

红旗

HONGQI

1

一九六一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六一年第一期★

目 录

社論：**在总路綫的**

偉大旗帜下前进…………… (1)

世界人民斗争的新形势……………于兆力 (6)

领导农业生产的几点經驗……………王任重 (17)

在胜利发展中的內蒙古文化教育事业………胡昭衡 (22)

中国革命

两个阶段的区别和銜接……………施东向 (29)



社 論

在总路綫的偉大旗帜下前进

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在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照耀下，我国人民已經胜利地度过了三个年头。这是具有偉大历史意义的三年。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国人民要以过去三年的巨大成就为基础，更加英勇奋发地前进。

三年来，我国在工农业战綫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国民經济的巨大跃进，使我們在一九五九年提前三年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計划工业生产的主要指标。在一九六〇年，我国重工业生产繼續保持跃进，鋼、鉄、煤、发电量、石油、机床、拖拉机等重工业产品的預計产量都完成了計划，有的还超过了計划。拿鋼产量來說，在这三年中几乎增加了两倍半，即从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到一九六〇年的一千八百四十五万吨，平均每年增加四百三十多万吨，而在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平均每年只增加八十万吨。在农业方面，我們在战胜了一九五九年的自然災害以后，又在一九六〇年同百年来最严重的自然災害作了英勇的斗争。人民公社日益巩固，农田水利建設有了巨大发展，这不但对于減輕这两年的自然災害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对于今后农业的增产将长期地發揮积极的作用。

特別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在这三年中，我們取得了在我国条件下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丰富而深刻的經驗，并且通过实践，使我們在社会主义建設的各个战綫上的具体方針和具体方法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完备。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通过这三年的实践，提高了觉悟程度，学到了許多新的本領和新的知識。

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設都要遵循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先进經驗也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設中所要学习的。但是，我們必須从我国的具体条件出发，才能正确地运用社会主义建設的普遍規律，有效地利用別国的經驗。从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三年，是我国已經完成了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取得在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決定性胜利以后的最初三年，这三年的社会主义建設的經驗具有特別重要的意义。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在一九五八年提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



針，这是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分析我国的实际状况，总结我国的建設經驗而制定的。通过这三年来的偉大实践，我們党的这条总路綫和这套方針經受了考驗，証明它們完全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发展的客观規律。这条总路綫和这套方針在若干具体内容方面，也通过实践而逐步发展和日益完善起来了。在处理大跃进的高速度和有計划的按比例的结合方面，在处理以农业为基础和以工业为主导的关系方面，在处理經濟建設中的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方面，在处理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的关系方面，在处理当前生产和基本建設、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生产和生活的关系方面，以及在劳动力安排、工业布局、計划方法等方面，在这三年实践中，都取得了許多經驗。一九五八年开始建立的人民公社，也經受了实际生活的考驗，人民公社內部的各項制度逐步地更加成熟。此外，我們还取得了在企业管理制度方面，在农业的增产措施方面，在工农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丰富經驗。所有这些經驗都是极端可贵的。

过去，我們的干部和群众学会了革命战争，他們是从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学会的。我們的干部和群众学会了革命，他們是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学会的。要真正学会社会主义建設的本領和知識，同样也必須經過实践。毛澤东同志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經驗时說：“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这个原理对于經濟建設也是适用的。从建設学习建設——这是我們今天从事建設工作的主要方法。为了做好社会主义建設工作，不仅需要生产技术方面的知識，也不仅要善于組織生产力，而且还要能够正确地处理社会关系。在革命中也必須正确地处理社会关系，但是，在建設中的社会关系又和在革命中不同，不經過实践也是学不会的。三年来的实践使人們在这几个方面都学到了許多知識。有些知識过去因为没有經驗，是不知道的；有些知識，过去虽然知道，但因为沒有經驗，还認識得不深切。尤其重要的是，这些有用的知識現在不仅为少数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員所学到，而且为各級广大干部和群众所学到了。三年来的国民經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发展，都是采取大規模的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在党的集中领导下进行的群众运动，是鍛炼干部，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觉悟程度，发挥群众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最有效的方法；也是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会社会主义建設的最有效的方法。当然不能认为，經過这三年，凡是我們應該学会的都学会了。我們今后还有严重的学习任务。但是無論如何，經過这三年，我們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設方面的本領和知識水平已經有了很大的提高，和三年以前的情形大不相同了。

人民群众是发展生产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最主要的力量。三年来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



五亿多农民的思想觉悟和组织程度的提高，精神面貌的变化，建设经验的积累，这将是在今后的建设事业中最积极地、最经常地起作用的因素。

在我们继续前进中间，必须十分重视这三年来所取得的丰富经验。认真地总结这些经验，将会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前进。

总结经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经常要使用的一种方法。在日常的工作中，我们做了一年的工作，就要把这一年的工作总结一下，做了一个月的工作，就要把这一个月的工作总结一下，在某一件工作告一段落的时候，就要把这一个月的工作总结一下。经常总结自己的经验，并善于总结经验的人，也就是善于从经验中学习的人。最近三年来，无论哪一个部门、哪一个单位的工作，都积累了许多经验，各级干部已经由于经常总结自己的工作而学习到了许多东西。但是，也还有许多经验没有被充分地研究和总结。如果在各个岗位上工作的干部能够把这三年的经验，系统地整理一下，认真地研究一下，毫无疑问，我们将能够从这些经验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任何一个工作部门的经验总结，都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总路线和政策为指导。只有这样，才能够看清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为什么应当这样做，为什么不应当那样做，等等。我们党的总路线和政策都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广大干部既然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大量的生动的经验，这就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领会和掌握党的总路线和政策。一般地说来，不通过亲身的经历，要真正懂得党的总路线和政策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是困难的。但是，如果使经验停留在零碎的片断的感性认识阶段，而不加以总结，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上升为对事物的规律性的认识，那末对党的总路线和政策也就了解不深或者只限于表面的了解，不能很好地掌握和贯彻。我们总结经验的一个主要目的，就在于使我们更深刻地、全面地领会党的总路线和政策，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并且使我们能够把党的总路线和政策更自觉地具体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来。

研究某个部门、某种工作的具体经验，就使我们对于这一部门的工作的客观规律性认识得更加清楚。对于各个部门的客观规律性认识得更透彻，就能够使我们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政策的内容更加丰富起来。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个新的事业。飞跃发展着的现实，向我们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不能认为，对于在我国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客观规律性，已经全部认识清楚了。这三年来的大跃进虽然使我们的这种认识大大提高了，但是仍然有不



少方面的工作的客观规律性，是我们一些同志所不认识的，或不充分认识的。认真总结我们的经验，使我们更好地掌握党的政策，更多地认识工作中的客观规律性，这样，就能够更加减少工作中的盲目性，更有把握地做好工作。

对待我们的经验，正如毛泽东同志经常指示我们的，必须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应当根据事实充分地估计我们工作中的成绩和成功经验，而且应当认真研究这些成绩是怎样得来的，这些经验为什么是成功的，这样，才有利于发扬这些成绩，推广这些成功的经验。在我们进行日常的工作的时候，眼光难免只看到一时一地；到了总结工作的时候，就能够把某一时期的工作同以前和以后时期的工作联系起来看，把本地区的工作和其他地区的工作联系起来看，把这一件工作同其他有关的工作联系起来看，把这一部门的工作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联系起来看。这样同前后左右联系起来，对一时一地的工作也就能够作出正确的估计，对于工作中的成功的地方可以看得更深切，对于工作中的弱点和缺点也更容易发现了。在大跃进的三年中，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绩表明，我们的成功经验是主要的，是经验中的主流，但是也有一些个别的、局部的不成功的经验。毛泽东同志说：“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这也就是说，我们既要善于从成功的经验中学习，也要善于从错误的经验中学习。

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三年大跃进的发展中，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这时候，就需要调整各个部门之间已经变化了的相互关系，巩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发展和变革中获得的伟大成果，充实新发展起来的一些事业的内容，提高那些需要进一步改善的新事物的质量。这样做，就会使我们的建设事业从现有的水平上大大提高一步。为了做好这样的工作，需要广大干部和群众保持冲天的干劲，同时也需要认真地从过去的三年经验中学习，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细致、更好。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我们的远大目标说起来，现在还只是走出了第一步。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进一步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还要克服许多困难，解决许多新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的第一步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方向已经明确，引导我们达到最后胜利的道路已经打开。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绩使我们感到鼓舞，我们所遇到的一切困难只是更加激发了我们前进的志气。



一九六〇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遭到严重的困难。在一九六〇年全国有九亿亩耕地受到程度不等的自然灾害，其中三亿至四亿亩受到了重灾。这不但很大地影响我们一九六〇年的农业生产不能完成计划，而且也不能不对轻重工业的生产造成不利的条件。由于我国人民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刻苦努力，才使得一九六〇年的重工业生产继续保持跃进。同时还必须看到，过去两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势必还要影响到今年工农业生产的若干方面。因此，我们必须继续艰苦奋斗，发扬勤俭建国的精神，来克服由于农业歉收而造成的困难，并且在新的一年中，用更大的努力，从其他方面省出更多的资金，节约出更多的劳动力，来加强农业战线，争取农业情况的好转。由于我国农业的机械化程度还很低，农业生产基本上是靠人力和畜力，要消除这严重灾害所造成的影响，是一件极其艰巨的事。这是当前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

中国人民曾经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战胜了一切国内外的敌人。中国人民在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时候，就已经预计到，在建设道路上同样会遇到各种严重的困难，灾荒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既然能够在革命中战胜一切国内外敌人，我们也一定能够在建设中战胜包括自然灾害在内的一切困难。

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统一的国家计划之下进行的。每一个局部必须服从整体的利益；各个地方、各个部门必须在统一的国家计划下密切地互相联系，组成为全国一盘棋。在我们党内来说，就是：全党要服从中央；高度的纪律性和高度的创造性是一个统一体，不能把这两方面割裂开来；要发挥高度的创造性，就要有在党中央集中领导下的高度纪律性。各级干部都应该在经济工作上更加提高纪律性，更加严格地遵守党和国家的统一的政策，使各个部门、各个地方的积极性，在统一的国家计划的范围内充分地发挥出来。各级干部必须进一步整顿作风，关心群众的生活，密切地联系群众，把党和国家的政策交给群众，在统一的目标下充分发扬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就是我们必胜的保证。

以过去三年跃进的伟大成绩做起点，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引导下，全国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周围，继续奋勇前进，就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取得新的胜利。



世界人民斗争的新形势

于 尧 力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第一年，一九六〇年过去了。

过去的一年，是社会主义阵营进一步巩固、发展和更加团结的一年，是社会主义体系的影响更加增长的一年。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发布的声明，是声讨帝国主义的檄文，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团结的新的纲领。这次会议的成就，使全世界人民受到鼓舞，使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感到沮丧。帝国主义的舆论，不得不承认，“莫斯科声明所坚决主张的是共产主义革命日益扩展的辉煌未来。”他们不能不担心，声明在世界范围内要发生巨大影响。

帝国主义者害怕我们团结，他们从来都指望我们分裂。但是，正如声明所说，“帝国主义者、叛徒和修正主义者指望社会主义阵营可能分裂，这种打算是建筑在沙子上的，是注定要破产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像保护眼珠一样，保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这一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结果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从朝鲜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越南到阿尔巴尼亚，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永远是最亲密的弟兄。帝国主义者的任何挑拨离间、造谣诬蔑，绝不能使我们这种伟大的团结受到丝毫的损害。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的发表，对于那些指望我们分裂的帝国主义分子之流，不能不是严重的打击。法国的一家报纸说：“这一声明使那些洋洋得意地希望共产主义世界发生内部分裂的人的幻想破灭了”。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团结，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团结、中国和苏联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团结，对于促进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促进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和胜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刘少奇同志在最近访问苏联时说：“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具有长期的根深蒂固的历史基础；在我们的面前还站着强大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我们两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共同斗争的任务和严重的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任务；资本主义世界总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以上



的人民都要求革命，要求世界和平，都要求社会主义阵营、首先是中苏两大国的联合支援。因此，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的人民，和资本主义世界总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都强烈地要求中苏两党两国的坚强团结。”同帝国主义的愿望相反，这种团结正在不断地加强。

在过去一年中，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取得了新的胜利。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以及欧洲的某些倾向于和平中立的国家，发展了和平共处的友好关系。

中国，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一贯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多年来，我国一直根据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处理我国同亚非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过去一年中，我国在执行和平共处政策方面的成就特别显著。在这一年里，中国同缅甸、尼泊尔、阿富汗、几内亚和柬埔寨接连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或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这些条约，丰富了和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中国同缅甸签订的中缅边界条约，全面地彻底地解决了几十年来中缅两国人民一直渴望解决的复杂问题，使长达两千多公里的中缅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并且为亚洲各国人民友好相处树立了一个好榜样。最近，我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政府根据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通过和平协商，就双重国籍问题条约的实施办法达成了协议。在这一年里，我国还同非洲的一些新独立国家和古巴新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同许多国家建立了文化和经济关系。中国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的友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有了重大的发展。

在最近召开的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赫鲁晓夫同志率领的苏联代表团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一起，有成效地宣传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苏联代表团提出了反对殖民主义制度的独立宣言，再一次提出了全面彻底裁军和禁止核武器等一系列的建议，并且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问题上，同许多国家的代表团一起，向坚持继续剥夺我国权利的帝国主义者进行了严正的斗争。在这次会期间，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友好活动。美国虽然还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操纵联合国会议上的表决机器，但是，已经开始出现失灵的局面。这次会议，通过了亚非四十三个国家提出的关于给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这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一切新老殖民主义者来说，都是一次政治上、道义上的沉重打击。通过这次会议上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的代表团的联合努力，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清楚地表明了：谁愿意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并且采取了种种建设性的步骤；谁在坚持“冷战”政策，拒绝采取任何有利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行动。

一九六〇年，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建设，有了新的高涨。苏联的工业生产预计超额百分



之三完成年度计划，工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十。苏联在一九六〇年连续发射了三个宇宙飞船，标志着苏联在尖端科学技术方面，继续把美国远远地抛在后面。中国的国民经济，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一九五九年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生产的主要指标的基础上，虽然农业遭到了百年来最严重的自然灾害，轻工业生产也受了影响，但是重工业仍然保持着继续跃进。在中国，农村和城市的人民公社，已经日益巩固，并且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也同样取得了新的巨大的成就。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成就吸引着全世界广大的劳动人民，增强着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着各国人民为争取美好未来而斗争的信心。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指出：“社会主义在它的整个体系的范围内，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些胜利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这些胜利向受资本压迫的各国人民明显地说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为经济和文化繁荣，为保证人们的高度生活水平和和平幸福生活，开辟无限的可能。”

二

一九六〇年是民族解放运动新高涨的一年。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兴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风暴。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体系正在全面崩溃，美帝国主义所推行的新殖民主义遭到了越来越强烈的打击。

古巴人民，在最接近美国的地方，继续高举着胜利的革命旗帜。在一九六〇年，美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古巴的干涉和破坏。美帝国主义的破坏和干涉一次又一次地被古巴人民击败。古巴革命的胜利发展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美国干涉古巴革命的斗争，是一九六〇年拉丁美洲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焦点。

古巴的革命斗争和拉丁美洲其他各国人民的斗争，是互相促进、互相支持的。在拉丁美洲已经形成了极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一年来，巴西、阿根廷、智利、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玻利维亚、秘鲁和洪都拉斯等国人民，为保卫国家资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先后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斗争，其中不少国家还展开了反对美国建立导弹基地和军事基地的斗争。巴拿马人民举行反美示威，要求美国归还巴拿马运河区主权。厄瓜多尔也掀起了大规模的反美示威。波多黎各人民要求摆脱殖民地的地位。在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巴拉圭、危地马拉这些被露骨的亲美独裁政权统治的国家里，人民群众展开了武装斗争。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正方兴未艾。这个强大的人民运动的兴起，严重威胁着美帝国主义的后方，大大地壮大了世界人民反帝斗争的力量。

非洲人民的广泛觉醒，是一九六〇年的重大事件。一年来，在广大的黑非洲，有十七个国家相继摆脱了殖民地的地位而宣告独立。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正到处以全民运动的规模



开展起来。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者的脚下，无一处不是燃烧着烽火土地。在非洲展开的争取自由和民族独立的反殖民主义运动，猛烈地冲击着世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最后障地。非洲人民正在进入自己历史上的新的阶段。

阿尔及利亚人民愈战愈强，愈来愈得到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而法国侵略者愈战愈弱，愈来愈在国际上陷于孤立。法国殖民者在用残酷的殖民战争不能取胜的情况下，采用政治欺騙的手法，妄图誘使阿尔及利亚人民投降。阿尔及利亚人民識破了法国殖民主义者的这种阴谋詭計，他們在以阿巴斯总理为首的临时政府的领导下，决心将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进行到底。最近，法国占领区内的人民，不顾殖民者的血腥镇压，奋起举行了争取民族独立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斗争。

非洲的斗争局势仍然是十分复杂的。老牌殖民主义者，一方面采用血腥镇压的手段，一方面采用怀柔欺騙的阴谋，力图保持他們的最后的障地。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者，也趁机插进来。因此，非洲人民不仅要同老殖民主义者进行艰巨的斗争，而且还要同更加阴險更加狡猾的新殖民主义者进行艰巨的斗争。刚果人民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斗争。正当刚果人民反对比利时殖民者的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却趁机而入，在“联合国”旗号的掩护下，对这个年轻的国家进行了侵略和干涉。新老殖民主义者恣意踐踏刚果的国家主权，阻止刚果的合法政府行使自己的职权，镇压刚果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扶植刚果的民族叛徒进行各种叛乱和分裂活动，使刚果局势一直陷于极端混乱的状态。美帝国主义在刚果以自己的赤裸裸的暴行，充当反面教员，深刻地教育了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一切争取民族解放的人民，告訴他們：帝国主义不但不会把独立恩賜給殖民地人民，而且无时无刻不在想卷土重来，从人民的手里夺走胜利果实；因此，对于一切帝国主义者，都不能抱任何幻想，要争取彻底的民族解放，必須依靠自己的坚决的长期的斗争。

一九六〇年，在亚洲兴起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巨大斗争風暴。

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争取和平、民主和民族独立的持續不断的强大的人民群众运动，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一九六〇年四月以来，日本人民連續举行全国规模的统一行动。群众运动的规模，在日本人民的斗争史上是空前的。日本人民群众的坚决斗争，迫使美帝国主义首脑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撤消訪日計劃，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岸信介下台。这个斗争正在繼續发展。日本人民的英勇斗争，是广泛的群众性的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一个范例。

南朝鮮人民推翻了美帝国主义的老走狗李承晚，土耳其人民也推翻了美帝国主义走狗曼德列斯。尽管这两个地方的斗争仍然是艰巨的、长期的，但是那里的人民争取胜利的信心大大增强了。

一九六〇年八月，老撾发生了爱国的军事政变，民主、进步和要求和平中立的力量，推



翻了原来的亲美卖国和坚持反革命内战的独裁政府。美帝国主义者对于老挝人民要求和平中立的愿望，公然采取敌视的态度，变本加厉地对老挝的内政进行露骨的干涉，在老挝重新挑起了内战。美国在老挝的政策，正如新加坡“海峡时报”所说：“已故的杜勒斯的幽灵已经降临老挝。就是他那一种边缘政策，把这个小小王国推入内战。”美帝国主义这个反动的政策，严重地威胁着印度支那地区和亚洲的和平。现在，老挝人民正在坚决地开展反对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武装斗争。老挝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得到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坚决支持。

现在，在全世界各个地区中，美帝国主义都亲自出马充当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凶手。拉丁美洲向来被美帝国主义视为独占的禁区，在西太平洋地区，在中东地区，美国也早已以宪兵自居。一九六〇年，美帝国主义又在非洲人民面前显示了它的狰狞面目。去年九月中旬的一期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说：“直到今年（一九六〇年——作者）夏天，美国人还认为非洲是硕果仅存的唯一能主要由他们的盟国担负监护责任的大陆。现在，非洲也一古脑落在他们的肩上了。”美国在许多国家中所扶植的、所依靠的反动统治势力，或者已经倒台，或者摇摇欲坠。和美国合伙行劫的同盟国，或者自身难保，或者另有打算，使美国不能信赖。因此，美帝国主义不能不亲自出马维护世界各个地区的殖民主义制度，这是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的一个反映，也是各帝国主义国家相互矛盾的尖锐化的一个表现。一九六〇年有无数新的事实证明莫斯科会议声明中的这个判断：美帝国主义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是全世界人民的敌人。

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正义的火炬在世界各处高高举起来了。美帝国主义妄图到处扑灭民族解放斗争的火焰，结果，它的力量就不得不分散到世界各处。“经济学家”杂志也不能不为“美国在非洲所突然面临的问题之艰巨”和美帝国主义“用来应付这些问题的武器之渺小”表示慨叹。形势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美帝国主义自己制造了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这些国家的人民。美帝国主义已经使自己套进了无数摆脱不了的绞索。这些绞索正被各国人民拉得越来越紧。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有力地打击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民族解放运动越是发展，就能给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越大的打击，世界和平就越有保障。无论古巴人民的斗争，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刚果人民的斗争，日本人民的斗争，老挝人民的斗争，都是对保卫世界和平的重要贡献，事实已经使人们越来越看得清楚了。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的暴风雨，不能不使帝国主义感到强烈的不安。“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篇社论说：“一九六〇年是一个叛乱的年头，这种叛乱，在世界范围的公民暴动中差不多将达到创纪录的程度。”帝国主义者把民族解放运动诬蔑为“叛乱”，把它看作不



祥之兆。他們认为不好的事情，正是全世界人民所认为的大大的好事。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漲，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灭亡，是我們时代的一个主要内容。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声明指出：“殖民主义的完全崩潰是不可避免的。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殖民主义奴役制度的瓦解，就其历史意义說来，仅次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

三

一九六〇年，是帝国主义更加衰落、更加腐朽，內部矛盾更加尖銳的一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日子是一天天更加不好过了。

經過了一九五七——五八年的經濟危机以后，美国的經濟在一九五九年才开始有了某些回升，到了一九六〇年，在許多重要生产部門的生产指数还没有完全恢复到一九五六年底的最高峰的时候，情况就又发生了逆轉，出現了經濟危机的症候。

从一九六〇年二月至七月，美国的工业生产呈現了停滯状态。八月以后，就連續下降，到十一月，比一月下降了百分之五点四。工业开工普遍不足，生产設備能力过剩的情况极为严重。作为美国經濟的三大支柱之一的鋼鉄工业，从一九六〇年夏季以来，开工率一直在百分之五十左右。十一月份的失业工人已有四百多万人。

美国的农业长期处在生产过剩的危机状态中。目前，剩余农产品的价值将近一百亿美元。一九六〇年美国农产品收成虽然比一九五九年略有增加，但是由于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的收入反比一九五九年减少，中小农户大批破产逃亡。

美国广大劳动人民的购买力正在繼續縮减，企业存貨大大增长。一九六〇年九月底，企业存貨达九百三十二亿美元，比一九五七——五八年危机时的最高点九百一十三亿美元还多。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目前財政金融状况十分恶化。近几个月来，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黄金儲备急剧下降。到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美国的黄金儲备已下降到一百七十九亿二千多万美元，比资产阶级經濟学家所規定的“危險点”一百八十亿美元还低。不久以前，“华尔街日报”刊出的一篇文章，承认美国面临的“衰退”“不但是周期性的”，而且将是“严重和持久”的。

美国这个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面临着經濟危机，必然会給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經濟带来严重的威胁。美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企图把自己的危机轉嫁給它的同盟者，主要是英国、法国和西德等国，而这些国家则力图抵抗美国的压力，使自己不致受到牵累，并且企图趁机加强自己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这样，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間就展开了纵横捭阖的斗争。

尽管美国还是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最大財主，但是，它的經濟地位正在下降。近年来，其他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經濟力量已經相对地加强。西欧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发展速度



大大超过了美国。以一九五九年的工业生产同一九五三年比，美国只增长了百分之十五，而西德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二，法国增长百分之五十九，英国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一九六〇年上半年和一九五九年同期相比，美国只增长了百分之四点二，而西德却增长了百分之十二点六，法国增长百分之九点三，英国增长百分之十一点四。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引起帝国主义各国间的尖锐斗争。这种斗争，在美国的黄金储备急剧下降、国际支付发生危机的情况下，更加激烈和表面化了。美国为了解救国际支付危机，要求它的盟国分担美国在海外的驻军费用和“援外”开支、取消美国货入口限制、降低关税等等，却遭到它的盟国的拒绝，首先是西德的拒绝。法国还趁机要挟美国同意让它分享北大西洋集团的领导权。英国也只是但愿美国从它的竞争对手西德身上去挤油水。一年来，不但美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彼此之间的矛盾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过去一年中，西方的政治首脑和经济领导人，进行了特别频繁的相互接触，但是，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阻止帝国主义集团走向四分五裂的过程。

在资本主义日益腐朽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浪潮日益高涨。工人阶级和其他在垄断资本统治下受害的人民，为反对垄断资本、改善生活条件、争取民主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正在不断地发展。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情况，正如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所正确指出的，是“处在一个深刻的衰落和瓦解的过程中”。

当然，帝国主义决不因为处境困难而甘愿放弃自己的阵地。美国统治集团在一九六〇年五月用挑衅和侵略行动破坏了巴黎四国首脑会议，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为了挽回军事上的颓势，美国正在加紧发展核武器和导弹的生产。美国的军事基地，早已遍布资本主义世界各地，最近又在海外建立和加强导弹基地。为了适应准备核战争的需要，美国宣布成立了一个中央军事计划机构。美国除了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军事集团之外，去年又勾结日本反动派签订了日美军事同盟条约，同时，在西欧还加紧了复活西德军国主义的罪恶活动。现在，西德军国主义已经复活，并且已经开始积极向外进行军事扩张。

由于和平力量的空前壮大和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广泛开展，世界和平的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曾经不得不装出“爱好和平”的姿态。但是，它的这种伪装“和平”的手法，已经为自己的侵略活动和备战活动所揭穿。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灾难。各国的工人、农民、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和平人士，都是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受害者，他们都站在或者可以站在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方面来，他们



占人类的絕大多数。革命的人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帝国主义好战集团和各国反动派，則只有一小撮人。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人民，組成反对帝国主义的統一战綫，是击败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重要保証。这个統一战綫越广泛、越强大，斗争越发展、越深入，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就越难以得逞，世界和平也就越有保障。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明确地指出：“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和积极的行动，能够维护住和平，防止新战争。”

四

当新的一年，一九六一年开始的时候，我們回顾了一年来世界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更清楚地看到：在世界舞台上，社会主义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帝国主义，和平力量日益明显地超过战争力量。

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风暴席卷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由于全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浪潮汹涌澎湃，美帝国主义已經陷于空前孤立的地位。这种形势，美国的統治集团已經深深地感觉到了。当选为美国新总统的肯尼迪承认：“我們在国外的威信、地位以及我們的影响已經全部下降，这是无可争辯的事实。”“美国正在丧失全世界的尊重”。他惊呼“变革的狂風正席卷全世界”，大声叫喊要“正視我們的实际情况”。美国资产阶级的政論家李普曼，在他的評論中也曾經多次談到美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声誉扫地的狼狽相。他說：“在考虑到日本、朝鮮、冲绳、越南发生的情况时，难道对于我們在远东的地位已經恶化还有什么疑問嗎？难道对于我們的地位在土耳其被削弱，在伊朗变得虛弱，在巴基斯坦变得不肯定的这一事实还有什么怀疑嗎？”“美国在世界力量对比中的相对地位已經明显地下降了。在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不仅在古巴、剛果、阿尔及利亚和老撾，在处理同我們的盟国的关系方面，我們的外交越来越失效，而且常常是使人感到难堪地失效。”

资本主义經濟的状况也使他們无法表示乐观。肯尼迪自己承认，美国經濟有五大毛病：一，“第一个和最广泛的失敗是在我們的經濟增长率方面。”美国經濟的增长速度，“不仅低于苏联，而且低于西欧和日本”。二，“我感到不安的第二件事是失业”。三，“我对定期出現衰退（即經濟危机——作者）的情况感到不安。一九五二年以来已經出現过两次衰退，而正如‘华尔街日报’已經警告的，第三次衰退可能現在已經出現了。”四，“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物价不断上漲的情况感到不安”。五，“对我国的国际收支和最近我国黄金外流有着正当的不安”。

在这种条件下，許多资本主义的謀士越来越迫切地向自己提这样的問題：究竟资本主义能不能永久存在下去。肯尼迪說：“在这个资本主义正在受到考驗的时代，我們不能采取一項不是最好的政策。的确，我們只有使资本主义起作用——为它服务，也使它为我們服务——



资本主义才能永久存在。”但是，肯尼迪实在提不出什么“最好的政策”。已经病入膏肓的美国经济，实在也找不到什么医治的妙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企业展望”一文肯定地说：“肯尼迪当选总统不会使企业前景有多大变化”。

肯尼迪主张美国的国防开支必须以需要而不是以预算为根据，要求继续增加军事拨款。他建议美国应立即采取的步骤是：一方面，必须竭力发展所谓威慑力量，“弥合导弹差距”，“我们应当准备不论这方面花多少钱我们就付出多少钱”；另一方面提出，“我们使用常规武器进行有限战争的部队必须现代化和得到足够的机动性”。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肯尼迪政府将改变加紧扩军备战的政策。

在美国政府继续坚持发展核武器和坚持准备核战争的情况下，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提出的以下的号召是十分重要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还没有过去。”“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要求各国人民保持特别高的警惕。”同时，我们坚定地相信，保卫和平的力量正在加倍迅速地增长着，只要提高警惕，加强斗争，帝国主义的罪恶计划是能够制止的。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统治集团中有一些人，强调地提出所谓“灌木林火式的战争”或“灌木林火式的和平”的主张。这个观点，“纽约时报”曾经连续著文加以说明。他们认为，“今天我们能够打的战争只有灌木林火式战争。今天我们能够希望作出的和平只有灌木林火式和平。”这种所谓“灌木林火式战争”的定义是：“它在地理上限制在一个具体的区域内，而且在这种战争中只使用所谓常规武器，或是至多使用战术性核武器。”他们公开宣称，“灌木林火式的战争”是在今天的条件下推行他们的帝国主义政策的最合适的手段。其实，这种方案，只不过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十五年来所充当的国际宪兵角色的经验总结。

我们共产党人不但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准备发动新的世界战争，而且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这种局部侵略战争。我们认为，如果听任帝国主义发动局部侵略战争并在这种战争中得逞，就有可能发展成为世界大战。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说：“共产党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从来反对革命输出。同时，它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反革命输出。它们认为自己的国际义务是号召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动员自己的一切内部力量，积极行动起来，并且依靠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力量，防止和坚决回击帝国主义者干涉任何一个国家的奋起革命的人民的事务。”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世界上所发生的一系列的局部战争的态度，一贯是十分明确的。我们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所进行的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坚决反对和制止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的非正义的反革命的战争。正因为我们相信世界大战是可以防止的，所以我们毫不怀疑，在现代条件下，有可能制止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发动的反革命的局部战争变成为世界大战，而且能够使各个国家的革命战争的胜利有利于扩大世界和平力量，削弱帝国主义的战争力量。



美国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在谈到“灌木林火式和平”的时候宣称，今后要利用各种方法和途径，在思想战线上对社会主义国家展开“新的巨大的攻势”，他们妄想“促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和平演变”，以便“在内部完成西方在外部所不能完成的事情”。他们还特别热心于挑拨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主张灵活地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拉开”，并且要“挤进”社会主义阵营的“每一个新的裂缝”。甚至公然说，“我们应该寻找分裂它们的新的办法”。可以断言，他们的这套所谓和平取胜的战略，只不过是梦想而已。就像永远看不到太阳从西边出来一样，帝国主义者永远不会看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永远不会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什么“和平演变”。

我们共产党人的态度是很明确的。莫斯科会议声明指出：“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和进行经济竞赛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各国对外政策的不可动摇的基础。”我们一贯主张，一切国际争端都应该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对于一切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谈判，我们都是积极支持的。当然，我们从来不把世界和平的希望主要地寄托在这种谈判上面。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帝国主义是否接受同我们的谈判，谈判是否能达成协议，达成的协议是否不被帝国主义所破坏，主要地决定于各国人民的斗争，首先是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紧密团结和日益强大。

许多评论家都指出，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将更加着重于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侵略。肯尼迪和他的伙伴们认为，争夺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领导”，是两大阵营力量对比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肯尼迪说：“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是：它们（指新独立国家——作者）将期望从莫斯科那里得到这种领导呢，还是将从美国这里得到这种领导。”他们的主张是，美国应伪装成“自由的朋友”，“同情”革命，扩大“经济援助”，维持“必需的军事援助”，把“流血革命”变为“有秩序的和平演变”，一方面抵抗所谓“共产主义的威胁”，一方面排挤英、法老牌殖民主义势力，达到美国控制中间地带的目的。

这种主张其实并不是什么新发明。美帝国主义者早已实行了这种主张，而且他们曾经依靠这种狡猾的手法在一定范围内收到过一些暂时的效果。但是这种狡猾的手法终究掩盖不了美帝国主义的穷凶极恶的面目，许多新独立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已经识破了美帝国主义的毒计。美帝国主义者想用伪善的“同情”和带着血腥气的“援助”，来阻挠被压迫的人民争取彻底解放，必定会越来越遭到失败。

一九六一年，将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人民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取得更大的胜利的一年。正如莫斯科会议声明所指出的：“完全彻底消灭殖民主义制度的一切形式和一切表现，是近几十年来整个世界历史进程所要求的。”声明为新独立国家指出了正确的道路：“摆脱了殖民主义压迫的国家，只有在同帝国主义、同封建主义残余进行坚决斗争的条件下，把本民



族的一切爱国力量结成民族民主统一战线，才能够顺利地解决民族复兴的迫切任务。巩固政治上的独立，进行符合农民利益的土地改革，消灭封建主义残余，清除帝国主义统治的经济根源，限制外国垄断组织并把它們从经济中排挤出去，建立和发展民族工业，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使社会生活民主化，实行独立的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同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友好国家发展经济和文化合作——这些全民性的民主任务，就是已经获得独立的各国民族进步力量能够联合起来、而且实际上也正在联合起来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朋友，帝国主义国家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敌人，这是社会制度决定了的。在争取民族解放的国家里，帝国主义者所能“领导”的对象，只是被这些国家的人民所唾弃的一小撮反动派，而绝不是这些国家的人民。

在新的一年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建设事业必将获得新的光辉的成就，社会主义国家也必将继续坚决地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坚决地支持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威力和国际影响及其在人类历史上的决定作用都将日益增长，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

莫斯科会议声明正确地指出：“所有革命力量都在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人民，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一般民主运动——所有这些当代的伟大力量，正在汇合成为一股冲击和摧毁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的洪流。”可以预料，在一九六一年，这股洪流将有新的巨大的发展。可以预料，在一九六一年，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资本主义世界中争取民族解放、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浪潮，一定会出现新的高涨。

在新的一年里，全世界人民的大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的大团结，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的大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团结，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团结，一定会有进一步的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这一切团结的核心。这种伟大的团结是世界和平最有力的保障。莫斯科会议声明指出：“各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团结，是联合工人阶级的一切力量、联合民主和进步力量的最重要的条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在它们争取全人类的光明未来、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伟大斗争中取得新胜利的保证。”

世界各国人民完全有理由充满信心地展望新的一年。在我们面前还有复杂的艰巨的斗争，但一片光明照耀着我们的前途。新的一年的国际形势的发展，将更加有利于社会主义，更加不利于帝国主义，更加有利于世界和平力量，更加不利于战争势力，更加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更加不利于老的和新的殖民主义势力，更加有利于各国人民，更加不利于各国反动派。总之，新的一年将是东风继续压倒西风的一年，这是毫无疑问的。



領導農業生產的幾點經驗

王任重

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湖北省同各個兄弟省一樣，在農業戰綫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農業合作化以後的三年（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八年），主要農產品的產量都是逐年上升的。一九五八年，一部分地區先澇後旱，但是這一年增產的幅度特別大。一九五九年全省碰到了七十二年來沒有過的大旱，一九六〇年七月中旬起，全省大部分地區又是五、六十天久旱不雨。經過全省人民英勇頑強的鬥爭，大大地減輕了自然災害的損失。一九五八年的大豐收，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在抗災鬥爭中所取得的勝利，以及一九五七年冬季以來在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地證明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無窮威力。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指示，現在全省正在更高地舉起三面紅旗，掀起一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新高潮。形勢要求我們認真地總結經驗，進一步提高領導農業生產的水平。

就全省各個地區的情況來看，農業生產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在正常年景，有的地方增產多，有的地方增產少，有的地方不增產。在一九五九年特大旱災的情況下，有的地方減產多，有的地方減產少，有的地方不但沒有減產，而且增了產。在湖北省各專區中，襄陽

專區的成績是比較突出的。這個專區的自然條件並不好，過去是著名的低產區。近幾年來，這個專區的生產面貌開始改變了：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六年，糧食增產百分之二十點一，棉花增產百分之一百五十七，油料增產百分之一百三十五點六；在一九五九年特大旱災的情況下，糧、棉、油料仍然分別比一九五六年增產百分之十九點九、百分之六十五點五和百分之二十三點一。一九五六年，這個專區的糧食總產量和商品糧食的数量，在全省六個專區中居第四位，一九五九年一躍而居第二位，一九六〇年進而居于第一位。襄陽專區所屬各縣的情況也是不平衡的，其中隨縣、棗陽縣、均縣增產的幅度比較大。這三個縣在一九五九年大旱的情況下，糧食的產量都比大豐收的一九五八年增加百分之十三以上。比起這些先進的地區來，沿長江兩岸的某些地區，這幾年來的進步則比較緩慢。認真地研究這種生產發展不平衡的情況，從中可以找到寶貴的經驗教訓。

農業生產以糧為綱，全面發展，是各個地區必須堅決執行的方針。為了貫徹這個方針，根據湖北地區的一些特點，必須實行下面三個“並舉”：擴大耕地面積和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並舉，夏收作物和秋收作物並舉，主糧和雜糧並舉（包括水稻和旱作物並舉）。



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举，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增加总产量。襄阳专区，特别是随县、枣阳县、均县，过去几年来，就是既抓住了扩大耕地面积，又注意了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因此总产量得到了比较大幅度的增长。有些地方，由于只注意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而忽视了扩大耕地面积，因而耕地面积不但没有扩大，甚至还缩小了，结果单位面积产量虽然有所增加，但总产量增加很少，个别地方甚至还降低了。这就说明，为了达到增产，必须既要积极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又要积极地扩大耕地面积，两方面都要抓紧。在一个地区，究竟如何具体实行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举，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例如，在劳动力多、耕地少，而又有大量宜于开垦的荒地的地方，就应当以扩大耕地面积为主。在劳动力少、耕地多而可垦荒地很少的地方，就应该以提高复种指数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主，同时尽可能利用可以利用的土地，保证耕地面积有增无减。在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的耕地面积已经很大，而又有大量宜垦荒地的地方，就应当在种好现有耕地的前提下，再去适当扩大耕地面积。必须肯定，耕地多是一件好事。一般的说，哪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耕地面积大，那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粮食和商品粮食就比较多。荆州专区和襄阳专区平均每人都有三亩左右的耕地，历年来商品粮食也就比较多。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〇年五年总计，八十二万人口的随县的商品粮接近于五百五十多万人口的黄冈专区。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前者平均每人有三亩耕地（其中水田占一半以上），而后者平均每人只

有一亩半耕地。群众说：“无土砌不起来墙，地少不能多打粮”，这是正确的经验之谈。有些同志担心，耕地多了会加剧劳动力紧张、抢不住季节等方面的矛盾。其实这是一个作物安排和劳动力安排的问题。安排不当，可能会增加矛盾。而只要安排得当，应当说，耕地增多了，耕作机动权也就大些。耕地越多，越便于安排作物，错开茬口，避免活路过分集中。

夏收作物与秋收作物并举，是适合于湖北省的自然条件的。湖北省气候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雨水多集中在春夏两季，十年当中有八、九年闹秋旱。因此，晚秋作物常常不可靠。一九五四年，夏季受到那样的大水灾，一到八月就缺雨，有很大一部分晚秋作物旱死了。反之，夏收作物、中稻和早秋杂粮则比较能保收。襄阳专区这两年所以能够在遭受大旱灾的情况下获得丰收，除了过去几年的水利建设搞得好的以外，在作物安排上夏收作物占的比重大（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也沾了大光。他们的水稻绝大部分是中稻，早秋杂粮也比较多，而晚秋作物的比重则较少。沿江某些县、社，这两年生产上进展缓慢的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晚稻占的比重太大，夏收作物种的太少。同水旱灾害作斗争，一方面需要兴修水利，改革排灌工具；另一方面，还需要根据气候变化的规律，巧妙地安排作物，尽可能躲开灾害的袭击。实行夏收作物和秋收作物并举，也就是在保收的前提下力求增产，多设几道防线，以便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实行主粮和杂粮并举（包括水稻和旱作物并举），一方面是为了尽可能增加产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粮食品种多样化，满足



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多方面的需要。襄阳专区增产粮食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在兴修水利的基础上，积极地发展水稻，同时又积极地发展薯类和其他旱作物。如均县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六年增产粮食七千五百万斤，其中水稻占四千二百万斤，红薯占三千一百多万斤。但是，在这个专区的某些地方，也曾经片面地强调“水稻化”、“发展高产作物”，不适当地减少了当地某些群众生活必需的粮食品种。例如：枣阳县的某些岗地，就曾经把高粱当作“低产作物”而取消了。但是这些地方缺乏树木柴草，群众向来主要是依靠高粱秆作柴烧，并且用以作建筑材料和编制席子、锅盖、扫帚等许多用具。高粱被取消以后，烧火多用麦秸，这就影响冬季耕畜所需的饲料，而且没有高粱秆，修补房子、做用具等等都发生了困难。因此现在不能不适当地恢复种植一定数量的高粱。还有些地方，在水利条件不具备或者在土质、气候等条件不适合的情况下，也勉强地把旱地改成水田，种植水稻，结果不仅不增产，反而减产。

最近几年来，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总结的农业“八字宪法”作为基本内容，在湖北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农业技术改革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几年来农业生产的发展，抗灾斗争的胜利，是与技术改革的胜利分不开的。许多改革的成果，特别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成果，将造福子孙后代。但是，技术改革的进展情况也是不平衡的。有的地方改的比较多，比较快，比较好，有的地方改的比较少，比较慢，比较差；大部分改革是对头的，收效好，也有一小部分改革是带有盲目性的，收效不好。

积极地进行技术改革，为实现农业的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为建立现代农业而斗争，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农业生产是一门科学，必须用严格的科学态度去对待它，千万不可草率从事。农业生产的周期很长，在关键性的季节和关键性的问题上，措施不当，往往会影响到一季、一年，甚至下季、下年的收成。因此改革必须既积极又慎重。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本着依靠群众，因地制宜，不违农时的原则，达到增加产量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也就是说，必须在保收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以达到尽可能提高产量的目的。毛泽东同志“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的名言，在向自然开战方面，也是完全适用的。

为了使技术改革收到预期的效果，减少盲目性，首先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倡的“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的方针。根据过去的经验，农业生产上一项比较重大的改革，一般说应当经过重点试验、多点试验和普遍推行这几个步骤。一项重大的改革，如品种改良、耕作制度的改革、改良农具的采用，从试验到普遍推广，一般需要几年的时间。这几年的时间，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发动群众，使新事物生根、开花、结果的过程。对于改革，要有满腔热情，在试验当中要有百折不挠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缺乏热情，碰了一两次钉子就心灰意懒，那是什么也搞不成功的。但是任何一项改革，如果不在当地试验成功，就冒冒失失地推广，那就可能浪费人力物力，造成重大损失。任何一项改革，哪怕已经在当地试验成功，如果群众还不接



受，还没有为群众所掌握，也是不能急于推广的。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要积极而又耐心地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和试验工作，真正在群众自觉自愿、口服心服、会做会用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推广。有一个时期，双轮双铧犁吃不开，我们一方面坚决维护它的名誉，一方面耐心地等待，现在双轮双铧犁在平原和丘陵地区吃香得很了，大家抢着用。岱字棉、南大二四一九小麦、胜利和稻谷等优良品种，经过逐步推广，只几年工夫，已经在全省普及了。这些改革受到群众欢迎，达到了增产的效果。相反，有些地方违背了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的方针，在改革中有很大的盲目性，造成了减产的损失。这是十分重要的经验教训。

农作物种类繁多，特性各异，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特别密切，有强烈的地域性和季节性。在此时此地是高产作物，在彼时彼地就可能是低产作物；在此时此地是增产措施，搬到彼时彼地就可能造成减产；在这里应当清明播种的作物，在那里也许应当谷雨播种。例如，在鄂西北山区有一种叫“爬山鸡”的豆类作物，每亩产量只有几十斤。但是它有一个极大的优点，种别的作物无收的贫瘠土地，它照样有收，所以在这些地里它就是“高产作物”。一般说，水稻是高产作物，但是把它搬到高寒山区，往往就变成了低产作物。在水源、气候、土质等条件适宜的地方，把旱地改成水田，种水稻，是有效的增产措施。但是有些原来种水稻的漏水田，改种旱作物，反而能够既保收又增产。一般说，条播是先进的播种方法，它比撒播或点播能够增产而又省工，但是陡坡地、块子太小的地或者同前茬作物套种的地，就不适宜于条播。在一

定的条件下，每一种作物的播种期、密度、施肥量等都有一个合理的限度，“过”或“不及”都不能得到最好的收成。怎样才算“合理”？要因时因地因作物而异。拿密植来说，太密了会“密死”，太稀了会减产。早稻的“合理密度”和中稻不同。从小面积看起来是合理的，推广于大面积就不一定合理。孤立地来看似乎是合理的，同其他条件联系起来看就不一定是合理的，例如，如果抢季节和抓密度发生矛盾的时候，一般说，与其抓密度而耽误季节，就不如让密度服从季节。

因此，农业生产的技术改革和技术措施，必须坚持因时因地制宜的原则。当然，许多条件是可以改变的，问题在于当条件还没有改变的时候，就只能采取与它们相适应的措施。有些条件是可以很快改变的，有些条件是短时期内不可能改变的。有些条件花一定的代价去改变是合算的，有些条件用过多的力量去改变是不合算的。如修建过大的水利工程，灌溉少量的土地，当然是不经济的。因此改变条件，也必须从具体情况出发，因地制宜，全面地权衡利弊得失。无论是品种的选择、作物的安排、轮作换茬制度、播种期、播种密度、施肥量、改良土壤等各个方面，都必须从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不但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管理区不能“一律化”，而且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小队，甚至相邻的两块田都不能“一律化”。那种不顾实际情况的什么“统一措施”、“统一规格”、“统一步骤”，以及不讲求限度的什么“越密越好”、“越早越好”、“越肥越好”等等，都是“乱改”、“瞎指挥”，都是错误的，应当加以反对。

在进行农业技术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注



意继承遗产的问题。过去适用于小农经济的耕作制度和耕作方法以及生产工具等等，总起来说是落后的，必须逐步地加以改革。如果前怕虎，后怕狼，对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东西不敢动，那就谈不到什么建立现代化的农业。但是还必须看到，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来的生产实践当中，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生产经验。由于社会条件和技术条件的变化，其中有些是过时了；有些虽然不好，但是在没有更好的东西代替以前，还必须暂时利用；有些则是在今后长时期以内还是适用的。因此，对于老祖宗的经验，对于当地原有的生产经验，必须细心地调查研究，具体地、历史地加以分析。对其中过时的、落后的东西，要坚决地加以改革，对一切有用的东西则必须继承并且加以发展。对历史遗产毫无批判地全盘接受或者简单地全盘否定，都是错误的，有害的。

为了继承一切好的遗产，必须用正确的态度对待老农。老农最熟悉当地的情况，有比较丰富的生产经验，其中有许多是十分宝贵的，值得我们“虚心学，用心挖”。在技术改革中，必须听取和充分考虑他们的意见。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的确有保守思想，但是决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而只能耐心地用算细账、摆事实、典型示范的方法去教育和说服他们。

改革和继承是辩证的统一。改革是主导的一面，但是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逐步地改革。所谓改革本身就包含着对过去经验的鉴别、选择、继承、改造和发展。

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改造农业落后面貌的根本措施之一。不兴搞基本建设，就不可能保证今后农业生产的持续跃进。但是基本建设的规模如果过大、步子过急，又

会影响当前生产。因此基本建设必须和当前生产统一安排，分期分批，量力而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在劳动力安排上，首先要满足当前生产的需要。在时间安排上，首先要服从农业生产的季节。在项目安排上，应当首先兴建费工少、受益大、受益快的工程。

农业生产是极端复杂的，是要依靠千百万农民群众去进行的。要领导好农业生产，就必须切实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真正把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真正走群众路线。无论是生产方针、生产计划的制订和贯彻，无论是技术改革、技术措施和活路安排，都要依靠生产队，生产小队和社员群众。只有这样，才可能做到因地制宜，切合实际。最近几年来，我们领导农业生产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要通过抓思想、抓政策、抓生活去抓生产。无数的事例证明，只要切实地改进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切实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切实地贯彻党的各项政策，高度地关心群众生活，就可以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生产搞得愈来愈好。反之，如果放松思想政治工作，不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不关心群众生活，不注意工作方法，而只是追求生产进度，生产数字，技术规格等等，那么生产也就没有搞得好的可能。

以上就是我们几年来领导农业生产的一些经验的初步总结，这些意见是不是正确，还有待今后农业生产的实践进一步来证实。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切实贯彻党的政策，虚心学习农业生产的知识，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地认识和掌握农业生产的规律，把农业生产领导得更好。



在胜利发展中的

内蒙古文化教育事业

·胡昭衡·

内蒙古自治区是在一九四七年解放战争即将转入反攻阶段时期成立的。十三年來，内蒙古自治区文教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績。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文化落后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旧中国，作为边疆地区的内蒙古，文化教育事业极端落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文盲，有些少数民族（如鄂温克、鄂伦春等族）几乎没有识字的人。那时，疫病流行，人口急剧减少。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的统治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剥削，把内蒙古各族人民投入了黑暗痛苦的深渊。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化教育面貌，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也起了天翻地复的变化。现在，一个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到业余教育的教育体系已基本建成了。全区青壮年文盲已大部分扫除。小学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学龄儿童已经入学，小学在校学生已为解放初期的十二倍多；中等学校在校学生约为解放初期的五十四倍。高等教育从无到有，已建立了各种大专院校二十余所，学生一万余人。此外，还

有许多职工、农牧民在各级各类业余学校学习。在卫生保健工作方面，到一九六〇年上半年为止，全区已有各类卫生机构六千八百多处，病床两万三千多张，卫生技术人员三万多人，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以城市医院为指导、以公社卫生机构为基础的医疗保健网，积极地为繁荣人口、保护劳动力服务。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基本上控制了危害人民生命健康最严重的疾病，根本扭转了蒙古民族和区内其他少数民族长期以来人口减少的趋势，并使其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期间，蒙古族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一，达斡尔族人口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九。爱清洁、讲卫生已开始成为新的社会风尚。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和文化活动也获得很大的发展。全区报刊有六十余种，广播电台遍及各盟市，在许多旗县、公社、生产大队、厂矿、街道还建立了广播站，每天都用蒙汉两种语文加强着党和政府与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联系。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互相促进着，它们对不断提高生产力起着良好的作用。

随着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一支以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骨干的文化教育工作队伍正在形成。目前全区有专业文教工作者十万人，业余文教工作者数十万人。文化落后的内蒙



古一去不复返了。具有民族特点、地区特点的社会主义文化正在迅速建設中。这是毛澤东思想的胜利，是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和文教政策的胜利，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

二

內蒙古自治区的文教工作，通过十三年来的实践，摸索出了一些經驗。为了在新形势下使我們的文教工作更好地发展，把过去的体会和經驗总结一下，是有教益的。

第一，內蒙古自治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是在遵循着全国文教工作共同的方針政策，密切結合內蒙古的民族特点、地区特点发展起来的。

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化，是我国各民族的共同任务，也是內蒙古各族人民的衷心願望。为了实现这一光荣任务，我們的文教工作就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必須贯彻执行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針，科学文艺工作中的为工农兵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必須开展兴无灭資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內蒙古自治区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在政治思想战綫上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在文化教育的各个领域，都开展了兴无灭資两条道路的斗争。我們批判了那些“为教育而教育”、“为文化而文化”、“为科学而科学”、“腦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等资产阶级方向，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党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权，不断地扩大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陣地，坚持贯彻了党的文化教育工作方針，不断地进行了对

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这就为知識分子劳动化和工农群众知識化創造了条件。事实証明，我們只有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遵循这些全国文化教育工作的共同的路綫、方針，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向前迈进，才不至于迷失方向，走上歧途。

但是，在內蒙古地区贯彻执行党的文化教育方針政策时，必須从实际出发，密切注意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忽視这一点，就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我們在工作中，一方面反对了脱离共同道路脱离共同方針政策、过分強調民族和地区的特殊性的傾向；另一方面也反对了不从实际出发、不考虑民族和地区的实际情况、生搬硬套的傾向。这样才保證了党的路綫、方針的胜利贯彻。內蒙古自治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正是沿着全国共同的基本規律并且带着自己的特点发展起来的。这从以下若干具体事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例如，在教育方面，我們针对区內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由于长期受压迫，教育落后的特点，贯彻了学校教育面向工农牧劳动人民和为少数民族开門的方針，采取了一系列鼓励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学生入学学习的具体措施。在录取新生、經費使用、学校設置、人員編制、助学金待遇、日常生活和假期等方面，都对少数民族的学生給予了适当照顾。現在大部分牧区少数民族学生都享有人民助学金，而在鄂温克、鄂倫春自治旗部分地区的小学，还实行了全部公費待遇。我們还根据需和可能，在全区有計劃地分布了学校网，逐步扩建了中小学，增加了学校設備。为了牧民子女入学方便，我們在牧区創辦了寄宿小学和游动小学。由于采取了



这些措施，使内蒙古的教育得到空前发展，大大改变了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面貌。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四六年相比，全区蒙古族小学生增长了十六倍，其他少数民族学生增长了十九倍；中等学校蒙古族学生增长了四十倍，其他少数民族学生增长了八十倍；高等学校有蒙古族学生一千余人，其他少数民族学生四百余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学校的牧区、林区和山区，都办起了学校。此外，我们还通过短期训练班和正规师范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师资。

通过民族形式，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这是内蒙古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内蒙古自治区党和政府一贯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教学工作。自治区建立后，就着手编印各种蒙语教材，采取了语文教材自编、其他教材译用全国统一教材的方针。解放以来，共编译出版了蒙古文中小学教材一百九十七种，六百五十多万册，蒙族业余学校教材七十五种，九十六万八千余册。高等学校也设置了蒙古语文专业。民族语文教材的解决，不但便利了少数民族的教学工作，使少数民族教育获得顺利发展，并且为贯彻思想政治教育和科学知识教育，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为了迅速发展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和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自治区的各級学校都加强了汉语教学，使学生逐步作到兼通蒙汉两种语文。

在文学艺术方面，我们鼓励通过各种为广大内蒙古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进行创作。十三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涌现了一批像小说“草原烽火”，好来宝“铁牯牛”，剧本“巴林怒火”，舞蹈“鄂尔多斯舞”，以及歌曲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优秀作品；挖掘、整理了一批民族文化遗产，如长篇史诗“格斯尔汗传”、长篇历史小说“青史演义”等作品，丰富了祖国文学艺术的宝库。医药卫生工作方面，我们重视对蒙医（中医的一种）的研究，专门组织力量整理和研究蒙医经卷，帮助蒙医总结经验，并在卫生进修学院中开设蒙医专业，培养和提高蒙医人材。体育运动方面，我们结合蒙古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英勇强健、精骑善射的特点，广泛开展了赛马、摔跤、射箭等蒙古民族的传统体育运动，并做出了良好的成绩。

发展繁荣内蒙古具有民族和地区特点的文化教育事业，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各兄弟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内蒙古文教事业的伟大成就，是和学习与接受各兄弟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经验分不开的。内蒙古自治区内，汉族人民多，汉族干部多，国内汉族先进地区的经验和影响容易传播，这对于内蒙古的革命和建设的迅速开展是个重大力量。对于兄弟民族地区的先进经验，我们的指导思想，第一是虚心地学习，第二是创造性地学习，使先进经验更好地和民族、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正由于我们沿着全国共同的基本规律，又是带着自己民族和地区的特点来进行文化教育的建设工作，所以才使内蒙古的文化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文化教育质量不断提高。今后我们要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道路上，在大力发展工农牧业生产、根本改变内蒙古落后面貌的同时，更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根据自己民族和地区的特点，为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更有特



色的貢獻。

第二，內蒙古自治區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是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和兩條腿走路方針的勝利。

近兩三年來，在黨的總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在黨的兩條腿走路方針的指導下，在內蒙古的文教工作中，做到專業和業餘，普及和提高，集中和分散，大型和中小型，土和洋，國家辦學和廠礦企業、人民公社辦學並舉，從而充分地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十分有效地促進了文化教育事業的高速度發展。

但是，對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並不是所有的人一開始就認識清楚的。有的人認為內蒙地區文化特別落后，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如群眾和專家相結合，普及和提高相結合等等，在內蒙古文教工作中行不通。這些觀點顯然都是錯誤的。事實證明：內蒙古的文教工作正是由於貫徹執行了黨的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才使我們在舉辦的學校中，既有全日制學校，也有各種形式的半日制學校和業餘學校。這樣就為勞動人民受教育、學文化开辟了極其廣闊的場所。在牧區的教育發展方面，我們首先抓普及，在普及的基礎上再提高；先普及小學教育，在群眾生產、生活逐步有了提高的基礎上，再發展中學教育；在辦學形式上採取了集中和分散相結合的方針，除集中办好一批重點小學以提高牧區學校質量外，為適應牧民居住分散的特點，還辦了許多小型的游動學校。這就大大促進了牧區教育事業的發展和解決了教育工作的普及和提高的問題。

內蒙古文教戰綫所取得的新成就，十分有力地證明了黨的兩條腿走路方針的正確

性。同時也說明了只有堅持黨的這一方針，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才能多快好省地發展文教事業，完成工農牧民勞動群眾知識化和知識分子勞動化的歷史任務。

第三，內蒙古自治區的文教事業，是在經濟建設發展的基礎上，根據生產建設的需要，逐步發展起來的。

經濟和文化是密切聯系的。經濟建設是文化建設的基礎。經濟建設的大發展必然帶來文化教育事業的大發展。只有掌握上層建築一定要和經濟基礎相適應的規律，才能使文化教育事業更好地為經濟建設服務。解放以來，為了使內蒙古的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規模、速度和步驟，既不超出生產發展水平所提供的可能性，又不落后於生產建設大躍進的實際需要，我們總是從內蒙古經濟建設發展水平出發，密切結合全國的和自治區的形勢任務，來安排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並且以文化教育戰綫上所取得的新成就，來促進內蒙古自治區的各項社會經濟建設工作。這是使內蒙古的文教工作獲得持續發展的物質基礎和群眾基礎。我們在貫徹黨的文教工作方針的過程中，對兩種錯誤思想進行了鬥爭。一種是認為內蒙古落后，經濟文化底子差，人口又少，文教工作不能高速度發展和積極地起促進作用的甘居中游、甘心落后的思想。另一種是，不顧自治區的實際條件和生產發展水平，孤立地考慮文教工作發展的速度，不實事求是地制定文教事業計劃，只注意數量，不注意質量，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文教，不注意生產，從而直接違背了文教工作必須和生產發展相適應，必須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原則。只有不斷地批判這些



錯誤思想，才能正确地处理經濟建設和文教事业的关系，才能使內蒙古的文化教育事业适应經濟建設的需要，蓬勃地发展起来。

在解放初期，內蒙古自治区的小学生只占全区人口百分之二点六，中学生仅有五千余人；蒙古族学生人数只占蒙古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九。这远不能适应經濟恢复时期的要求。为了适应內蒙古地区經濟生产建設上的需要，我們大力发展了中小学教育，开办了內蒙古党校、內蒙古行政干部学校和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此外还举办了为工农牧业生产服务的工业、农牧业、林业、商业、財經、卫生等各种专业学校和短期訓練班。这就为經濟文化的大規模建設准备了一批干部。在一九五三年第一个五年計劃开始以后，除了繼續发展中等专业学校外，在国家帮助下，內蒙古创办了师范学院、畜牧兽医学院和医学院等高等院校，为国家培养高級建設人材和科学技术干部。一九五八年以后，在党的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下，內蒙古的經濟建設出现了大跃进的局面，教育事业也随之有了大发展。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增加較快，一个工、农、牧、林、医、师范等高等教育网已在区内初步形成。十三年来各級各类学校为自治区培养了各种建設人材四十万人。明年将有更多的中学毕业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工农牧业的生产建設工作。这是內蒙古的教育事业給农牧业生产战綫上提供大批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力的具体表现。很显然，所有这些对于內蒙古地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将会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从上述发展过程看，內蒙古自治区的文

教工作和經濟建設基本上是相适应的。

文教工作怎样才能更好地适应經濟建設，这是一件极其复杂的工作。正确認識和处理文教事业同經濟建設的关系，对于促进生产跃进以及发展文教事业是有着重大意义的。因此，我們必須很好地学习党的方針政策，特别是党的发展国民經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針，认真地总结过去文教工作經驗教訓，从而使文教事业更加适应区内的經濟建設。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內蒙古自治区文化教育事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內蒙古各族人民的努力，和祖国各民族、特别是汉族人民的支持下，得到繁荣和发展的。

內蒙古各族人民从自己切身经历中深刻体会到，沒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就沒有內蒙古各民族的彻底解放。沒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关怀和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汉族的支援、帮助，就沒有今天欣欣向荣的內蒙古，也就談不上內蒙古文化教育工作的繁荣发展。中国共产党是各族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和捍卫者，只有跟着党走，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党的领导，祖国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团结，是內蒙古各民族繁荣幸福的根本保証。

文教工作是无产階級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必須为巩固和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为进一步肃清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而斗争。內蒙古的文教工作正是这样做的。从內蒙古自治区成立时起，我們就紧密結合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在解放战争、民主改革、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斗争等运动中，以无产階級



世界观和民族观作武器，向各族人民反复地进行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并且在群众中广泛地开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的学习。我们揭露和批判了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反对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反对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等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从而使内蒙古地区各族干部和群众，大大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团结。这样，就使党的威信无比提高，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得以胜利贯彻，使内蒙古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获得民族团结的巩固基础；使内蒙古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沿着党的正确的道路，不断地取得胜利。为了进一步巩固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我们今后必须继续深入开展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坚决反对和不断地批判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并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贯彻到文教工作的各个方面中去。

三

当前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任务，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争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在这总任务下，内蒙古自治区的文教工作必须在过去三年大发展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本着统一计划，全面安排，合理布局的精神，正确处理文化教育

事业同工农业的关系；使文教工作既保证重点，又照顾一般；既有利于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和以粮纲为中心的增产计划的胜利完成，又为国家培养合乎需要的人材，满足工农业生产需要。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文化教育事业的基础。为了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在安排文教事业发展规模和速度的时候，首先必须考虑全区究竟能拿出多少劳动力来从事文教事业。也就是说，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一方面必须积极适应和满足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不应该超出经济发展水平所提供的可能性，任何一个方面的不适应，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是不利的。我们的文化教育工作，要积极为农牧业培养有文化有技术的劳动者，推进农牧业技术改造，并且要促使各方面都注意做到保护农村和牧区劳动力的健康；要坚决贯彻中央精简节约的精神，改善并精简机构和劳动组织，坚决地从各方面节约一切可以节约的劳动力，支援农牧业生产战线，把支援农牧业作为文化教育工作长期的重要任务。根据当前形势和思想情况，需要加强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特别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教育，勤俭建国的教育和热爱劳动的教育。总之，要使我们一切工作在目前和将来都有利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特别是有利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化教育工作，还要充分运用过去的经验，特别是三年来文化教育工作大跃进的经验，继续进行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文教工作方针政策，提高文化教育工作质量，实现多快好省



的要求，加速工农牧业的现代化。大力培养科学技术队伍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队伍，繼續进行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办好农村牧区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为将来逐步消除城乡差别創造条件。在文化艺术、学术思想領域內，要繼續貫徹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发揚民族优秀文化傳統，提倡各民族之間大力开展文化交流，在党的领导下，各学派互相学习，团結合作，繁荣文学艺术創作，以促进內蒙古自治区的具有民族特点、地区特点的社会主义、共产

主义的文化教育。

內蒙古自治区所有的文教工作者，应根据当前文化教育工作面临着的新形势和新任务，认真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澤东著作，全面地貫徹执行党的方針政策，要树立发展国民經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并进一步发揚革命热情和求实精神相結合的作风。我們相信，在党的领导和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下，內蒙古的文教工作一定能更紧密地配合生产，保証自治区的經济建設更好地持續跃进。

(編者按：本文作者是中共內蒙古自治区
委员会書記处候补書記)



下 乡 (套色木刻)

杜鴻年



中国革命两个阶段的区别和衔接

施 东 向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最后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根本问题，是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同时为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准备充分的条件。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一方面坚持了“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①的原理，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严格区别开来，反对把“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到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②。他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要把民主革命的锋芒针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不要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按照列宁的提法，就是民主革命“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资产阶级革命是不超出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围的革命。”^③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又坚持了“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④的原理，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衔接起来，不容许在两个革命阶段中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他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⑤。按照列宁的提法，就是要对整个民主革命“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刻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标记”。^⑥“我们将用全部力量去帮助全体农民实现民主革命，从而使我们的无产阶级的党更容易尽快地过渡到新的更高的任务即社会主义革命。”^⑦

我们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应当深刻理解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实践中怎样坚持了和发展了关于中国革命两个阶段互相区别又互相衔接的理论，尤其应当透彻懂得毛泽东同志如何

①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60页。

②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78页。

③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页。

④⑤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46页。

⑥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4页。

⑦ “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22页。



結合实际斗争的变化，应用这个理論，来制定两个革命阶段互相区别又互相衔接的完整政策。只有这样把理論学习和政策学习完全結合起来，才能使我们不但在理論認識上，而且在实际工作中，真正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論和不断革命論相統一的原則，既不犯那种否定革命发展阶段論的“左”的偏向，又不犯那种否定不断革命論的右的偏向。

在民主革命阶段，我們运用革命发展阶段論和不断革命論相統一的原則，所要解决的問題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如何区别又如何衔接的理論問題和政策問題。現在我們运用革命发展阶段論和不断革命論相統一的原則，所要解决的問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如何区别又如何衔接的理論問題和政策問題。可以肯定，认真学习“毛澤东选集”第四卷，对于我們正确理解和解决这个問題，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因此，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除了必須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只能是而且必須是消灭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消灭地主階級和官僚資产階級（大資产階級），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縛的生产力，而不是消灭一般的資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是消灭上层小資产階級和中等資产階級。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同敌人作斗争的主要力量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一切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民。所有这一切，“就决定了我們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而不同于十月革命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①

从上述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任务的科学分析出发，毛澤东同志制定了我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的总路綫和总政策，制定了我們党在各項工作中的具体路綫和具体政策。他要求全党同志必須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綫和总政策，不要只記住我党的具体的个别的工作路綫和政策，而忘記我党的总路綫和总政策。同时，要求全党同志在貫徹执行总路綫、总政策和各項具体政策时，严格划分在现阶段“許可做的事和不許可做的事”^②的界限，对“許可做的事”必須坚决做好，“不許可做的事”則坚决不做。

当时，我們必須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必須消灭地主階級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剝削制度，但是地主富农的工商业一般应当保护，不能把减租减息时期鼓励地主富农轉入工商业的資本认为是“化形”而加以沒收和分配。必須把滿足貧雇农的要求和发揚貧雇农的带头作用放在第一位，但是不能違反坚决团結中农的政策，不能損害中农的利益，而使貧雇农陷于孤立。在划分階級时，必須注意不要把本来是中农成份的人錯誤地划到富农

① “关于民族資产階級和开明紳士問題”。“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86頁。

② “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31頁。



的圈子里去。我們贊成按人口平分土地这个最彻底地消灭封建制度的方法，但是絕不能提倡絕对的平均主义。为了貫徹执行坚决团结中农的政策，必須容許一部分中农保有比較一般貧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

当时，我們必須沒收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壟断資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但是对于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地位必須在原則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对于官僚資本也要有明确界限，不能把一切国民党人經營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資本而加以沒收。对于那些查明确实是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經營的，即完全官办的工商业，以及著名的国民党大官僚所經營的企业，都應該全部沒收，归民主政府接管經營；而对于小官僚的工商业，則不在沒收之列。对于民族資產階級的右翼分子，应当打击他們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但是，政治上的打击和經濟上的消灭是两件事，不应当把这两件事混同起来，不应当因为在政治上要打击他們，就在經濟上采取消灭他們的政策。

当时，新民主主义國民經濟的指導方針，必須是紧紧地追随发展生产、繁荣經濟、公私兼顧、劳資两利这个总目标，不能离开这个总目标而实行片面的、狹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損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謂拥护工人福利的錯誤方針，不能对上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經濟成分采取过左的錯誤政策(例如过高的劳动条件，过高的所得稅率，等等)。

关于政权問題，毛澤东同志当时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階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所謂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階級、农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所压迫和損害的民族資產階級，而以工人、农民（兵士主要是穿軍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①因此，“在乡村，是雇农、貧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貧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損害的中小資本家，学生、教員、教授、一般知識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紳士，一般公務人員，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階級(經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②

毛澤东同志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发展的过程中，及时地克服了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同志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沒有严格区别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而違反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总路綫、总政策和各項具体政策的过左偏向。他向全党同志发出警告，要我們从这些錯誤中吸取經驗，得出教訓，必須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險政策，必須把新富农和旧富农加以区别，必須避免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險政策，必須避免对知識分子采取任何冒險政策，

①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問題”。“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72頁。

② 同上书，第1268頁。



必須避免把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錯誤地应用于城市，去斗争民族资本家，去消灭一般的资本主义。他說：“全党同志須知，現在敌人已經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們的胜利。我們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錯誤，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說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問題中，任何一个問題犯了原則的錯誤，不加改正，我們就会失败。”^①他要求各級党委“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須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們按情况規定的政策。否則，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們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錯誤的政策。**”^②

我們有些同志，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在民主革命阶段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否认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論的原理，执行某些“左”傾冒險的政策，是因为他們不了解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社会經济条件，不了解民主革命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不了解“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③列宁曾經說过，“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說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說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④“誰想不經過政治民主而由其他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他就必然会得出一种無論在經济上或政治上都是荒謬的和反动的結論。”^⑤毛澤东同志結合中国的实际，很好地闡明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上述原理，他說：“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們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經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經济和合作社經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經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計的范圍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⑥

当然，中国民主革命只有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下才能取得胜利，但是，我們必須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区别开来，必須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宣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行动綱領的实践区别开来。我們必須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行動綱領，但是絕不能够超出资本主义社会經济制度的范圍，而在民主革命阶

①② “关于工商业政策”。《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84頁。

③ “論联合政府”。《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60—1061頁。

④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4頁。

⑤ 同上书，第14頁。

⑥ “論联合政府”。《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61頁。



段消灭一般的资本主义经济，绝不能在民主革命阶段实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所要实行的任务。毛泽东同志说：“在现时，毫无疑问，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① 在我们党内，必须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必须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如果有的党员被资产阶级思想腐化，如果在党员中发生了资本主义思想，我们当然必须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能在民主革命阶段把反对党内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在民主革命阶段，把党内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同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反对资本主义这两件事混为一谈，当然也是错误的。

三

毛泽东同志坚持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阶段，同时又坚持两个阶段必须互相衔接。列宁说过：“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这个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为无产阶级当前的需求、为争取条件积蓄无阶级的力量以便在将来取得完全胜利而奋斗。”^② 民主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彻底，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斗争也就开展得愈迅速、愈广泛、愈坚决。而无产阶级对于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则是保证民主革命的彻底性和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问题。

毛泽东同志从中国整个革命历史经验中，得出结论：“这个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③ “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④

毛泽东同志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要全党同志记住历史教训，他说：“在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99页。

②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6页。

③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11页。

④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3—1484页。



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地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坚决地扩大了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这样，就不但保证了我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历史教训，全党同志都要牢记。”^①

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对农民的领导权问题。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无产阶级只有坚决领导农民革命，满足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才能解决革命的胜利和转变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③日本投降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及时地作出决定，把减租减息的政策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为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一九四七年我党召集的全国土地会议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是一种最彻底地消灭封建制度的方法。毛泽东同志批评了当时有些人在一个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惧怕消灭封建制度、不敢平分地主土地、不敢同封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等右的倾向。在土地会议以后，各解放区的党组织，都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了党内成份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整编了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为了保证土地改革的彻底性，毛泽东同志强调在土地改革中必须不动摇地执行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这就是，坚决依靠贫雇农，团结广大中农。土地改革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只能和必须是贫农。贫农和雇农合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左右，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他们对地主作斗争最坚决。土地改革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我党必须经过贫雇农发动土地改革，并且经过贫雇农去团结中农，团结农村中赞成土地改革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结成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为了保证土地改革的彻底性，毛泽东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57页。

②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3页。

③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51页。



同志同样强调在土地改革中，必须不动摇地执行依靠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力量、发动农民自己救自己、自己打倒地主、取得土地、保卫土地的群众路线的方针，而反对采取与此相反的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资产阶级的方针。在土地改革中，凡是封建势力没有被彻底摧毁的地方，或者没收地主土地和分配进行得不彻底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复查，重新发动群众，纠正这种不彻底的缺点，务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都获得土地，确立贫雇农在农村中的领导优势。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执行了这样的坚决彻底的土地改革政策，才能够在民主革命阶段真正建立了巩固的工农联盟，实现了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才能使一切同我们争夺领导权的政党和派别在政治上孤立起来。并且在这样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社会力量，建立了反蒋反美的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不仅必须领导广大农民群众，而且必须领导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性，同时他们可以参加反对美蒋，或者在反对美蒋的斗争中保守中立，因此我们有必要和可能去团结他们。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又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软弱的和动摇的阶级。他们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但不是人民大众的主体，也不是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在这个阶级中占大多数的中间派，他们在国共两党之间采取犹豫和观望的态度，怀疑人民的力量，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抱着某种幻想；为数不多的一些右翼分子，则存在着反动的政治倾向，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因此，无产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必须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否则也就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这个时候，对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斗争，集中表现在反对所谓“中间路线”和“第三条道路”的斗争上。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幻想在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之外，另找所谓“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实际上就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主张“第三条道路”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在国共两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时候，要求共产党作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武装力量被消灭以后，又劝告中国人民要怜悯反动派，不要彻底推翻反动派的统治，企图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的任务，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许半途而废。如历史已经证明的，反对资产阶级右翼的“第三条道路”的斗争，是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关头，为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扩大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彻底孤立反动派、争取民主革命彻底胜利和争取社会主义前途，所进行的一场极关重要的斗争。

在整个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始终用敢于夺取胜利、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来教育我们。他反复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战略上轻视敌人。他说：“如果我们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又说：“当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



上,在每一个具体問題上,也輕視敌人。”^①在国民党反动派向全国人民发动全国規模的反革命內战的时候,“如果我們表示軟弱,表示退让,不敢坚决地起来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就将变成黑暗世界,我們民族的前途就将被断送。”^②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地进行了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并采取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一切反动势力的方針,把这种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摧毁反动派的全部国家机器和他們的全部反动军队。同时,我党在长期根据地建設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权工作經驗,培养了大批管理国家的干部,正由于这样,就使得我們有可能在全国範圍內,迅速、彻底地摧毁反动国家机器,迅速地建立起新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保证了我們能够尽快地肃清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保证了革命的真正彻底性。

毛澤东同志在論到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結果的时候,曾經指出:“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經濟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結果,不是它的全部結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結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③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主要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所建立起来的巩固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經濟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經濟。

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民主革命,一方面,如前所說,必須反对那种否定革命发展阶段論的“左”傾冒险主义。这种傾向是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在无产阶级队伍內的反映。另一方面,又必須反对那种否定不断革命論的右傾机会主义。犯这种錯誤的人反对两个革命阶段的銜接,不力爭民主革命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企图用一道万里长城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隔开,这种傾向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

列宁曾經說过,在民主革命中,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革命不要坚决扫除旧制度的一切残余,不要十分彻底,不要进行到底,不要坚决无情;要使种种民主改革进行得比較緩慢、渐进、謹慎,要用改良的办法而不用革命的办法;要使这些改革不发扬农民、特别是工人的革命的自动性、主动性和毅力,以免工人农民用民主革命給予他們的自由,用扫清了农奴制的基地上所产生的民主設施,調过头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与此相反,共产党却告訴无产阶级,不仅要最积极地参加民主革命,而且要力求领导民主革命,“不应当局限于被狹隘地了解为主要是工会运动的那种阶级斗争的範圍內,相反地,应当竭力扩大你們的阶级斗争的範圍和內容,一直到不仅包括俄国当前的全民民主革命的一切任务,而且包括今后社会主义革命的任

①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問題”。“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67頁。

② “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45頁。

③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澤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45頁。



务。因此，虽然不要忽视工会运动，不要拒绝利用任何一点合法活动的机会，但是你们应当在革命时代把实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府的任务提到第一位，这是保证人民完全战胜沙皇制度、保证争得民主共和制度和真正政治自由的唯一道路。”^①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两个阶段互相区别又互相衔接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统一的理论和政策，从而既保证了我国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又保证了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顺利转变。

四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粉碎了它的压迫人民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根据中国的条件，首先是在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地区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政权，最后引导到在全国范围内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前，人民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它担负着民主革命的任务。那时候，像一些犯“左”倾错误的同志那样，认为“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是错误的。在全国范围内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并且建立起人民共和国以后，这个全国范围的人民政权的性质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担负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因为这时旧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即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逐步上升而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获得了全国政权，就应当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②这时候，如果认为革命还不到转变之时，那当然也是完全错误的。

中国无产阶级在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同时，巩固地建立了自己对国家的政治统治权，因而就不需要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为社会主义革命再进行一次夺取政权的斗争。这是因为我们党在领导民主革命中丝毫没有忘掉社会主义的目标，在民主革命斗争中紧紧地抓住了政权的问题，并且坚决地确立了和巩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结果。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立即全部没收了官僚资本，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这就彻底

^①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7页。

^②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0—1481页。



摧毁了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旧中国的官僚资本在全部资本主义经济的固定资产中的比重约占百分之八十。没收这部分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实行对外贸易的垄断，这就使人民共和国有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一方面，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在土地改革和革命战争的基础上建立了巩固的工农联盟；另一方面，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掌握着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营经济，这样就完全有可能对中小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用和平方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对其他私有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而逐步地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来。

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开始的~~关键~~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当然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解放的广大农村中的主要矛盾，还是封建主义和民主主义即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还用了三年的时间，在这些地区实行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以后，我们才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

有人认为在民主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没有完全、彻底解决以前，即使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全国政权，也不能实行革命的转变，而必须等待民主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全部解决以后，才能实行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列宁说，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相互关系，“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后一革命可以巩固前一革命的事业。”^①无产阶级取得全国政权，是革命转变的基本标志。我们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立即开始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同时在一个时期之内，用大力解决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即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并且在土地改革完成的基础上，立即不间断地引导广大农民小私有者经过互助组走上合作化的道路。当时还有一种错误意见，即认为在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之间应当有一段间隔的时期，这种意见实际上是要让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泛滥起来，使农村革命停顿起来。我们党拒绝了并批判了这种错误意见，才使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在我国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在如何实行革命的转变这个问题上，结论完全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必须“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① “十月革命四周年”。《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页。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①我国人民大革命的胜利，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正是这样地实现了我国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可能性。

五

毛泽东同志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相统一的原理，解决了中国革命两个阶段互相区别和互相衔接的问题，同时又把这个原理当作一种普遍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全部革命运动，指导中国革命有步骤地、不断地由一个过程推向另一个过程，由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革命是分阶段的，又是不断的，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我们不能脱离开革命发展阶段论来孤立地对待不断革命论，所谓革命的不间断性，就是指的各个不同革命发展阶段的连续性，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地进行，也就是指的各个不同革命发展阶段之间的互相联系。我们也不能脱离开不断革命论来孤立地对待革命发展阶段论，所谓革命的阶段性，就是指的不断革命过程中各个革命阶段的质的差别性，而每一个革命阶段又都是不断革命长河中的一个片断、段落、部分。这反映了事物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由一个事物到另一个事物的不断推移过程。

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包含量变和质变两种状态，量变引起质变，一种性质的事物必然要转化为另一种性质的事物，一种质的过程必然要推移到另一种质的过程。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还必须看到：不仅不同质的事物不断推移的过程总是显出阶段性来，就是一种事物在它发展的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由于在总的量变过程（同事物的根本质变相对而言）中存在着许多的部分质变，因此也往往使这一过程形成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各个阶段之间，都有若干性质的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②

① “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80页。

②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302页。



毛澤东同志不仅把革命发展阶段論和不断革命論相統一的原則，应用于不同性质的事物的关系上，例如，应用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革命的关系上，而且，也把这个原則应用于同一事物或同一过程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关系上，例如，应用于民主革命过程的几个不同发展时期的关系上，以及这几个大阶段各自所包含的各个小阶段的关系上。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五四运动开始，到革命的完成，經過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等几个时期。在整个过程中，民主革命的根本性质是没有变化的，但是由于矛盾的发展，由于敌情和同盟軍的变化，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是不同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也是最偉大、最生动、最活跃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敌我力量对比形势的变化、发展，也分为几个在性质上有某些区别的小阶段，这就是：争取全国和平局面、同时准备应付全国内战的阶段；敌处战略进攻、我处战略防御的阶段；我处战略进攻、敌处战略防御的阶段；战略决战和争取全国胜利的阶段。从“毛澤东选集”第四卷中，以及从毛澤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中，我們看到，毛澤东同志是怎样根据量变和质变互相推移、总的量变中又包含着部分质变的規律，熟练地运用革命发展阶段論和不断革命論相統一的原則，来正确地处理上述民主革命的各个不同时期之間的关系，使之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有步骤地、同时又是迅速地推动革命前进。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澤东同志在指导当时的軍事斗争中，在指导土地改革工作中，在指导城市工作中，以及指导其他一切工作中，都出色地运用了从量变到质变，从部分质变到整个质变的原則。例如，在实行土地改革方面，同样按照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区别若干較小的发展阶段，采取适当的步骤，以适应不同形势下生产关系逐步变革和群众觉悟程度、組織程度逐步提高的需要。在一部分半老区，即自日本投降至大反攻这两年内所解放的地区，土地改革运动，一般经历清算斗争、执行“五四指示”、普遍彻底地分配土地，这样三个阶段，一步一步地削弱以至最后消灭封建势力。在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区，土地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实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負担政策，打击地主，中立富农。第二阶段：平分土地，包括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在内。毛澤东同志反对了不分阶段的工作步骤上的急性病，指出减租减息阶段是任何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所不能缺少的，缺少了这个阶段，我們就要犯錯誤。

所有上述各种事物发展过程中各阶段的区别和联系，例如中国革命整个过程中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区别和联系，在民主革命总过程中几个时期的区别和联系，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各个阶段的区别和联系，以及土地改革中几个阶段的区别和联系，都是客观存在的。人們如实地認識了这些客观的过程，如实地按照事物发展过程来部署自己



的工作，是可以通过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来加快这些过程的发展的，但是如果企图超越客观发展的必经阶段，来期求工作的胜利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真正的革命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他又说：“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①

总之，不论指导整个革命或者指导某一项工作，都不能够从主观臆想出发，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情况出发，必须像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的那样，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必须深刻地全面地了解客观情况的基础上，来制定适合情况的政策，并且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政策。绝不能脱离客观情况，主观地想改就改、想快就快、想慢就慢。

在目前新的条件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进一步创造性地运用了革命发展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统一的原理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如何区别又如何衔接的问题。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停步不前，但是也不能陷入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阶段的空想。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②

认真领会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两个阶段互相区别又互相衔接的理论的精神和实质，将帮助我们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更好地理解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路线和政策问题。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3—284页。

②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16页。



红旗

HONGQI

2

一九六一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六一年第二期★

目 录

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施东向 (1)

进一步加强生产队的建设.....林一舟 (5)

伟大的战略决战叶剑英 (9)

大抓原料材料,

增产更多更好的轻工业品宋孟邻 (21)

江洲人民公社大办粮食的胜利.....刘光辉 梅国宝 (27)

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

战争政策的经济根源.....严耀群 (34)



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

施东向

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我们：“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①

我们党所领导的一切事业，无论是革命或者是建设，都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人民群众的事业，必须依靠人民群众自己动手。党的政策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来实现。所以，在我们的任何工作中，都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使广大群众熟悉和了解党的政策，这是在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的一个关键。

人民群众能够理解和接受我们党的各项政策，因为我们党的政策总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我们党的政策，集中表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它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在比较复杂的工作中，我们党的政策必然要包含比较复杂的内容。拿农村工作来说，过去在土地改革

中，既要依靠贫雇农，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又要坚决地团结中农，不损害中农的利益。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既要积极地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又要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经过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现在的农村人民公社中，既要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大集体的力量，又要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把着重发展队有经济作为发展人民公社经济的中心环节。革命工作总是不断向前发展而又划分为不同的阶段的，在各个阶段中，既要求在这一阶段为下一阶段做准备，又要求认真做好当前阶段的工作，不许可把下一阶段的工作移到现在来做。对于党的政策所包含的这些复杂的要求，群众是不是都能够理解和接受呢？无数的事实证明，党的这些政策不但能够为群众所接受，而且能够为群众所掌握。我们党的政策总是界限分明的，那些是许可做的，那些是不许可做的，那些是现在应当做的，那些是将来才能做的，都规定得

①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17页。



清清楚楚。只要把这些都明确地告诉群众，

群众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毛泽东同志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曾经生动地说：“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同志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往往不懂事，对于实际事物往往没有经历，或者经历很少。你们对于一九三三年制定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小册子，就看不大懂；这一点，农民比你们强，只要给他们一讲就都懂得了。”^①农村阶级分析问题中包含着许多复杂的政策问题，但是农民群众很容易理解，这是因为党关于农村阶级分析的各项规定都是切合实际的。我们党的任何政策中所包含的内容，不管多么复杂，都不是虚构出来的，都是来自实际生活和实际经验的总结；凡是在我们政策中必要的、不可缺少的内容，都应该使群众知道。如果以为群众只能懂得政策中的这一方面，而不能懂得政策中的那一方面，只能接受这一方面，而不能接受那一方面，那无疑是错误的。事实恰恰相反，如果不全面地交代党的政策，那就会引起群众的怀疑，当然也会把群众的行动引导到不正确的方向去。

党的政策是群众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是群众中正确意见的概括和提高，它不是从群众的经验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党在一切工作中都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人民群众要在自己的事业中取得胜利，绝不能脱

离党的领导。党把群众的智慧、经验，集中起来，形成政策，再交给群众，使政策为群众所掌握；这正是党的领导的一个具体表现。

就一方面说来，党的政策是群众所能够理解的。就另一方面说来，群众要完全懂得党的政策，又往往需要经过一个过程。这是群众的觉悟程度逐步提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干部进行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把党的政策原原本本地交给群众，并且通过实践使群众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党的政策的正确性，群众就能够纠正由于经验的局限而产生的某些片面的和错误的认识，他们的觉悟程度也就逐步提高。无数的经验证明，党的政策向群众交代得越清楚，群众的觉悟程度就越能提高，他们在工作中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就能够发挥得越充分。干部的责任，就是要使群众的觉悟水平提高到党的政策的水平，使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实际行动。群众中通常总是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有些人对党的政策接受比较快，有的则比较慢。我们在工作中要善于发现积极分子，并通过积极分子去带动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群众。对于积极分子，也需要不断地提高他们的觉悟。在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群众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19页。



的觉悟水平出发来进行工作。当群众对党的政策还不很了解的时候，必须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善于等待群众提高觉悟，切不可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强迫群众行动，而成为命令主义。当然，同时也要善于区别群众中的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切不可迁就错误的意见，而成为尾巴主义。毛泽东同志说：“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①我们每一个干部，都要力求很好地掌握这项领导艺术。

我们的党通过各级干部而同广大群众联系。各级干部正确地理解党的政策，坚决地在工作中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并且使党的政策为群众所掌握，同群众一起执行党的政策，这样，就使党同群众密切地相互联系在一起，我们的事业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很明显，如果以为只要干部懂得政策，而不需要让群众也懂得政策，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曾经对一些不能贯彻群众路线的同志提出批评说：“他们做一件事情，总不愿意向被领导的人讲清楚，不懂得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他们主观上也要大家动手动脚去做，但是不让大家知道要做的是怎么回事，应当怎样做法，这样，大家怎么能动起来，事情怎么能够办好？”^②

我们的多数干部具有党中央和毛泽东

同志所提倡的作风，总是反复地把党的政策向群众交代，遇事同群众商量。这样，他们就能够使群众自觉地投入工作，并且在工作中想出许多好主意，拿出许多好办法。在党的政策的指导下，群众的力量和干部的力量拧成一股劲，工作就进行得顺利，事情就能够办好。事实证明，这样做，也是干部提高自己的政策水平和保证自己在工作中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一个方法。

为了要把党的政策全面地、清楚地交代给群众，首先就需要干部自己能够深刻了解党的政策。如果干部自己还不理解政策，当然不可能做到把政策正确地交给群众。教育者自己首先要受教育。当我们还不能把某一个道理使群众清清楚楚地理解的时候，有些人以为这是群众的理解能力低的缘故，但虚心的人却能由此看出，其实是我們自己还理解得不透彻，因而没有把道理说清楚。教育别人的过程往往同时就是教育自己的过程，帮助群众逐步深入理解党的政策的过程，往往同时就是干部自己逐步深入理解党的政策的过程。也有这样的情况，干部由于缺乏群众所具有的某些方面的实际经验，对党的某项政策一时还不能有深透的理解，而群众由于有某些方面的经验，却对党的某项政策理解得比干部更深切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干

^{①②}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18页。



部在把党的政策交代给群众的时候，更加需要向群众学习。

我们的多数干部在工作中总是同群众打成一片，主动地把自己的工作放在群众的监督下面。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就便于群众根据党的政策来监督自己的工作。我们每天处理许多事情，有些对我们说来还是新的事情，我们对党的政策的认识和掌握的能力，也要经过实践才能逐步提高，因此，工作中产生一些缺点、错误是难免的。群众的监督，可以帮助我们避免缺点、错误，或者及时地发现和纠正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群众明白了党的政策，就能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①我们的干部在工作中有了缺点或错误的时候，就要采取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并且把政策原原本本、不折不扣地交给群众，虚心倾听群众的批评和意见，和群众一道来克服工作中的缺点或错误；这样，群众的积极性就会更加高涨，工作就会出现新的局面，而干部对政策的认识和掌握的能力也就会随着提高。

至于如何根据具体情况来正确执行党的政策，那就更需要同群众商量了。党中央规定的统一的政策，各个地区、各个公社以至各个生产队都必须执行。但是，由于各个地

区、各个公社、各个生产队各有不同的情况，要有效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还必须从具体地区的具体情况出发，采取切合情况的方针、步骤和方法。干部如果不同群众商量，不了解实际情况，主观地出些主意，往往是行不通的。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认真地同群众商量，这样就能使党的政策得到贯彻执行。

党的政策本身也是通过群众的实践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毛泽东同志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②把政策交给群众，率领群众一道来贯彻党的政策，通过群众的实践来考验和丰富党的政策，这是毛泽东同志一向提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方法。我们党在以往的任何时期都是这样做的，今后我们也永远要这样做。

①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28页。

②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901页。



进一步加强生产队的建设

林 一 舟

生产队是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基础，是人民公社组织生产和分配收入的基本单位。人民公社经济发展的快慢，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的高低，主要地决定于生产队经济的发展程度。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必须加强生产队的建设，加速队有经济的发展。

几年来，各地在加强生产队的建设，加速发展队有经济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仅有許多原来基础较好的队，生产连年大幅度地增长，而且有許多原来基础差、生产水平低的队，迅速地改变了面貌，由缺粮队，变成了余粮队，由产量低、收入少的穷队，变成了产量较高、收入较多的富裕队。认真地总结这些办得好的生产队的经验，对于提高广大农村干部的领导水平，加强生产队的建设，进一步办好人民公社，争取农业生产的丰收，有很重要的意义。

最近，許多地区的报纸上陆续发表了一些介绍办得较好的生产队的材料。在这些材料中，提供了不少可贵的经验。

例如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江西日报介绍的江西省全南县东风人民公社的员山大队，就是办得较好的生产队之一。这个大

队，一九五七年以前是个低产少粮的穷山区，土地瘠薄，自然灾害不断，每年需要国家供应两三万斤粮食。但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三年的艰苦奋斗中，他们的粮食总产量逐年增加，不仅结束了缺粮的历史，而且三年来共售给国家数十万斤粮食。粮食的大幅度的增长，带动了林、牧、副、渔各业的全面发展。一九六〇年社员每人平均收入比一九五七年增加近一倍。

在这个大队中认真实行了劳动力、土地、耕畜、农具的“四固定”。由于劳动力固定，保证了各生产小队安排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上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由于土地固定，作物布局合理，改良土壤的工作能够有计划地进行，为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和多种多收、高产多收的方针，提供了可靠的保证；由于耕畜、农具固定，社员对自己使用的犁、耙、耕牛都很熟悉，非常爱护，农具损坏、掉失的很少。在“四固定”的基础上，坚持执行了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度，因而充分调动了生产小队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三年来，投入生产的用工量逐年增加。这个大队依靠群众，因地制宜地采取了許多有力的增产措施，修建



了一个能灌溉四百亩田的水库，挖了二十三条共长十余里的渠道和许多水塘，把二百多亩旱地变成了一年收两季的水田，把将近二百亩低产田进行了改造，还通过开荒、实行林粮间作扩大了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通过发展牲畜、制造土化肥增加了大量优质肥料。这样就大大改变了过去旱地多、水田少、肥料不足、旱涝灾害不断等不利因素。这个队的干部，不仅在生产上遇事带头，同群众商量，而且在生活上兢兢恳恳为社员服务，他们对以公共食堂为中心的公共福利事业一直抓得很紧，办得很好。同时，认真实行了劳逸结合。群众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产战斗力，一九五九年以来，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月月满勤。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六日云南日报介绍的云南省马关县马白公社的塘子边生产队，也是一个办得较好的生产队。过去他们的生产条件也很不好，山高、坡大、风多、水少，灾害不断；比起别的队来，他们的底子薄，收入少，粮食不足。大跃进以来，他们依靠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克勤克俭，发愤图强，粮食产量逐年增长，一九六〇年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以上。随着粮食的逐年增产，副业生产收入也显著增加。

这个队有五个队委委员，其中有四个出身于贫雇农家庭，一个出身于下中农家庭；有两个党员，两个团员。他们的共同的特点是：作风民主，办事勤俭，模范地遵守财务制度；吃苦耐劳，带头生产；关心社员生活，干群一心，亲如家人。这个队的干部，认真贯彻党的政策，凡事找群众商量，经常有五个老农当参谋，周围还有一批贫农积极分子，经常反映贫农、下中农的意见。凡是生产上、

生活上的大事，事先倾听社员群众的意见，然后再作抉择。生产上的重大改革，从不轻举妄动，胡乱指挥，而是既坚持积极态度，又认真听取老农和社员意见，做到因地制宜。这个队的公共食堂，在干部和群众同心协力地经营之下，做到了人人吃得饱，吃得好，吃得省，社员非常满意。这样，他们就能把四十户社员、八十五个劳动力的生产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团结一心，勤劳生产，使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使许多一年一熟的地变为两熟，在粮食生产上赶上了当地一些比较富裕队的生产水平。

员山大队和塘子边生产队，在全国几十万个生产队中，不一定是办得最好的、经济发展最快的。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原来的基础并不好，只是由于他们在建立公社以后，工作做得好，使生产得到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它们的这些经验，具有普遍的意义。

从这两个生产队的经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办好生产队，保证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关键，在于干部认真地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具有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

政策是党的生命，是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的锁钥。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谆谆教导的，“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事实证明，凡是工作做得好的生产队，对于党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及有关各项具体政策的贯彻，都是不折不扣，认真执行的。拿执行“三包一奖”制度来说，员山大队每年都是以生产队上一年的实际产量（指一般年景）为基础包总产，作物则由小队因地制宜进行安排，超产部分和新开



荒地收入，上交三成给大队统一分配，七成留归小队所有。因此，年年“三包”都作到大队、小队、社员三满意，使小队有产可超，有奖可得。每年“三包”方案落实以后，“三包”合同即坚决贯彻全年，做到定期检查，当年决算，合理奖赔。大队干部还经常深入群众，总结经验，帮助小队完成包产任务，争取超产。例如一九五九年第一小队因干劲不足、经营不善没有完成包产任务，减了产。由于及时地帮助他们做了总结，在群众中进行讨论，使大家认真吸取了教训，结果一九六〇年以来第一小队样样工作走在前头，成为全大队的生产上游队。其他超产小队也因为发扬了过去的优点，生产搞得也很好。因而一九六〇年三个小队都超额完成了包产任务，使全大队实现了粮食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的大幅度增产。

能否正确处理大集体与小集体、集体与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群众积极性的发挥，有决定的意义。而正确处理这些关系的唯一的准绳，就是党的政策。党的政策，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集中表现，它兼顾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兼顾了群众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只有认真地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才能够正确地处理各种经济关系，使广大群众自觉地行动起来，从而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为完成各种任务铺平道路。员山大队大幅度增产的事实，正是认真贯彻党的政策的結果。有的地方的社员，把党的政策比作“轨道”，把生产任务比作“列车”。就是说，只要干部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生产的“列车”就会在平坦的“轨道”上畅快前进。如果不是这样，而使“列车”出了“轨”，那就会寸步难行。这个比喻是很恰当的。

为了使党的政策全面地、彻底地贯彻到生产队中去，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就要求干部具有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

农业生产是十分复杂的，是“争天时，夺地利”的斗争，必须切实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科学地指挥生产，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凡事同群众商量，一切经过试验。塘子边生产队的干部正是这样做的。他们考虑到本地地形复杂，土质差异很大，对于任何新的生产技术措施，都与社员一起认真试验，取得直接经验后才逐步推广，决不草率从事。如一九五八年春推行石丫口村利用“冷水田”栽大芒谷的丰产经验时（石丫口村与塘子边生产队仅相隔一座山），先召开了老农座谈会，老农认为这是一项好经验，可以推广；有的老农并提出芒谷有“抢生”的特性，建议实行轮作，今年栽芒谷，明年栽白谷，既利于增产，又可以防病。队干部接受了老农的意见，因地制宜，实行轮作。结果，三年连续获得水稻大丰收。像这样依靠群众，既积极又慎重地采取增产措施、推广先进经验的做法，成功的把握是比较大的。

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坚持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是实事求是地领导生产和走好群众路线的根本前提，也是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的重要关键。塘子边生产队的全体社员所以能够团结一心地发展生产，是与干部们一贯吃苦耐劳、带头生产，“手勤、脚勤、脑不闲”的良好作风分不开的。他们常常是出工比社员早，收工比社员迟，有重活、累活，自己抢着干。例如，一九六〇年春耕正紧时，忽然下了一场雨，旱地提前得水，



是抢种包谷的好时机。可是，当时，男劳动力要犁田耙地，准备插秧，没有人送粪。这时，队委委员刘明珍立即带头背粪，一连背了二十天。她的行动带动了全队四十多个妇女，终于提前十五天完成了种包谷的任务。这种情形，就如有的地方的社员所比喻的：“干部是火车头，社员是火车斗，只要挂上钩，你们跑多快，我们就跟多快。”可见，干部的好工作作风，对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搞好生产，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动力。

在这里，遇事同群众商量特别重要。一切措施、办法，都是要靠社员的双手来实行的。即使是完全正确的措施和办法，如果不同群众商量，生硬地实行，而群众却并不真正接受，或感到没有把握，那末，他们做起来就会感到“手软”，心情就不会舒畅，效率就不会高。正如有的地方的社员所说：“干活一个心情高，一个心情低，可差远了。”我们要想正确地领导生产，指挥生产，就不仅要懂天时，懂地利，懂庄稼，而且要懂群众的思想 and 心情。要懂，就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

干部带头克勤克俭，以身作则地认真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也是很多办得较好的生产队的一条共同经验。如塘子边生产队所以能够很快地改变了贫困面貌，赶上了当地一些比较富裕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五个队干部都能始终坚持勤俭办社的优良作风。他们一面勤劳生产，挖潜力，尽可能多增加收入；一面紧缩开支，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省一个是一个，

富日子也当穷日子过。实践证明，凡是这样做的队，它的经济就发展快，日子就越过越富裕。而不这样做的队，经济的发展就很慢，甚至不能发展，就不可能很快地改变面貌，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

目前各地还有少数生产队处在落后状态。它们之所以落后，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由于领导干部缺乏工作经验，缺乏正确的工作作风，因而不能很好地贯彻党的政策，不能把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在这种地方，只要加强党的领导，改进干部的工作作风，就可以使落后面貌迅速改观。应该看到，群众不仅有极大的生产积极性，高度的劳动热情，而且在发展生产方面有无限的创造力和丰富的经验。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党所制定的一系列的具体政策，更为广大群众充分发挥这种积极性和创造力开辟了空前广阔的天地。只要我们善于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不折不扣、一丝不苟地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就完全能够把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充分调动起来，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改变不了的落后状态。

现在，党的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和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已经进一步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又有大批的干部下放农村，加强基层领导，条件是非常有利的。只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很好地总结和运用过去几年来已有的宝贵经验，我们就一定能够把作为人民公社的基础的生产队办得更好，把人民公社，把整个的农村工作提到一个新的水平。



偉大的战略决战

葉劍英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第三年以后，毛澤东同志及时地組織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指揮人民解放軍向国民党軍队展开了战略决战。三大战役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开始，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歼灭敌人正規軍一百四十四个师(旅)，非正規軍二十九个师，共一百五十四万余人。在这个期間，其他战場的人民解放軍也都展开了进攻，歼灭了大量的敌人。在战争的头两年，人民解放軍每月平均歼灭敌軍八个旅左右。到了这时，人民解放軍每月平均歼灭敌軍的数目，已經是三十八个旅了。这三大战役，使国民党賴以发动反革命內战的精銳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大大地加速了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的到来。

三大战役所取得的偉大战略决战的胜利，是毛澤东同志的战略决战思想的胜利，是毛澤东同志战略思想的胜利。战略决战思想是毛澤东同志整个軍事科学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认真研究三大战役的丰富經驗，将帮助我們全面地領会毛澤东同志的战略思想，全面地学习毛澤东同志的軍事科学。本文想从几个方面来闡述三大战役中所体现的毛澤东同志的战略决战思想和軍事指揮艺术。

及时地抓住决战时机，正确地确定决战方向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經過敌处战略进攻、我处战略防御阶段，轉入我处战略进攻、敌处战略防御阶段以后，由于人民解放軍繼續大量地歼灭了敌人，到一九四八年八月，敌我双方軍事力量的对比更进一步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民解放軍从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百二十万人增加到二百八十多万人；国民党軍队由四百三十万人减少为三百六十五万人，其中用于第一綫的只有一百七十余万人。

在这个时候，人民解放軍虽然在数量上还少于国民党軍队，在装备上还低于国民党軍队，但是，在两年多的內綫和外綫作战中，已經大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战斗力。人民解放軍消灭了大量的敌人，繳获了大量的現代化武器，加强了自己的装备，建立了强大的炮兵和工兵，提高了攻坚能力，在石家庄、四平、开封等战役中，取得了攻坚經驗，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



能打陣地战。同时，人民解放軍利用战斗間隙，用訴苦、三查和群众性练兵的方法，进行了新式整軍运动，加强了內部的团結，提高了部队的政治质量、軍事技术和战术。解放区的翻身农民繼續踊跃参军，坚决进行保田、保家的斗争；被俘的蔣軍士兵經過政治教育之后，也紛紛自願地参加人民解放軍，从而使解放軍得到源源不断的兵員补充。这个时候，各个主要的解放区相继連成一片，可以作战略上的直接支援。解放区面积已扩大到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增至一亿六千八百万，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解放区内已經完成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发展了生产，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使我軍后方更加巩固，使战争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的支援。在全国范围内，更加扩大和巩固了人民革命的統一战线，更加发展和壮大了人民革命的力量。

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军队的数量虽然还多于人民解放軍，装备虽然还比人民解放軍的好，国民党反动派虽然还統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三分之二的人口，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所发动的反革命战争的非正义性，由于国民党反动統治的极端腐朽性，国民党反动政权已經陷入搖搖欲墜的境地。这时候，敌人已經被迫放棄“全面防御”的計劃，而进行所謂“重点防御”，企图以他們現有的兵力和工事，固守战略重要点綫。敌人为了避免遭受歼灭，以精銳部队为核心，兵力靠攏、猬集一团，想使人民解放軍“吃不掉、啃不烂”；同时，裁并“綏靖”区、扩大兵团、吞并杂牌、裁减机关，以求增大机动兵力；并在国民党統治区大量抓丁，扩充二綫部队，以便整頓和补充力量，进行垂死挣扎。但是，在人民解放軍大規模的进攻面前，他們再也无法摆脱战略上全面被动的地位。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五个战略集团已被人民解放軍分別牵制在南綫和北綫的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五个战场上。东北战场为卫立煌集团，共四十八万余人，分布在长春（当时，該处敌人已被圍困两个月）、沈阳、錦州三个孤立地区，依靠北宁綫的錦、榆段作为他們和关內水、陆联系的通路。华北战场为傅作义集团，共六十余万人，分布于平綫（在人民解放軍綏察战役后，归綫与張家口之間的联系已被切断）上的归綫、張家口及北宁綫上的北平、天津、唐山、山海关等各要点，依靠塘沽港作为他們海上补給的通路；太原孤城的守敌，已被圍困。华东战场为刘峙集团，共六十余万人（以后增援的一个兵团及其他部队未計算在內）。这个国民党軍集团在我軍进攻济南时，迟迟不敢北援，当济南被解放后，即集中于以徐州为中心，西起商丘、东至連云港的隴海綫上及南至蚌埠的津浦綫上，企图阻止我华东人民解放軍南下。中原战场为白崇禧集团，約七十五万人，分布于平汉綫南段及以汉口为中心的地区。西北战场为胡宗南集团，約三十万人，被牵制于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一隅。除上述五个战场外，敌人后方的军队仅有三十六个旅，約二十三万余人，由于人民游击战争的发展，很难机动。这样，国民党反动派就沒有完整的战线了，除某些地区还有一部分兵力可作战略机动外，大都处于徘徊麻痹、被动挨打的状态。



这种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反动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为着继续大量地歼灭敌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人民解放军就必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同敌人的强大机动兵团作战。因此，敢不敢打我军从来没有打过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的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军的强大集团，敢不敢夺取更大的胜利，已经成为我军当时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就在这时候，国民党一九四八年八月南京军事会议曾经讨论过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至十月底，以观时局发展，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作撤退准备的作战指导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让敌人实现他们把现有兵力撤至关内或江南的计划，使我们失去时机，从而增加我军尔后作战的麻烦呢？还是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决策逃跑之前，我们就当机立断，抓住大好时机，组织战略决战，各个消灭敌人的强大战略集团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战争形势的科学分析，毅然决然地抓住了这个战略决战时机，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他在“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向东北战场的我军指挥人员指出：要“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①

毛泽东同志说过：“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②他还指出，在一个或几个战役分了胜败以后，“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脱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给敌人更大的损害，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让对方完成其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图。”^③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行到第三年以后的情形也是这样。国民党军队在遭受了一系列的失败以后，为了挽救他们的危局，曾经进行拼命的挣扎，企图用“重点防御”的办法，来摆脱当时已经出现的对他们极端不利的形势，妄图重新创造一种有利于他们而不利于我们的形势，在一定时机向我们举行反扑。与此相反，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赢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以后，力图发展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更大量地消灭敌人，务求发展当时已经出现的对于我军极为有利的形势，务求不让敌人实现他们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计划。这种主观能力的竞赛，当时首先表现在时机的选择上。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抓住时机，进行决战；对于敌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39页。

②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1版，第452—453页。

③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版，第215页。



人来说，应当是抓住时机，组织战略撤退，避免战略决战。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社论说：“满洲的丧失是不可避免的，在撤退问题上唯一严重错误，就是择时不当。”敌人在战略撤退上的犹豫不决，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捕捉决战时机的英明。

毛泽东同志在紧紧地抓住决战时机的同时，又正确地选定了决战方向。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立要点的時間，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傅作义、卫立煌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又特别有利。在敌军方面：孤立分散，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长春被围，无法解救；或撤或守，举棋未定。在我军方面：兵力优势，装备较好；广大地区，联成一片；土改完成，后方巩固；关内各区，均可支援。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敌军，就能粉碎敌人战略收缩的企图；就能实施战略机动，有利于华北、华东战场的作战；就能以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战争，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的总后方。根据上述情况，毛泽东同志将战略决战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的卫立煌集团，这就将战略决战的初战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这是毛泽东同志宏图大略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好棋子。决战首先从局部的优势开始，进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由于迅速而顺利地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就使全国战局急转直下，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

针对三个战场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作战方针

在辽沈战役开始前，东北战场敌人据守于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我军进攻的主要方向应首先指向哪里，才有利于战役发展，才有利于全歼东北敌人，才有利于全国战局，是战役指导的关键问题。从局部看，长春孤敌，为我久困，是东北战场敌人的弱点，消灭该敌可以解除我后顾之忧。但敌人却企图以长春来牵制我军，掩护沈阳、锦州敌军改善态势，并且进行撤退的一切准备工作。我作战方向如首先指向长春，就会中敌人的诡计；而攻克长春，又会将沈阳、锦州的敌人迅速吓跑，影响战役和全国战局的发展。锦州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虽然锦州敌人的兵力比长春多，周围并有若干据点；攻锦州时，华北敌军可能增援，敌人亦可由海上支援，若不能迅速攻克锦州，就会陷我军于被动地位；而且我军主力，远由北满南下作战，会有一定困难。但是，锦州至山海关段上各点的敌军，孤立分散，攻歼取胜比较确



实可靠；在北宁綫上作战，可吸引长春、沈阳敌军来援，有利于战役发展；还可分割敌方在华北战场和东北战场的两大战略集团，华北敌军的增援则将因我华北人民解放军的牵制而削弱。锦州是东北敌军通向关内的咽喉，打下锦州这一战略要点，就等于关上了东北的大门，卫立煌集团即成“瓮中之鳖”；而且控制了北宁綫，更有利于我军根据战局发展，向两翼机动作战。基于上述分析，锦州才是东北敌军的真正弱点、致命弱点。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應該准备使用主力于該綫，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①如长、沈之敌敢于增援，“则你们便可以不开锦、榆、唐綫連續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②同时又指出，攻克锦州是全战役胜利的关键，要求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中心注意力必須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該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偉大的胜利。”^③东北人民解放军坚决地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作战方针，歼敌四十七万，取得了东北决战的偉大胜利。加上当时其他各战场上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从此就使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对于国民党军也轉入了优势。

正当辽沈战役方兴未艾之时，毛泽东同志在华东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济南战役胜利以后，又組織了淮海战役。华东战场敌人刘峙集团，以重兵猬集于徐州附近地区，形成所謂一点两綫的部署，企图阻止我军南下，以屏障南京。敌人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若要攻歼其任何一部，必須首先擋得住敌人的援兵，才能贏得时间，保持主动。这是华东战场与其他战场截然不同的特点，也是影响战役胜败的关键。当时黄伯韬兵团位于东接連云、西近徐州、南靠江淮、北面山东的隴海綫上，是刘峙集团右翼勁旅。如歼灭了黄伯韬兵团，則使刘峙丧失一臂，并可吸引徐州敌人东援，在运动中歼其一部。同时可将我山东、苏北两解放区联成一片，切断徐(州)、海(州)联系，形成包圍徐州、兵临江淮的态势。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間突破，占领新安鎮、运河車站、曹八集、嶧县、棗庄、临城、韓庄、沭阳、邳县、邳城、台儿庄、临沂等地。”^④为了全歼黄伯韬兵团，毛泽东同志根据华东战场敌军部署的特点，在兵力的使用上，采取了巧妙的部署，指示我军“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否則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⑤毛泽东同志对战役尔后的各阶段也反复地強調了这一部署原則。从一般情况

① 見“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38頁。

② 見“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39頁。

③ 見“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40頁。

④⑤ 見“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55頁。



说来，主要兵力应集中使用于攻歼的目标上，毛泽东同志却在有足够兵力及敌军兵力集中的情况下，采取了相反的方法，创造性地处理了战役目的和手段既统一而又有区别的辩证关系，灵活地运用了集中兵力的原则，因而顺利地牵制、阻击了徐州敌军强大兵团的东援，取得了歼灭黄伯韬兵团的胜利，切断了敌人海上逃路，为战役的尔后各阶段，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以后由于黄维兵团北援，徐州敌人西逃，使战役发展方向不是东向新(浦)、海(州)、连(云港)及两淮地区，而是向西歼灭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这就使淮海战役大大地超过了原来的计划，歼敌五十五万五千余人，取得了中原决战的伟大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从此，国民党反动统治陷入上崩瓦解的境地。

恰当淮海战役鏖战正酣之际，毛泽东同志又组织了平津战役。当时华北战场的敌军，在我华北人民解放军的牵制与打击下，又受到了辽沈、淮海两大战役胜利的震撼，已成惊弓之鸟。国民党反动派这时在战略上唯一可能机动的兵力就是傅作义集团。因此，蒋介石一方面企图利用这个集团阻止我军南下，以便掩护他们在江南重整军力；一方面又企图诱使这个集团经塘沽海运江南，增援华东战场，以解刘峙集团之围或扼守长江，进行垂死挣扎。而这个集团本身当时还有沿平绥线西撤远的企图。敌人或撤退或收缩，都将对战局的发展不利。因此，不使敌人撤退、不让敌人收缩就成为平津战役的主要关键。毛泽东同志利用了华北敌军认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后必然进行休整，不能迅速入关的错觉，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于辽沈战役结束之后，不进行休整，迅速秘密入关，配合华北人民解放军的两个兵团，出敌不意地对华北敌人实施战略包围，力求将敌人全部就地歼灭。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①“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②为了不使敌人逃跑，又着重指出：“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③为着造成敌人的错觉，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的敌军南下，又令华东战场我军对杜聿明集团残部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又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要点，作好防止敌军向青岛逃跑的准备。这样，就稳住了敌人，完成了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使傅作义集团完全陷入收不拢、逃无路之绝境。“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毛泽东同志运用之妙，却超乎寻常。“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以及延缓华东战场对杜聿明集团残部最后歼灭部署的指示，则更表现了军事指挥上的高度艺术，而为一般军事家所望尘莫及。由于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69页。

②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70页。

③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69页。



我軍执行了上述方針，傅作义集团即被我軍斬头去尾，一截一截地被各个歼灭。平津战役共歼灭和改編了国民党反动軍隊五十二万余人，取得了华北决战的偉大胜利，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

毛澤东同志根据全国各战場的具體情况，抓住了不同的关键問題，正确地确定了决战方向，制定了不同的作战方針，使三大战役之間和各战役的各阶段之間有机地联系了起来，一环扣一环地，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取得了战略决战的偉大胜利。正如毛澤东同志所指出的：“指揮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組成問題，照顾两个战役之間的关系問題，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間的关系問題，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間的关系問題，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問題，那就难免要吃亏了。”“任何一級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揮的全局說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問題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問題或动作上。”“說重要，說有决定意义，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規定，必須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規定。”^① 抓住了最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問題，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在組織决战中，初战問題就是最重要的問題。从战争的全局和战役的全局出发决定初战，初战的勝負又对战争的全局和战役的全局的勝負有决定意义。这就是两者的辯証关系。因此，初战必須建立在确有胜利把握的基础上，同时，初战的胜利又必須有益于全局的发展，这是照顾局部和全局关系中最吃力的問題。总之，沒有全局观念，就沒有好的初战計劃。历来的軍事家虽然也慎重初战，但初战的指导艺术，毛澤东同志却在理論上和實踐中，达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三大战役的首战东北，以及辽沈战役的首攻錦州，淮海战役的首歼黄伯韜兵团，平津战役的首克新保安和天津，都是从全局利益考虑决定的。三大战役的三个作战方針，都是初战与全战役計劃密切联系的体现。因此，初战胜利之后，就势如破竹地分别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三大战役的初战胜利，完全体现了毛澤东同志提出的“必須打胜；必須照顾全战役計劃；必須照顾下一战略阶段”^②的初战原則。在战争指导中如何照顾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如何在复杂的情况中去找出和掌握关键問題，毛澤东同志为我們作出了光輝的范例。

全面地运用十大军事原則，高度地施展作战艺术

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长期以来敌人战略上圍攻我軍的情况，改变为我軍战略上圍攻敌人的情况。毛澤东同志从最后消灭敌軍主力，必須攻击敌人坚固設防的大、中城市，并与敌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版，第173—174頁。

②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版，第222頁。



人强大机动兵团作战的情况出发，从建立全国统一的革命政权，必须夺取政治、经济的中心城市的情况出发，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全歼敌人强大兵团密切地结合起来，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城市与地方密切地结合起来，把大规模的运动战和大规模的阵地战密切地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军多年来丰富的作战经验概括而成的“十大军事原则”，在三大战役的指挥中，得到了全面的运用。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是人民军队达到化劣势为优势、以劣势兵力战胜优势敌人的根本方法。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它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①这个正确的指导就是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法。我军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作战方法，不仅在中国革命战争过去的实践中，而且在三大战役的决战的实践中，都得到了完全的成功。

在三大战役中，我军对敌人实施战略包围的同时，进行了战役和战术上的分割与围歼。在战略上将敌人分隔在几个战场上，而在各个战场上又把敌人的强大集团肢解为若干孤立部分，集中优势兵力，逐次予以歼灭，以至迅速地消灭全部敌人。我军在辽沈战役中，利用东北敌军分散孤立的态势，首先集中优势兵力攻歼了锦州的敌人，继而转用主力各个歼灭了由沈援锦的廖耀湘兵团和沈阳的残敌，卫立煌集团遂全军被歼。我军在淮海战役中，首先割断了黄伯韬兵团与徐州敌军的联系，继而包围了黄维兵团，阻止了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使敌军不能相互支援，在歼灭了黄伯韬兵团之后，逐次转用主力各个歼灭了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我军在平津战役中，把敌军分割包围在平绥、平津线上的各点，逐次歼灭。通过各个歼灭敌人的方法，我军在四个月零十九天内，就把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三大战略集团一百五十四万余人，迅速全部地予以歼灭。这是毛泽东同志“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这些原则的实际运用和发展，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全部歼灭敌人强大兵团密切地结合了起来。

在三大战役中，我军不仅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夺取了敌人占领的城市和地方。由于攻克锦州，不仅歼灭了敌人、解放了该城及其附近地区，而且迫使长春敌人的一部分起义，其余全部投降，而解放了长春，并为全歼卫立煌集团打下了基础。由于黄伯韬兵团被歼和黄维兵团被围，不仅歼灭了敌人、解放了陇海线东段南北地区，而且迫使徐州敌人弃城逃跑，解放了徐州，并为全歼刘峙集团打下了基础。由于新保安、天津被攻克，不仅歼灭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1版，第452页。



了敌人、解放了两城及其附近地区，而且为全歼傅作义集团打下了基础。总之，在三大战役中，不但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夺取了敌人占领的很多城市和地方。这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①“一切敌人守备坚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②这些原则的实际运用，使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城市与地方密切地结合了起来。

在三大战役中，我军不仅进行了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且进行了大规模的阵地战。辽沈战役开始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以六个纵队的兵力在大量的炮兵支援下，于三十一个小时内，攻克了敌人坚固设防的锦州。同时，在锦州以南的塔山地区，以近三个纵队的兵力，用阵地防御战阻止了敌人九个师在海、空军配合下的增援；在黑山地区，用阵地防御战阻住了廖耀湘兵团十二个师的增援。攻克锦州后，我军又转用兵力，迎击从沈阳西进的敌军，以八个纵队，经过两昼夜的激烈战斗，在运动中将廖耀湘兵团全部歼灭。淮海战役开始时，我华东人民解放军以十一个纵队，在运动中以侧击、攻击、截击的方法，将西撤的黄伯韬兵团包围于徐州以东的碾庄圩附近地区，同时以强大的兵力在徐州以东地区，用阵地防御战阻止了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共十二个师的东援，将野战阵地防御中的黄伯韬兵团九个师全部歼灭。在围歼黄伯韬兵团的过程中，我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六个纵队，密切协同，以运动战将北援的黄维兵团中途包围于蒙城东北的双堆集附近地区。歼灭黄伯韬兵团之后，中原人民解放军在华东人民解放军配合下，突破了敌人的坚固野战阵地，将黄维兵团全部歼灭。当黄维兵团被围攻时，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团企图沿津浦路增援黄维兵团，合力南逃。我军以八个纵队之兵力，展开了大规模的阵地阻击战，粉碎了敌人的企图。因此，杜聿明集团遂弃城西逃，我华东人民解放军则以十个纵队的兵力，展开了平行追击，在运动中将敌人包围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黄维兵团被歼灭后，我军集中十一个纵队的兵力发起攻击，彻底摧毁了敌人的坚固野战阵地，将杜聿明集团二十四师全部歼灭。同时，刘汝明、李延年两个兵团共八个师由蚌埠的三次北援，亦为我军所粉碎。淮海战役的三个阶段，都以大规模的运动战开始，以大规模的阵地战结束。平津战役中，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以六个纵队的兵力，在强大的炮兵支援下，于二十九个小时内，攻克了由十个师十三万重兵坚守的现代设防的天津市。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要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战争的不同阶段，适时地转换作战形式。我军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曾一再地进行过这种作战形式的转换。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时，我军曾以运动战为主歼灭和消耗了敌人；在敌军从“全面防御”被迫转入“重点防御”以后，阵地战的形式特别是攻坚战就被提到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同志指出：“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

①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47页。

②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48页。



时，注重陣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①在三大战役中我軍已經把大規模的运动战和大規模的陣地战很好地結合了起来。

在过去历次革命战争时期以及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由于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基本特点，使我軍只能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能以保守和夺取城市与地方为主要目标；只能在战役、战斗范围内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敌人的一路或一部，而不能全歼敌人的强大兵团；只能在必要的方向和时间，以陣地的进攻和防御来輔助运动战，而不能打大規模的陣地战，特别是大規模的攻坚战。到了三大战役的时候，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已經改变为我强敌弱的形势，攻克敌人坚固設防的大、中城市和夺取地方，已成为繼續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密切联系的問題。在对敌人的强大兵团实行战役分割的同时，实行战略包围，力图全歼；在攻歼敌人重兵坚守的城市的同时，从运动中歼灭敌人增援的强大兵团。这些都是三大战役的时候，人民解放軍可能和必須完成的任务。“一切战争指导規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沒有的。”^②正是由于毛澤东同志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进行了灵活的战略指导，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严格遵循了和灵活运用毛澤东同志所規定的战略战术原則，因而使我們在三大战役中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

“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揮上說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③毛澤东同志在三大战役中，不但对我軍指揮自如，而且善于制造和扩大敌之弱点，使敌軍完全听我調动，就我范围。例如：攻击錦州的时候，我們估計沈阳的敌人可能出来援助錦州的敌人，而沈阳的敌人果然来援，結果取得了辽西的大胜利。又如：围歼黄伯韬和黄維兵团的时候，我軍坚决阻击邱清泉、李弥、刘汝明、李延年等兵团的增援，敌軍果然都不能越“雷池”一步，結果使黄伯韬、黄維兵团全部就歼。又如：平津战役开始的时候，我們打算先稳住敌人，而傅作义集团果然未能东逃或西撤，結果全部被我解决。所有这一切，都証明了毛澤东同志的軍事指揮艺术达到了“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高度。

創造了解决敌军的三种方式

人民解放軍对敌軍从来就是在主要实行軍事打击的同时，又进行政治上的爭取和瓦解，

① “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47頁。

②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版，第171頁。

③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問題”，“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1版，第215頁。



并把二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在三大战役中，由于我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败局已定，敌人内部的一切矛盾，都迅速扩大化，这就为我军争取和瓦解敌军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在辽沈战役中，我军争取了曾泽生部的起义，郑洞国部的投降；在淮海战役中，我军争取了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等部的起义，孙良诚、赵壁光、黄子华等部的投诚，并在围攻杜聿明集团的时候，发出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组织了强大的政治攻势，虽然杜聿明拒不投降而遭歼灭，但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争取了敌军一万四千余人来降。

平津战役中，在我大军包围下的北平、天津守敌，完全陷于绝境，我军“秣马厉兵”，只待攻城。但是，为了保护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我军采取了“先礼而后兵”的方法，劝告平、津守敌接受和平解决，给敌军指出了两条道路，或战或降，任其择一。天津守敌陈长捷等拒绝投降，我军即以战斗方式，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了该敌。在天津解放之后，迫使北平守敌不得不接受和平解决的方法，并且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就使北平这一文化古都以不流血的斗争方式获得解放。用北平方式解决敌军，“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①在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之后，我军为了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主要部分，对于綏远国民党反动军队董其武部，有意让其暂时存在，在保留一个时期之后，待条件成熟时，再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其和平改编。用綏远方式解决敌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②因此，这并不是说，他们举行了起义或接受了和平改编，就已经革命化了，没有反动性了，相反地，还必须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造，才能真正地成为人民解放军。

在三大战役之后，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提出了用天津、北平、綏远三种方式解决残余敌军的问题，他着重指出：“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③同时指出：“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④。战争发展的实践，完全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些意见的正确。一九四九年四月，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同志向全国进军的指示，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迅速地消灭了继续顽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并用和平方法解放了綏远、长沙、昆明、四川西部、新疆和西藏等地区。用三种方法解决敌军，是毛泽东同志关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要互相结合的思想，在敌军主力被歼后的新条件下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①②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26—1427页。

③④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25页。



兵民是胜利之本

为了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党在军队中继续进行了“三大民主”、“立功运动”、政策教育等政治思想工作，更加激发了广大官兵最大限度的革命热忱和革命主动精神，使他们能够以惊人的毅力、高度的智慧和灵活的战术，去完成一切作战任务。与此同时，党还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了巨大的动员和组织工作，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支援战争。在辽沈战役中，动员了十八个独立师直接投入战斗，又以八十个二纵兵团约三十余万人，作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后备兵源。在淮海战役中，动员了四十余万人的地方武装，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了主力部队作战。在平津战役中，也动员了华北几个省的地方武装，参加对敌斗争。在各战场上，还动员了广大的民兵和各种群众团体，支援前线，巩固后方，使我军得以专心作战。这样，就将人民的力量全部动员了起来，与前线的军事斗争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使敌人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而无法逃脱其灭顶之灾。由于各解放区相继完成了伟大的土地改革，动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不断地得到提高；同时，在已解放的城市中，立即恢复了各种工业生产，尤其是军工生产，从而使我军的供应得到了根本的保证。为了满足前线我军对粮食、被服的急需，又组织了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筹集粮食，赶制被服。在三大战役中，各地组织了广大的人民群众，随军执行战勤任务。辽沈战役的时候，动员了一万三千八百余副担架，三万六千七百多辆大车，九万六千多民工，随军行动。淮海战役的时候，动员了二百多万民工，支援前线，使我军与民工的比例达到了一兵一民、一兵二民、甚至一兵三民。在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援和热情鼓舞下，人民解放军终于克服了一切困难，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真正的力量属于人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的因素，政治的因素。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①又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②革命战争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尽管革命的武装力量开始的时候比较弱小，但是，最后终究要取得胜利。在三大战役中，广大人民支援战争的宏伟场面，以及由此而取得的战略决战的胜利，再一次证实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1版，第432页。

②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1版，第474页。



大抓原料材料， 增产更多更好的輕工业品

· 宋 孟 邻 ·

輕工业是国民經济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发展輕工业生产，增加輕工业产品，对于支援农业和重工业的发展，对于保証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对于扩大社会主义經济建設資金的积累，都有重大的意义。从安徽省的情况来看，不仅人民生活中吃、穿、用方面的許多必需品，要由輕工业来生产，而且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小农具及其修配材料，农副产品的加工工具，短途运输的車輛，小五金和各种包装用品、防护用具等，許多也是要輕工业部門或者由輕工业部門同其他部門协作生产的。按照党中央所規定的国民經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針，在大力发展农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也必须大力加强輕工业部門的工作，增产輕工业品，以适应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日益增长的需要。

安徽省輕工业的基础很薄弱，在剛解放的时候，全省市場上輕工业品的供应，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靠省外調进的，省内生产自給的只有百分之几。經過几年的努力，并且在邻近省市的大力支援下，到一九五七年，生产自給部分已上升到百分之三十左右。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輕工业有了很快的发展。一九五九年自給部分已近百分之六十。

一九六〇年在持續跃进的基础上，自給部分已近百分之七十。这就愈来愈适应了生产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

发展輕工业的主要关键，是做好輕工业原料材料的生产和供应工作。輕工业的行业多、产品种类多，需要的原料材料的品种多、数量大，除主要依靠农副产品供应以外，还需要許多矿产原料、鋼鉄材料、化工原料，以及野生植物、动物等等。这些原料材料的資源分布面既广，有些又很分散。只有大力做好原料材料的生产和供应工作，才能保証輕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几年来，安徽省在发展輕工业过程中，一直重視原料材料的生产和供应工作，特别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統筹规划，自力更生

为了解决輕工业的原料材料問題，安徽省根据全国一盘棋的精神，在服从国家的統一計劃、統一調撥的前提下，坚持了統筹规划、自力更生的方針。实践証明，自力更生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能的。全国各地的工业都在发展，对于原料材料的需要都在增加，在国家調撥供应的物資暂时不可能滿足各方面生产需要的情况下，要更快地发展輕



工业，必须采取自力更生的方针来解决原料材料不足的问题。同时，安徽省轻工业的原料材料资源是极为丰富的，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为轻工业提供的原料材料也愈多，因此，除了某些特种原料材料以外，也完全有条件做到自力更生。但是，这些道理，并不是所有的人一开始都认识到的。在安徽省轻工业部门中，有的人存在着依赖思想，单纯指望国家调拨；有的人片面强调困难，怕麻烦，图省事，借口搞原料材料是农业、重工业、商业和物资供应等部门的事情，自己不积极去抓。各级党的组织及时地批判了这些不正确的思想，不断地教育干部和群众，树立自力更生的思想，千方百计地发展轻工业原料材料的生产，搞好轻工业原料材料的供应。

在发展轻工业生产中，我们根据统筹规划的方针，进行了全面安排，既安排了轻工业的生产，又安排了轻工业原料材料的生产 and 供应。在安排原料材料的生产中，我们在贯彻执行以粮为纲的方针的前提下，安排了经济作物和其他农副产品原料的生产，将轻工业所需要的农作物原料，纳入农业生产计划之内。同时，轻工业部门又尽可能从本身挖掘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和设备，发展原料材料生产。在规划安排中，我们一方面考虑到现有工厂的需要，根据现有工厂的生产能力发展原料材料的生产；另一方面，又根据今后生产发展的需要，并考虑到可能条件，有计划地发展原料材料生产和建立新的原料材料基地。有些人不考虑社会需要，只看到目前还没有那种原料材料，而看不到生产和发展这些原料材料的可能性，就认为不能办那

种工厂。也有些人不考虑原料材料的来源，主张办起了工厂再搞原料材料。这两种看法都是片面的。如果不结合需要和可能，单纯地就现有原料材料来办厂，有就办，没有就不办，那就会不能满足生产发展和生活提高的迫切需要，不利于调动地区发展原料材料生产和办厂的积极性。如果办起了工厂再来搞原料材料，其结果原料材料供应同轻工业生产衔接不上，就必然造成劳动力、资金和设备能力的浪费。我们的做法是，在坚持就地取材，使轻工业工厂接近原料产区的原则下，不仅有什么原料就办什么工厂，并且对于必须发展的轻工业品，即使本地没有原料，但是已经证明有可能发展原料生产的，就积极引种培植，创造条件，一面发展原料材料生产，一面着手办厂。这样做，就充分地调动了地区办厂、办原料材料的积极性，把发展轻工业生产同发展原料材料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例如，安徽省造纸工业的发展，就是一手抓原料生产，一手抓工厂建设的。我们现在已经和正在创办木浆、竹浆、苇浆和草浆厂，为造纸工业建立原料基地。萧县的葡萄，原来种植面积只有一千五百亩，而且主要是作为水果供应市场的。我们在那里建立葡萄酒厂的同时，即利用黄河故道荒地，扩种葡萄，现在已经扩种到近八万亩。由于葡萄种植面积的扩大，产量的增加，葡萄酒厂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安徽省原来养羊很少，在筹建毛纺厂的同时，引种繁殖了绵羊，为毛纺厂生产进行了准备。这些都说明，只要坚决贯彻统筹规划、自力更生的方针，真正做到一手抓生产，一手抓原料材料，就可以扩大原料材料的来源，更多更快地增产轻工业品。



大家动手，两条腿走路

安徽省在大抓原料材料、大力增产轻工业品的过程中，一贯坚持了大家动手、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不仅轻工业部门，而且其他行业和其他部门，也都在可能条件下，根据统一计划的要求，结合本身业务，举办轻工业。在办厂方面，财贸部门办起了食品、农副产品加工、小五金、小百货、丝绸和废品加工利用等工厂；文教部门办起了文具、体育器械、卫生器材和制药厂；林业部门办起了木材加工、林产化工和森林资源的综合利用工厂；政法、民政部门办起了缝纫和假肢等工厂；重工业部门也结合自己的生产和资源条件，积极发展轻工业。在办原料材料方面，有的结合干部劳动锻炼，开荒办农场，建立原料材料基地；有的在自己兴办的轻工业工厂中，附设原料材料生产车间；有的大搞原料材料的综合利用；有的结合业务，大抓边角料和废品旧料的利用等等。据安徽省轻工业、商业两个部门的不完全统计，他们在大力生产轻工业品的同时，又办了原料材料生产单位四百多个。各地人民公社工业，也有计划地发展轻工业原料材料的生产。城市人民公社工业，除了大力生产小五金和小百货以外，还积极进行轻工业、化学工业原料的生产和废品旧料的初制加工。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在首先办好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农具制造、修配等行业的前提下，还大力地进行了农副产品原料和野生原料的初制加工。所有这些，都大大增加了轻工业原料材料的来源。

在大搞轻工业原料材料工作中，我们既

抓原料材料基地，又抓分散产区。发展轻工业原料材料基地，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形式：以原有国营农场、林场、饲养场为基础建立轻工业原料材料基地；人民公社或者生产大队，根据条件，在国家给予资金、技术、化肥等方面的支援下，建立和发展轻工业原料材料基地；由各生产部门自办轻工业原料材料基地等。在大搞轻工业原料材料工作中，我们一方面对原来已经有基础的原料材料生产，如棉花、烟叶、麻类、芦苇、茶叶、梨、葡萄、白芍、檀皮、栓皮等，有计划地发展，由少到多；另一方面对原来没有的或者生产很少的原料材料，如蚕桑、水竹、绵羊、甜菜、甘蔗、多穗高粱、高级烟叶和某些贵重药材等，积极利用荒山、荒地、湖滩、草场，引种培植，从无到有，逐步建立基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省已有各种农作物原料生产基地一百多处。这些基地，由于生产集中，产量高，商品率高，对保证轻工业重点企业的原料材料供应，起了显著的作用。轻工业部门还抽出职工，自搞设备，自筹资金，兴建了钢铁厂、化工厂，生产轻工业所需要的部分钢铁材料和化工原料。在抓原料材料基地的同时，也注意了发展分散产区的原料材料的生产，特别是棉、烟、麻等主要原料的生产。有条件的人民公社，都有计划地种植这些原料作物，既解决了人民公社本身的需要，又供应了轻工业生产的原料。这样，就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使轻工业所需要的原料材料有了可靠的保证。

在发展某些非农业原料材料的生产 and 农业原料的初制加工上，我们坚持了土洋并举的方针，除了建设一批骨干工厂以外，并有计划地兴办小洋群生产单位。这样做的最



大好处是，容易办，便于大家动手，不仅生产部門可以搞，其他部門也能搞。例如为了增产化工原料，蕪湖市四十八个工厂，建立了八十多个化工車間、小組，利用錫罐、鐵罐，制成燒碱、純碱、漂白粉、骨胶、香精、氯酸钾、炭精棒等九十多种化工原料。全省輕工业生产单位，仅为生产三酸、两碱、漂白粉等主要化工原料，就办起了一百六十多个工厂、車間，产量約占整个需要量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对于补充国家分配之不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了发展各种农副产品原料的初制加工，在充分利用民間原有加工工具的同时，还制造了一批动力加工机械，供应各主要加工点的需要，仅各种野杂纖維剝制机械，一九六〇年就生产了一千六百多台。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工效，节约了劳动力。

在原料材料的利用上，我們大搞多种經營，綜合利用。許多輕工业工厂，根据本厂的条件和需要，以本业为主，密切結合技术革新和科学研究，有計劃、有重点地积极开展了这一工作。有的是本厂需要什么原料材料，就生产什么原料材料，像造纸厂、肥皂厂生产燒碱、純碱、和漂白粉，火柴厂生产氯酸钾等等。蚌埠市的輕工业工厂，因陋就簡，办起了七十多个卫星厂和車間，仅一九六〇年上半年，就生产了化工原料七十四种，二千六百多吨。有的以边材角料和廢棄物品，大搞綜合利用。淮南市綜合利用煤炭資源，办起了塑料、橡胶、炭黑、防腐油、农药、炼磺、提氨以及其他工厂和車間三十四个，已經生产的化工原料就有四十三种。有些生产季节性强的工厂，如制糖厂、烤烟厂等，也利用原料材料供应的淡季，进行

其他产品的生产。这样大抓多种經營、綜合利用的結果，充分發揮了各工厂的設備、資金、技术等方面的潜力，利用同样多的設備、資源，生产出更多的輕工业品。

在原料材料的来源上，我們还大抓了各种野生植物的利用。安徽省野生植物資源极为丰富，据普查鉴定，可以利用的各种野生植物达三千种之多。从一九五七年起，我們就有領導、有計劃地开展了采集和加工利用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績，有力地促进了輕工业品的增产。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〇年秋季，仅国家收购利用的野杂纖維、野生油料、林产化工、药材等原料，就有一百七十多万担。在采集利用的同时，还有計劃地对野生植物进行了培植和品种改良工作，变野生为家生。例如，罗布麻是一种很好的野生紡織纖維原料，从一九五九年开始，我們就在蕭县有計劃地进行培植，現在已經发展到三万多亩。各地为了发展薄荷脑、香料、香精生产，就搞香花“母園”，引种改良，育苗培植，仅歙县、屯溪、毫县、阜阳、潁上五个县的野生植物加工厂，在一九五九年就培植了薄荷、香花等四百三十多亩。目前，全省已經建立了药材培植場三百多个，共培植各种药材三百五十多种，其中野生变家生的就有一百二十多种。变野生为家生的工作，虽然还只是开始，但是对于今后进一步发展确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大力支援农业， 結合抓好原料材料

农业是国民經济的基础。大力支援农业是各个部門、各个行业的共同責任，也是輕



工业部門的責任。輕工业必須依靠农业，沒有农业的发展，也就沒有輕工业的发展。农业发展了，給輕工业供应更多的原料材料，輕工业就能有更大的发展。因此，輕工业部門必須把支援农业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几年来，安徽省輕工业部門，除供应农民生活必需的日用品以外，并且根据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技術改造的要求，大力发展了生产資料的生产，供应农业的需要。仅据一年多来的統計，輕工业部門就組織生产了胶輪小板車和独輪車八十多万輛，各种小型农具一千七百万件，及时供应农业生产的需要。輕工业部門还从劳动力、技术、設備等方面大力支援了农业。这些，都有助于促进农业增产和农业的技術改造。

安徽省輕工业在大力支援农业的工作中，結合大抓原料材料的生产，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办法。

一是根据各企业的生产特点，有計劃地組織輕工业工厂，选择支援对象，需要什么原料，就到生产什么原料的产区去支援。例如在一九六〇年秋天，各地的紡織厂利用設備檢修的生产空隙時間，抽調了三万多人，由領导干部亲自帶領，到棉产区帮助人民公社加强棉花的田間管理，帮助搞好采摘、整晒、加工以及短途运输工作。各烟厂也組織了一千多人，成立五十一个专业队、組，到烟产区帮助人民公社搞田間管理、采摘、平摊、烤制，并配合商业等部門搞好收购和調运工作。竹木器厂、軟木厂、林产化工厂等，則到山区帮助人民公社采伐和割制竹木、栓皮、松脂等原料。一九六〇年仅抽調上山采割松脂、栓皮的就有一千八百多人。

二是采取厂社挂鈎、固定支援对象的办法，把支援农业的工作同建立原料材料基地的工作結合起来。如几个較大的紡織厂、造紙厂，都有目的、有重点地同人民公社和农場挂鈎，帮助它們进行野杂纖維加工和建立了二十多个紙浆厂，既支援了人民公社生产，又开辟了原料材料的来源。蚌埠市建华造紙厂所需要的紙浆，原来主要靠收购原料自己加工，因为原料的运量多、体积大，往往由于不能及时运到而影响生产。一九六〇年春季以来，这个紙厂先后抽調职工，騰出切草机、柴油机等設備，在五河、嘉山、怀远等地，一面支援农业生产，一面帮助人民公社建立了三个紙浆厂，保證了紙浆的供应。安徽第一紡織厂，抽調了一批职工，携带自制的野杂纖維剥皮机等設備，到岳西、巢县等地，帮助人民公社进行野杂纖維加工。

三是采取重点示范的办法，推动人民公社发展原料材料的生产。例如，为了发展高級卷烟的原料，一九五九年，輕工业部門在黄山地区进行了重点示范，試种高級烟叶成功，推动当地人民公社扩大了种植面积。安徽省过去沒有搞过甜菜、多穗高粱制糖，輕工业部門配合农业部門，及时派出技术力量和干部，帮助生产这些原料的人民公社搞好种植、加工，吸取經驗，組織推广，也取得了一定成績。

通过以上几种办法，輕工业部門把支援农业同搞好原料材料的生产 and 供应緊密結合起来，既支持了农业生产，提高了人民公社发展原料材料生产的积极性，又扩大了輕工业原料材料的来源，保證輕工业工厂生产的需要，提高了工厂支援农业的积极性。



組織各方面力量，大搞群众运动

輕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料材料的生产 and 供应，关系到生产、加工、收购和运输等各个方面，关系到农业、重工业、商业、计划、交通运输和科学研究等各个部門。因此，要使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得到充分地利用，就必须把各个方面的力量組織起来，充分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

在大搞輕工业原料材料的群众运动中，我們抓住了以下几个重要环节。

輕工业原料材料的采集、加工和生产，是重要的环节之一。以搞野生原料来讲，两年来，在小秋收运动中，我們提出了“农产品要搞好，副产品也不丢”、“出門带把刀，回家带担料”、“上山带个筐，下山不空手”的口号，发动群众积极开展野生原料的采集、加工工作。我們不仅有领导地組織劳动力，集体进行輕工业原料材料的采集和加工，还动员群众利用生产空隙进行采集和加工。例如，在一九六〇年的小秋收运动中，全省各地发动群众采集各种工业原料几十万担。輕工业部門也抽出三万多人投入了这个运动。

搞好收购和調运是另一个重要环节。为了搞好收购，及时把收购任务分配到队，把收购的政策、价格、品种和規格向群众讲清楚，做到家喻户晓。同时合理布置收购点，并組織食堂、代銷店就地收购，便利群众。在調运方面，除了統一組織劳动力和运输工具以外，还利用回空、自搞挂車等办法，大搞捎脚运输，及时把原料材料运送到厂，加工利用。

广泛开展节约原料材料运动也是一个重要环节。原料材料的增产和节约是密切联系

的，只抓增产，不注意节约，增产的实际效果就要大大降低。在原料材料的节约方面，安徽省各輕工业企业，除了加强原料材料管理，严格定額制度外，还充分发动群众，动脑筋、找窍门，改进产品设计，提高操作技术，合理下料，反对浪费，檢集旧料，千方百计地节约原料材料。

为了切实加强对于輕工业生产和輕工业原料材料生产、供应的领导，更好地发动群众，更好地把各方面的力量調动起来，中共安徽省委和各地、市、县委，都組織了各有关部門参加的輕工业领导小组，对輕工业的生产和輕工业原料材料的生产、收购、分配、运输等工作，实行集中领导，統一安排，綜合平衡，分工負責，密切协作，从組織上把各部門的力量拧成一股绳。这样，就有效地发挥了各个部門的作用，使輕工业原料材料供应、成品生产和銷售等环节連成一条龙，更好地保证輕工业生产的需要。

几年来，安徽省的輕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輕工业品的供应量不断增大，这对支援工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都起了重大作用。但是，随着国民經济的更大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进一步提高，对輕工业品的产量、质量、品种和規格都有更高的要求。因此，必须增产更多、更好的輕工业品，供应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进一步活跃市場。现在，全省各地正从各方面作更大的努力，进一步抓好輕工业原料材料的生产 and 供应，扎扎实实地进行各項准备工作，保证今年輕工业生产的繼續发展。

(編者按：本文作者是中共安徽省委書記处書記)



江洲人民公社大办粮食的胜利

刘光辉 梅国宝

江西省九江市江洲人民公社位于长江中流的江中心，方圆七十多平方公里。全社共三千二百四十四户，一万五千多人，土地四万八千亩。这里的地势平坦，土地肥沃，适宜种植粮棉等作物。解放前，由于水利失修，圩内沟淤浅，堤壩百孔千疮，旱涝灾害常常发生，粮食作物平均亩产不过百斤。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江洲人民依靠互助组、合作社的力量，进行了水利建设，整修了圩堤，抵挡了江洪的侵害，使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内涝和干旱依然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的威胁。

在实现人民公社化的第一年，即一九五八年冬至一九五九年冬，江洲人民依靠公社的力量，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建成了完整的包括三条大圩堤、四十六条支渠和数百条斗渠的灌溉系统。从此，这里在长江水位二十二公尺以内不会潮堤，一次降二百五十公厘暴雨不致成灾，旱上百天仍可保丰收。

江洲是个老棉区，过去以种植棉花为主，兼种一部分杂粮。到一九五九年，棉粮的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都有很大增加，但是，粮食仍然不能自给，还需要国家供应一部分粮食。在进入一九六〇年的时候，江洲公社

的干部和群众响应党的号召，决心大办粮食，争取在一九六〇年实现粮食自给自足。

要实现粮食自给，江洲公社全年需要生产粮食六百万斤左右。为了生产这么多粮食，需要把粮食播种面积由一九五九年的二万亩扩大到四万亩。而为了保证棉花生产的继续跃进，棉花播种面积不仅不能减少，还需要由一九五九年的二万二千亩扩大到二万六千亩。在以种植棉花为主、粮棉播种面积都要扩大、耕种质量也要提高的情况下，自然就出现了耕地、劳动力等不足的困难。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公社党委发动干部和社员进行讨论。开始，人们认识不同，主张不一。少数人认为耕地少、劳动力少，多种了粮食就会影响棉花生产。他们主张采取减少棉花种植面积的办法来多种粮食。多数人不同意这一主张。他们认为：只要加强党的领导，全面贯彻党的各项政策，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就能实现粮食自给，同时使棉花生产大发展。公社党委支持了这一主张，并进一步组织干部和社员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以“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生产”的方针为中心，学习和讨论党的关于人民公社的方针政策，把政策交给群众，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要实现粮



食自給，首先必須堅決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充分發動群眾，依靠群眾。第二、分析實現糧食生產大發展的有利條件，這就是：有人民公社這種優越的組織；有許多肥沃的荒地可以開墾；有良好的水利設施；幹部進一步改進了工作作風，認真貫徹執行黨的政策。第三、學習鄰近老棉區港口公社幸福生產隊實現糧食自給、糧棉雙豐收的經驗，尋找實現糧食自給的有效辦法。通過做這三件事，大家提高了思想，統一了認識，增強了信心。在此基礎上，公社黨委採取由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結合的群眾路綫的方法，制定了一九六〇年播種四萬畝糧食作物、一年實現糧食自給的糧食生產計劃。

* * *

實現糧食自給的計劃，首先要解決耕地少的困難。公社黨委通過進一步貫徹政策，充分發動群眾，終於解決了這個問題。公社黨委根據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政策，在一九五九年冬季和一九六〇年春季，積極幫助生產隊搞好春作物的“三包”，發動和組織社員擴種春作物，同時並允許和鼓勵生產小隊在保證完成包產任務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田邊地角和其他閑散的土地擴種春作物，收入歸小隊所有。結果，各生產隊和社員都積極擴種，使春作物播種面積達到二萬三千畝，比前一年擴大百分之十四，春季就收到了一百三十多萬斤糧食。春收一結束，公社黨委繼續堅持貫徹黨的政策，發動各生產隊和社員用各種方法擴大秋季糧食作物播種面積。

擴大秋季糧食作物播種面積的第一個方

法是開荒。這裡有大片的荒地，雖然荊草叢生，但土質肥沃。在開墾之前，公社黨委根據黨的政策和群眾意見，制定並宣布了經營荒地和荒地收益分配的辦法：以生產隊為單位組織開荒和經營荒地，各生產隊通過“三包”把開墾荒地和管理荒地作物的任務交給生產小隊；各生產小隊包產以內的荒地收入如實上交生產隊統一分配，超產部分除小部分上交生產隊統一分配外，大部分歸小隊所有；各生產小隊在完成包產任務的前提下，可開墾一部分荒地，誰種誰收。辦法一宣布，在公社的統一領導下，以生產隊為單位，全社出動了一千多個社員、五百多頭耕牛、六台拖拉機，到付家洲、大王洲上安營扎寨，開墾荒地。經過二十多天的奮戰，全社開墾了一萬二千畝荒地，全部種上了秋作物，共收穫了九十五萬多斤糧食。

第二個方法是套種。公社黨委根據老農及其他社員的意見，總結出五種套種方法。即：綠豆套玉米，黃豆套高粱，菜地套紅薯，芝麻套碗豆，部分棉田試套花生。由於這種方法切合本地實際情況，受到群眾積極擁護，並且在實踐中把它充實、發展到“十套”。即：綠肥套玉米，高粱套黃豆，高粱套綠豆，綠豆套芝麻，芝麻套玉米，玉米套綠豆，西瓜套芝麻，黃豆套玉米，芝麻套碗豆，紅薯套芝麻。在推行套種中，各生產隊根據社員意見確定：套種的作物一般都不包產，但是如果套種田因人為因素造成減產需要賠產時，套種作物的收入便計入這塊田的包產任務內。這樣，即使完成包產任務更有了保證，



又鼓舞了社員大搞套种的积极性。江心生产队第五小队在史家場种七十亩玉米，分別套种了綠豆、高粱，共收粮食三万二千斤。群众說：“过去史家場，十年九不收，今日史家場，平地起高楼，党的政策好，取得大丰收。”

第三个方法是利用“十边”地。各生产小队在保証完成包产任务的前提下，利用“十边”地扩种的二千四百多亩粮食作物和瓜菜，收获了六十万斤粮食和一百二十万斤瓜菜。

全社通过上述开荒、套种等办法，順利地解决了缺少耕地的困难，一九六〇年粮食播种面积共增加了二万三千多亩，增收粮食二百三十六万斤。

实现粮食自給的另一个困难，是劳动力不足。按照粮棉生产計划要求，全社全年缺少二十万个劳动日。这个困难，公社党委也是通过深入贯彻政策，充分发动群众解决了的。首先，公社党委根据党的政策，把百分之九十五的劳动力集中到生产第一綫，由生产小队支配。公社經过发动群众献謀献計，采取“挤”、“換”的办法，从公社、生产队所屬的机关、企业中挤出了五百个劳动力，又通过以老代壯、以弱代强、以女代男的办法，从食堂、托儿所等单位換出了一批劳动力，再加上充分利用輔助劳动力，使全社生产第一綫增加了一千三百多个劳动力。由于劳动力固定給生产小队使用，各生产小队都能合理安排和使用劳动力。例如，在去年春天，既要收春粮，又要播棉花，还要开荒扩种秋粮，劳力少，時間紧，开始有的社干部认为

无法全面搞好生产。各生产小队积极发动社員想办法、出主意，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地安排劳动力，并加强劳动管理，推行定工分、定报酬、定奖惩的制度，从而充分发挥了社員的积极性。原計划一个半月完成春收春播任务，結果一个月零几天就全部結束了。又如中洲生产队，原来是个穷队，地多人少，全队只有五百来个劳动力，而且其中很多是弱劳动力，平均每个劳动力負担八亩五分地。去年公社下放了五十一个劳动力，生产队把这部分劳动力都固定給生产小队支配。在生产队統一领导下，十五个小队都积极主动地合理安排劳动力，妥善安排生活，认真执行評工記分、超額奖励、按劳分配的政策，大大調动了社員的积极性。一九六〇年全队社員出勤率平均达到百分之九十，比一九五九年提高百分之十，劳动工效比一九五九年提高百分之二十。由于調动了社員的积极性，挖掘了劳动潜力，有效地克服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全队全年扩种了六百亩粮食作物和数百亩棉花，获得了大丰收，粮食比一九五九年增产百分之四十四点四，棉花增产百分之四十二，总收入比一九五九年增长十一万元，实现了戶戶增收入，社員生活大改善。

其次，公社党委还根据自願两利、等价交換的原則，組織协作，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例如，去年进行秋粮作物的田間管理时，江洲生产队第一小队劳动力多、負担耕地少，及早鋤完了头遍草；第三小队劳动力少、負担耕地多，別的小队已經鋤完了头



遍草，他們的三百三十多亩粮食作物的鋤草工作还剛动手。这时，公社党委便和生产队党支部一同召开了一、三小队會議，經双方同意后組織了协作。一小队发揚共产主义風格立即抽出了二十多个强劳动力帮助三小队突击鋤草；三小队按工付給一小队工資。这样，一小队得到了合理报酬，增加了收入；三小队得到了有力的帮助，及时鋤完了草，双方都乐意。这种根据自願两利、等价交換的原則組織的协作，对解决劳动力不足問題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公社党委还从貫徹鼓励革新、奖励創造的政策入手，发动群众开展技术革新运动，大力改革工具，提高工效，節約劳动力。

* * *

江洲公社一貫坚持了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級所有制，从各方面維護生产队的所有制，从各方面保證生产队行使經營管理权。首先是加强对生产队的领导，公社党委书记和常委經常駐生产队，生产队干部駐小队，具体帮助搞好基层工作。其次，公社在生产领导上虚心听取生产队和包产单位的意見，技术措施的制定和推行，強調因地制宜。如一九六〇年制定生产計劃时，公社首先根据国家計劃和各队实际情况向生产队提出建議，由生产队、小队干部和社員群众对作物安排、种植面积、产量指标、技术措施，反复进行了討論，經過四次平衡調整后方才定案。公社和生产队对于土地、劳动力、耕畜、农具固定給生产小队使用的政策，也是执行得很认真的。例如前进生产队，有十三个生产小队。由于劳动力

固定，生产队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劳动力归小队支配，保證了各小队在农业生产上有足够的劳动力。由于土地固定，在作物布局、开垦荒地、貫徹农业“八字宪法”等方面，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有計劃地进行。去年各小队根据公社、生产队的統一规划，有計劃地开垦荒地和推行套种、間种，共扩种了一千多亩粮食作物。由于固定使用耕畜和农具，社員对耕畜、农具特別爱护。由于前进生产队在公社統一领导下认真坚持了“四固定”，各小队之間、社員与社員之間互相了解，从而为开展經常性的生产竞赛創造了有利条件，通过竞赛他們又进一步建立和发展了团结互助的关系。这一切綜合起来，便形成了一股促进生产发展的巨大力量，使全队一九六〇年粮食和棉花的产量比一九五九年有了很大的增长。

公社和生产队在“四固定”的基础上，坚持实行了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的制度，进一步調动了小队与社員的生产积极性，增强了他們的責任心。每季作物的“三包”工作，采取的办法都是以生产小队上一年的实际产量（指一般年景）为基础包总产，作物的安排、技术措施的制定由小队因地制宜地进行，超产部分三成上交生产队統一分配，七成归小队所有。每当“三包”方案落实后，各小队立即組織社員千方百计闖超产。如江洲生产队第六小队接受包产任务后，小队长立即帶領几个老农逐坵察看土质，因地制宜安排作物。这个队的土地，一种是潮沙地，适宜种棉花；一种是飞沙地，适宜种玉



米和綠豆等。小队长根据老农意見并經過社員共同討論，按照包产任务，安排四百七十亩潮沙地种棉花，其余三百多亩飞沙地分別种玉米、高粱和綠豆，并制定了技术措施。这个小队因地制宜地安排作物和实行技术措施的结果，获得了粮棉双丰收，实产超过包产指标百分之十以上。

在执行“三包”的过程中，公社、生产队的干部深入小队帮助出主意、挖潜力，实现包产，力争超产。全社六十四个小队，在公社与生产队的领导与帮助下，艰苦努力，在一九六〇年有五十一一个小队实现了超包产，获得了超产奖励，占全社小队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因为没有搞好生产或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而没有实现包产指标的只有六个小队，占百分之九点一；其余百分之十点九的小队是保产队。但是，与一九五九年的实产比较，全社六十四个小队的产量都增加了。

为了发挥小队的战斗作用，公社党委与生产队党支部在搞好“四固定”与“三包一奖”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健全生产小队的领导核心，严肃认真地发动群众选那些成份好、立场稳、觉悟高、工作积极、办事公道、善于走群众路线、能与社員彻底实行“四同”的人担任小队干部。全社二百多个生产小队正副队长，都是貧农出身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員或者是模范社員。他们不怕苦，带头干，遇事与社員商量，忠心耿耿为社員服务，在带领社員实现粮食自給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先锋作用。

* * *

江洲公社所以能够正确地贯彻党的政策，在一九六〇年实现了粮食自給，是与全社干部有良好的工作作风紧密联系的。这个公社干部作风上的突出之点，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关心群众、善于走群众路线。

江洲公社的干部，总是原原本本地把政策交给群众，处处按照政策办事，并且发动群众进行监督。例如，中洲生产队在去年大办粮食中，由于开始没有明确宣布生产小队在保证完成包产任务的前提下，可以利用零星地种植粮食作物，以致有些小队对利用零星地犹豫不决。当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田紹兴同志到这个队检查工作的时候，老农譚緒之把这件事告诉了他，还说：“我们小队屋前屋后、田头地角的零星地有几十亩，如果要种高粱、玉米，只要社員少抽袋黄烟就种上了；不仅不会影响完成包产任务，而且到秋后还可多收三五千斤粮食。这是大办粮食的好门道，应该提倡提倡。”田紹兴觉得这是关系到贯彻政策、调动小队生产积极性的大事，于是他又到另外几个生产队访问了老农。大家都说譚緒之讲的对。在访问中，田紹兴还发现有的生产队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成绩，创造了经验。田紹兴把这一问题提交公社党委会讨论后，全社广泛发动小队在保证完成包产任务的前提下，充分利用零星地扩种粮食作物。结果，各小队很快掀起了一个利用“十边”土地的运动，种植了二千多亩高粱、玉米、紅薯等，仅秋季就收获了数十万斤粮食。

依靠群众，无往不胜，脱离群众，一事难成。江洲公社的干部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



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在领导大办粮食的工作中，紧紧依靠群众，请社员当参谋，拜老农为师，遇事同社员商量，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全社从公社党委书记到生产作业组长，都有三名到七名参谋或顾问，此外，还有一些知心朋友。由于干部有事同群众商量，群众便把干部当作自己的知心人，遇事就主动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干部同心协力搞好工作和生产。这个公社的中洲生产队，在去年夏季开垦了五百多亩荒地，有四百多亩已经种上了庄稼，另外有八十多亩因为土质太差，干部不知种什么好。几个老农听说后，立即赶来帮助干部出主意。六十多岁的老农杨四维想起二十多年前在这样的荒地上种过米豆，不到二分地，收了十多斤。他根据过去的经验提议种米豆。其他几位老农也都说，米豆虽然产量低，但能耐旱，生长季节又短，种下后只要能遇上一、两次雨，就准保收。干部和社员认为杨四维的提议很好，就把这八十多亩地种上了米豆，结果收了一万零五百斤。

全社各级组织和干部都把关心群众生活列为自己的重要的工作之一，像抓生产一样抓生活。公社、生产队除有专人管理社员的生活外，各小队都挑选了一名优秀的副小队长，以食堂为中心具体管理社员的生活，使社员吃好、睡好、休息好、娱乐好。江洲生产队第六食堂，原来家底薄，又缺乏经验，办得不很好。由于生产小队长、共产党员王弟旺经常到食堂和炊事员一起打柴煮饭、养猪种菜，帮助食堂工作人员提高管理水平，发

展家底生产，结果使这个食堂越办越好。生活搞得越好，社员干劲高。去年这个小队的粮食总产量比一九五九年增加一倍，棉花增加百分之七十七。

* * *

江洲公社在一九六〇年实现粮食自给的斗争中，公社工业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了加速粮食生产的发展，公社首先依靠自己的力量，克勤克俭，发展为农业服务的社办工业，大力支援生产队。去年公社的农具修配厂共制造了各种新式农具二千一百多件，牛车二百五十五部，胶轮车五十二部，木帆船一百四十艘，有力地支援了各生产队。各生产队在去年各种农活中，由于使用了这些工具，节约了大量的劳动力。如江洲生产队，地多人少，每个劳动力负担十六亩耕地，过去年耕作粗放，产量低。去年公社农具厂为他们制造了大批新工具，提高了劳动效率，使各样农活都做得比以前精细，促进了粮食和棉花的增产。此外，社办农药厂、化肥厂，去年还制造了大批土农药、土化肥支援各生产队。社办企业还积极帮助生产队建立和发展农具修配站。去年公社除将农具厂的一部分铁炉、铁钻等工具下放给生产队外，还帮助生产队培养了二十多名铁、木工，使各生产队迅速建立了农具修配站，自己修造一部分工具，既方便又经济，从而更多地节约了劳动力。例如三齿中耕器这种除草的新农具，效率很高，使用也方便。过去由于各种作物的密植规格不同，使用时齿轮之间的距离要经常调整，这就需要工具和技术。



可是过去生产队没有这种工具和技术，因而未能普遍推广。去年各生产队有了农具修配站，有了工具和技术，就使全社原有的三百多件中耕器全部使用起来。全社去年虽然增加了各种作物播种面积数万亩，可是因为使用中耕器锄地又快又好，普遍比过去多除了一、两遍草，促进了作物的生长。

公社还从经济方面帮助生产队发展生产。例如，去年开荒时，荒地上芦苇丛生，杂草纵横，用犁耕、锄挖都不行，公社使用一万多元向国营拖拉机站租来七台拖拉机开荒，帮助各生产队克服了开荒中的困难，提前并超额完成了开荒任务。又如，去年七月间，全社二万多亩棉田遭到虫害，为了及时扑灭，公社借给生产队数万元资金购药灭虫，结果很快消灭了虫害，保证了棉花顺利生长，获得了丰收，平均单位面积产量达到子棉二百四十斤，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在帮助生产队发展粮食生产中，公社对穷队给予了更多的帮助，在公社的帮助下，全社三个穷队去年的粮棉生产均获得了成倍增长，一跃变成了富队。

* * *

正如江洲人民传诵的：“办粮一年，变化万千”，今日的江洲呈现着一片粮棉增产、百业兴旺的新景象。

一九六〇年全社粮食总产量达到五百七十八万多斤，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七，实现了粮食自给。粮食自给是在棉花生产持续跃进的情况下实现的。全社平均亩产子棉二百四十斤，总产六百四十三万多斤，

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五。

粮食生产的大发展，带动了农林牧副渔各业齐跃进。油料全年总产量达七十七万多斤，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五以上。全社养猪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以上，队有养猪场，户户养了猪；家禽比一九五九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全社培育了六十五万株果木、风景和经济林幼苗，营造了九百多亩果木、风景林，还绿化了总长六十四华里的三条干渠。副业收入比一九五九年增加了几倍，平均每人有二十余元。全社养鱼尾数比一九五九年增长三倍多。

随着各项生产全面大发展，收入大增加。一九六〇年全社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二。公社的各级经济，均有很大增长。队有经济收益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四点一。社有经济总收入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七；社有经济在全社经济中的比重，由一九五九年的百分之四点七上升到百分之八点八。社员收入比一九五九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二点四。以食堂为中心的集体福利事业越办越好，各个食堂都建有较雄厚的家底，油料、蔬菜都自给有余。

江洲公社一九六〇年实现以粮为纲、全面跃进，是党的政策的伟大胜利。这一年，不仅在生产上取得了巨大成绩，而且全社干部、社员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重要性。现在，江洲公社干部与社员通过总结一九六〇年的经验，正进一步地全面贯彻党的政策，努力搞好冬季生产，为实现一九六一年粮棉生产的持续跃进而奋斗。



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 战争政策的经济根源

严耀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集合各国的反动势力，到处进行武装干涉和挑衅，成为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这是同美国垄断资本的发展相联系的。

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美国是后起者。美国的工业产量，在一八九〇年超过了英国而居世界首位。但是由于兴起较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实力还不能和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相匹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工业生产超过了英、法、德三国的总和。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九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增长了百分之七十，而同期英国却减少百分之一。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从债务国一变而为最富有的债权国。战前美国对欧洲国家负债四十五亿美元，在战争结束时，欧洲国家反而倒欠美国的钱，只战争借款一项即达一百亿美元。美国的资本输出急剧增加。世界财政资本剥削的中心从欧洲移到了美国。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日法西斯溃败了，英、法帝国主义严重削弱了，美国成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头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依靠战争，生产有较大的增长。工业生产指数如以一九三九年为一百，一九

四三年达二百三十九，提高了一倍以上。在战后初期，美国工业生产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百分之五十六点四，出口占百分之二十三点六，黄金储备占百分之七十一一点三。战后由于大量固定资本的更新，又兼继续进行扩军备战，生产继续有上升。工业生产指数，若以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为一百，一九五九年升到一百五十九。近年来，美国的经济，虽然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日渐下降，但它的工业生产和黄金储备几乎仍各占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半，出口占五分之一左右。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只能使生产和资本进一步集中。美国制造业，资产在五千万美元以上的公司，一九三九年占全部制造业公司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二，资产的百分之四十二。到一九五六年，这类公司就占到总数的百分之零点四，资产的百分之六十一一点五。据美国“幸福”杂志一九六〇年七月号的材料，在美国的制造业和采矿业中，五百家巨大的公司，就户数来说，只占该两业公司总数的百分之零点二，但却占到销售总额的一半，利润的百分之七十。在美国很多工业部门中，都是为首的几家大公司占



据着统治地位。例如在汽车工业中，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家公司的产量占全部小汽车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四百五十个加工工业部门中，有四家大公司的产量占一百五十个部门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在金融保险业方面，也是大垄断组织占据着统治地位。三百家巨大的银行，占银行总数的百分之二，拥有全部存款的百分之五十三。在垄断资本的排挤下，美国的中小企业日益破产。中小企业的破产率，一九四五年为每一万家企业中平均约有四点二家，一九五九年增至五十一家。

美国垄断资本对劳动人民的剥削是越来越残酷了。工业中的剥削率(剩余价值率)一九二九年为百分之一百五十八，一九三五年增至百分之二百，到一九五五年更增至百分之二百三十五，一九五八年估计为百分之二百六十七。垄断组织的利润急剧增加。根据大大压低的官方统计数字，美国公司纳税后的利润，一九三九年是五十亿美元，一九五九年增加到二百三十八亿美元。

美国的生产和资本更加集中于大公司、大银行，使大垄断财团的实力更加增强。洛克菲勒、摩根、杜邦、梅隆等美国八大财团拥有和控制的资产，在一九三五年是六百零九亿美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们发了横财，一九四八年增加到一千二百二十九亿美元。经过侵朝战争，到一九五五年，又增至二千一百八十五亿美元。二十年間，增加两倍以上。特别是那些在国外掠夺和军火生产中占重要份额的财团发展更快。在国外掠夺

中占首位的洛克菲勒财团，一九三一年时控制的资产为二百十五亿美元，到一九五五年增至六百十四亿美元。在军火生产中占重要地位的杜邦、梅隆财团，实力也都有很大增长。

随着美国垄断资本的经济实力的增长，垄断组织对国家生活的统治大为加强，更加加速了垄断资本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垄断组织的代表有更多的人直接参加到政府中去。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一些臭名昭著的人物，如杜勒斯、赫脱、威尔逊、盖茨、尼克松、汉弗莱等等，都是洛克菲勒、杜邦、摩根、如里福尼亚、克里夫兰等大垄断财团的忠实代表。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是波士顿财团的大金融资本家。副总统约翰逊是一个百万富翁。在肯尼迪拼凑的内阁班底中，国务卿腊斯克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主席，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是福特汽车公司的总经理，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是一个石油资本家，又是一个金融资本家。

垄断组织的力量和国家的力量合为一体，通过剥削工人阶级和掠夺广大居民阶层来最大限度地增加垄断资本的利润。在大垄断组织的控制下，美国国家机器本身也加紧搜刮民财，日益掌握着更多的财富。据一九五四年统计，联邦政府拥有资产达一千九百九十九亿美元，约占全国财富的四分之一以上，而在一九二九年，还仅占百分之十五。美国政府还通过税收政策、信贷政策等等来进行所谓调节和干预经济生活，对国民收入作有利于垄断资本的再分配。通过这些方式进



行再分配的財富，約占全国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壟断組織又通过国家的这个龐大的經濟力量，对内压迫和剝削人民，对外进行掠夺和擴張。

* * *

資本輸出是帝国主义的特征之一。列宁曾經指出：“只要資本主义还是資本主义，过剩的資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資本家的利潤；他們只会把資本輸出到国外去，輸出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潤。”^①对于美帝国主义來說，資本輸出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由于美帝国主义拥有直接的殖民地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为少，資本輸出成为美帝国主义渗入其他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掠夺殖民地人民、榨取高額利潤的主要手段。随着美国壟断資本的发展，美国資本輸出迅速增长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主要的資本輸出国家是英国、法国和德国。那时，美国在国外的投資，占世界第四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資本輸出一跃而居世界首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資本輸出急剧增加。

美国資本輸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国家机构来进行的，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資本輸出的一个重要特点。这种通过国家机构輸出的資本，即通常所說的“美援”。美国政府在战后对国外提供的所謂“援助”已达一千亿美元以上。通过“美援”，美帝国主义把它的侵略势力渗入到了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的声明揭露了

“美援”的侵略实质，声明指出：“美国帝国主义利用軍事集团的和經濟‘援助’的政策作为主要手段，力图使許多国家屈服于它的統治。它也破坏着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的主权。高度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中占統治地位的壟断资产階級，同美国帝国主义結成联盟，牺牲本国的主权，指望依靠美国帝国主义者的支持，镇压革命的解放力量，剝夺劳动人民的民主自由，阻撓人民群众爭取社会进步的斗争。美国帝国主义把这些国家拖入軍备竞赛，拖着它們执行准备新的侵略战争和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中立国家进行顛复活动的政策。”^②声明又說：美国帝国主义“是想在經濟‘援助’的幌子下，在已經获得独立的国家的經濟中，維持原有的陣地并夺取新的陣地，是要把已經获得独立的国家拉进軍事集团，在这些国家中扶植軍事独裁制度，建立軍事基地。”^③美国壟断資本的代言人把“美援”說成是美国帮助其他国家恢复和发展經濟的慷慨行为，这显然是弥天大謊。

美国壟断財团的私人資本輸出規模也是很大的。到一九五九年底，美国在国外的私人投資总额已达到四百四十八亿美元之巨。这个数字还是大大低估了的。在国外私人投資中占大部分的直接投資額，是按賬面价值計算的，連美国商务部也承认，市价要比賬面价值高出一倍以上，再加上美国壟断資本

① “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3頁。

②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声明·告世界人民书”，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頁。

③ 同上书，第26頁。



家为了逃稅而隱瞞、造假的部分，到一九五九年底，美国私人国外投資总額估計在一千亿美元以上。

美国私人資本輸出，範圍遍及資本主义世界各个角落。無論是資本主义工业大国，还是經濟不发达国家，都有美国資本的踪迹，都受到美国資本的盘剝。近年来，随着美国殖民势力的擴張，对中东、非洲等地的資本輸出更有迅速增加。

在私人資本輸出中，直接投資約占百分之六十以上。在直接投資中，农业、公用事业所占的比重，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降低很多，而石油和制造业的比重則大为增加。一九五九年底，在全部私人直接投資中，石油业就占了百分之三十五，采矿业占百分之十，制造业占百分之三十三，这三个部門一共占到总數的百分之七十八。前兩部門主要投在拉丁美洲、中东、非洲和加拿大，后者則主要投在加拿大和西欧。这种情况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外投資越来越侧重于直接夺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内及其殖民地的銷售市場，越来越侧重于直接攫取不发达国家的原料。美国工业所需要的各种金屬和矿产原料，有一半或一半以上是从国外掠夺来的。例如，进口的石油占国内石油消費量的百分之十五，鉄砂占百分之十八，天然橡胶全部来自国外。

由于国外工資低廉，原料便宜，加上拥有其他許多便利和特权，美国私人資本在国外投資的利潤率大大高出于国内的利潤率，一般要大百分之三十到七十。据麦金賽公

司对四十家公司的調查，百分之九十五被調查的公司的国外利潤率大于国内，其中三分之一的公司比国内大一倍以上。国外利潤占美国全部公司利潤的比重愈来愈大。据大大低估了的官方数字，美国各公司的国外利潤一九五〇年为二十一亿美元，占公司总利潤的百分之九点一，一九五八年增为三十七亿美元，占公司总利潤的百分之十九点四。在对外投資中，尤以大壟断財团获利最多。据美国經濟学家佩洛估計，一九五六年，美国最大的二百家壟断企业获得了全部公司利潤的百分之五十七，但却得到了国外利潤的百分之九十。美国的一些大壟断財团的利潤还主要来自国外。洛克菲勒的新澤西美孚石油公司有百分之七十三的利潤来自国外。梅隆的海灣石油公司有百分之六十的利潤来自国外。

商品輸出在美国对外掠夺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美国大量的过剩商品，需要世界市場来消納。有人认为，美国商品輸出數額不大，只占国民生产总值极小的比重，因而否认商品輸出对美国經濟的作用。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在一九五八年发表的“二十世紀的对外經濟政策”的报告承认，“美国所生产的耐用品，有百分之九到百分之十輸出到国外。有意义的是，这些出口竟然决定了美国大部分工业是賺錢还是亏本。”报告說，美国的民用飞机、紡織品、銅和軋鋼机以及縫紉机的銷售总額中，出口占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卡車和公共汽車占百分之十九，柴油引擎占百分之十六，农业机器占百



分之十四，工作母机占百分之十一。此外，美国大部分的主要农产品约有百分之二十至四十运销国外。美国全部劳动力的百分之七，即约四百五十万人的就业，直接依赖于对外贸易，比汽车、钢铁、化学和纺织等工业部门所雇用的全部职工人数还要多。

美国对外大量倾销商品，而自己却高筑关税壁垒，每年出超很大，战后最高年份达到一百亿美元。因此，商品输出又是填补它庞大海外开支亏空的主要手段之一。近年来，美国国际经济地位削弱，出口减少，国际收支逆差越来越大，黄金外流，美元地位下降。美国垄断资本正发动一个大规模的出口攻势，要求其他国家降低对美国货的关税和进口限制，规定“美援”款项必须用来购买美国货。

列宁指出：“美国的亿万富翁们几乎是最富的……他们发财最多。他们把所有的国家，甚至最富有的国家，都变成了向自己进贡的国家。”^①美国垄断资本在国外穷凶极恶地进行掠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更加变本加厉了。正如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所指出的，“美国帝国主义成了最大的国际剥削者”^②。

* * *

美国帝国主义为了实现他们的掠夺目的，并且为了排除实现这个目的障碍，顽固地坚持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大规模地进行扩军备战，从而使美国这个工业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成了一个最畸形的军事化经济

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扩军备战的规模，与年俱增。一九三六年度，直接军费（不包括间接军费）为九亿美元，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一，联邦预算的百分之十点三。而在战后，比重就大为增加。一九四八年度，号称已经复员之年，直接军费仍达一百一十七亿美元，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五点二，联邦预算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五。一九五三年度，直接军费达五百零四亿美元，占国民收入百分之十六点五，联邦预算的百分之六十七点八。侵朝战争结束后，每年军费仍达四百多亿美元。一九五九年度，直接军费为四百六十四亿美元，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一点六，联邦预算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五，如果加上间接军费，则总数达到六百二十三亿美元，占联邦预算的百分之七十九点五。一九六一年度财政预算中的军事开支，达四百五十五亿六千八百万美元，占联邦预算全部开支的百分之五十七点一。

军事生产在美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从一九五四至一九五八年，每年军事订货约为一百六十亿美元，绝大部分用于耐用品制造部门，大致等于耐用品需求的四分之一。军事生产就业人数，一九五八年约为五百五十七万人，占到物质生产部门就业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五。近年来，军火生产约占工业

① “给美国工人的信”。《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45页。

②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告世界人民书”，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页。



生产的百分之十四，軍火利潤占全部公司利潤的百分之二十五。

軍事生产是美国壟断統治集团用以支持經濟的一項重要手段。战后美国經濟极不稳定，危机頻繁，美国壟断資本越来越多地利用經濟軍事化来人为地支持生产，企图解救危机。这是美国帝国主义极端腐朽的重要表現之一。壟断資本实行这样的政策，决不能消除資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只能使这种矛盾更加深化。軍事生产的市場是由国家提供的，而且利潤很大，可以人为地刺激固定資本的投资，暂时提高工业生产水平，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就业和消費。但是，經濟軍事化的結果，使越来越多的成品和原料消耗在非生产性的軍事消費上，或以大量战略儲备的形式积压起来，軍事生产实际上起着破坏生产力的作用。同时，經濟軍事化的加强，必然使政府的稅收和國債大为增加，人民負擔加重。美国联邦政府的稅收，在一九三九年度是五十五亿美元，一九五九年度是八百三十九亿美元，增加十四倍多。美国人民平均每人納稅，一九三九年度是四十美元，一九五九年度增加到四百七十四美元，这还没有包括各州的稅收和地方稅在內。联邦公債在一九四〇年是五百零九亿美元，一九六〇年十月是二千九百零六亿美元，增加了近五倍。由于財政入不敷出，通貨膨脹，結果是物价高漲，生活費用指数上升。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六〇年，生活費用指数上升了百分之五十二。这一切就使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日益陷于貧困。新近当选的美国總統肯尼迪供认，美国

有一千七百万人是饿着肚子上床睡觉的。

美国的軍事生产，近年来由于常規武器生产日益减少，導彈和新式武器的比重增加，对于經濟的刺激作用已越来越小。一九五一年軍事生产使用的鋼鉄，占美国生产全部鋼鉄的百分之五十，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到一九五八年只占百分之十左右，目前只占百分之五左右。軍事訂貨已越来越側重于導彈方面。一九五三年度，導彈采购只占三亿美元，飞机八十七亿美元，傳統武器一百五十五亿美元，而在一九五九年度，導彈为三十八亿美元(增加十二倍多)，飞机七十七亿美元，傳統武器五十五亿美元(减少三分之二)。導彈生产所涉及的工业部門远不及傳統武器广泛。从政府軍事訂貨来看，除电子工业、推进器、軍事橡胶、石油、固体燃料、合金等工业部門外，其他許多部門所得軍火定单已大大减少。这种变化也显著反映在軍事定貨的分配上。在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五年間的一百家获得軍事定貨最多的公司中，現已有四分之一被淘汰而由新的公司代替。

新式武器的价值高，成本大，技术設計复杂，研究費用高，也使这些武器的生产对美国工业生产的刺激作用越来越减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一艘潛艇值五百万美元，現在一艘原子潛艇值四千五百万美元，而配备北极星式導彈的潛艇則值九千万美元之多。研究費用和实验費用在武器的总价值及其发展中所占比重大大增长。例如，在一架現代化的 B-52 式的战略轰炸机的价值中，研



究費用占百分之二十，而在阿特拉斯火箭的價值中，這筆費用占百分之六十。

但是，美國帝國主義並沒有因為軍事生產對經濟的刺激作用減弱而放棄經濟軍事化的政策，因為壟斷組織從軍事生產中取得的超額利潤是驚人的，軍事生產是它發財致富的重大來源。

軍事訂貨的利潤率比一般企業的利潤率高。例如，即使根據官方大大低估的數字，一九五七年，與生產導彈有關的化學、電子、建築材料等工業部門的利潤率分別為百分之十四點七、百分之十二點四、百分之十二點九，而食品和飲料工業的利潤率是百分之九點八，紡織工業的利潤率是百分之八點六。同年，五百家最大的工業公司的平均利潤率為百分之十一點六，而接受軍事訂貨最多的十二家公司的利潤率，按官方的數字也都超過這個水平一倍左右，如通用動力公司為百分之十九點七，波音飛機公司為百分之二十一點三，通用電氣公司為百分之二十點一，實際數字還要更高。再以軍火生產占百分之九十的飛機工業來說，即使按官方材料，從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四年，六大飛機公司的利潤率，也比一般製造業高出三倍至四倍。

軍事訂貨的大部分，掌握在壟斷資本集團特別是一些最大的壟斷組織手中。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從一九四〇年六月到一九四四年九月，美國政府同一萬八千五百三十九家公司簽訂了總額達一千七百五十億美元的軍事訂貨合同，而其中一百家最大的公司奪取了訂貨總額的百分之六十七。又

如在侵朝戰爭時期，一百家最大的公司獲得軍事訂貨的百分之六十四，一九五八年度又增為百分之七十五，而中小企業獲得軍事訂貨的比重，則從一九五四年度的百分之二十五點三，下降到一九五八年度的百分之十七點一，一九五九年度又降至百分之十六點六。這就是大壟斷組織特別熱衷於經濟軍事化和擴軍備戰的根本原因之一。

* * *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中國和一系列國家人民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形成了一個強大的世界體系，而且對國際局勢發揮着越來越大的影響。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運動越來越高漲。殖民主義體系在民族解放運動的打擊下迅速瓦解。帝國主義的地盤越來越小了，基礎越來越動搖了。資本主義總危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美帝國主義雖然現時仍是一個比較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但是，隨着壟斷資本的發展，經濟軍事化程度的提高，生產和消費的矛盾日益尖銳，經濟越來越不穩定了。

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聲明正確地指出：“在現代帝國主義的主要國家——美國，資本主義的腐朽表現得最明顯。美國壟斷資本暴露出它顯然沒有能力利用現有的生產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最富有的國家——美國，成了經常失業現象特別嚴重的國家。工業開工日益不足，成了那里的經常現象。在戰後年代里，儘管靠降低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增加軍事撥款，但是生產的增



长速度正在下降，勉强超过人口的增长。生产过剩的危机更加频繁了。”^①

在过去十五年中，美国已经爆发了三次经济危机。现在美国又面临着新的经济危机的威胁。在一九六〇年中，工业生产又形下降。工业生产指数，一九六〇年一月是一百一十一（一九五七年平均数为一百），二月到七月盘旋在一百零九到一百一十之间，十一月下降到一百零五。工业开工普遍不足，生产设备能力过剩的情况极为严重。美国经济三大支柱之一的钢铁工业，从一九六〇年夏季以来，开工率一直在百分之五十左右。失业人数日益增加，目前美国经常有四百多万人全失业，半失业人数在一千万人以上。劳动人民由于处境的日益恶劣，对垄断资本的斗争也加强了。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由于美国农业危机的加深，美国农民的处境日益恶化，许多农场破产。一九三九年，美国共有农场六百四十四万个，而到一九五九年，已下降为四百六十四万个。据美国官方的材料，美国农业人口大量缩减，一九五四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八，而到一九五九年已下降为百分之九。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华尔街日报”的一则新闻报道：美国“农民正以每五分钟一个人的速度流出农村”。

近几个月来，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黄金储备急剧下降。美元危机震撼着美帝国主义的经济地位。这一危机反映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经济不稳定性的加深，反映了美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霸权

的衰落。十五年来，美国在加紧扩军备战的同时，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一直以“施主”自居，把“美援”当作向外扩张的主要手段。现在正走向事情的反面。“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一期的一篇文章说：美国“现在发现自己处于这样的窘境：那些得到帮助的国家变得比施主更为富有。愁美元不够用的是美国，而不是外国。因此，扮演的角色突然掉换过来了——一次引人注目的改变可能正在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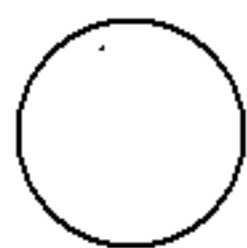
美帝国主义现在正面临着空前困难的处境。怎么样摆脱这种处境，对于美帝国主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美国的官方人士吵嚷嚷，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办法，看来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什么办法从根本上摆脱困境。值得注意的是，美帝国主义目前正在东南亚张牙舞爪，加紧武装侵略老挝。在加勒比海，也调动了大批舰艇进行所谓“演习”，策划对古巴进行公开的军事进攻。美帝国主义显然是想用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的办法，来解救或者缓和国内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使垄断资本集团特别是从事军事生产的垄断资本集团保持高额利润。美帝国主义的这种破坏和平的行为，遭到了亚洲、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国广大人民的反对。玩火者必自焚。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挣扎，都不能挽救它日益走向复灭道路的命运。

^①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告世界人民书”，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页。



红旗

HONGQI



3-4

一九六一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一年第三、四期 ★

目 录

-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 (1)
- 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
代表会议的决议 …………… (4)
- 社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 (7)
- 《不怕鬼的故事》序 ……………何其芳 (13)
- 争取我国工业生产建设的新胜利……………薄一波 (19)
- 鼓足干劲，力争丰收 ……………廖鲁言 (26)
- 一个从铁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起来的农具
修造厂 ……………陶石 (33)
- 关于旧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许瀚新 (38)
- 发展修理服务业是组织人民经济生活的
一个重要内容 ……………陈扬 (47)
- 京西煤矿生产持续跃进的經驗 ……………王政 (51)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在北京举行。

八届九中全会是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进行的。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会委员八十三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八十七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其他工作同志二十三人也列席了会议。

八届九中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同志关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并且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全会对于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议期间的工作表示满意。全会热烈欢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完全赞同这次会议所一致通过的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并且将坚决为实现会议文件所规定的共同任务而努力奋斗。全会号召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高举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同苏联的团结，加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加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团结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人民的团结，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新的胜利。

八届九中全会还听取和讨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同志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全会指出，在一九六〇年，全国人民继续高举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伟大跃进的基础上，取得了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胜利。由于连续三年的大跃进，我国工业生产水平已经大大提高。钢产量已从一九五七年占世界第九位上升到第六位，煤产量已从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已经大大加强，机床的拥有量和工程技术人员都比一



九五七年增长了一倍多。工业总产值过去三年中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率提高了一倍多。农业方面，由于在一九五九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一九六〇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农业生产计划没有完成。但是，过去三年中人民公社的组织日益完善和日益巩固；农田水利建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有效的灌溉面积三年中增加了三亿多亩；农业技术装备有了一定的改善，三年中排灌设备增加了八倍左右，拖拉机增加了两倍左右；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在广泛的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所有这些，不但减轻了过去两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而且为今后的农业增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国在过去三年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明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

八届九中全会认为，鉴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尽最大努力争取农业生产获得较好的收成。在农村中必须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贯彻执行关于人民公社和农村经济的各项政策，切实安排好社员的生活，帮助社员渡过由于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并且为今年农业的增产做好准备。轻工业部门应当努力克服由于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原料不足的困难，开辟新的原料来源，增加生产，尽可能地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重工业方面，由于三年来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主要产品的产量已经大大超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即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的原定的水平，一九六一年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这就是说，应当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的品种，加强生产中的薄弱环节，继续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节约原材料，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由于农业歉收和轻工业原料不足而形成的市场供应的暂时困难，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全会要求各有关部门迅速采取措施，帮助轻工业、城乡手工业、家庭副业和郊区农业的发展，增加各种日用品和副食品的生产，同时改进商业工作，活跃农村初级市场，以便逐步改善供应状况。

八届九中全会建议国务院根据全会所决定的方针编制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八届九中全会指出，加强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的联



系，在目前时期具有最重大的意义。在全国城乡居民中，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绝大多数是拥护党和人民政府的路綫和政策的，他们知道党和政府将坚定地领导他们渡过目前的暂时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并且积极地热情地帮助党和政府这样作。但是也有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极少数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如同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所说，他们总是企图复辟，他们利用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和某些基层工作中的缺点，进行破坏活动。在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中，百分之九十几是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的，而百分之几却是混进革命队伍和各种经济组织的一些坏分子，也就是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以及由于反动阶级的影响和侵蚀而蜕化变质的分子，他们在农村中和城市中违法乱纪，危害人民的利益。此外，在好心好意的工作人员中，也有少数思想觉悟不高的人，他们对于党和政府的基本政策缺乏认识，对于党所反复宣传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以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社会主义社会的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缺乏足够的了解。鉴于这种种情况，许多地方的党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已经在农村和城市的工作人员中进行整风运动，并且已经收到成效。全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进行这一运动，帮助干部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并且纯洁组织，把经过认真考查确属混入党内和政府机关内的极少数坏分子清除出去，同时防止和制止坏分子的破坏活动。所有这些工作，全会认为，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张旗鼓地去进行。

八届九中全会着重指出，一九六一年的任务是异常艰巨的。但是，依靠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伟大团结，依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伟大力量，依靠三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丰富经验，依靠整风运动，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任务是能够完成的。

八届九中全会对于工农业战线上的全体劳动人民、特别是灾区人民表示慰问，并且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革命精神，发扬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千方百计地、不失时机地采取有效的措施，争取今年农业丰收，争取在工业、运输业、商业、文教卫生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其他战线上完成新的任务。

八届九中全会考虑到过去三年中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决定成立六个中央局，即中央东北局、中央华北局、中央华东局、中央中南局、中央西南局和中央西北局，代表中央分别加强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关于各国 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听取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对于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工作表示满意。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热烈欢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完全赞同这次会议所一致通过的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

这次有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参加的会议，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继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之后的另一次重大事件。这次会议的成果，给了正在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世界人民以极大的鼓舞，给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以沉重的打击，在新的基础上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次会议的声明，重申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和平宣言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斗旗帜和行动指南，并且以三年来的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正确分析丰富了一九五七年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将如维护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一样，维护这次会议的声明，并且坚决地为实现这个文件所规定的共同任务而努力奋斗。

正如声明所说，我们的时代，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争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主义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代。帝国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发展的这种进程，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生命力，有力地驳倒了现代修正主义者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理论”。

现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已经出现一个新的高涨。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正在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是仅次于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形成的伟大发展。发达的资本主义各国的人民，针对着本国和外国垄断资本的压迫而进行的群众性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也正在风起云



涌。这一切力量，已经汇合成为冲击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洪流。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进步力量超过了反动力量。社会主义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力量。世界人民面前出现着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光辉灿烂的前景。

当前局势迫切要求世界人民进一步联合起来，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现代帝国主义的主要国家——美国，作为最大的国际剥削者，世界宪兵，世界反动势力和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现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是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美帝国主义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各国反动派一起，结成了各种军事和政治的联盟，日益变本加厉地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扼杀民族解放运动、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和一般民主运动的罪恶活动。美帝国主义坚持这种反动政策的结果，已经使自己陷于空前孤立的地位。在世界人民坚持不懈地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反动侵略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情况下，必能使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运动获得越来越大的胜利。革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共产党人从来就反对革命输出，也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反革命输出，反对帝国主义对于奋起革命的各国人民内部事务的任何干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像以往一样，同各国兄弟党和各国革命的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着促进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事业而作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且认为，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

保卫世界和平，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防止帝国主义正在策划着的新的世界战争，是世界人民的最迫切任务。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仍然在顽固地坚持导向核战争灾难的“冷战”政策，加紧武装西德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疯狂地进行着扩军备战活动。事实证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没有改变。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帝国主义发动新的具有空前破坏性的世界战争的危险并没有过去，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求各国人民保持特别高的警惕。但是，由于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这些当代维护和平的强大力量的联合努力，新的世界战争是可以防止的。只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斗争，建立和扩大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就能够有效地维护和平。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不认为，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需要通过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坚持实行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的政策，一贯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裁减军备，禁止核子武器，解散军事集团，取消外国军事基地，制止复活西德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社会主义各国，首先是苏联的和平倡议，获得了世界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来就把保卫世界和平、实现和平共处、防止世界战争当作自己在国际斗争中最迫切的任务。在过去一年里，我国同缅甸、尼泊尔、阿富汗、几内亚和柬埔寨先后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或者和平友好条约，同缅甸签订了两国边界



条約，同尼泊尔簽訂了关于两国边界的协定，同印度尼西亚就华侨双重国籍問題条約的实施办法达成了協議。这些条約、协定和協議的締結，証明了和平共处五項原則的无限生命力，对于維護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重大貢獻。今后，我們仍將同社会主义各国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在一起，为保卫世界和平、防止世界战争而进行頑强的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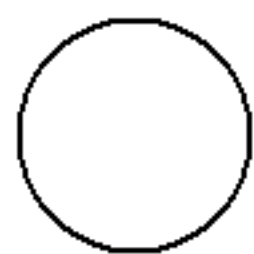
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是各国人民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証。这种偉大的团結，是由共同理想和共同事业联系起来的，是在对共同敌人的共同斗争中发展和巩固起来的，是以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原則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根据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原則，始終一貫地为維護这种偉大的团結而奋斗。

社会主义各国根据完全平等、互相尊重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內政、互利和同志式相互援助的原則进行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合作。各国共产党都是独立的、平等的，同时，必須本着无产階級国际主义的精神，遵守各兄弟党在會議上共同制定的有关反对帝国主义、爭取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共同立場，在共同的事业中团結一致和相互支持。这次會議的声明指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根据需要举行會議来討論迫切的問題，互相了解彼此的观点和立場，通过协商途徑得到一致的观点，协调在爭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这对于加强团結、爭取共同事业的胜利，是完全必要的。

偉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是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的不可动摇的思想基础。为了保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純洁性，創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馬克思列宁主义，必須坚决反对作为资产階級思想反映的、背离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特别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現代修正主义仍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險。与此同时，也要反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傾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认为，繼續貫徹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設的具体实践相結合的原則，提高党和国家干部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在目前具有特別重要的意义。

中苏两国两党的团結具有特別重大的意义。偉大的苏联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历史最久、經驗最丰富的先鋒队。偉大的苏联是社会主义陣营中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一貫为維護和加强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結而努力，认为这是中苏两国人民的基本利益所在，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基本利益所在。帝国主义者妄想分离中苏两党两国团結的阴谋，是永远不能实现的。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會議，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全体中国人民，高举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的偉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同苏联的团結，加强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結，加强全世界工人階級的团結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人民的团結，爭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新的胜利。



社論 大兴調查研究之風

一切从实际出发



——紀念《农村調查》出版二十周年

毛澤东同志从来十分重视調查研究，并且經常亲自动手进行調查研究工作。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毛澤东同志到湖南作了三十二天的实地調查，在掌握了系統的材料的基础上，經過深入的分析写成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艰苦岁月里，毛澤东同志率領紅軍轉战南北，他經常抓住机会动手作农村調查，积累了許多內容丰富、生动，又有深刻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的調查材料。这些調查材料，一部分在战争中遗失了，一部分保存了下来。在一九四一年，毛澤东同志亲自校讀了保存下来的調查材料，編为《农村調查》一书，写了序言和跋。《农村調查》的序言和跋，后来收在《毛澤东选集》第三卷中。《农村調查》的出版，到現在整整二十周年了。

《农村調查》在当时出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們找一个研究問題的方法”，“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①，換一句話說，就是为了在全党各級领导机关和广大干部、党员中，大兴調查研究之風，克服主观主义，树立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和工作作风。一九四一年八月，党中央根据毛澤东同志的建議和他写的《农村調查》的序言和跋的基本精神，作了《关于調查研究的决定》。在一九四二年的整風运动中，党中央把《农村調查》的序言列为二十二个整風学习文件之一，全党干部結合实际认真地学习了这个文件，这个文件的基本精神深入了人心。那次整風收到了很大成效，“这种成效，主要地是在于使我們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和党员，进一步地掌握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統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②从那次整風起，在全党各級领导机关和广大干部、党员中，大大地兴起了調查研究之風，大家懂得了“沒有調查就沒有发言权”这个普遍真理，造成了一个良好的風气：人人以調查研究为荣，以“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粗枝大叶、夸夸其談、“下

① “‘农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789、791頁。

② “目前形势和我們的任务”。《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62頁。



車伊始”就哇啦哇啦发議論的那种主观主义作风为耻。調查研究的作风的树立和发扬，对于推进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有重大的意义的。历史证明，《农村調查》这个榜样所体现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和作风，《‘农村調查’的序言和跋》对調查研究的重要性、意义和方法所作的理論的闡明，对于全党转变思想作风，对于党的建設，对于党的路綫和各項政策在各地的正确贯彻执行，起了极为巨大的作用，从而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今天，我們讀起这些文件来，仍然感到十分新鲜。这些文件所体现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論和工作作风，是永远有效的，今天仍然是我們的工作指南。

毛澤东同志指出：真正的好的领导，必須經常地周密地进行調查研究，“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階級的实际情况，沒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①为什么呢？因为经过調查研究，真正地了解情况，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也才能正确地执行政策。不进行調查研究，对实际情况沒有真正的具体的了解，单凭脑子想像，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来的。对于执行机关說来，如果不对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各个階級、階层的动态，經常地进行周密的調查，也不可能正确地执行政策。

毛澤东同志在《兴国調查》整理后記中說：“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了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我們是辯証唯物主义者，我們必須尊重辯証唯物主义。一切工作必須从实际出发，也就是必須从进行調查研究开始；否則，加強领导，正确贯彻执行政策，理論和实际相联系等等，就无从說起。离开实际調查，坐在房子里冥思苦想，这是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这样子去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不是犯右的錯誤就是犯“左”的錯誤。历史經驗証明：凡是在政策上犯了右的或“左”的錯誤的，都是不重視和不进行調查研究的；凡是正确地掌握政策、工作做得好的，都是十分重視了解情况，都是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之下經常进行周密系統的調查研究的。

所以在一九四二年整風中，毛澤东同志特別強調調查研究，用加強調查研究去反对主观主义，保証中央路綫、政策在各地、各个部門正确贯彻执行。加強調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最好的方法，是正确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綫和政策的基本保証，这是一条真理。在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也是这样。

毛澤东同志指出：“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來說，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們具有对中国社会問題的最基础的知識。”^②毛澤东同志非常善于

^{①②} “‘农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789頁。



从典型調查研究中概括出一般的結論。他說，比如要了解麻雀的結構，不必也不可能把天下的麻雀一一加以解剖，認真解剖几只就够了。

領導者作一些“走馬看花”式的調查以及看下面送來的書面報告、統計數字，都是必要的；但是，了解情況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方法還是親自動手作比較深入的典型調查。如果只是“走馬看花”，一般說來就只能看到表面的現象。現象是入門的嚮導，知道一些現象當然是有用處的。但是，只有親自作了系統周密的典型調查，才能正確處理“走馬看花”所看到的大略情況，做到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從中得到規律性的認識。對於看下面送來的書面報告也是這樣，調查了幾個典型材料，有了對實際情況的基礎知識，才能從書面報告中看出問題來，看出那些結論和建議是真知灼見，可以實行，那些結論和建議是“想當然”的，不能實行，那些情況是基本的，那些情況是次要的，等等，這樣就能在更高的水平上綜合下面送來的書面報告材料。如果不作典型調查，對於確實具有真知灼見的報告，也會因為自己缺乏對實際情況的具體了解而忽略過去。正確的統計數字，對於掌握全面情況是很重要的，但是，只有具體了解實際情況的領導者，才能利用這些數字去引出一般的結論。這就是毛澤東同志十分強調領導者要親自作典型調查、親自解剖幾個麻雀的基本原因，這也就是他屢屢告誡人們不要單是坐在屋子裡看下面送來的書面報告和統計表報的基本原因。

進行典型調查的最好的方法，就是開調查會，找了解情況的群眾和中下級幹部到會，“自己口問手寫，並同到會人展開討論。”^①要開好調查會，必須有眼睛向下的決心，必須有甘當小學生的精神，否則到會的人就會“知而不言，言而不盡”。具體地說來，調查會怎麼個開法呢？毛澤東同志所作的實際調查就是最好的榜樣。

例如毛澤東同志的《興國調查》。這個調查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對八個家庭的調查，一部分是對“各階級在土地鬥爭中的表現”的調查。對於八個家庭的經濟狀況、人口、勞動力、生活和他們的要求、願望，調查得很詳盡、很周密。對於“各階級在土地鬥爭中的表現”，調查了下面一些項目：（一）本區舊有土地關係，其中包括田地分配和人口成份；（二）剝削狀況，其中包括地租剝削、高利剝削（高利剝削中又包括“錢利”、“谷利”等六種）、稅捐剝削；（三）鬥爭中的各階級，其中包括八個階級或階層在鬥爭中的具體表現；（四）現在土地分配狀況，其中包括田地、山林、池塘、房屋、各村分田的數量，等等；（五）土地稅；（六）蘇維埃（當時的工農政權），其中包括區政府、鄉政府、村政府、政府人員的弊病，等等。這次調查，毛澤東同志本來還準備調查兒童和婦女狀況、交易狀況和物價比較、土地分配後農業生產的狀況、文化狀況，因為敵人進攻，我軍決定誘敵深入，沒有來得及進行。從《興國

^① “‘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790頁。



調查》中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一）周密、詳細，如孔夫子所說的“每事問”。（二）但又不是事无大小，現象罗列，而是貫串了階級分析的方法，調查的綱目也是在階級分析方法的指导下定出来的。（三）貫串了历史的方法，对于各个階級是历史的調查，对于八个家庭也是历史的調查，即調查它們在土地改革前怎样，土地改革中怎样，土地改革后怎样。（四）貫串了一般和个别相結合的方法。典型調查对于全局說来是个別，而在典型調查中又有一般和个別的关系。“各階級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現”是一般，“八个家庭的調查”是个別。“各階級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現”的調查，也包含着一般和个别，全乡的状况是一般，个别人物的經濟状况及其变化、具体表現、要求等等，又是个別。这样处处把一般和个别結合起来，对于情况的了解就能够既全面、又深入。（五）着重調查各階級的經濟状况，又注意他們的意識形态。（六）关心基本群众的生活状况和基本要求。总之，在这个調查中全面地貫徹了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开調查会要同到会的人展开討論，就是說調查必須是討論式的調查。大体說来，討論包括两种：一是某一个問題到会人說得不清楚，或者由于見聞所限、众口不一，主持調查会的人及时提問，展开討論；二是討論解決問題的方法，得出結論。毛澤东同志所作的实际調查，有些問題和到会人共同討論，作出了解決問題、改进工作的結論；有些未作結論，仅記錄了到会人对問題的答話。但作出結論来也好，由于材料所限暫時未作結論也好，他总是力求把問題的来龙去脉調查清楚，在調查中寻求解決問題的方法。这就是把調查过程同时作为研究过程，作为調查問題的產生原因和調查解決問題的方法的过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在那里？在实际中，在群众中。毛澤东同志在《长岡乡調查》整理后記中說：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单凭领导人的腦子想得出来的，要依靠在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鮮的具体經驗。这是彻底的辯証唯物主义的實踐观点、群众观点。碰到了困难問題，到群众中去調查，把問題摸透，把問題的历史、產生的原因、周圍的条件等等，弄个一清二楚，把群众的做法也調查明白，这样做得到了什么結果，那样做又得到了什么結果，并且和群众虛心地討論，把他們的經驗集中起来，解決問題的好方法就有了。

調查情况和解決問題的过程，同时又是向群众学习、集中群众經驗的过程。毛澤东同志在《长岡乡調查》整理后記中說：許多基层政权的工作同志，創造了許多动员群众的好办法，“他們与群众打成一片，他們的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功。上級苏維埃人員的一种責任，就在把这些好的經驗收集与整理起来，傳播到广大区域中去，这样的工作，現在應該立即在各省各县实行起来。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給他們看。”这些話，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无限的生命力。收集、整理（也就是总结、提高）和傳播群众的好經驗，在任何时



候都是领导者的责任；“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在任何时候都是“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不可能解决的问题。道理在那里？就在于相信群众的创造力，在于能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去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我们作调查，万不可存着这样的想法：你们（群众）说情况，我出主意，材料在你们手里，办法在我脑子里；而要有拜群众做老师、向群众“取经”的精神。

毛泽东同志一贯非常重视群众的经验。他告诉我们：“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①

对社会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必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调查和分析社会各阶级的动态，这是决定政策和斗争策略的基础。没有对各个阶级的动态的深入了解，就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和斗争策略。而调查分析各阶级的动态，又要以调查分析它们的经济状况和特殊的经济利益为基础。毛泽东同志作实际调查的时候，是非常重视这一点的。例如在《兴国调查》中，调查和分析了中农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六大基本利益：第一，中农人口占全人口百分之二十，土地只占百分之十五，在土地改革中大都分进了土地。第二，土地改革前，中农讨一次亲要花很多钱，几乎等于中农的全部财产，讨亲很不容易，土地改革后，婚姻自由，一个钱也不要。第三，过去迷信，老人死了出丧要花很多钱，中农常常因此负债破产，土地改革后破除了迷信，不用那么破费。第四，过去牛贵，跌死一条牛（南方山地，常常跌死牛），卖得十元八元牛肉钱，要加上十多元，才能买回一条，土地改革后牛贱，跌死一条牛，再加三四元就可买回一条。第五，地主富农权力被打倒，迷信破除，送情送礼、香纸蜡烛都不要了，也节省一点用项。第六，除上述五项经济利益外，尚有政治上的利益，算是最重大的一项利益；过去，中农在地主富农统治之下，没有“话事权”，事事听人处置，土地改革后与贫雇农一起有了“话事权”。毛泽东同志分析了这些情况，就得出了必须和能够巩固地团结中农以及怎样团结中农的普遍结论。

观察各个阶级的动向，要从它们的基本的经济利益出发；某一个阶级拥护还是反对某一政策，最根本的就在于这一政策是增加还是损害它的利益。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党的政策必须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团结同盟者一道去打击革命的敌人。一九四八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写道：“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

^①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796页。



导。”^①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都是根据上述原则来确定对同盟者阶级的政策，实现对他們的领导的。

毛澤东同志在調查中还非常注意群众生活改善的状况，注意改善群众生活和发动群众支持革命战争的关系。长岡乡的工作，各方面都做得很好。当然那里有其自己特有的情况，那里的具体作法，别的地方不能完全照抄。但是，毛澤东同志对长岡乡的工作情况做了周密的調查，从中引出了一条普遍的結論：“苏維埃是群众生活的組織者，只有苏維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問題，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維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紅軍，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圍剿而斗争。应该明白：长岡乡在战争动员上的伟大成績，是与他們改良群众生活的成績不可分离的。”从这里，我們也可以体会到从典型調查中发现一般、抽出一般結論的方法。

調查研究是正确地制定政策和正确地执行政策的基础。毛澤东同志說：“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任何一个部門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②因此，各級领导者和领导机关，要实现正确的领导，就必须經常地进行深入的調查研究。毛澤东同志說，沒有調查就沒有发言权，并且說，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純的一种表现。这是我們必須时时刻刻記住的。

建国以来，我們的事业更复杂、更繁重了。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所以能够制定出正确的路綫和政策，就是因为对中国的情况有深入的調查研究，从而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設的具体实践密切結合起来。实践証明完全正确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及其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針，就是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根据我国实际情况，集中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智慧、經驗、要求而制定出来的。各地方的各級领导机关，正确执行党的路綫、政策，取得了伟大的成績，也是以对本地情况的經常調查研究为基础的。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我們必須繼續发揚党的調查研究的优良傳統。社会主义建設事业是很复杂的，在每一項工作中，不經過反复的調查研究，便不能彻底摸清客观規律。社会主义时代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在总路綫照耀下，我們的事业以不断跃进的姿态前进，情况的变化是非常迅速的，所以也就更需要經常地进行調查研究，及时了解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在全党领导机关和干部、党员中，根据毛澤东同志关于調查研究的指示，大兴調查研究之風，一切从实际出发，党的总路綫和各項政策就一定能在各地、各个部門得到更好的貫徹执行，从而取得更大的胜利。

① 見“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73頁。

② “改造我們的学习”。“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02頁。



《不怕鬼的故事》序

·何其芳·

世界上并没有鬼。相信有鬼是一种落后的思想，一种迷信，一种怯懦的表现。这已经成为今天的人们的常事了。

但在从前，人们并不是这样看的。许多人相信有鬼，而且怕鬼。这是无足奇怪的。人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还不能科学地去理解的时候，他不可能不有各种各样的迷信。何况那时的反动统治阶级，还要利用鬼神来愚弄人民，吓唬人民，巩固他们的统治呢。

今天看来，值得我们惊异的，倒不在于当时有鬼论者之多，而在于当有鬼论者占优势的时候，还是有主张无鬼论的少数派。《论语》中记载的孔子，对于鬼神就有所怀疑，有所保留。荀子在《解蔽篇》中曾经嘲笑一个“愚而善畏”、相信有鬼怪的人。汉朝的桓谭和王充，晋朝的阮瞻和阮修，南北朝的范缜，都抱有唯物主义的见解。他们或者认为人的形体灭亡精神就随之灭亡，或者明白地主张无鬼论。无鬼论和无神论的思想在我国历史上是像火种一样不曾断绝的。这是我们民族的智慧的不灭的光辉！对古代的不为鬼神的迷信所束缚的人，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思想上的勇敢，见解上的卓越。

我国过去的笔记小说的作者，很多都是喜欢谈鬼的。这自然常常是表现了这些作者

还未能超脱出关于鬼的迷信。但是他们之中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虽然认为有鬼，却对这种大家以为可怕的鬼表示不敬，认为没有什么可怕，并且描写了一些敢于骂鬼、驱鬼、打鬼、捉鬼的人物。这类故事是很有意义的。它们机智地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的大无畏精神。这就是我们编选的这种“不怕鬼的故事”。

我们编这个小册子，目的不在于借这些不怕鬼的故事来说明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我们主要是想把这些故事当作寓言、当作讽刺性的故事来介绍给读者们。如果心存怯懦，思想不解放，那末，人们对于并不存在的鬼神也会害怕。如果觉悟提高，迷信破除，思想解放，那末，不但鬼神不可怕，而且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一切实际存在的天灾人祸，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是不可怕的，都是可以战胜的，都是可以克服的。

我们开始编这个小册子，是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之后。毛泽东同志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①这还是一九四六年他在延安接见美国



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時說的話。在這以後，我們打敗了美帝國主義支持的蔣介石，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我們又和朝鮮人民一起打敗了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軍。許多事實證明了毛澤東同志的論斷。然而，怎樣認識革命力量和反動力量的問題，在中國，在世界範圍內，都還是一個大問題，還是有許多人沒有得到解決。他們還有迷信。他們還沒有解放思想，或者還沒有完全解放思想。他們不知道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在某些時候還顯得“強大”和“有力量”，在歷史上記只是暫時的現象，只是臨時起作用的因素；它們的反人民的性質，它們的已經腐爛和沒有前途，却是事物的本質，却是經常起作用的因素。同反動力量相反，革命力量在某些時候還顯得不夠強大，只是暫時的現象，只是臨時起作用的因素；它的進步的性質，它的獲得人民的擁護和必然會勝利，却是事物的本質，却是經常起作用的因素。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藐視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完全有把握、有信心戰勝它們。同紙老虎一樣，傳說中的鬼的樣子也是可怕的，但許多不怕鬼的故事却寫出了它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可怕。這些故事都是這樣描寫的：人只要不怕鬼，敢于藐視它，敢于打擊它，鬼就怕人了。不要怕鬼，這不但可以作我們在戰略上藐視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比喻，而且還可以擴大這個比喻的內容：對於一切看起來似乎可怕但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可怕的事物，如果我們不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對它們抱有畏懼和顧慮，都可以叫

作是“怕鬼”，都是同怕鬼一樣可笑的事情。

世界上並沒有過去的故事里所說的那種鬼，但是世界上又確實存在着許多類似鬼的東西。大而至于國際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以南斯拉夫鐵托集團為代表的現代修正主義，嚴重的天災，一部分沒有改造好的地主階級分子資產階級分子篡奪某些基層組織的領導權，實行復辟，小而至于一般工作中的困難、挫折等等，都可以說是類似鬼的東西。帝國主義、反動派、修正主義等等，它們同鬼有不同之點，它們是實際存在的，而鬼是並不實際存在的。但是，它們同傳說中的鬼又有共同之點，就是總要為祟，總要搗亂，總要引起麻煩；它們或者窮凶極惡，面目猙獰，或者形容妖冶，狐媚惑人；它們都會迷、會遮、會吓，其變化多端和詭異的程度，可以使過去的故事里的鬼相形見绌；而最重要的，是它們同傳說中的鬼一樣，看起來似乎可怕，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可怕。有些人對它們發生畏懼之心，也同怕鬼一樣，都是由于思想落后，由于沒有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由于主觀認識不符合客觀實際而來的怯懦。徹底掃除這種落后的“怕鬼”思想，對於每個革命者來說，是嚴重的鬥爭任務。還有一種“半人半鬼”的人，他們不是被改造為完全的人，就會走到成為完全的“鬼”。當着他們還是“半人半鬼”的時候，他們的反動的一面也是會同其他“鬼類”一樣總要為祟，

① 見“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93頁。



总要捣乱。读一读过去的不怕鬼的故事，大家来提倡不怕鬼的精神，是大有好处的。

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当然比过去故事里的那些不怕鬼的人更加高明。他们清楚地知道，不管国际国内反动势力表面上多么强大，终究挡不住具有雷霆万钧之势的历史车轮。历史和现实生活的规律，总是正战胜邪，真战胜伪，善战胜恶，美战胜丑，新生的革命力量战胜腐朽的反动力量，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战胜剥削者压迫者，先进战胜保守。所以，在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者看来，世界上什么都不可怕。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被打倒的阶级实行复辟或企图复辟，特大的天灾，以及一般工作和斗争中的困难、挫折等等，一切都不可怕。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对这一切完全可以而且必须加以藐视。对于敌人、对于阻碍我们前进的事物不敢藐视，被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吓破了胆，或者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低头屈膝，那就是二十世纪里的怕鬼的人。

我们选的这些故事，很多都是正面描写人的勇敢，不怕鬼怪。选自《夷坚志》的《漳州一士人》，里面的那个人物就什么怪异都不怕。他讲得很好：“天下无可畏之事，人自怯耳。”选自《阅微草堂笔记》的《鬼避姜三莽》，里面的那个人物听人讲到一个捉鬼的故事，就天天晚上潜行在坟墓间，像猎人等待狐狸和兔子一样，准备捉鬼；然而却一直沒有碰到鬼。这个故事的作者的评论也不

错。他说：“三莽确信鬼可缚，意中已视鬼蔑如矣，其气焰足以慑鬼，故鬼反避之也。”选自《子不语》的《陈鹏年吹气退缢鬼》，这个故事写得有些阴森。它描写缢鬼“耸立张口吹陈，冷风一阵，如冰。毛发凛冽，灯荧荧青色将灭”。但接着的一段叙述却有意思。陈鹏年这时想：“鬼尚有气，我独无气乎？”于是他鼓气吹鬼，鬼最后被吹得如烟散尽。选自《金壶七墨》的《陈在衡》，里面的一个鬼作了这样的诚实的自白：“鬼实畏人。”这很像是这些故事的总结。我们对于国际国内一切反动势力、天灾人祸，对于一切表面上可怕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事物，不是都应该有这样的气概吗？难道它们有气，我们反而没有气吗？难道按照实际情况，不是它们怕我们，反而应该是我们怕它们吗？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

有些故事同样是表现不怕的精神，却写得很有风趣。出自南北朝的《幽明录》的《阮德如》就是一例。阮德如在厕所见到了一个鬼，他心安气定地笑着对它说：“人言鬼可憎，果然！”鬼就羞惭而退了。这个故事写得简短有味。也是选自《阅微草堂笔记》的《曹竹虚言》，里面那个不怕鬼的人看见鬼披发吐舌，变作吊死鬼的样子来吓他。他笑着说：“犹是发，但稍乱；犹是舌，但稍长；亦何足畏！”鬼又把它头取下来放在桌子上。他仍然笑着说：“有首尚不足畏，况无首耶！”于是



鬼就技穷了。从《聊斋志异》的《青凤》中节录的《耿去病》，里面描写的对付鬼的办法更妙：

生乃自往，潜于楼下。夜方凭几，一鬼披发入，面黑如漆，张目视生。生笑，染指视墨自塗，灼灼然相与对视。鬼惭而去。

国际国内的反动势力是比鬼还不知道羞耻的。然而我们有时候也必须学耿去病的办法，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并不是为了引起它们的惭愧，而是这可以使它们无可如何，知难而退。

毛泽东同志在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提出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在精神上武装了全国人民，加强了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在今后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在最后战胜国内反动阶级残余力量、争取建成社会主义伟大国家的伟大斗争中，毛泽东同志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思想继续鼓舞着我们，使我们同样会取得伟大的胜利。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思想，总是同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一起提出来的。远在一九三六年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就说过：“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①在一九四八年写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他更为详尽地指出：我们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反对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

体斗争问题上，却又决不可轻视敌人，相反，应当重视敌人。他说：“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中农，独立工商业者，中产阶级，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一般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开明绅士），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②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是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过反复考验的经验总结。他把异常复杂的革命的战略和战术问题用这样简明的语句表达出来，作为我们在革命斗争中的一条根本指导原则，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的理论的概括。

为什么我们对于敌人既要在战略上藐视又要在战术上重视呢？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给我们作了透彻的说明。他指出这是因为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是对立的统一，无不具有两重性。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它们是纸老虎，因此我们应当在战略上藐视它们。从它们吃了成百万成千万的人而且今后还会吃人上看，它们又是真老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20页。

②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67—1268页。



虎；因此我們又应当在策略上在战术上重視它們^①。这就說明了，我們的革命理論的辯証法，我們的战略、策略和战术的辯証法，正是客觀事物的辯証法的正确反映。正因为我們的理論，我們的战略、策略和战术，正确地反映了客觀事物的規律，然后我們才能够战无不胜。同对待敌人一样，我們对待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也必須既在战略上藐視，又在战术上重視。一切革命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都不过是暫时的現象，都不过是前进道路上的阻碍和曲折，都是可以克服、可以扭轉的。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轉化的。在进行着翻天覆地的革命事业的人們的面前，革命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都是十分渺小的存在。从这点上說，我們完全应当藐視它們。然而我們又必須正視它們，认真地研究它們，从其中取得必要的經驗教訓，并且寻找出克服和扭轉的有效办法，坚决貫徹执行，然后才能战胜它們，順利前进。从这点上說，我們又应当重視它們。

我們这里选的不怕鬼的故事，都是着重描写人的勇敢，描写他們对于鬼怪无所畏惧，而且敢于打击它們，因之或許更多地表现了战略上藐視的精神。但其中有些故事也是可以用来說明战略上藐視和战术上重視的密切結合的必要的。这个小册子的第一篇，选自于宝的《搜神記》的《宋定伯捉鬼》，写得很有兴味，也很有意义。你看这个年少时就敢于捉鬼的人，他不但胆大，而且是心細的。他

不但夜行遇鬼，毫不畏惧，精神上完全处于主动的地位，而且善于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办法，使他遇到的鬼从头到尾都在他的掌握之中。最初，鬼問他是誰，他就麻痺它，說“我亦鬼”。鬼建議兩人輪流背着走。鬼发现他太重，疑惑他不是鬼。他又一次地麻痺它說：“我新鬼，故身重耳。”他們过河，鬼涉水无声，他却有声。鬼又怀疑了，問他“何以有声？”他第三次麻痺它：“新死不习渡水故耳。勿怪吾也。”他不但一直使鬼为假象所迷惑，而且还从它的口中探听出来了制服鬼的办法。他說他是新鬼，不知道鬼畏忌什么。鬼告訴他：“惟不喜人唾。”后来鬼变成了羊，他就用唾沫唾它，使它不能再变化逃走。这个鬼就是这样终于为他所捕获了。这个故事不正是表现了这个人不但在整个精神上藐視鬼，而且在具体对待它的时候又很謹慎、很有智謀嗎？

从《聊斋志異》选出的《妖术》，也有同样的內容。这个故事里的于公，不相信街上的算卦人說他三天就要死的預言，沒有受到詭詐。但他回去以后，并不是毫无警惕的。到了第三天，他靜坐在屋子里看究竟有什么事情发生。白天过去了，到了晚上，他便关门点灯，帶劍坐着等待动静。那个会妖术的算卦人果然派一个荷戈的“小人”来杀害他，他用劍砍断了它的腰，原来是一个紙人。接着又一个猙獰如鬼的怪物来了，他用劍砍断了它，原来是一个土偶。后来又来了一个高与檐齐的巨鬼，它一

^① 見“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90頁題解。



推窗子，墙壁都震动得要倒塌的样子。于公怕房塌被压，就开门出去和它搏斗。因为他会武术，这个巨鬼终于被他打败了，原来是一个木偶。如果这个于公不是既对妖术和鬼怪无所畏惧，同时又充分加以警惕，而且有武器和武术的准备，他不是就会被那个算卦人派来的鬼怪所杀害吗？他又怎样还能揭穿那个算卦人的妖术，并且最后给以应得的惩罚呢？

这个小册子里含有这样的内容故事还有，不过不如这两篇情节较为复杂曲折，我们就不一一举出了。这些故事都说明了这样的道理：总的说来，鬼并没有什么可怕，人是完全能够打败它、制服它的。但对于每一个具体的鬼，对于每一个同鬼相周旋的具体场合，人又必须采取谨慎态度，必须有智谋，然后才能最后取得胜利。这个道理是含有深刻的意义的。虽说世界上并没有鬼，我们古代的传说和迷信既然把鬼描写成为一种能够害人的东西，这些故事的作者就会根据人在实际生活中的经验，根据人和有害的事物作斗争的经验，这样去虚构他们的故事，并从而表现出这样的道理来。当然，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高度的理论上的概括，如果没有他的思想的指引，我们读这些故事是不容易看出这样的意义和教训的。

早在四十一年以前，当中国还是魔鬼当道、魑魅横行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所主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号就向中国人民发出号召：“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

要怕。”这是何等振奋人心的大无畏精神！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一切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革命人民，都应该具有这种崇高的风格和革命的气魄，彻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做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汉，做一个既有冲天干劲又有科学分析精神的智勇双全的人！

这本书从一九五九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着手编辑，到今年夏季即已基本上编成。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并决定由我写一篇序。一九六〇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就显得很有必要。当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作出了拥护莫斯科会议声明的决议和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定了今后政策，目前条件下的革命斗争的战略战术又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的时候，我们出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会那么惊世骇俗了。



爭取我国工业生产建設的新胜利

薄 一 波

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三年中間，我国的工业生产建設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六〇年比一九五七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将近两倍，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以上。我国鋼的产量，一九六〇年达到了一千八百四十五万吨，比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长了将近两倍半，平均每年增加四百三十七万吨，为第一个五年平均每年增加八十万吨的五倍半。我国鋼的产量在世界上的位置，一九五七年是第九位，一九六〇年上升为第六位。我国煤炭的产量在世界上的位置，一九五七年是第五位，一九六〇年上升为第二位。三年中，我国工业的其他产品，例如生鉄、电、石油、各种机器設備、化学肥料等等，以及各方面的基本建設，也都实现了連續大跃进。

我国工业經過了三年的連續大跃进，不仅生产水平大大提高了，而且物质技术基础也大大加强了。一九六〇年比一九五七年，我国机床的拥有量和工程技术人員，都增长了一倍多。許多工业产品，在数量大大增加的同时，质量也提高了，品种也增加了。不論鋼、鋼材、机床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品种，一九六〇年都比一九五七年有了很大的增长。我国工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物质技术基础的不断壮大，对于我国国民經济、首先是农业的技术改造，对于科学文化的发展和提高，都已經发生而且將繼續发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一九五七年，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提出了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內在鋼鉄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战斗号召。这个号召，大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加快我国工业发展的斗争意志，提高了全国人民的劳动热情，发挥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創造性。經過了三年的連續大跃进，不仅我国人民完全有信心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超过英国，甚至我們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这种可能了。当我们党提出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时候，英国資产階級經济学家曾經嘲笑我們，认定那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可是不久以前，倫敦泰晤士报也不能不說：“英国應該警惕，巨龙能够超过我們。”

三年的連續大跃进使我們贏得了時間。一九六〇年我国工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大大超过了



原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一九六二年的水平，这就使我们有可能也有必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两年，用较多的力量，来巩固三年大跃进的成就，充实新发展起来的一些事业的内容，提高那些需要进一步改善的新事物的质量。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一九六一年在重工业的安排上，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这就是说，应当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的品种，加强生产中的薄弱环节，继续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节约原材料，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所确定的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应当坚决贯彻执行这个方针。

一切事物运动的规律都是螺旋式的上升和波浪式的发展，经济的运动也是这样。就我国工业大跃进的过程来说，可能是这样：在一定的基础上和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有几年的发展速度很高，有几年的发展速度比较低一些，有几年又会出现很高的发展速度。过去三年我国工业的发展，是在比较薄弱的基础上进行的，数量有很大的增长，质量也有一定的提高。今后我们要求在数量继续增长的同时，大大地提高质量。可以预计，经过两三年的时间，我国工业一定会在新的发展的基础上，更加巩固、更加充实、更加提高，必将出现更好的跃进。因此，必须认识，党中央所提出的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是积极的方针，它既有利于巩固三年连续大跃进的伟大成绩，又有利于今后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

贯彻执行在发展的基础上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首先要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尽最大努力争取今年农业获得较好的收成，尽可能提高农业的发展速度。同时，要努力开辟新的原料来源，加快轻工业的发展，尽可能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在重工业内部应当认真抓紧采掘工业，更多地增产煤炭、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矿石、化工原料、非金属材料及木材等等，使它们进一步适应加工工业发展的需要。为此，矿山的工作必须加强，矿山的建设必须加紧进行。采矿所需要的勘探、采掘、破碎、洗选、烧结、运输等设备和各种附属设备，以及矿山维修所需要的备品、配件，都必须积极安排生产，保证供应。在发展工业生产的同时，要加强交通运输工作，把原料基地和加工基地很好地联结起来，把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很好地联结起来，以保证生产和流通的顺利进行。为此，要加强必要的铁路支线和专用线的建设，对原有线路进行技术改造，对现有设备加强维护，增强短途运输、厂内运输和装卸的力量。运输部门和生产部门要加强协作，组织合理运输，消除浪费运输力的现象。在工业的基本建设方面，要适当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把力量集中起来，打歼灭战。今后两三年内工业基本建设的主要任务，是要从各个工业部门、生产过程各个环节的设备能力的现状出发，进行填平补齐，配套成龙，提高综合生产能力。在具体步骤上，应当首先充实已经建成或者部分建成的新企业，然后再安排必要的新项目。在



进行这一工作的时候，又应当分清主次，分别轻重缓急，优先保证那些国民经济要求最迫切的、生产条件最好的、对当年生产最起作用的、能够提高质量和增加品种的企业；不应当在国家计划以外任意增加新建和扩建项目。

我们优先发展重工业，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给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为了给农业、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等经济部门提供现代化设备，推动它们更快地发展。马克思说过：“不变资本的生产，不是为它自身而发生的，却不过因为那些会把生产物供个人消费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① 马克思这句话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的，但是它的基本原理对社会主义生产也是适用的。这就是说，重工业本身需要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但是这种扩大再生产，目的是为了促进其他经济部门的扩大再生产，是为了促进消费资料的扩大再生产。因此，重工业的发展，不仅应当考虑到本身的需要，而且应当全面地考虑到其他经济部门、特别是农业部门的需要，应当更多地考虑到如何为其他经济部门、特别是农业的技术改造服务。毛泽东同志说：“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② 经过三年的伟大实践，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观点的正确性。今后一定要坚决按照这个观点，来进行工作。

争取工业产品在质量和品种方面的跃进，是工业战线上在今后两三年内的一项主要任务。工业生产的数量是工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但不是唯一的标志。既没有离开数量的质量，也没有抽象的数量，所有产品在具有一定数量的同时，都具有一定的质量。同样，所有产品的质量，都体现在具有一定数量的产品中。数量有多少，质量有高低。当具有一定质量的产品数量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就必须更加重视质量和品种，把提高质量和增加品种当做第一位的要求。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工业企业，都要订出提高质量和增加品种的计划，并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证实现。提高重工业产品的质量，具体来说，首先就要提高煤炭和钢铁的质量，降低煤炭的灰分和含矸率，降低生铁的含硫率，提高钢和钢材的合格品率，提高钢的出材率。同时，应当努力增加优质钢和合金钢的产量，增加重要钢材的产量，使它们在钢和钢材的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都大大提高。轻工业产品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应当力求作到经久耐用，物美价廉，并且要考虑到城乡居民的普遍需要和特殊需要，增加花色品种。无论重工业部门或者轻工业部门，都应当切实制定和严格执行质量标准 and 产

①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74页。

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页。



品檢驗制度，凡是不合格的产品，不得出厂。任何企业，都不应当片面追求产值和产量，而降低质量。只完成产值、产量指标而没有完成质量、品种指标的企业、車間、小組和个人，都不能算作完成計劃；凡是全面地完成这些指标的，应当受到表揚和奖励。

在一定数量的基础上，提高质量和增加品种，对于我国工业的发展以及整个国民經济的发展，将发生极为重大的作用。工业产品的质量提高了，品种增加了，就可以大进一步地提高我国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平，更好地消除工业生产中的薄弱环节，填补缺門，使整个工业体系和整个国民經济体系更加完整，而进一步提高工业材料和设备的自給率，更好地适应国家建設和人民生活各方面的需要。同时，也可以大大地节约人力、物力的消耗，更好地发挥經济效果。我国人民应当有志气有决心，不但在工业产品的数量上赶上和超过英国，而且在质量、品种上赶上和超过英国。我們一定要逐步地做到：凡是工业发达国家能够生产的产品，我們都能够生产；凡是工业发达国家已經达到的质量水平，我們都能够达到。

要全面地完成国家規定的产量、质量、品种等各項計劃指标，除了前面所說的要做好工业各部門之間的填平补齐的工作以外，在企业内部，特别是重工业企业的内部，要做好设备的維修和生产能力的平衡工作。每个重工业企业，都要充实机修力量，准备充分的备品、配件，以及必要的工具和工艺装备，保持正常生产所必需的原料、材料、燃料、半成品和在制品的周轉量，滿足包装材料的需要，保証主要技术措施的需要。每个工业企业，都要实事求是地調查研究本企业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发现缺門和薄弱部分，采取积极措施，或者进行維修，或者改进技术，或者調整和增加必要的设备，按照企业規模的合理性，把薄弱环节和缺門填平补齐，配套成龙。这是一項非常細致的工作，作用很大，意义很大，做好了，就可以使我們現有的生产能力大为增长，有些甚至可能成倍地增长。因此，必須領导干部負責，亲自动手，組織专人，限期完成。机械工业的生产，必須滿足各方面配套、維修所需要的设备、备品、配件。今后出厂的产品，必須是成套的，并且要附有足够的配件和零件。現在許多重工业企业，厂內的运输能力不足，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問題。为了解决这个問題，这些企业都应当根据生产的需要，增加必要的运输力量，具备必要的运输装卸设备、貯料場地、仓库等等。在大型厂矿內，应当注意厂內运输的合理布局，設立专门机构和专职人員管理运输工作，做到原料材料运得进，产品和廢料拉得出，保証生产的正常进行。

为了全面地完成国家計劃，在做好设备的維修和生产能力的平衡工作的同时，要合理地組織劳动力。这三年來，工业、交通部門的职工增加了一倍以上。就絕大多数的企业來說，目前不是人少了，而是人多了。这些企业，依靠現有的劳动力，完全可以保証生产繼續发展的需要。有些企业的領导人員，一提到增加生产任务，就要增加人。我們应当帮助这些同



志，使他們懂得党中央关于抽調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綫的重要意义，使他們发掘企业中現有劳动力的巨大潜力。今后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决不能像过去那样主要依靠劳动力的增加，而应当反过来，主要是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們应当引导企业的领导同志认真钻研，多想办法，改进劳动組織，加强劳动管理，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新的水平。为此目的，各个企业都必須尽量减少非生产人員，充实生产人員，做到增产不增人。要严格实行定員定額，不經批准不得招人。要做好劳动力的調配工作，避免时而赶工、时而停工的現象。要提高出勤率，提高工时利用率，并且按照全面完成計劃的要求組織劳动竞赛。为此目的，尤其需要坚持和改进領导干部、工人群众和技术人員三結合的制度，进一步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在占用劳动力很多的单位，如矿山、搬运、装卸这样的单位，更应当积极地提高半机械化和机械化的程度。同时，要有領导有計劃地发展和創造新技术。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必須把敢想敢干和科学精神結合起来，把放手发动群众和一切經過試驗結合起来。一切革新成就和先进經驗，都要經過科学鉴定；在推广的时候，又要适合各个企业的具体条件。一切革新活动必須同生产紧密結合。凡是經過科学鉴定可以大量推广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有关的領导机关都应当积极予以支持，納入生产計劃和技术操作規程。

工业部門当前的一項重要任务，是要在改进产品质量、增加品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原料、材料、燃料的消耗，降低生产成本。工业的各个部門、各个企业，在这方面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力量。根据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的材料：以煤炭消耗來說，同类的現代化企业的高炉炼一吨鉄所消耗的焦炭，先进的企业只有六百九十公斤，落后的企业却超过一吨；同类的火电站发一度电所消耗的煤炭，先进的企业只有零点四五三四公斤（按标准煤計算，下同），落后的企业却高达一公斤左右；再以生鉄的消耗來說，同类的現代化企业的轉炉生产一吨鋼所消耗的生鉄，先进的企业只有一点一吨，落后的企业却高达一点五吨，甚至还更多一些。又如鋼材的消耗，据一九六〇年的材料，生产一台容量相同、規格型号一致的大型变压器，先进的企业比落后的企业要少用鋼材四点五吨。只要我們帮助这些落后的企业采取有效措施，經過認真努力，使它們在原料、材料、燃料的消耗方面，首先达到平均先进水平，然后再达到先进水平，那么，就可以節約出大量的煤炭、生鉄、鋼材等等，而增产更多的工业品。

为了節約原料、材料、燃料的消耗，降低产品成本，所有企业都要加强定額管理，做好經濟核算工作。沒有定額就无法核算，而沒有核算就无法考察經濟效果的大小，也就不能推动落后赶上先进。应当教育职工突破原有的定額，創造新的定額，但决不是說不要定額，相反应当更加做好定額管理工作。应当发动职工进行經濟核算工作，但决不是說不要专业人員



的經濟核算工作，而是应当把兩者結合起來。每個企業，每個車間，每個小組，都要按月按季進行經濟活動分析。企業的領導人員，要抓先進和落後兩頭，帶動中間，使落後的逐步地趕上先進的。我們只要真正把經濟核算工作做好了，把原料、材料、燃料的消耗降低了，把勞動生產率提高了，把管理費用減少了，就能夠使產品的成本大大降低。

在那些有條件的企業中合理地實行綜合利用，適當地進行多種經營，也是節約原料、材料、燃料和降低產品成本的一個重要途徑。這裡可以舉吉林化學工業公司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公司利用在生產過程中的廢水、廢氣、廢渣，僅僅在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就試制成功七十九種新產品，其中成批生產的有三十五種，重要的有：礦渣水泥一萬八千噸，礦渣棉九千噸，磷肥五千五百六十九噸，硫酸四千四百噸，電石二千噸，碳酸鈣八十二噸，硫化碱六十八噸，等等。凡是有條件進行綜合利用、多種經營的企業，都應當根據自己的技術和資源等條件，在經濟合理和有主有從的前提下，確定本企業綜合利用、多種經營的範圍和方向。

要做好上面所說的各項工作，應當認真地加強企業管理。經過十年來的經驗積累，特別是最近三年連續大躍進的經驗積累，我們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合乎我國情況的企業管理方法，這就是把集中領導和大搞群眾運動密切結合起來，把黨委領導和廠長切實負責密切結合起來，把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密切結合起來，把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和貫徹執行按勞分配原則密切結合起來，以及堅持“兩參、一改、三結合”，等等。現在的問題，是要更進一步地把這些原則和方法制度化、普遍化。提高企業的管理水平，必須切實遵守一切合理的規章制度，特別是那些屬於生產技術方面的規章制度，如操作規程、檢驗規程、安全規程等等。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是應當改革的，但是必須有合理的規章制度代替它；在沒有新的合理的規章制度以前，決不允許廢除現行的規章制度。必須做好作業計劃，做好生產調度工作，組織有節奏的生產，力求做到按班、按日、按旬、按月、按季地完成計劃，防止發生前松後緊的現象。所有企業的領導者，都必須學會兩條腿走路、兩手抓的工作方法，一手抓生產，一手抓生活；一手抓當前的生產，一手抓下一步的生產準備；一手抓日常生產，一手抓設備維修；在夏天就要考慮到冬天的工作，在冬天就要安排好夏天的工作。只抓生產不抓生活，不注意勞逸結合，不注意安全生產；只顧眼前的生產，不顧下一步的生產，過多地吃掉庫存儲備，過分地磨損機器設備，不適當地消耗人力，而使下一步的生產不能正常進行，這是一種不好的領導者。所有企業的領導者，都必須把經濟工作做得更合乎實際情況，更細緻，更深入。

為了保證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能夠按照既定的方針順利地發展，各個部門、各個地區、各個經濟單位，在編制和執行計劃中間，都應當貫徹執行全國一盤棋的精神。也就是說，都要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全國統一計劃中來考慮，使自己的工作適合於全國統一計劃的要求，積



极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不要层层加码。把各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去完成当前最迫切的任务，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方针，和在发展的基础上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几年来的经验，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国家的计划应当充分考虑各方面的积极性，而各方面的积极性首先应当表现在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上面。国家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如果不充分地考虑到各方面的积极性，国民经济就不能得到多快好省的发展；反过来，如果某一个方面、某一个单位脱离国家计划，脱离整体的需要，片面地发挥他们所谓的“积极性”，那就不但不利于整体，也必将不利于他们那个局部。

经常进行调查研究，是争取工业生产建设新胜利的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制订正确的路线、政策、方针，需要经过科学的、周密的调查研究。同样，在执行党的路线、政策、方针的时候，也必须经过科学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这是做好任何工作的基本条件。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才能方法对。所以先决条件是情况要明。而要情况明，就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业各部门、各企业的各级领导干部，应当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实际工作中，及时了解情况，及时发现問題、解决问题。要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来正确地部署工作。有指标就要有措施，有措施就要有专人负责，有問題就要下决心解决，并且要采取正确的方法解决。彻底纠正某些同志那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甚至全然不了解具体情况，却在那里指挥生产的现象。

一九六一年工业各部门和企业单位，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广泛发动群众，分期分批地进行整风。企业整风，应当从调查研究、检查工作、总结经验着手，密切结合生产，边整边改，推动生产前进。应当通过整风，使所有干部提高政治水平和政策水平，发扬实事求是、依靠群众、埋头苦干、民主团结的作风，从而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多快好省地完成国家计划。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革命精神，发扬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千方百计地、不失时机地采取有效措施，争取今年农业丰收，争取在工业、运输业、商业、文教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其他战线上完成新的任务。我们相信，我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一定能够以最大的热情和坚强的意志来响应党的号召，在生产、建设上克服一切困难，胜利地完成党和国家给予的光荣任务。



鼓足干劲，力争丰收

廖鲁言

二月四日“立春”，春耕生产即将在全国各地先后开始。抓紧时机，尽最大的努力，千方百计地争取一九六一年的农业丰收，首先是粮食丰收，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中心任务。

一九五八年以来，工业生产連續三年大跃进，对于商品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需要大大增长。由于在一九五九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之后，一九六〇年又遭到更为严重的百年未有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计划没有完成。这就给我们带来一定程度的暂时困难。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六亿人民，依靠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伟大力量，完全有信心、有条件克服困难，争取一九六一年的农业丰收，首先是粮食丰收。

争取一九六一年农业丰收，是有许多有利条件的。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个思想已经贯彻到各个方面的工作中去。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把农业放在首要的地位。国民经济三年大跃进的实践，无可争辩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论断，教育了干部，也教育了人民。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思想和党的有关方针政策，进一步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掌握，变为几亿农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行动，变为全国各方面积极支援农业的行动。这就成为促进农业增产的无穷的力量。

农村人民公社的组织日益完善和日益巩固。各地在总结三年来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了以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更好地贯彻执行了社会主义的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并且在不妨害集体经济发展的原则下，鼓励公社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党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和农村经济的各项政策的进一步地贯彻执行，毫无疑问将更加充分地调动起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增产。

一九六〇年秋季以来，全国各地一致努力从各方面调剂出一部分劳动力，充实农业生产第一线。现在已经从各个方面主要是从县社两级各项企业和事业中，节约出大约两千多万个劳动力，加强了田间生产。目前我国的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依靠手工劳动。调整劳动力，充实田间生产的力量，为农业增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此外，各地对社员的生活都及早地作了安排，认真地实行劳逸结合。灾区人民也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生产渡荒，休养生息。这样，全国农民经过一冬的养精蓄锐，就能够兵强马壮地投入春耕生产。



已經兴修的水利工程和其他农田基本建設，將逐漸發揮更大的效益。大跃进以来，全国各地兴修了数以百計的大型水利工程、数以千計的中型水利工程和数以万計的小型水利工程，增加了有效的灌溉面积三亿多亩。虽然有的水庫修成以后，由于干旱，蓄水还不多，有的由于输水渠道的修建和平整土地还来不及跟上去，沒有配套成龙，因而还没有能够充分發揮效益，但是，已經配套成龙的工程，在过去两年的抗御自然灾害的斗争中确实起了显著的作用，減輕了灾害的损失。还没有配套成龙的水利工程，只要开渠整地的工作跟上去，就能够越来越多地發揮灌溉效益，越来越有力地促进农业增产。土壤改良和洼地改造等等农田基本建設，也将对今后的农业增产逐渐發揮作用。

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在几年来广泛的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經驗已經越来越多。他們越来越深刻地認識到，必須按照因地制宜、不違农时的原則，推行“八字宪法”。“八字宪法”的内容越丰富，越发展，农业生产的規律性越为干部和群众所掌握，农业生产的增长就越有保証。

經過三年的大跃进，我国的鋼产量已經由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到一九六〇年的一千八百四十五万吨，这就为工业支援农业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这三年中，农业排灌机械增加了八倍左右，拖拉机增加了两倍左右，化学肥料也有了增加。虽然农业机械的拥有量和化学肥料的生产还赶不上农业生产的需要，但是，达到了以年产一千八百四十五万吨鋼为代表的工业化的水平，應該說，我国农业的技术改造已經具备了初步的物质技术基础，完全有可能在今后以較快的速度进行农业技术改造。

以上这些有利条件，不但将促进一九六一年的农业增产，而且将在长时期内对农业生产發揮作用。

現在我們的任务就是要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全党全民，一齐动手，从春耕到秋收，到冬藏，坚持不懈地为实现农业丰收而努力工作。

現阶段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是党在农村中各項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早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开始在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的时候，党中央根据毛澤东同志的建議所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即已明白指出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同年十二月十日，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又詳細地闡述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区别。

現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具体形式，是“三級所有，队为基础”。耕畜和农具等主要生产資料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生产所得的产品，归生产队支配。毛澤东同志曾經一再指出，公社、生产队和生产小队三級所有，三級核算，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



这种制度是适合于当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事实证明，在现阶段，把以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稳定下来，就能促进农业生产力进一步地发展。由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是将来的事情。到那时候，由社经营的拖拉机、抽水机等等现代化的农业技术装备将成为农业的主要生产资料；这些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资料，归各个生产队所公有，也就是归全社所公有。至于生产队所有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所培育的林木果树和多年生的作物以及队营企业，都不收归社有，仍然归生产队所有，归生产队继续经营，继续使用。这就是基本社有制。基本社有制的物质基础是现代化的农业技术装备，而耕畜和畜力的、手工操作的农具将退居于辅助的地位。由此可见，为了创造可以实现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条件，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在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还鼓励公社社员在不妨碍集体生产的条件下经营家庭副业，饲养家畜家禽。社员的自留地，除了一小部分作为公共食堂的菜地以外，其余由社员家庭自己经营。有计划有领导地组织农村的集市贸易，活跃农村经济，这样将大大有利于饲养业、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的迅速发展。家庭副业是一种从属性的经济，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它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下，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庸，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和助手。应当在不妨碍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发展的条件下，积极组织社员经营家庭副业，发展那些不利于集中经营的零星的生产，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这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利而无害的。

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从开始建立人民公社的时候起，党在历次的有关文件中，都特别着重地指出这一原则。农村人民公社所实行的工资制和部分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我国农民群众的创举。部分供给制是一种最普遍、最可靠的社会保险。各地经验证明，供给和工资的比例按三七开是适当的。这就是说，供给部分在分配给社员消费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三十；其余的百分之七十是工资，按各个社员所做劳动工分的多少，进行分配，多劳多得。要很好地实行这样的分配制度，就必须在努力增加生产的同时，坚决实行勤俭办社，精打细算，节约开支。生产投资、管理费用、公共积累和农业税收等支出的总和，在主要还是手工劳动的社队，一般应当控制在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而把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分配给社员消费。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劳动群众的觉悟水平，就能充分调动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发展生产。

当前，各级党委的重要任务，是进一步贯彻执行党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和农村经济工作的各项基本政策，进一步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所有的干部要更加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以队为基础的



人民公社三級所有制、社会主义社会的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并且在实际工作中更好地掌握这些基本政策。

现在，许多地方的农村党组织，根据中央指示，已经在工作人员中进行整风运动，并且已经收到了成效。整风运动一定要搞深搞透，为此就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张旗鼓地进行。在整风运动中，一定要把经过认真考查确属混入党内和社队干部中的极少数坏分子清除出去，纯洁我们的组织。同时，要帮助干部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进一步发扬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进一步把革命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干部作风的改进，对于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加强人民公社各方面的工作，领导好生产，具有重大的意义。

为了争取一九六二年的农业丰收，必须根据党的各项基本政策，进一步搞好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

生产小队是组织生产的基层单位。劳动力、土地、耕畜、农具必须坚决固定给生产小队使用。凡是还没有实行“四固定”的，必须在春耕以前把“四固定”落实到生产小队，并且登记造册，不许任何人随便调用。生产小队与生产小队之间进行协作，必须有利于当前的农业生产，必须自愿两利，等价交换，以工换工，评工记分。在公社内部，为了便于机耕，需要调整插花地的时候，也必须使各有关的生产小队都觉得有利。耕畜固定给生产小队使用，繁殖也由生产小队负责。繁殖的幼畜，所有权属于生产队。那个小队繁殖的幼畜，达到使役的年龄以后，就固定给那个小队使用。生产队必须抽调的时候，一定要商得小队的同意，并且给小队以适当的奖励。农具固定给生产小队使用，修补添置也由小队负责，所需费用应该计算在成本以内。

生产队对生产小队要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制度。三包必须落实，奖罚必须兑现。凡是三包还没有落实的，一定要在春耕以前落实到生产小队，经过社员民主讨论，做到三包计划家喻户晓。有的地方以上年度的实产量作为本年度的包产指标，有的地方以常年产量作为包产指标，可以因地制宜。总之，包产指标必须留有余地，一定要让包产单位经过努力，在正常年景下，有产可超，有奖可得。在保证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的前提下，超产奖励可以奖励一部分粮食，逐步做到以实物奖励为主，鼓励超产的小队储粮备荒。在保证完成包产任务的前提下，生产小队应该充分利用田边地角和其他闲散土地，多种多收，并且合理组织好劳动力，利用农事闲隙时间，发展林、牧、渔业和其他副业生产。生产小队包产任务以内的各项收入，除了应得的奖励以外，都应该上缴给生产队统一分配。超产奖励和节约的成本归生产小队支配。生产小队包产任务以外的经营收入，应该绝大部分归小队所有，归小队支配。生产小队的这种收入，可以提出一小部分作为本小队的公共积累，把大



部分分配給本小队的社員。在一个生产队內，各小队有的超产得奖，有的沒有超产、沒有得奖，超产多少不同，得奖多少也不同，包产任务以外的經營收入多少也不同，于是，在各小队之間口粮标准、工資水平和劳动工分的分值就会有高有低。这种差別在一定程度上是各小队生产經營得好与不好的反映，承认这种差別，对于发展生产是有利的。生产小队的利益是社員群众最直接关心的。坚持生产小队的这种小部分所有制，对于調动社員群众和小队干部的积极性是十分必要的。

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生产經營管理的权力应该主要归生产队。生产小队是組織生产的基层单位，安排农活的指揮权应该归生产小队。在保證完成包产任务的前提下，生产小队有权因地种植，有权制定技术措施，有权安排各种农活。公社的生产計劃，应该建立在生产队的生产計劃和生产小队的包产計劃的基础上。作物安排、产量指标和技术措施，都应该經過社員群众討論，由生产队和生产小队共同商量制定，由社員当家作主。公社是一个統一的整体，生产队和生产小队是它的組成部分。公社对全社的生产計劃的制定、先进技术措施的推广、生产資料的供应、劳动力的规划和生产部署等要进行統一的领导和安排。公社一級领导机关有权根据国家計劃向生产队提出建議，并且在商得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同意后，对生产队提出的計劃做必要的平衡和調整，但是，不能不問实际情况，不听生产队、生产小队和社員的意見，任意規定产量指标，机械地安排作物种植面积，硬性推行技术措施。

民主集中制是人民公社的組織原則。人民公社的各級組織应当健全經常的民主管理制度，充分發揮社員代表会或社員大会的作用。貧农和下中农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社員代表会应该以貧农和下中农为主体。富裕中农經過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般都得到了教育改造，有一部分改造得比較好，社員代表会也应该有改造得較好的富裕中农的代表。不但公社一級需要成立社員代表会，生产队一級也需要成立社員代表会。因为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一个生产队大約有二百五十戶左右，社員大会不容易經常召开。至于生产小队約有三、四十戶，大事可以随时召集社員开会討論。社队兩級都要实行一切权力归社員代表会。

此外，还要加强人民公社的經濟核算和財務管理工作，彻底实行勤儉办社，坚决反对貪污浪費。

为爭取一九六一年的农业丰收，还必须不失时机地搞好生产安排，因地制宜地抓紧一切可行的技术措施。

在安排农业生产的时候，必須以粮为綱，同时适当安排棉花、油料、蔬菜和其他經濟作物，发展林牧副漁等多种經營，以适应整个国民經济发展的需要和城乡人民生活的需要。

增加农作物产量的途徑，是多种多收和高产多收并举，增加种植面积和提高单位产量，



两条腿走路。这是毛澤东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向各級党組織和公社、生产队一直到生产小队的干部指出的一条正确的途徑，必須認真切实地貫徹执行。这两年来各地开展的“見縫插針”运动，應該繼續坚持下去，把屋前屋后、村前村后、地边、路边、水边的一切可以利用的零星閑置的土地全部利用起来。开垦荒地的工作也應該尽力进行。在本社本县的小片开荒和省內近距离的移民垦荒，花費較省，收效較快。在拖拉机等农业机器还不很多的最近几年以內，應該把小片开荒和省內开荒做为开垦荒地的重点，在劳动力許可的条件下，积极进行。

在安排农业生产的时候，需要同时做好农村劳动力的安排，并且安排好人民生活。在农业沒有实现机械化以前，农村劳动力总是緊張的。劳动力的使用，应当区别輕重緩急。在决定种植計劃、制定技术措施和安排林牧副漁等多种經營的时候，都必須把劳动力的因素考虑在內。要合理地利用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还必須切实貫徹劳逸結合，保證公社社員有适当的休息。田間生产是有季节性的，一年之內有忙有閑，甚至一月之內也有忙有閑。按照农事忙閑的不同，把农村劳动力組織好，使用好，做到既有經常队伍，又有机动力量，既不誤农忙的需要，又使农閑时不发生窝工浪費，既保證农业生产需要的劳动力，又保證多种經營需要的劳动力。这是一門很大的学問，公社、生产队和上級机关，要同生产小队干部一起，認真学会这一本領。各級干部，一直到公社、生产队和生产小队，必須把农民的生活安排好，粮食管理好，办好公共食堂。公共食堂只許办好，不許办坏。管理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安排好人民生活，是十分重要的工作，是爭取一九六一年丰收的一項重要的保證。

在农业技术措施方面，必須因地制宜，不違农时，积极地繼續貫徹执行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八字宪法”是增加农作物产量的綜合措施，它符合于农作物生长的普遍規律。各种不同的农作物，在不同的地区，种在不同的土壤上，又有各不相同的具体規律。我們應該以“八字宪法”为指导，从实际情况出发，去摸索寻找在不同地区、不同土壤等条件下各种作物生长的具体規律，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这样也就使“八字宪法”的内容更加丰富和发展。各地、各公社、各生产队和小队，都應該仔細研究本地本社本队的任何一个可能增产的措施，經過試驗成功以后，积极推广。不論是增产效果大的或者增产效果不很大的，不論是适用于大范围的或者只适用于部分土地的增产措施，都不要放过。不同群众商量，机械地硬性推行技术措施，是必須反对的；經過試驗証明有效的技术措施，不引导群众在条件相同的地方积极推广，也是不对的。

当前，首要的工作是抓紧冬麦、油菜和夏收杂粮等越冬作物的田間管理。看天、看田、看苗，合理施肥、灌溉，及早除虫治病，力爭更多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一九六〇年秋季播种小麦的时候，一般墒情是比較好的，初期的生长情况一般也比較好，不过近一个多月以来，华北等主要产麦区，缺少雨雪，旱象已經开始露头，一定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水源，同干旱



作斗争。同时，还要尽可能准备好一批农家肥料和化学肥料，让冬麦在返青以后，既不缺水，也不缺肥，达到高产。

要抓紧春耕以前的一切生产准备工作。大力积肥、造肥，经营好越冬的绿肥作物，充分利用城市粪便和其他一切肥源，为越冬作物准备充足的追肥，为春播作物准备充足的基肥。目前化肥供应量还不足，尤其要抓紧积农家肥料。要利用春耕大忙季节到来以前的时间组织群众积肥造肥，并且及时把已有的肥料运送到田间去。社员家庭养猪积肥、人畜粪尿和社员利用集体劳动以外的空余时间拾的粪肥和沤制的土杂肥，交队使用的，一律要按质按量，计价收买。

在春耕大忙季节到来以前，还要根据当地水利的情况和劳动力的条件，适当安排一定的劳动力，不脱离生产队，不脱离本食堂，把必须兴修的渠道修起来，把土地平整好，切实做好工程配套，使已经修成的水库和已经蓄起来的水真正能够用于灌溉。旧有的堤坝塘堰的岁修工作，也要抓紧做好。

各地要立即以生产小队为单位，逐队检查留种量和选种情况。根据小队的包产计划，按作物、按地块把包产计划检查落实，也把留种量和选种情况检查落实。种子一定要经过精选。种子经过精选，可以保证合理密植，节约用种量，可以保证苗齐苗旺。要根据当地当时气候的变化，选择播种的时间，保证不违农时，迟了不行，过早也不行。

各地各社各队，还必须认真检查小农具、人力畜力农具和农业机器、排灌机械的准备情况。特别是小农具和人力、畜力农具，目前还是农民向地球开仗的主要武器，必须在春耕前切实准备好，该修理的修理好，该添补的添补齐全。有关部门应该尽力做好制造修理农具用的钢铁竹木等原材料的供应工作。地方经营的和公社经营的制造修理农具的单位，以及负责农具供销的商业部门，必须做好工作，按照季节及时满足农民对于农具的需要。农业机械和排灌机械，该修理的要及时修理，没有配套的要及时添补配套。为了适应农业季节的需要，农业机械部门应该把春耕所需用的农业机械和排灌机械的修理配套工作作为第一位的任务。对耕畜的饲养管理工作也要加强。要保护耕畜安全过冬，使耕畜在冬季农闲季节得到适当的休息。

争取一九六一年农业丰收，首先是粮食丰收，不只是农业部门单独的责任，而且是各部门共同的责任，是全党全民共同的责任。工业部门和各有关部门，都应该把支援农业的任务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真正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指出：“鉴于农业生产连续两年遭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尽最大努力争取农业生产获得较好的收成。”现在，全体农民、全国人民和全体干部正在继续鼓足干劲，掀起一个争取一九六一年农业丰收的生产新高潮，经过全党全民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实现党的这个号召。



一个从铁业生产合作社

发展起来的农具修造厂

陶 石

北京市房山县城关人民公社农具修造厂，是房山县社营工业企业中一个规模较大的工厂。全厂现有职工二百一十五人，分设冶炼、铸工、锻工、机工、木工、黑白铁、农具修配和自行车修理等八个车间，有机床三十四台，电动机十七台，基本上实现了半机械化生产。这个厂能够制造和修配小型农具、部分农业机械和食堂炊具等。它所修造的小型农具，占城关公社小型农具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农业机械，占公社农业机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城关公社依靠它的力量，做到了农业机具“中修不出社”。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原来由十几个手工业者组织起来的铁业生产合作社，怎样在党和政府的扶持和引导下，坚持了为农业服务的方向，最后发展为一个具有一定规模、成为城关公社的主要技术力量的农具修造厂。

一九五四年元旦，在房山县手工业联社的帮助下，十八个手工业工人和个体手工业者，组成了一个铁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社刚成立的时候，只有几件简单的手工工具和一间草房，流动资金不到二百元，原料很缺乏，

又逢到农闲淡季，产品销售不出去，生产上遭遇到不少困难。

房山县党和政府，为了扶持这个铁业生产合作社，根据这个社的大多数成员都是修理农具的手工业者的情况，决定从供、产、销方面帮助这个社同有关的部门挂钩，开展制造和修理农具业务，把它引导到为农业服务的道路上来。在铁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后不久，房山县手工业联社发给贷款五百元，低价赊借生铁二千斤，第一次就向它订购农具九百件，并且经常分给农具加工的任务。铁业生产合作社在社章中规定了为农业服务的方针。它沿着党和政府指引的道路，除了用一小部分力量给厂矿企业加工一些零件如螺丝等以外，用主要的力量进行农具、排灌工具和炊具等生产。这样，铁业生产合作社一开始就把自己同农业结合在一起，迅速地开展了自己的业务。一九五四年年底，这个社的职工发展到四十名，总产值达到三万八千多元，生产了小型农具三千多件。一九五五年，职工增加到四十九名，产值增加到八万二千元，生产小型农具达七千多件。一九五六年，农业合作化高潮出现，农业生产有很



大的发展，农具的需要量大增，铁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也更快。这一年，职工增加到九十二名，添置了两台车床，一台钻床，一台柴油机；除原有的锻工、黑白铁、修理自行车三个小组外，又新成立了铸工和机工两个小组，并在大韩继等五个村建立了农具修配组；全年产值达到二十二万元，生产小型农具一万多件，水车一千台。

铁业生产合作社的绝大多数社员，看到事业日益发展，都欢欣鼓舞，心情舒畅，积极生产。但是，也有少数社员却滋长了一些错误思想。有的社员留恋过去的个体生产，认为参加铁业生产合作社以后，不如在个体手工业时“自由”；有两个社员甚至因此退了社。有的社员对于为农业服务的方向发生动摇，认为制造和修理农具，产值小，利润低，没有搞头，不如转向为工业加工服务。铁业生产合作社在上级领导下，结合着社章学习，发动群众，通过回忆对比，摆事实，讲道理，对社员群众进行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社员群众回忆入社前后在生产、生活方面变化的事实，认识到个体生产者的“自由”，只是少数人发财，而使大多数人陷于贫困、破产的“自由”，只有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生产，才能使大家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在坚持为农业服务方向的讨论中，社员了解到制造和修理农具，对于发展农业、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作用。他们了解到铁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壮大，是和为农业服务、同农业结合紧密地联系着的。只有继续坚持为农业服务的方向，才能得到广阔的发展前途。离开农业生产的

需要，片面追求产值，追求利润，不仅不符合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方针，而且对本身业务的开展也是不利的。这样，克服了在少数社员中存在的错误思想，坚持了为农业服务的方向，铁业生产合作社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原来退了社的两个人，在这种形势下，不久也回到社里来了。

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这个由手工业者组织起来的铁业生产合作社，走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四月，转为北京市周口店区地方国营农具修配厂。九月，房山县城关地区实现了公社化，这个厂下放给城关人民公社领导，改名为农具修造厂。

城关公社的领导和群众，对农具修造厂很重视，积极为这个厂的发展，解决资金、设备、原料和技术力量的问题。在资金和设备方面，从一九五八年公社化至一九六〇年年初，公社先后向农具修造厂投资十八万元，为农具修造厂扩大装备创造了物质条件。仅在一九五八年年底，农具修造厂就利用公社的八万元投资，添置了六台机床，改用了电力生产，大大提高了生产能力。在技术力量方面，通过各方面支援和自己培养，先后增加了一批技术人员。在原料方面，公社领导上不但把国家配给的大部分钢铁，分给农具修造厂，而且把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城关公社炼铁厂，并入农具修造厂，成为它的冶炼车间，以解决农具修造所需要的原料。目前，农具修造厂生产的农



具、大鍋等主要產品，大部分的生鐵原料，是依靠自己冶煉的。另外，在運輸力量方面，農具修造廠通過協作方式，執行等價互利原則，從各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獲得了有力的支援。在公社領導和群眾的積極支持下，農具修造廠很快地發展、壯大起來。一九五八年以來，全廠職工人數增加了近一倍，車間由五個增加到八個，機床等重要機械設備增加了三倍以上，新建廠房一百七十多間，產量、品種逐年增多。

在公社的大力支持下，農具修造廠製造和修配農業機具的能力大為增強。但是，由於公社化以後，社辦的廠礦企業迅速增加，這些企業都迫切地需要增添設備，加強技術力量。農具修造廠是公社的一支主要技術力量。公社黨委要求農具修造廠，除了把主要力量放在為農業服務方面以外，抽出一部分力量，為廠礦企業加工和生產機械設備。在一九六〇年秋季大辦農業、大辦糧食以前，農具修造廠用於為廠礦企業加工和生產機械設備的力量，經常約占三分之一左右；加工和生產的機械設備，主要有壓力機、制磚機、卷揚機、起重機、水泥攪拌機、硫酸泵和夾板錘等。城關公社耐火器材廠、制鞋廠等廠礦企業的主要設備，都是農具修造廠製造的。農具修造廠對於城關公社社營廠礦企業的發展，獻出了自己的力量。

為廠礦企業加工和生產機械設備，產值和利潤要比生產農具高，在少數職工中，片面追求產值和利潤的錯誤思想又有抬頭。農具修造廠的黨組織，在城關公社黨委領導下，

再一次開展了全廠大討論，對職工群眾進行了國民經濟以農業為基礎的教育，糾正了少數職工的錯誤思想，使全廠職工進一步明確認識到，農具修造廠的光榮任務，就是為農業生產和農業技術改造服務。

* * *

一九六〇年秋季，房山縣城關公社為了貫徹執行黨中央關於“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對社辦的廠礦企業開始進行了整頓。公社對農具修造廠的任務重新作了規定：集中全力為大辦農業服務；把原來為廠礦企業設備加工的力量，集中到為農業服務方面來，安排為農業服務的生計，如果廠礦企業迫切需要農具修造廠加工，也必須經過公社黨委批准，才能接受加工任務；加強同生產隊的聯繫，及時製造和修配農業機具等。農具修造廠在公社指導下，清退了為廠礦企業加工的許多訂貨，調整了力量，從而生產出更多的產品，供應了農業的需要。據一九六〇年第四季度統計，農具修造廠製造了小型農具五千五百多件，動力鋤草機十五台，飼料粉碎機十一台，電碾四台，食堂炊具五千二百多件，其中大鍋三百多口。僅小型農具一項，就比一九五九年同期增長了百分之六十以上。

“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號召，大大提高了職工的覺悟，在生產和服務態度等方面，都出現了新氣象。機工車間職工，發揮巧幹精神，生產薯類切片機，日產由十台猛增到二十三台。鑄工車間原來是全廠的後進車



間，常常完不成生产任务，現在大家的干劲足了，每天完成生产任务。許多下乡修配的工人，主动找工作做，哪里的农具需要修配，就赶到那里，有多少农具需要修配，就修配多少，工作沒有完成，决不离开，因而受到了农民的贊揚。例如，修配工人周克勤和靳旺，听说支楼生产队需要赶修水車，就及时赶去修理，在修理的空隙时间，他们还下地参加劳动，受到了支楼生产队的表揚。又如，工人邵义，了解到饒乐府生产队有十头騾子，因为沒有釘掌，不能耕地，他就及时赶去釘掌，保证了騾子及时投入生产。

几年来，特別是一九六〇年秋季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以来，农具修造厂为公社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改造贡献了很大力量。

农具修造厂圍繞党在农村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来安排生产。当公社各生产队忙于备耕、备种、备收的时候，农具修造厂就集中力量，生产农具。仅据一九六〇年統計，就生产了小型农具二万五千多件，新式农具、农业机械和排灌机具三百多件。当公社举办农田水利基本建設的时候，农具修造厂就配合建設工程的需要，及时生产大批水庫工程所必需的技术装备，供应水庫工地，并抽出技术工人，深入水庫工地，帮助民工进行工具改革，減輕民工的劳动强度。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农具修造厂的职工，發揮大胆革新和創造的精神，創制

了大量新式农具。据一九六〇年統計，全年創制了灵便中耕器等新式农具十种，三十三件，仿制了玉米脫粒机等新式农具十三种，四十件，改制了薯类切片机等七种，一百六十八件。全年創制、仿制和改制的二百四十多种新式农业机具，共为农业节约了近一万个劳动日。他們所創造的机引三铧培埂犁，每天能够培埂一百多亩，相当于二十头畜力和十个劳动力的效力。他們所仿制的風送截断机，只用两个中等劳动力操作，每小时能鋤干草一千公斤或青草二千公斤，每天能供五百头牲口吃草，代替了六十六人劳动，比人工鋤草提高效率三十二倍。农具修造厂还为公社各生产队的公共食堂鑄造了大鍋、菜刀、勺子、水桶、煤鏟等各种炊具，供应了农民生活方面的需要。

几年来，由于抵禦自然灾害，发展农业生产，农业机械的損耗很大。根据这种情况，农具修造厂特別加强了农业机械的修配工作。他們把农业机械的修配和制造結合起来，貫徹了先修配后制造的精神。他們曾經在厂內有关車間中，建立了农具修配、机器修配、釘馬掌等专业小組，从事修配工作。一九六〇年第四季度，为了进一步适应农具修配的需要，在原来修配专业小組的基础上，設立了农具修配車間，专门修配农具。修配专业人员由十三人扩充到三十五人，当修配任务重、农具修配車間和专业修配人员不敷需要时，其他有关車間也分担修配农具的任务，并且确定由一名副厂长专门领导修配工作。仅据一九六〇年統計，农具修造厂修配



了小型农具五千八百多件，拖拉机七十多台次，拖拉机零件二千七百多件，锅驼机一百五十多台次，水车四百多台次，胶轮大车一百四十多辆次，以及锄草机、水泵、手推车等将近二千件。而且修配时间大为缩短，有些农具当天就可修好。

为了更好地了解各生产队的需要，并加强生产队的修配力量，农具修造厂经常派人下去，深入生产第一线，同时下放一部分技术人员到各生产队。几年来，农具修造厂下放了技术人员三十五名，充实了城关公社各生产大队农具修配站的技术力量。城关公社各生产大队修配站的技术力量，大多数是农具修造厂培养起来的。一九六〇年，农具修造厂在城关公社党委领导下，配合有关部门，了解了各生产队对于农具需要的情况，并且组织了七个修配专业队，下乡巡回修配农具，在修配空隙，同农民一起劳动，教会

农民使用和管理新式农具的技术，得到农民赞扬。

今年以来，农具修造厂正在结合城关公社各生产队的春耕准备工作，忙于赶制农具。他们在公社党委领导下，先派出一名副厂长和几名技术人员，到各生产队了解了春耕中需要农具的情况，而后组织了十七个技术人员，由副厂长率领，带了三台烘炉，下乡修配农具和排灌机具。为了提高产品质量，下乡修配队把两位巧匠吸收归队，赶制当地镰刀、锄头名牌货。在厂内的职工，也在集中力量，为春耕的准备工作服务。他们除在制造小型农具以外，还在赶制水稻插秧机、耘锄、喷雾器等农业机具和水泵等排灌工具，以及饲料粉碎机等畜牧业机具。同时，他们准备结合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掀起全厂生产竞赛高潮，以保证完成春耕所要求的任务。



同商量 (套色木刻)

介夫



关于旧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許 滌 新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五年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已经指出，旧中国的官僚资本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中，也就是在编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著作中，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的形势，明确地论述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两个部分即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区别，论述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问题。他指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金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①

当时，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收四大家族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旧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大抵是在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经过一般垄断然后进入国家垄断阶段的。旧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却不如此。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经济十分落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一般资本主义经济得不到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不是在生产发展、一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不是经过一般垄断而进入国家垄断的。它是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直接利用国家政权，一方面掠夺工农劳动群众及其他小生产者，一方面压迫民族资产阶级，而直接成为国家垄断资本的。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本来并没有什么了

^①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53页。



不起的財富，他們是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舉行反革命政變，竊取了國家政權，成為大買辦、大地主的新的政治代表人物之後，利用國家政權逐步地發展成為壟斷資本集團的。所以，中國四大家族壟斷資本的形成過程，也就是他們建立和加強血腥的法西斯軍事獨裁的過程。在舊中國的條件下，民族資本很少有發展的機會，也難以實現生產規模的集中和擴大；只有同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的官僚資本，才能在短促的時間內成為國家壟斷資本。

四大家族依靠國家政權，無孔不入地擴大其壟斷活動的範圍，從金融、商業、工業、農業直至文化事業的物質機關，包括國民經濟的一切方面。

金融和商業，是官僚資本獨占的最主要的和最先下手的方面。蔣介石在建立了法西斯獨裁以後，立即利用國家權力，控制了原來北洋軍閥政府的兩大金融支柱，即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後來又相繼成立了“國家的”中央銀行和中國農民銀行，並組織了“四行聯合辦事總處”，蔣介石任總處主席。四大銀行是四大家族進行壟斷活動的大本營。四大銀行系統直接支配着國民黨的政權，並且通過國民黨政權，直接操縱着舊中國的經濟。蔣介石給了他的所謂“國家銀行”以經理國庫、發行兌換券、鑄發國幣、經募內外公債等特權。發行“法幣”是四大銀行完成其金融獨占的有決定意義的步驟。一九三五年，蔣介石政府規定以中、中、交三行所發的鈔票為“法幣”，並實行“白銀國有”。四大家族不但利用這種毫無價值的紙幣，掠奪人民的財產，而且把全國

人民血汗的結晶物——白銀攔為己有。四大家族享有發行“法幣”的特權，就濫發鈔票，造成延續十幾年的惡性通貨膨脹。惡性通貨膨脹是一種對廣大人民的瘋狂的殘酷的掠奪，它使人民手中所持有的貨幣，一天天的打折扣，以至化為烏有。四大家族又利用通貨膨脹，進行買空賣空、囤積居奇、製造黑市以及吞并其他企業的各种投機活動。蔣介石政府借用大量外債，以支持它的法幣政策，而由外債所獲得的外匯，事實上又落入了四大家族的荷包。發行內債是四大家族財富堆積的又一個來源。蔣介石政府發行內債的數量，是清朝和北洋軍閥歷屆政府所望塵莫及的。蔣介石政府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九年的內債，等於北洋政府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七年十五年內債的四倍。巨大的內債是四大家族進行長期反革命內戰所需要，同時又極大地加速了四大家族金融資本的集中。在那時，承購內債的，主要是四大銀行。內債不是按票面價值發行，而是打了折扣的，普通是五折、六折；內債的還本付息則按照債券票面價值十足支付，利息約為六厘到八厘。所以承購內債的四大家族的銀行，一下子就得到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利益。內債的發行是以租稅作擔保的。內債發行愈多，租稅就愈多，人民的負擔也就愈重。內債的大量發行，其實意義只不過是把全國人民——主要是農民——的財富，加速轉化為四大家族的私產。四大銀行利用各種各樣的巧取豪奪的方法，控制全國的銀行。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又劫收了敵偽的金融機構，用敵偽搜



刮来的财富，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金融壟断势力。据統計，一九四六年蔣介石政府各省市所屬的銀行，已經占全国銀行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四大家族的壟断資本实际上主要是一种商业投机資本。在实现金融独占的同时，他們利用政治特权，依靠雄厚的金融力量，积极进行大规模的商业投机，压榨生产事业。战争、内外債、外汇、黄金、地产、商品囤积、货币贬值等，都是壟断資本进行大规模投机的手段。据統計，四行联合办事总处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二年五年內，每年核准的专案貼放中，工矿业的貼放只占总額的百分之十九多，大部分用于商业投机。四大家族利用政权壟断了外汇和对外贸易，包办了外国商品对中国的傾銷和中国土产向外国的出口。四大家族并在蔣介石政府的“貿易調整委员会”之下，設立各种壟断主要出口物資的公司(如中国茶叶公司等)。一九四一年，蔣介石政府又实行专卖制度，凡是列入专卖的物品(如糖、食盐、火柴、酒、烟类、茶叶等)，都由四大家族独家經銷。四大家族的商业借助于专卖制度和国民党政府的統制貿易政策，控制大量商品，壟断市場价格，收购时肆意压低物价，以低于生产成本的收购价格掠夺生产者，出卖时又肆意抬高物价掠夺消費者。利用政权进行商业壟断，成为四大家族吮吸人民脂膏、集中最大财富的主要手段之一。

四大家族的财富，归根到底，主要是从掠夺农民而来的，而这种掠夺又主要是通过

国家政权进行的。蔣介石反动政府用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稅，特别是用田賦征实、征借和征购等办法，殘酷地掠夺农民。拿湖南的田賦征实作例，据調查，一九四二年，这一省每亩稻田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二点七被蔣介石政府拿走。蔣管区其他各省的田賦，情况也大致如此。田賦征实征借的負担，名义上由地主繳納，实际上轉嫁到农民身上。“賦出于租”，所有大小地主都以田賦增加为理由，竭力提高地租。四大家族的統治，使广大农民紛紛破产，不得不依靠借錢借粮度日。四大家族又利用农民的这种困难，极力开展其高利盘剥农民的金融活动。中国农民銀行和中央合作金庫，就是四大家族进行高利貸活动的主要机构。一九四一年蔣介石統治区农村放款中，以四大家族为主的銀行放款占百分之五十一。四大家族对农民的剝削，使国民党統治区的农业生产急剧下降，災荒变成常态，饥民到处皆是，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力。

同样的，四大家族对于工业的独占也完全依靠国家政权。在这方面，他們主要利用隶属于国民党政府軍事委员会的所謂資源委员会、工矿調整委员会这类机构。例如“工矿調整委员会”，主要是协助官僚資本的工业，用接管、加股的办法，吞并民族工业。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大家族乘民族工业的危机，依賴外資和政治暴力，公开搶劫民族工业。抗战胜利以后，又在“接收”的名义下，搶夺人民胜利果实，把敌伪的二千四百一十一家工厂，名义上收归国家所有(其中发还和标卖的只占百分之十)，实际上是窃为四大家



族所私有，从而，使四大家族在工业方面的独占，达到惊人的地步。以解放前夜的情况来说，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垄断资本，在工业方面的独占达到如下的程度：电力占百分之六十七，煤炭（产量）占百分之三十三，水泥（产量）占百分之四十五，纺织（设备）占百分之四十，织布机（设备）占百分之六十，糖（产量）占百分之九十，交通运输方面，轮船（吨位）占百分之四十五，铁路、公路和航空均占百分之百。总的说，四大家族这个国家垄断资本，在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比重，达到百分之八十。

蒋介石独裁政权二十二年的统治，从金融、商业、工业、运输、邮电、农业、地产和文化事业的物质机关等方面，把国家最大的财富集中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系统。事实说明了这个官僚资本的确是“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

利用国家权力，横征暴敛、假公济私而发展起来的这个垄断资本，并不是反映中国国民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恰恰相反，它反映了中国国民经济的破产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停滞和衰落。

二

旧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除了具有一般的垄断性、寄生性或腐朽性以外，其主要的特点，是具有深刻的买办性和封建性。中国的官僚资本，一开始便是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毛泽

东同志说：“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①同时，“于买办阶级之外，帝国主义列强又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②，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中国的官僚资本，正是近代中国买办制度与封建制度的混血儿，是大买办大地主在经济上的联结物。中国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就是旧中国殖民地化的过程。到了四大家族统治时代，官僚资本的这种买办性和封建性，表现得更加强了。

从四大家族垄断资本的形成及其垄断活动中，可以看出这个垄断资本彻头彻尾地浸透着买办性。四大家族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总买办，是为他们服务的一条走狗。四大家族对金融、商业、运输、邮电、工矿以及农业的垄断，那一件不是直接间接为帝国主义、特别是为美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政策服务的呢？如果离开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本的支持，四大家族怎能成为旧中国的国家垄断资本，怎能实现其对中国人民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掠夺，实现其各项反动政策呢？如前所说，国民党的法币政策和举借的内债、外债等，都是直接依靠英美垄断资本的援助的。四大家族起初把中国的“法币”变成英镑集团的一员，以英镑为“法币”的本位，

①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8页。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623页。



后来又把“法币”变成美元集团的一員，以美元为“法币”的本位。以外汇为本位，信用由外汇的价格决定，这是国民党的“法币”买办性的基本特点。国民党政府为支持其法币政策而举办了大量外債。这就使中国的金融财政落入外国壟断資本之手，而成为外国壟断資本的附屬品。四大家族的商业資本也好，工业資本也好，都是从事买办活动和依賴外国的买办資本。四大家族在工业方面，起初是依賴德国資本，而后又依賴美国資本。四大家族的壟断資本絕大部分用于商业投机，主要也是由它的买办性决定的，是服从于帝国主义經濟掠夺的需要的。这个特点，在抗日战争結束以后，尤为突出，美国通过四大家族把中国变成美国的独占市場，企图使中国在实际上一步步变为美国独占的殖民地。

旧中国条件下的壟断資本的形成，也必然是而且只能是以封建的农业生产关系为其支柱。这个壟断資本在发展过程中，始終一貫地利用国家机器，同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結合在一起，进行前資本主义的、超經濟的强制掠夺。許多官僚資本家也大抵兼有大地产主的身份。四大家族的壟断資本不仅以超經濟的政治强力直接掠夺农民，而且，他們的金融财政活动和商业活动也具有濃厚的封建高利貸剝削性质。四大家族是旧中国最大的农奴主和高利貸主。

这种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壟断資本主义本身，同时表現着濃厚的軍事性质。四大家族是为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服务而从反革命的內战起家的。他們利用愈来愈頻繁的內

战，制造市場投机的条件，进行“合法”的公开的搶劫。蔣介石集团軍事活动的范围愈广，愈持續，軍費也就跟着扩大，为筹措軍費所增加的賦稅和举办的內外債也就愈多，四大家族的“軍事利潤”也就愈大。蔣介石政府举办的內外債，主要用于內战。有人作过統計，用于內战的內債，达到百分之八十六，主要是用来向帝国主义国家购买軍火。长期的大規模的反革命內战，需要长期的大規模的軍火接济，因而购买軍火就成为蔣家朝廷的重要的大宗的国际貿易。这种大宗国际貿易的回扣或其他种种利益，主要地或大部地是由四大买办家族所壟断。四大家族在各方面用来从事独占活动的主要机构，如資源委员会、工矿調整委员会、貿易調整委员会，最初就是直接隶属于国民党政府軍事委员会之下的。这些机构的活动及其所屬的企业，一方面满足了軍事上的需要，例如鋼鐵厂大部由兵工署举办，錫、鋅的生产有百分之九十归兵工署直接支配；一方面又是为了用軍事掠夺办法为四大家族集中财富。

政治变成經濟，經濟又变成政治。以蔣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依靠政治强力发展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壟断資本集团，而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壟断資本，又成了蔣介石反动政权的經濟基础，成了蔣介石集团全部反人民政策的主要經濟原因。四大家族要維持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取得和保持他們的壟断地位，必須借助于軍事鎮压，借助于各种反革命战争，一方面同人民作战，一方面同买办封建阶级中的異系異派作战。四大家族把



这种反革命的战争，作为发财的捷徑。四大家族的财富堆积既然是和战争完全分不开的，战争提供给他们以各种掠夺和盗窃人民财富的机会，他们追求财富的欲念没有穷尽，他们对内战的兴趣也就没有穷尽。这就决定了蒋介石集团好战成性。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对于经济的独占，既然主要依靠国家政权，以独占国家政权为前提，因此，他们也就要坚持法西斯独裁，反对实行民主。四大家族既然以买办起家，他们的财富的堆积，依赖买办活动，而为了自己的经济的政治的独占，又必须依靠帝国主义的援助，这样，他们也就不能不出卖中国的主权，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的附属国和殖民地了。就是说，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必然是一个卖国集团，要他们实行民族独立政策是一定不可能的；同时，由于四大家族垄断资本的浓厚的封建性，坚决与农民为敌，因此要他们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也是一定不可能的。他们“不但反对‘耕者有其田’，连减租减息也反对。”^①这一切就不能不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②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美国帝国主义的直接支持下，四大家族的垄断资本发展到了最高峰。这个时期四大家族垄断资本的发展，实质上是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军事势力在中国的发展，是反映了美帝国主义代替了日本，排挤了英法等帝国主义，独占了旧中国这样一个事实。蒋介石为着取得美帝国主义更大的支持，以维持其独裁统治，进

行内战，不惜以出卖军事基地、出卖空海航权、签订奴役性商约等项比袁世凯卖国行为还要严重多倍的卖国条件，作为酬谢美国帝国主义的礼物。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蒋介石政府和美国政府签订所谓“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按照这个条约，全中国的领土、领海、内河、领空等都向美国人开放，美国人可以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从事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慈善事业，采勘和开发矿产资源，租赁和保有土地，以及从事各种职业的权利。美国人在中国，在经济权利上得与中国人享受同等待遇；而在政治上则得到中国人民所得不到的特权。这就是把中国的主权全面出卖给美国，使中国变成美国的殖民地。毛泽东同志说：“蒋介石政府所长期施行的极端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现在被空前的卖国条约即中美商约所加强了。在中美商约的基础上，美国的独占资本和蒋介石的官僚买办资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控制着全国的经济生活。”^③事实完全是这样。

这个时候，美帝国主义除了进行更大规模的经济掠夺以外，并给国民党政府以大量的物质援助。这种援助，据美国自己承认，等于国民党政府“货币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

①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77页。

②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32页。

③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24—1225页。



上”，“在比例上超过战后美国对任何西欧国家援助数量。”这就是美帝国主义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中国人民的苦难和民族危机就由此而极度地加深。国民党反动政府为支持其反革命战争，更滥发所谓“法币”和“金圆券”，在长期通货膨胀的基础上，造成了更加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从一九三七年六月至一九四九年五月，国民党通货发行额增加达一千七百多亿倍。货币不断地贬值，物价不断地上涨，两者都达到闻所未闻的惊人的程度。正当的生产事业遭受严重破坏，社会购买力不断下降。工人的工资、公教人员的薪水、农民出卖农产品所得的货币，以至民族资本家贩卖商品的货款，都因为恶性通货膨胀而化为乌有了。而四大家族却在黄金美钞的投机和囤积居奇中，大获其利。特别由于蒋介石政府为了打内战而恢复了抗战时期极端恶劣的征兵征粮制度，更加迫使广大农民群众生活不下去。在美国独占资本和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联合进攻之下，在美货大倾销之下，民族资本毫无出路。有人统计，一九四六年上海大小民营工厂倒闭百分之七十五，重庆中小工厂倒闭百分之八十。民族资产阶级中许多人，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所抱的幻想，他们的企图同官僚资本“和平合作”、企图走“第三条道路”的幻想，因此逐渐归于破灭。蒋介石的官僚买办资本在中美商约的基础上同美国的独占资本进一步结合，控制国民经济的結果，完全像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使恶性通货膨胀迅速发展，中

国民族工商业日趋于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趋于恶化，为数众多的中等阶级分子日益丧失了他们的积蓄而变为毫无财产的人，罢工、罢课等项斗争因之不断发生。中国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已经威胁着各阶层人民。”^①

四大家族垄断资本的集中规模愈大，跟美国独占资本勾结愈紧，其贪欲愈大，四大家族的政治统治也就愈加反动，就愈要充当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将中国出卖给美国，就愈要发动战争，反对中国人民，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前进。而四大家族垄断资本的洗劫及其全部反人民政策，又势必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不得不团结起来为救死而斗争。要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就必须摧毁这个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即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没收四大家族的垄断资本。毛泽东同志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着重地论述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问题，正是从当时这样一种实际斗争形势出发的。

三

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两个部分，即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前者是民主革命的对象，后者则在民主革命中受到了保护。毛泽东同志在那时候曾再三指出这种区别的重要性。他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

^①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11—1212页。



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即民族資本主義經濟。

在旧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曾經在人民群众中极力进行一种欺騙的宣傳，企图掩盖官僚資本主義的实质。他們把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壟斷資本主義說成是一般的資本主義，力图使人相信，依靠这种壟斷資本主義就能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就能使中国成为独立的国家，并且在中国建立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有些資產階級分子曾經相信了这种欺騙的宣傳，对于四大家族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一些所謂“經濟建設”抱着幻想。事实終于粉碎了这种幻想，事实完全証明了馬克思主義者对于官僚資本主義的分析。这种官僚資本主義的发展不但不能使中国得到独立和自由，而且只会使中国无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它不但不能使中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而且它正是束縛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官僚資產階級对于人民民主革命，必然采取坚决的敌对态度。无產階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为了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也就必須把彻底消灭官僚資本主義作为一个主要任务。所以，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如果因为当时的革命是在民主革命阶段，而不敢明确地把官僚資本主義当做革命的对象，无疑是錯誤的。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因为当时要明确地反对官僚資本主義，就連帶着同样反对民族資本，那也是錯誤的。在旧中国的条件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国主义沒有联系，或

者联系較少，它們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排挤和損害，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義是有矛盾的；由于中国經濟的落后性，这部分資本主義經濟在国民經濟中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民族資產階級的階級地位决定了他們在民主革命中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們中的大多数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統治的斗争，另一方面，他們又經常表現出动摇性和妥协性。根据民族資產階級的两面性，无產階級对于民族資產階級就应当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而不能对待官僚資產階級的政策来对待民族資產階級。毛澤东同志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間，为了說明对待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特別回顾过去的历史經驗說，民族資產階級中的不少分子，曾經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前），附和了蔣介石的反动，“但是，决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认为那个时期我們在政治上不應該争取他們，在經濟上不應該保护他們”。毛澤东同志指出，就在那样的时候，“我們的政策，仍然应当是保护和争取他們，以便我們能够集中力量去反对主要敌人。”^①

在旧中国，官僚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虽然是資產階級中的互相有联系的两个部分，但这两个部分具有显著的区别，这种区别不是人們虛构出来的，而是客观的事实。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科学地分析不同的階級和阶层，并且从这种科学分析出发，制定正

① “关于民族資產階級和开明紳士問題”，“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87頁。



确的政策，以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毛泽东同志正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根据客观事实，把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严格地区别开来，把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严格地区别开来，从而制定了一系列的对待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正确的政策。实行这种政策，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因为实行这样的政策，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在使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达到彻底胜利的决定时期，才使得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参加了革命或者采取中立态度，从而最大限度地孤立了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反革命势力。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九年四月所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关于没收官僚资本，作了如下的规定：“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其中，如有民族工商农牧业家私人股份经调查属实者，当承认其所有权。”^①

按照这个规定，人民政府在解放初期所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共二千八百多个。因为这些企业是极为集中的企业，所以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又因为这时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已是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这一部分经济也就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

经济。

在我国条件下，官僚资本在本质上是买办的和封建的，因此，反对官僚资本的斗争的性质，是属于民主革命的；同时，官僚资本，又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分，执行没收的机关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没收之后成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因此，反对官僚资本的斗争，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没收了官僚资本，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部分（在比重上来说占百分之八十）被消灭了。剩下来的只是一部分小的和中等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所代表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由于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掌握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解放之后除了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之外，还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所经营的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用和平方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这一切说明，毛泽东同志关于反对官僚资本的理论和政策，不仅对于彻底完成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于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也有着重大的意义。这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个非常光辉的范例。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59--1460页。



发展修理服务业是 組織人民經濟生活的一个重要內容

· 陈 揚 ·

修理服务业是人民經濟生活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它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群众的生活需要是多方面的，人們不仅需要經常添置新的用品，同时也需要修配一些旧的东西。无论是衣服鞋子、鍋壶盆桶、手表金笔，或者是自行車、收音机、照相机等等，一有损坏都需要修理，都离不开修理行业。“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这是我国民間流傳很广的一句諺語。它不仅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勤儉节约的美德，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了修理服务业同人民生活的密切关系。随着整个国民經济的持續跃进和人民购买力的日益提高，社会的生活用品不断增加了，有些比較高級的日用生活品也更加多起来了，需要修理的东西自然就增加了，人們对修理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特别是城乡人民公社化以后，广大的农村妇女和城市家庭妇女参加了社会劳动，有些过去可以自己修理縫补的东西，現在需要更多地依靠社会力量来解决。这样，发展各行各业的修理业务，就更加成为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因而也就更應該成为我們組織人民經濟生活的一个重要內容。

修理服务业的发展，必須同人民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相适应。这种客观要求在南京市也表現得非常明显。在旧中国，南京是一个典型的消費城市，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經過十一年多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特别是經過最近三年来持續跃进的偉大实践，南京已經成为一个具有一定工业基础的生产城市了。随着生产建設事业的迅速发展，全市人民得到了充分就业，出現了“处处忙生产、戶戶无閑人”的嶄新局面。同时，为了适应家务劳动社会化的一定要求，在全市範圍内也兴办了相当数量的生活服务事业。在这些服务事业中，修理服务业占了不小的比重。但是，总的說来，修理服务业的发展情况仍然还不能滿足广大群众的要求。有的地方，因为在发展工业特别是街道工业中，較多地吸收了一部分原来从事修理服务的职工，加上对修理服务网点的設置不够多和不平衡等等，就使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显得更加突出了。因此，去年六月份，我們就在全市範圍内开展了一次整頓和发展修理服务业



的工作。从去年十二月份开始，我們又在巩固前一阶段成績的基础上，調整和充实了修理服务网点和从业人員。全市共計增加了三百三十多个修理服务网点和一千三百多名修理服务人員。同时，通过加强政治思想領導，加强行政管理和統筹安排，进一步調动了修理服务人員的积极性，增添了服务项目，提高了服务质量，降低了修理价格，縮短了交件期限，并着重抓了当前季节中群众最迫切需要的修理业务，获得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事实証明，进一步开展修理业务，是一件既能滿足广大群众的需要，又能为国家节约物质财富的大好事情。

二

修理服务工作必須从方便群众出发。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是衡量修理服务工作好坏的首要标志，也是衡量修理服务工作有没有政治挂帅的主要标志。合理地設置修理服务网点，使群众能够就近找到地方修东西，又是方便群众的重要前提。修理服务网点怎样設置才比較合理呢？从南京市的实践来看，必須正确地贯彻集中和分散相結合以及国家举办和群众举办相結合的原则。現在南京城区每个人民公社都以国营修理商店为核心，建立了“修理一条街”，将各种修理行业配置成套，做到应有尽有。例如，鼓楼人民公社就有山西路一条街，在这条不到三百米长的馬路上，集中了五十二家专营和兼营各种修理业务的店鋪，經營的项目共达二百六十多种，从生产上用的电机馬达、电訊仪表，到生活上用的收音机、自行車、鋼琴、儿童玩具和修鍋、补碗、鞣鞋、箍桶等等，几乎无

所不包，基本上做到了来什么修什么。在这些修理力量比較集中的地方，技术水平一般比較高，設備材料也比較全，因此就能够担負起比較高級的修理项目。人們来到这些“修理一条街”，往往可以同时滿足自己多方面的修理要求，因此，即使路远一些，群众也并不感到麻煩。但是，总的說来，由于修理行业联系群众很广，包括的项目很多，在处理集中和分散的关系上，应当以分散为主。如果只发展集中的大修理服务点，放松了分散的小修理服务点，就会使群众感到許多不便。我們有些地方曾經发生过这样的缺点。經過不断地調整、充实，現在城区各个人民公社除了繼續办好“修理一条街”，并使之繼續向高級修理的方向发展以外，都以人民公社的分社为单位設立了綜合修理商店，在这些商店下面，又按照地区的特点，分設若干固定的綜合性或专业性的修理服务点，并組織一批修理人員游街串巷，流动服务。全市各个街道生活服务站，都承担了一些修理项目，并为群众代办各种修理业务。不少企业单位也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家屬宿舍中建立了修理服务点。这样，就把国家的和群众的修配服务力量結合起来，形成了一个以国营修理商店和人民公社綜合修理商店为核心的广大的修理服务网，基本上滿足了群众就近修理东西的要求。

但是，比較合理地建立起一个修理服务网，还只是方便群众的第一步。因为就广大群众來說，不仅要求能够就近找到地方修东西，修得方便，还要求修得好，修得快，修得便宜。这就要求所有的修理服务行业，都要坚决贯彻以服务为主、微利多修、促进社



会节约的经营方针，努力改进经营管理，提高技术水平，降低修理成本，合理计价收费，并在保证修理质量的前提下，尽量缩短交件时间。

计价收费是否合理，不仅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同时也直接关系到修理业务的发展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需要很好地加以掌握。各个修理服务行业，都要根据保本微利和手艺的繁简、配料价值的高低、托修物品的残损程度等等，按质分等论价，并严格地实行明码标价，以便更好地接受群众的监督。南京市在进一步整顿修理价格中，采取了全面调查、抓住重点、分批调查的办法，首先解决那些和群众联系最广、修理数量最大的行业，如修锅、补鞋、成衣等行业的修理价格问题（一般降低了百分之十到二十左右）。这样做，既可以及时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也便于我们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和解决修理价格中的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

三

切实解决修理服务业所需要的原料材料和补充修理服务人员、增强修理服务力量，是进一步发展修理服务业的重要关键问题。要妥善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必须在安排和执行国家计划中，加以通盘考虑，把它放到一个适当的地位上来。

修理服务业所需要的原料材料，虽然数量不很大，但是品种繁多，规格复杂。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凡是属于国家统一分配的计划物资，应该纳入国家计划，统一安排；凡是当地能够生产的原料材料和配件，应当积极安排生产；凡是能

够用于修配的废旧物资，都应当大力组织回收，并优先供应修理服务业。同时，每一个修理服务单位，也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千方百计降低原料材料的消耗。只有这样，才能使修理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获得可靠的物质保证。

为了做好原料材料的组织供应工作，南京市各个城区人民公社，都专门成立了修配材料商店，作为国营商业部门的助手。他们负责统一编制所在地区内修配材料的供应计划，根据实际分配数量和专材专用的原则，供应各个修理服务点，并检查其使用情况。同时，他们还负责组织一部分原料材料的生产 and 回收边角废料的工作，对不合用的材料进行加工，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国营各专业公司和废品公司为核心，以修配材料商店为基干的原料材料供应网。这样做，对于搞好修理服务行业的物资供应工作，起了良好的作用。

修理服务的项目很多，业务量很大，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力，是不能适应客观需要的。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充分调动现有修理服务人员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也要根据需求和可能，适当充实力量。南京市过去修理服务业的力量是比较强的，因此，在过去发展工业中，适当地抽调一部分人去从事生产制造，是完全必要的。问题是有些地方调得多了一些，直接影响了某些修理业务的发展。因此，在充实修理力量中，我们着重抓了动员原有人员归队的工作，使那些能够归队的修理服务人员，重新走上自己熟悉的岗位，以迅速增强专业修理的队伍。但是，专业修理的力量毕



是有限，即使把原先的修理人員全部動員歸隊，也不能完全滿足人民生活上日益增長的需要。因此，我們在加強專業隊伍、培養新生力量的同時，還從各个方面大力發展兼修業務。城區人民公社和分社所屬的不少工廠，都劃出專門修理車間，掛牌營業；許多出售人民日常用品的商店，也做到了兼營修理，賣什麼、修什麼，有些商店還實行賣什麼、修什麼、回收什麼。事實證明，這種專業修理和兼營修理相結合的辦法是行之有效的，它為增強修理力量、發展修理業務開辟了一條廣闊的道路。

四

修理服務業是直接為人民生活的。修理服務人員的政治覺悟越高，服務態度越好，修理服務的質量也就越高。因此，必須加強黨的領導，加強對修理服務人員的思想教育工作，使所有修理服務業的職工都能夠樹立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熱愛自己的事業，處處為群眾着想，不斷地提高服務質量。

在進行思想教育工作中，樹立先進的標兵，具有很大的鼓舞群眾的作用。同其他各行各業一樣，在修理這一行業有著很多受到群眾愛戴的模範人物。南京市建邺人民公社莫愁路綜合修理第三門市部，就有一位修配能手“李三年”——李順義。這位六十多歲的老銅匠，修了三十多年的鍋，補了三十多年的壺，經他修理的東西，件件質量很好，可以包用三年。因此，群眾稱贊他，遠近近

都叫他“李三年”。我們在修理服務行業中，大張旗鼓地宣傳了“李三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力地促進了修理服務行業的紅旗競賽運動。

在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同時，還必須正確地解決修理服務行業的組織形式和分配制度等問題。從南京市的實踐來看，屬於全民所有制的國營修理商店，在目前不宜發展過多，而且主要應該經營一些比較高級又適宜集中的修理項目，如修理照相機、收音機、樂器等等。屬於集體所有制的合作修理商店（小組），應該是主要的組織形式，但是它的核算形式也不宜過大，一般應該以小組作為基本核算單位。凡是適宜分散流動經營的項目，如修鞋、磨刀等等，應該在統一管理下，保留和安排適當數量的個體流動挑、攤。在分配制度方面，應當根據不同行業的特點，採取各種各樣的形式，但是不論採取那種形式，都必須切實貫徹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原則。

為了加強對修理行業的政治思想領導和業務領導，南京市在調整修理服務網點的同時，還下放了一批幹部，各個修理服務點也逐步建立和健全了一些必要的管理制度。

以上所說的這些工作，從南京市來說，還有許多不完備的地方，需要不斷地總結經驗，不斷地加以改進。我們相信，在領導重視和群眾支持下，南京市的修理服務業，一定會日益發展起來，以適應人民經濟生活上日益增長的需要。

（編者按：本文作者是中共南京市委第一書記）



京西煤矿生产持續跃进的經驗

王 政

战斗在煤炭生产战线上的北京京西矿务局职工，同全国煤矿工人一样，在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下，高举毛澤东思想紅旗，一九六〇年取得了煤炭生产的巨大成績。目前，他們正以冲天的干劲，百倍的信心，争取一九六一年的新胜利。

京西矿务局所屬的各个煤矿，分布在北京西郊起伏的群山中，煤炭蘊藏量很丰富。解放以来，京西矿务局所屬各矿煤炭产量一年比一年增多。一九六〇年煤炭产量，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間总产量的百分之一百零五点七二，比一九五九年提高百分之二十六点六，比大跃进前的一九五七年提高百分之二百四十一一点六五。一九六〇年，京西各矿生产的煤炭，除了供应北京以外，还供应了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

一九六〇年，京西矿务局实现了持續跃进，提前一个月完成了全年的采煤和掘进计划。一九六〇年同一九五七年相比，职工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以上，坑木消耗降低了一半以上，原煤成本降低了接近一半。

一九六〇年京西矿务局在持續跃进中的經驗，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京西矿务局取得一九六〇年持續跃进的重要經驗之一是，放手发动群众，从生产准备、掘进和工人参加管理等方面，为增产更多的煤炭創造有利条件。

依靠群众做好生产准备工作，抓紧抓早，事事往前赶，是增产煤炭的先决条件。在一九五九年年底，京西矿务局一面抓当前生产，一面抓一九六〇年第一季度的生产准备工作。因此，一九六〇年第一季度，就創造了超过上年第四季度的优良成績。京西矿务局的领导，总结了这方面的經驗，在一九六〇年中，又在季末抓季初，月末抓下月，当月抓上旬，每天抓头班，每班抓前半班，做到一步主动，步步主动。每月二十日左右，就安排下月生产计划，二十五日左右，就把下月生产计划交給职工群众，进行认真的討論。群众討論的意見集中起来以后，领导上将计划进行适当的修改，再交給群众討論。这样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几經反复，然后定案，并且由局到矿一直落实到班到組。由于生产计划和职工群众見面早，討論得深入細致，因此，职工的积极性就充分地調动起来，各项措施就訂得具体，生产准备工作就做得好，完成



和超額完成計劃，也就有了保證。例如，大台礦的月計劃，從礦上提出，到計劃落實到班、組，經過段幹部、各有關科室、班和組的積極分子，一直到全體職工，多次修改和補充。大台礦計劃抓得早，討論得充分，準備工作做得及時，所以每個月生產任務都完成得好。在京西礦務局所屬的各個煤礦中，大台礦最早完成了一九六〇年的生產計劃。

在加強生產準備中，設備的維護和檢修是一項重要工作。京西礦務局平時就注意開展群眾性的設備維修工作。一九六〇年第四季度，全局召開了器材設備和檢修的專門會議，及時安排了礦燈、煤車等二十七種生產急需的器材和設備。各煤礦都在檢修不停產的口號下，採用經常和突擊相結合的辦法，分期、分批地對主要設備進行了檢修。局屬的機械廠和各礦的機修車間，在一九六〇年年底，就修理和製造好了大批備件，其中機械廠供給各礦檢修用的備件，就達六千多件。

京西礦務局注意發動群眾做好生產準備工作，在生產中爭取了主動，所以，一九六〇年前十個月，每月都完成了生產計劃，並提前於十一月完成了全年的生產計劃。一九六〇年十二月，這個局又着重抓了今年第一季度的生產準備工作，為今年生產的繼續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加強掘進工作，是保證煤炭生產持續增長的重要一環。根據煤炭生產的特點，要多出煤，就必須準備出足夠的採煤工作面。煤礦工人把回采比方成吃飯，把掘進比方成作飯。他們懂得，只有掘進工人加快掘進速度，

開出了更多的工作面，採煤工人才能采出更多的煤炭。特別是在煤炭生產不斷提高的要求下，加強掘進工作，使掘進適應回采的需要，就成為增產煤炭的一個重要關鍵。京西礦務局從局到礦，都確定了領導幹部專門抓掘進工作，成立了專門管理掘進工作的辦公室，負責對掘進工作進行具體的規劃和安排，並且加強了專業的掘進隊伍。全局季季舉行採掘平衡會議，各礦月月舉行採掘平衡會議，各段每周研究幾次採掘平衡工作，回采的班、組，也明確規定由副職負責管理掘進工作，注意採煤工作面的接替，從上到下，一抓到底。同時，這個局還把由於實行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調整勞動組織而節約出來的人力，大部分放到掘進方面；不放幹部參加勞動，也優先下放到掘進班、組。例如，從一九六〇年第四季度起，全局抽調出一千二百多名輔助人員等，組成了三十個掘進組，來加快掘進速度，使今年一開始，就有三個新的工作面投入生產。由於加強了掘進力量，使採煤工作面由一九六〇年年初的五十二個，到年底增加到六十個，從而保證了採煤工作的順利進行。

發動群眾，千方百計地加快掘進速度，是加強掘進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京西礦務局各礦在推廣各種快速掘進先進經驗的同時，還開展了掘進工生產運動會的競賽，創造出不少全局掘進進尺的新紀錄，不少後進組趕上或者超過了先進組。通過生產運動會的競賽，超齡岩石掘進隊連續四個月保持月進尺二百米以上的紀錄。大台煤礦的掘進二十組，在競賽中立志追趕創全局煤巷掘進最高



紀錄的二十三組。二十三組把自己的先進經驗，全盤教給二十組，把最好的電鑽交給二十組使用，幫助他們追趕自己。結果，二十組全年進尺一萬米以上，超過了二十三組全年的進尺量。

在加快掘進速度的同時，京西礦務局還從多方面提高回收率，使同樣的掘進進尺，生產出更多的煤炭。大台煤礦一九六〇年比一九五九年的回收率提高了百分之十二以上，等於這個礦增加了一個掘進組，既增加了煤炭的產量，又節約了勞動力，降低了煤炭的成本。有人認為大華坑一九六〇年後半年就“沒有煤可採”了；經過發動工人找煤，結果全年多生產了三十萬噸煤炭。由於京西礦務局的各個煤礦的職工，採用各種方法提高採煤的回收率，就使煤炭資源得到了充分利用，並且減輕了採煤對掘進的壓力。

工人參加管理，是發揮工人羣眾生產積極性，完成和超額完成生產任務的有力保證。京西礦務局各礦每季按時召開職工代表大會，動員職工羣眾討論生產任務，總結生產經驗，廣泛聽取職工羣眾對生產和管理方面的意見。在班、組中，在建立和健全核心小組的同時，還設立了工人管理員，使班、組內的安全、計劃、成本、工資、出勤、質量等，事事都有專人管理。讓工人羣眾參加這些方面的管理，使羣眾管理同專業管理正確地結合起來，這樣，管理工作就建立在廣泛的羣眾基礎上，收到了只憑少數專業管理人員所不能得到的效果。例如，工人參加班、組的成本管理以後，在節約坑木消耗上，成績極為顯著。負責成本管理的工人管

理員，在本班、組內進行了生動深入的節約坑木的宣傳，使節約坑木的重要性，深入人心。他們還同本班、組的工人一起，從採煤方法、支架方法等方面，研究改革方案，千方百計地節約坑木消耗，處處精打細算，力爭寸木不丟。工人們在大力回收坑木的同時，又把用壞了的長坑木改製成短坑木，短坑木改成做立眼的盤，盤又改成短短の木磚。這樣，一九六〇年全局節約的坑木，就夠城子煤礦、木城澗煤礦和房山煤礦一年的使用。

京西礦務局所屬各礦，在工人參加管理中，還普遍推行了由工人管理員管理的勞動卡片制度。勞動卡片記載每個工人每天的勞動成果，是競賽評比的可靠根據。同時通過勞動卡片，還可以及時發現問題，採取措施，加以解決。例如，在推行“四八”交叉作業制以後，大多數班、組工人的勞動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有少數班、組工人的勞動效率反而下降了。畢文明班就是勞動效率下降的一個班。經過工人管理員對勞動卡片進行了研究，發現畢文明班在交叉時間里，勞動力調配不當，窩工比較多；而同組的王金奎班，由於勞動力調配得好，沒有窩工現象，勞動效率比畢文明班高一倍。在發現了問題的關鍵以後，畢文明班積極地學習了王金奎班的經驗，改進了勞動力調配，避免了窩工現象，同時在班內開展競賽，結果畢文明班的勞動效率超過了王金奎班。

二

持續開展羣眾性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是京西礦務局一九六〇年取得持續躍



进的另一个重要經驗。

煤炭生产是地下作业，笨重体力劳动比較多。开展以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減輕笨重体力劳动，提高劳动效率，是十分必要的。在一九六〇年年初，京西矿务局职工，就针对“撬、推、背、卸”等笨重的手工操作，大搞小型机械化，先后制出小型装煤机、装岩机、转载机、推車器、运柱机、上煤机等九百多台，將成千名的工人，从笨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大大鼓舞了广大职工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决心和信心。

为了进一步提高煤矿的技术水平，京西矿务局在小型机械化取得重大胜利以后，又及时地发动群众，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矛头，轉向采煤方法的改革方面去。工人、科室干部和党政领导干部，都热情高涨地投入运动。木城澗煤矿在革新采煤方法上取得了突出成績。在运动中，党委书记首先集中大家的意見，提出采煤方法的改革方案，然后召集职工反复討論，認真进行試驗，全矿有四百多个职工，对改革方案提出了一千多条意見，繪制了一百二十張草图，作了十五次总结，最后使方案逐漸完善。新采煤方法推行后，使采煤的生产工序大大减少，坑木消耗大大降低，工人在十分安全的条件下劳动，回采效率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七点四，十月底就提前完成了一九六〇年全年的产煤计划和掘进计划。

京西煤矿的煤质硬，地质情况复杂，一种采煤方法不能适应多种地质情况。因此，京西矿务局党委在改革采煤方法的运动中，鼓

励大家在学习兄弟单位先进經驗的同时，发揚独創精神。全局各矿，全年試驗了十三种新的采煤方法，經過反复鉴定，最后确定了四种方法，其中以木城澗矿和城子矿創造的两种采煤方法适应性最强。

在采煤方法革新以后，煤产量显著增加，但是运输系統不能适应煤产量提高后需要的矛盾又暴露出来。于是，京西矿务局各矿，又及时地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矛头指向运输系統。經過广大职工的努力，迅速改进了运输綫路，并实现了煤車摘鈎、道岔等一系列工序上的半自动化。同时，还試驗成功載波电话。調度員坐在調度室里，可以同在地下巷道里来往的任何一个电机車司机联系。由于調度及时，加强了运输煤車的周轉，运输能力基本上适应了生产的需要。

针对生产上的薄弱环节，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努力加以克服，对生产的迅速提高，有重要的作用。門头沟煤矿由于煤层过硬，电钻的使用寿命很短，生产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城子煤矿的生产因为煤車常常发生故障而受到影响。为了克服生产中的薄弱环节，两矿組織了大批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員，認真革新电钻和煤車。經過反复研究試驗，門头沟煤矿采取了各种形式电钻的优点，制出了联合型电钻，使电钻的寿命大大延长；城子煤矿改革了煤車的結構，使煤車的运行效率大大提高。电钻和煤車革新后，檢修次数大为减少。过去門头沟煤矿用十五个工人专门修理电钻还修理不过来，現在只用两个工人修理电钻就够了。城子煤矿每天煤車的修理也显著减少。这样，这两个矿就騰出了



修理的力量，来加强其他方面的维护检修工作。

把经过鉴定的技术革新项目，迅速地加以推广，是京西矿务局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获得大面积丰收的重要原因。他们一方面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鼓动，介绍推广项目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又分阶段地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组织力量一项一项地加以推广。例如，在城子煤矿和房山煤矿，经过试验，创造成功了一种经济使用电机车线路的先进经验。京西矿务局就立即召集房山煤矿、木城涧煤矿、安家滩煤矿和城子煤矿的负责人和技术人员开会，研究在这四个矿中加以推广。这四个煤矿的井下、井上运输都是用的电车，过去由于铜线不足，有些应该架线的地方没有架线，特别是随着巷道的向前伸展，有些电车线路因为缺少铜线而不能相应地延长。推广经济使用电车线路这一先进经验，就能够解决铜线不足的问题。但是，电车线路的改装工程，必须在几小时之内完成，才不致严重影响生产。由于技术力量和工具、设备的限制，这项工作要在各矿同时进行是不可能的。于是，京西矿务局就集中了各矿电工，一个矿一个矿地来进行。他们首先从房山煤矿开始，结果在六个小时内，就完成了四千米长的电车线路改装工程。四个矿的全部改装工程，从开始准备到工程完成，只用了一个月工夫。由于推广了经济使用电车线路这项先进经验，这四个矿在没有增加铜线的情况下，共延长了五千多米线路。工人们高兴地说：“技术革新开红花，电车线路大搬家，省出铜线铺新路，不用推车往上爬。”

京西矿务局在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得到了北京有关的科学研究机关和大、专学校的有力支援。一九六〇年，京西矿务局先后同十五个科学研究机关和大、专学校协作，到这个局参加协作的人员最多时曾经达到五百人以上。京西矿务局一九六〇年所有的主要技术革新项目，都闪烁着内外三结合的光芒。

三

生产跃进，首先必须思想跃进。在一九六〇年里，京西矿务局抓紧职工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不断提高职工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从而推动了生产的持续跃进。

一九六〇年初，京西矿务局的党委就向全局广大职工讲形势，交任务。一方面向职工指出过去两年的巨大成就；一方面又指出，在一九六〇年必须作更大努力，向全国先进水平看齐，使广大职工普遍树立起不断革命的思想，发扬了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

在向职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中，京西矿务局的各级党组织，特别强调指出煤炭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使职工们认识到，煤炭是工业的粮食，无论是炼钢、炼铁、发电、机械铸造、交通运输、轻工化工，都离不开煤炭。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产品加工项目的增加，农村用煤的需要量也日益增大。同时，煤炭又是人民日常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因此，努力增产煤炭，适应工、农业和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是煤炭工人的光荣任务。当工人们讨论煤炭工业的重要性的时候，有的矿工说：“粮食是宝中宝，煤



炭是工业的粮食，也是宝中宝。”

广大职工群众认识到增产煤炭的重要意义，所以他们在胜利面前不骄傲，在困难面前不气馁，经常精神焕发，斗志昂扬。在以粮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大台煤矿地质条件忽然发生了不利于增产煤炭的变化，煤层由厚变薄，按照一般情况，煤炭产量势必降低。但是，由于广大职工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他们认真研究改革采煤方法，充分利用薄煤层的空间；同时开展掘进表演赛，加快掘进速度，适应变化了的地质条件，终于在薄煤层的采煤工作面上，创造出月产煤炭万吨以上的优异成绩，促进生产不断提高，提前完成了一九六〇年全年的生产计划。

插红旗，树标兵，是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个好方法。京西矿务局城子煤矿十一组的老工人李九德，是全国先进生产者，他从解放到现在，十一年多没有缺过勤。他住在离矿十二里远的地方，不论春、夏、秋、冬，不论风、雪、雨、水，每天总是按时到矿。同时，他还在十一年多中始终保持安全生产。李九德的先进事迹，为京西各矿的矿工们所称颂。京西矿务局党委号召大家向他学习。许多年轻矿工在学习了他的事迹以后，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树立了艰苦奋斗的作风。城子煤矿的职工学习后，出勤率大大提高，全矿平均出勤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四点八三。京西矿务局有大量的像李九德那样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的好矿工，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动广大职工群众前进，对于促进生产的不断提高，起了很大作用。

京西矿务局在开展政治理论学习中，主

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全局有百分之七十的职工参加了理论学习，有百分之七十四的青年参加了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木城涧矿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职工，占职工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这个矿的党委书记、矿长和许多科室干部，都同工人们在一起学习。工人们在学习了毛泽东著作以后，政治思想水平大大提高，很多工人还能运用毛泽东思想去研究和解决生产中发生的问题。例如，大华坑二段进尺缓慢，有些工人一直认为是煤质太硬造成的，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以后，大家认识到，看问题要全面，既要看到客观因素，也要看到主观因素。于是他们分析进尺缓慢的原因，除了肯定客观上确实存在煤质较硬的原因以外，在主观方面，生产安排和劳动力配备不够合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段一个班的三个小工作面，共同使用一个电钻；可是原来却是分别打眼，分别备料，等到料备齐了，同时都要电钻打眼，因此造成一个工作面打眼，两个工作面窝工的现象。而且原来在劳动力配备上，对煤硬的工作面安排的人力过少。他们找出了这些主观原因以后，采取了专人统一备料、专人统一打眼的办法，避免了窝工现象，同时加强了硬煤工作面的力量。这样，掘进进尺就有了显著的增加。

四

干部深入群众、深入生产第一线，及时发现問題，及时解决問題，是促进京西矿务局一九六〇年实现持续跃进的一条重要经验。

京西矿务局和所属各矿的主要领导干



部，一部分是經過革命戰爭考驗的老幹部，一部分是由工人中提拔起來的工人幹部。他們的工作作風樸素，接近群眾，從來同群眾的關係就比較密切。在一九六〇年，京西礦務局又堅決響應黨的號召，認真貫徹執行黨的幹部下放政策，全年先後下放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幹部，充實到生產第一綫，同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商量。同時，京西礦務局從局到礦，都規定了各級幹部定期下礦井的制度。許多礦的科室幹部提出“一天工作半天完，半天工作在前綫”的口號，經常參加勞動。這樣，就進一步密切了幹部和工人的關係、黨和群眾的關係。

幹部深入生產第一綫，同工人並肩勞動，既是普通勞動者，又是生產的指揮者，這就有力地鼓舞了職工的勞動熱情，並且使生產中發生的問題，及時得到解決。門頭溝煤礦黨委書記同工人一起勞動，工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煤炭產量有了很快的增加。但是，生產的增長，卻帶來了運輸跟不上等新問題，許多采下來的煤炭，不能及時運出。黨委書記立刻召集運輸工人開會，研究提高運輸能力的辦法，提出了在尾繩車上多掛煤車的措施，使尾繩車由原來每次牽引八個煤車，逐漸增加到牽引十六個煤車，保證了生產提高的需要。

城子煤礦的領導幹部，為了深入前綫，到生產中去領導生產，他們开辟了井下辦公室，把調度工作和小型機電設備的修理工作，都搬到井下去進行，受到了工人們的熱烈歡迎。在實行了井下辦公以後，這個礦的一個工人出身的礦長，還同技術人員、科室幹部

和工人群眾一起，解決了長期以來存在的電鑽打眼慢的關鍵問題，使采煤工作的進度有了很快的提高。

領導深入群眾，一手抓生產，一手抓生活，對於提高工人的勞動積極性有很大的作用。一九六〇年，京西礦務局所屬各礦，都成立了生活辦公室，由一個書記和一個礦長負責管理。書記下食堂，同廣大炊事人員一起，給廣大職工做出可口的飯菜。有的礦把飯菜送到車間和井下，保證了工人吃好休息好，大大地鼓舞了職工們的幹勁。這個局的經驗又一次地證明：職工的幹勁越大，領導上越應該關心職工的生活；領導上越關心職工的生活，職工的幹勁就越大。

* * *

一九六一年新年已過，春節就在眼前。京西礦務局的職工同全國煤礦工人一樣，採用輪流休息的辦法，元旦堅持了正常生產。元旦這一天，全局煤炭日產量和掘進日進尺，分別超額百分之二十二點四和百分之三十二點六完成了當日計劃，刷新了這個局日產量和日進尺的最高紀錄。一月上半月，全局采煤和掘進都超額完成了計劃，原煤平均日產量和日進尺，分別比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份提高百分之十六點五五和百分之八點八六，質量也比計劃有了提高。現在，京西礦務局的廣大職工，正以更高的勞動熱情迎接春節假日的生產。他們總結了一九六〇年的豐富經驗，提出“保出勤、保檢修、保任務”的口號，力爭在完成一月份計劃的基礎上，打勝第一季度這一仗，為完成一九六一年全年的生產任務創造良好的條件。



红旗

HONGQI

5

一九六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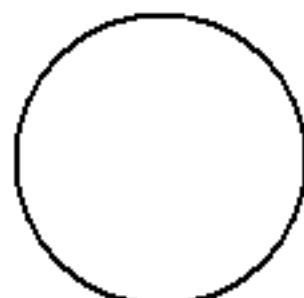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六一年第五期★

目 录



社論：在学术研究中坚持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

劳动力问题馬文瑞 (6)

阿尔巴尼亚人民胜利的斗争罗士高 (17)

调查研究的态度关 鋒 (22)

民主革命中的农民问题林一舟 (27)



社論



在学术研究中坚持

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中，提出問題，发表不同意見，进行自由討論的風气有了发展，这是一种很好的現象。在各种問題上进行的討論，有些比較深入，有些还只是初步接触；討論的結果，有些已經取得了結論，有些还未能达到結論。不管怎样，在任何一个学科中，有了爭論，有了相互交換意見，相互批評，就有了活跃的空气。这种活跃的空气对于科学的发展，对于科学工作者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对于青年一代的科学工作者的成长，是极为有益的，是十分必要的。

我們党坚持在学术和文艺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毛澤东同志在說明这个方針时会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种風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風格，另一种学派，我們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問題，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討論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决。”^①无数的事实証明，为了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就必须实行这样的方針，而决不能实行与此相反的方針。

科学的任务是探求客观真理，真理是有客观标准的。有許多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否认真理的客观性，照他們看来，真理是因人而异的，只要“言之成理”，就算真理。我們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們认为，科学上的是非不决定于主观上是否“言之成理”，而决定于是否符合于实际。在任何一个科学問題上，不能同时有几个客观真理，而只有一个客观真理。但同时，我們又认为，使我們的主观認識达到客观真理，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是一下子可以完成的，而是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当客观的科学真理还没有为我們掌握的时候，就必须容許人們从各种不同方面經過各个不同途徑进行探索，进行各种不同的試驗，提出各种不同的假說，并且进行自由爭論。这样，我們就能够一步步地接近客观真理。我們主張在学术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基本上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的。

资产阶级唯心論者把真理看做主观杜撰的东西，是为了掩护那些違反客观实际的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社会学的观点。現代资产阶级承认不同学派的存在，实际上只是承认符合于反人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5—26 頁。



民群众的、反科学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哲学、社会学的观点和对他们有利的各种自然科学学说。我们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则是按照科学发展的规律，按照有利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益的原则来促进科学工作，以求不断地更多认识客观真理。

科学工作不能只是复述前人已经达到的成绩，重要的是要在接受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经过独立的工作，解决前人所未有解决或者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进入前人所未有进入或者没有完全征服的领域。在解决新的问题和征服新的领域的过程中，难免要经过曲折迂回的道路，错误也是可能发生的。如果为了怕犯错误而不敢接触新的问题和新的领域，就不会有创造性的科学工作。在科学的发展中，会不断地遇到新的问题；不应当认为一切问题都已经解决，都已经有了现成的答案，而要勇敢地向新的领域探索，容许人们由于进行新的探索而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同时，我们的科学工作当然也不应当停滞在还不成熟、还不是完全正确的，以至错误的意见上，而要造成一种条件，使正确的意见能够起而代替错误的意见，使完备的结论能够起而代替比较不完备的结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符合于这样的要求的。

在科学研究中，对于比较复杂的对象，为了求得完全的认识，往往需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去处理。整个自然界是一个整体，整个社会也是一个整体。对自然界的整体和社会的整体中的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分别地进行研究，就有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各个学科。如果不是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我们就不可能对自然界和社会得到完整的知识。在不同学科之间，当然不应当尊此贱彼，互相排斥，而应当共同发展，互相支持。在社会主义的有计划进行的科学事业中，应当使所有的学科的研究工作都有适当的安排。在对自然和社会的研究中，有些同当前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主义事业较少或很少直接联系的学科，被人认为冷门；但只要它们对于作为整体的自然和社会的研究也从某一个方面有所贡献，那么在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安排中也应当有它们的适当的地位。这也是学术上的百花齐放的要求。从不同的学科的研究出发，对于共同有关的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进行讨论，也是必要的。这种讨论对于从事这些不同学科的人来说，都有扩大眼界的作用。通过这种讨论，可以互相吸收正确的意见，取长补短，可以使由于某一学科的局部范围而有时难免形成的某种片面性得到克服，并且使问题得到比较全面的解决。

在同一学科中的不同学派，一般说来，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在不同学派之间，有的学派是正确的或基本上是正确的，而别的学派是错误的或基本上是错误的。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学派和唯心主义学派的对立就是正确和错误的对立。在这种不同学派之间，应当通过自由讨论和科学实践来辨明谁是谁非。站在正确方面的学派应当在同错误作斗争中克服错误的主张，发展正确的主张，也要吸取对方所提供的某些有用的思想材料。另一种情形是，不同的学派分别在不同的条件下，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同一的对象，在它们之间，并不是正确



和錯誤的对立，它們在不同方面对于探求真理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中医和西医的區別在很大程度上屬於这种情形。它們在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的同时，也可能各有某种片面性和缺陷。它們之間，在个别問題上也会有是非的爭論，但总的說来，这种性质的不同学派完全可以共同发展，互相帮助。在科学史上，这种性质的不同学派发展的結果，并不是这一个学派克服了那一个学派，而是在各个学派所提出的积极貢獻的基础上，使科学的发展进入更高的阶段。

在資產階級学术界中，“門戶之見”不但存在于各个学派之間，而且往往还存在于各个学科之間。某一学科的研究本来只是以自然現象中的某一方面，某一部門为对象，但有些研究者却竭力夸大这一学科的重要性，企图使其他学科服从这一学科，自以为这一学科的研究成果已經可以解答自然界的全部奧秘。从这种不切实际的夸大中只能得到荒謬的結論。某一学派本来只是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对它的研究对象做了研究，提出了有价值的結論，但如果企图壟断这一方面的研究，不准許別人从其他方面，其他角度进行研究，不承认別人的研究也有自己的貢獻，那就不仅是不利于这門科学的发展，也会不利于这一学派的发展。資產階級的錯誤的唯心主义的哲学、社会学的学派或其他坚持錯誤主張的学派取得了壟断地位，那就更加是有害于科学的发展了。我們所要执行的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正是同这种資產階級学术界的反科学的“門戶之見”相对立的。

我們的科学工作的目的不仅在于認識世界，而且在于改造世界。对客观事物的認識有正确有錯誤，有深有淺。在改造客观事物的實踐中所采取的方法也有正确有錯誤，有好有差。在如何改造客观世界的問題上，特別表现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当然，只有在科学地認識了客观規律的基础上，才能在實踐中达到預期的目的。但是也常有这种情形，为了达到預期的某一目的，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也可以采用那样的方法。两种或更多种的方法虽然都有某种客观規律性的依据，但是其中的一种方法，因为是建立在对外观規律性的更深的認識的基础上，因为是更充分地利用了有关的各种客观規律性，所以比別的方法更好更有利。在科学技术上常常可以遇到这种情形，在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設問題上也有这种情形。提倡百花齐放百家爭鳴，也就是为了更好地利用科学的力量来改进我們的實踐，不让我們的實踐停滯在已經达到的水平上面。

以上这些都表明，在我們的科学事业中，应当有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广闊的天地。如果以为承认客观真理就不能提倡百花齐放百家爭鳴，那显然是錯誤的。

由此也可見，我們承认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即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我們的各門科学研究中都起着指导作用，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不应当和不需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馬克思列宁主义使哲学、社会科学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哲学、社会科学的領域內，人們如果不是自觉地站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場上和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那就几乎不可能真正解决任何一个实质性的问题。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正确性也在自然现象的科学研究中得到证明。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领域内，研究者如果能够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也一定能够大大地促进自己的工作。承认馬克思列宁主义在各門科学中的这种指导作用的人，在我們的学术界中已經一天天更多了。但是，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代替每一門具体科学的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作用，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基本理論和方法，依靠这种理論和方法，科学研究工作者还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大量地收集材料，独立地进行思考，才能在某一个具体问题的科学研究中得到成績。恩格斯說得好：“即令只要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挥唯物主义观点，也是一种需要多年静心研究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讲空話是无济于事的，这样的任务只有依靠大量的、經過批判审查了的、完全领会了的历史材料才可解决。”^①

因此，我們不能以为，只要有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追求科学真理就是轻而易举的事，就不会經過曲折和艰难，就能保证不出任何差錯，就不需要有任何不同意見的自由爭論。同时，我們也不能以为，简单地背誦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某些原則，就能判断科学爭論中的是非問題。馬克思列宁主义是高度科学性和高度革命性相結合的理論。必須联系具体实际，全面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才能发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威力。如果任意摘取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原則、个别語句，而不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就来判定什么意見对，什么意見錯誤，这种判断一定是靠不住的，而这样的做法往往只是使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一种片面性的东西。

承认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并不等于已經能够正确地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人們要想熟练地掌握某种武器，就必须反复地使用它。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武器也是这样。研究具体科学問題，进行自由而充分的討論，这就能够真正看出究竟是否已經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理論和方法彻底决裂，是否正确地理解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方法，是否在所研究的问题上已經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并且能够使理論和实际相結合。所以百家爭鳴正是为学术界提高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提供了一种条件。有些从旧社会来的知識分子，虽然在思想上經過自我改造，承认和接受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但是一到具体的学术問題上，他們的旧的同馬克思列宁主义对立的观点又会流露出来。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有些爭論，只是由于某些人对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方法的理解和运用不正确而引起的，但是，就是这样的討論，也是有意义的。在努力学习把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具体科学研究中去的过程中，发生差錯是难免的，对于这种差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不能熟視无睹，但是这种差錯同反对和有意歪曲馬克思列宁主义是有区别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任务不是简单地斥責这种差錯，

^① 《論卡尔·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版，第347頁。



而是認真地進行討論，有說服力地糾正這種或那種不正確的理解。

在政治上承認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是一件事；在學術上承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是另一件事。這兩件事顯然是互相有關的，但又並不就是同一件事。有這樣的人，在政治上承認馬克思列寧主義，但在學術上仍然懷疑馬克思列寧主義，例如，有這樣的自然科學家，他們在學術理論上仍然受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束縛，看不到這種世界觀同實際科學工作之間的矛盾，他們不知道，即使是不承認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的科學家，如果能夠在科學研究上真正做出成績來，就不能不是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自發地傾向於唯物論，並且在某種程度內傾向於辯證法。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應當團結一切在政治上承認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的學術工作者，並且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下同他們一起為我們的科學事業的發展而努力。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當然不否認和排斥一切還不能自覺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方法的科學家所作出的科學成績，而要通过自由的討論來證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對於各個學科的研究工作所具有的指導意義。許多從舊社會來的學術工作者在政治上承認馬克思列寧主義，因為已經有無可辯駁的鮮明事實說服了他們；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學術上真正確立指導地位，就必須依靠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在學術上做更多的工作，在學術的討論和批評中起積極的作用。

在我們的社会中，堅持資產階級世界觀，不但在學術問題上，而且在政治上，企圖用資產階級的理論和方法來代替無產階級的理論和方法的人當然還是有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固然也會被他們所利用，但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並不因此而害怕實行這個方針。毛澤東同志說：“馬克思主義者不應該害怕任何人批評。相反，馬克思主義者就是要在人們的批評中間，就是要在鬥爭的風雨中間，鍛煉自己，發展自己，擴大自己的陣地。”^①

毛澤東同志在說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時還說：“毫無疑問，我們應當批評各種各樣的錯誤思想。不加批評，看着錯誤思想到處泛濫，任憑它們去占領市場，當然不行。有錯誤就得批評，有毒草就得進行鬥爭。但是這種批評不應當是教條主義的，不應當用形而上學方法，應當力求用辯證方法。要有科學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說服力。教條主義的批評不能解決問題。我們是反對一切毒草的，但是我們必須謹慎地辨別什麼是真的毒草，什麼是真的香花。我們要同群眾一起來學會謹慎地辨別香花和毒草，並且一起來用正確的方法同毒草作鬥爭。”^②

由此可見，對我們說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發展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科學事業的一個積極的方針，是不斷地鞏固和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在學術界中的領導地位的一個方針，是充分表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鬥性的一個方針。我們的學術界應當繼續貫徹執行這種方針，共同為我國的科學事業的繁榮發展而努力。

①②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29頁。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劳动力问题

馬文瑞

我国劳动力的状况和劳动者的面貌，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同旧社会比起来，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从一九五八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中，又进一步地起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三年中，随着生产建设的高速度发展，我国国营工业、交通运输、商业、文教卫生等部门的职工总数增加了大约一倍，其中工业工程技术人员增长了一倍多，新成长的技术工人有几百万人；另外，还有一大批劳动力参加了城市人民公社组织的各种生产劳动和服务工作。在农村中，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巩固，农业“八字宪法”的推行，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兴办，林、牧、副、渔、社办工业和农村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我国农村中广大的劳动力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三年来，由于生产持续跃进，劳动报酬增长和就业人数增多，劳动者的家庭收入不断增加。劳动者的思想觉悟和组织程度，也大大提高了。

在这伟大的三年中，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与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巩固，在我国社会中，已经根

本消除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城市中的失业现象和农村中的所谓“人口过剩”现象。几千万长期羁绊在家庭琐事中的妇女，欢欣地参加了社会劳动。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已经走上了合适的工作或者学习的岗位。“人人有事做”的理想在我国已经完全实现，我国从此将永远是一个充分就业的社会。

我国几亿人民充分就业、热爱和平劳动、生活不断改善的铁的事实，粉碎了帝国主义者、反动派和一些资产阶级学者的所谓“中国人口多，无法解决就业问题”、“中国人口多，无法提高生活水平”以及“中国人口多，必然要向外扩张”的种种谬论和诽谤。

同帝国主义者和他们们的应声虫的主观愿望相反，在我国社会中出现的問題，已经不是什么劳动力过剩问题，劳动者失业问题，而是劳动力由多余变为不足的问题。这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在彻底解决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严重的失业问题、实现了充分就业之后出现的新问题。

毛泽东同志早在我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快要到来的时候就预言说：“在合作化以前，全国很多地方存在着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在合作化以后，许多合作社感到劳动力不足了，有



必要发动过去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广大妇女群众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这是出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一件大事。过去，人们总以为合作化以后，劳动力一定会过剩。原来已经过剩了，再来一个过剩，怎么办呢！在许多地方，合作化的实践，打破了人们的这种顾虑，劳动力不是过剩，而是不足。有些地方，合作化以后，一时感到劳动力过剩，那是因为还没有扩大生产规模，还没有进行多种经营，耕作也还没有精致化的缘故。对于很多地方说来，生产的规模大了，经营的部门多了，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扩张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这种情形，现在还只是在开始，将来会一年一年地发展起来。”^①三年大跃进的实践，完全证明毛泽东同志的预言的正确，证明这个预言是充分认识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作出的科学论断。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持续跃进中，在劳动力方面感到某种程度的不足，是一种正常的情况，是一件大好事，归根到底是我国生产建设发展的结果和人民生活改善的标志。

在资本主义世界，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他们那里出现的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在资本主义世界，由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之间尖锐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经愈来愈深刻化。资本主义垄断组织为了维持它们的高额利润，愈来愈横暴地加重了对劳动者的剥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于战前，并且还在继续降低。在那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都存在着数

以几十万、几百万计的庞大的失业人口。帝国主义的头子、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一九六〇年有一万五千四百四十五家公司倒闭，企业倒闭率达到“二十年来的最高峰”（据《邓—布列德斯特里统计所》报告，见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华尔街日报》）。美国总统肯尼迪今年二月十五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认，美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失业问题”，失业人口已经达到了五百五十多万人。

在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生产不断增长，失业现象消灭，劳动者的家庭收入不断增加，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而在资本主义世界，则是企业倒闭，失业人数增加，劳动者的收入不断下降，显露出满天阴霾的垂暮景况。这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又一次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所谓“自由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二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出现的劳动力由多余变为不足的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认真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满足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对劳动力的需要，对于保证我国国民经济顺利地向前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一般说来，要靠以下两个途径：一是提高生产的机械化程

^① 《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一文的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74—675页。



度，用机器来代替人力；一是合理安排和节约使用劳动力，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单位，按照生产建设任务保有数量适当的劳动力，避免使用劳动力畸多畸少和一切浪费劳动力的现象，充分发挥每一个劳动力的作用。

不断地提高生产的机械化程度，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根本措施。大跃进以来，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开展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大大地加速了我国生产机械化的进程，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依靠提高生产的机械化程度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还受着客观条件的较多限制。我国当前的情况是，在农业上一般地还是手工劳动，在工业中，有些部门或者有些企业，手工劳动所占的比重也很大。在使用手工劳动的地方，积极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争取采用新工具、新机器、新技术来节省人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潜力当然是很大的。但是，当目前在这些部门和企业中还没有条件用现代化机械来装备，还不能不保持大量手工劳动的情况下，要很多地节省人力和很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我国当前的条件下，从合理安排和节约使用劳动力方面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就更显得十分重要。

我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使我们有可能来合理安排和节约使用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在企业中，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竭力提高工人的劳动强度，

从而造成比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劳动力不可能全面安排和合理使用，因而，从整个社会来说，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国民经济是按计划进行的，我们完全能够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根据国家当前的建设方针和任务，按照统筹兼顾的精神，对于农业、工业等国民经济各部门需要使用和可能获得的劳动力，进行全面安排，合理分配，以保证国民经济高速度按比例发展的需要。

节约使用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可能范围内用最少的人力实现最大的增产，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马克思说过：“无论是个人，无论是社会，其发展、需求和活动的全面性，都是由节约时间来决定的。一切节省，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省。……因此，节约时间以及在各个生产部门中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就成了以集体生产为基础的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是极其高级的规律。”^①列宁特别强调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意义，他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②；“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一个根本的任务，因为不这样就不可能最终

①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之一《货币论》。转引自《论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7页。

② 《伟大的创举》。《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8页。



地过渡到共产主义。”^①毛澤东同志一贯重视节约人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总是把节约人力提在前边，他一再告诫我们：“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②；“必须十分爱惜当地的人力物力”^③；“十分注意人力物力的节省使用”^④；“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⑤物资的节约是节约物化劳动，人力的节约是节约活劳动。活劳动是创造财富之源，因此，节约人力是尤其重要的，是最根本的节约。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人力物力，是我们发展生产的根本性的措施。在我国工业、农业等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中，都应当注意尽可能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具备着发展国民经济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一定能够在我們加速提高生产的机械化程度，合理安排农业、工业等国民经济一切部门的劳动力，和注意劳动力的节约使用下，获得很好的解决。

三

按照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党的方针政策，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结合起来。这就要

求在劳动力的安排和使用方面，根据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精神，尽可能满足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使农业、轻工业的发展速度加快，从而促进重工业的迅速发展。

馬克思曾經論述过农业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說：“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⑥他又說：“能够投于工商业上面而无須从事农业的劳动者人数……是取决于农业劳动者在他們自身的消費額以外，能够生产多少的农产物。”^⑦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是互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曾經不断地促使农民破产，加深农业的危机，但是，它同时却不能不以农业的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其先决条件。这是一个不以人們意志为轉移的客观经济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是紧密結合的。我們应当自觉地利用国民

- ① 《俄共(布)党綱草案》。《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0頁。
- ② 《必須学会做经济工作》。《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19頁。
- ③ 《論联合政府》。《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1092頁。
- ④ 《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針》。《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74頁。
- ⑤ 《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节约生产費用的經驗》一文的按語。《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68頁。
- ⑥ 《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25頁。
- ⑦ 《剩余价值学說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頁。



经济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这一客观规律，大力加强农业战线，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发展，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

毛泽东同志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从来都特别强调地指出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在红色区域，“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①。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又指出：“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经常地告诉全党要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要使工业的发展和农业的发展互相适应。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强调地指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③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毛泽东同志又根据新的情况，进一步地提出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毛泽东同志以上的思想，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我国当前的生产建设，是按照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进行安排的。劳动力的安排是生产建设安排中的一项

重要内容。生产建设的安排如此，劳动力的安排当然也必须如此。

我国劳动力的分配使用，特别着重安排好农业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这也是从我国当前农业的实际情况出发所必须采取的重要措施。当前我国农业战线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巩固，为农业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农业“八字宪法”的推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兴办，林、牧、副、渔、社办工业、商业和农村运输等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大大增加了用工量，此外，生活服务、文教卫生等事业的开展，也要占用一定的劳动力；而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农业机械化还仅仅在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依靠手工劳动。要依靠手工劳动来满足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村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而大量增加的用工量，当然不能不出现劳动力不足的情况。特别是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需要更多的人力来进行抗灾斗争，劳动力紧张的情况就更显突出。解决农业劳动力不足的根本办法，是实现农业机械化，从根本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目前这个工作正在党的领导下，在工业和其他各行各业的大力支援下，加紧地在逐步进行。但是，由于我国农村如此广大，实现农业机械化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增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

- ① 《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26页。
- ②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14页。
- 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页。



力，就成为农业增产，首先是粮食增产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并不是一种暂时性的措施，而是在今后相当年份内必须坚持做好的工作。

在目前说来，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必须做到以下三条。

第一，保证农村中的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达到农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争取达到百分之四十。这是正确分配城乡之间、也就是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劳动力的重要标志，是保证农业战线有足够的劳动力的先决条件。我国在走向工业化的过程中，必然要“逐步把一个适当数量的劳动力从农业方面转移到工业方面”^①。这个转移应当是逐步的，并且是数量适当的。实现这种转移的根本条件，是农业生产向机械化过渡，用机器来不断地代替人力。在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基本上仍然是依靠人力的条件下，要过多过快地使农村人口转到城市，是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并且归根到底也不利于工业的发展的。规定农村中的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必须达到农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或者百分之四十，以限制城市从农村抽调劳动力，并且进而要求在必要的情况下，动员城市中可以调出的一部分劳动力下乡，确保农业战线有充足的劳动力，这在当前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保证农村中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固定归生产小队支配。这不仅是确保农业生产所必需，并且也是贯彻执行人民公社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的一项重要内容。生产小队是人民公社组织生

产的基层单位。农业生产的好坏，取决于全国三百多万个生产小队的劳动成果。保证小队有支配劳动力的必要的权力，是发挥小队的劳动主动性、积极性，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劳动力固定归小队支配的规定，必须坚决执行。

第三，保证在农忙季节使农村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用在农业生产第一线。这是正确分配农村中农业和非农业各方面的劳动力的重要标志，也是争取农业有好收成的重要条件。农业生产大大发展了，其他生产建设事业也就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既然目前农业生产主要还是依靠人力，而农业“八字宪法”的进一步实施又要求增加田间的用工量，因此，必须保证在农忙季节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劳动力用在农业生产第一线，才有可能取得好收成，首先是粮食的好收成。

以上三条，是完全合乎客观实际的要求。自从一九六〇年秋天党中央发出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以来，在许多农村人民公社中已经实现了这些要求。为了进一步实现这三条要求，应当采取一些什么办法呢？

最主要的也是最易见效的，是在农村人民公社内部调整劳动力。农村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它除了发展农业生产以外，还要

^①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页。



相应地发展多种经营和其他各项事业。但是，任何事业的发展，总有轻重缓急之分。当前农村人民公社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首先是粮食生产。其他各行各业都应该在同农业紧密结合、在促进农业生产和在农业的带动下去进行。这就要求在劳动力的分配上坚决保证满足农业生产第一线的需要，把非农业各方面占用多了的劳动力调整到农业生产第一线来。一九六〇年秋天以来，从各方面调整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已经有两千多万人，其中大部分是从农村人民公社内部调整的。但是，有些地方非农业各方面占用的劳动力，在数量上、质量上还过多过强，而给农业生产第一线配置的劳动力仍然偏少偏弱。因此，必须要作进一步的调整，继续挖掘非农业各方面的劳动力的潜力，采取抽调、以弱替强等办法，把更多的、强的劳动力调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人民公社各项事业，除了一部分必须维持常年工作的以外，一般的都必须同农业生产季节相结合，农闲多办，农忙少办，大忙停办，农忙务农，农闲做工或者从事其他经营。非农业各方面所用的劳动力，在农忙季节必须控制在人民公社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内，在农闲季节可以适当增多一些。

除了从农村内部调整以外，城市各行各业也应当尽可能从劳动力方面支援农业，抽调一批干部、技术工人和一般劳动力，到农村去加强基层工作、帮助农业技术改造和直接参加农业劳动。这些工作，一九六〇年冬季以来，已经作出了很大的成绩，目前应该继

续努力，按照预定的计划，把企业、事业、机关中可以抽调出的一部分劳动力，及早下放到农村去。

四

在工业战线上的劳动力，当前总的说来并不是数量不足的问题，而是合理调整和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的问题。

在大跃进的三年中，我国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他们的操作技术更加熟练，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也大大加强。这些都为我国工业战线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节省人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并且，三年中我国工业战线上的职工人数已经增加了一倍多。就很多企业来说，目前不是人少了，而是人多了。因此，只要我们在所有企业中，进一步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改进劳动组织和定员定额，努力挖掘生产潜力，我们就可以依靠现有的劳动力，保证生产建设事业继续发展的需要。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我国当前工业战线的方针和任务。全会公报指出：“重工业方面，由于三年来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主要产品的产量已经大大超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即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的原定的水平，一九六一年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这就是说，应当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的品种，加强生产中的薄弱环节，继续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运动，节约原材料，



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根据党中央确定的方针任务，在劳动力问题上，应当采取措施，压缩基本建设方面使用的劳动力，发掘一切企业中现有劳动力的潜力，节约劳动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做到增产不增人，甚至增产又减人，并且尽可能抽出一部分劳动力，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

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是高速度的扩大再生产，因而必须重视发展基本建设，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发展基本建设必须同发展当前生产相适应，必须以当前生产为基础。如果在基本建设方面分散了力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当前生产，就会对扩大再生产不利。三年的连续大跃进，我国的工业基本建设方面有了巨大的发展。当前工业基本建设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从各个工业部门和生产过程各个环节的设备能力的现状出发，进行填平补齐，配套成龙，提高综合生产能力，使基本建设更好地同当前生产结合起来。这样，就可以使现有基本建设力量得到更好的利用，并且从基本建设中节约出一部分劳动力，充实现有生产企业和支援农业。在安排基本建设劳动力的时候，还必须首先满足生产性建设所需要的劳动力，其次才是非生产性建设所需要的劳动力。

在现有生产企业中，节约劳动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很大的潜力。大跃进三年来，在工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不少企业在使用劳动力方面，曾经产生计划不周的缺点。有的企业，特别是新建的企业，用人过多或者过早；有的企业非直接生产人员和辅助工人的

比重较大；有的企业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同当前生产结合得不够紧密，或者对技术革新的成果，没有及时巩固和迅速推广；有的企业在技术革新获得重大成就，生产迅速发展情况下，管理工作没有及时跟上来，劳动组织不能完全相适应，等等。这些缺点，都不利于劳动力的节约和劳动生产率的更大提高。迅速克服这些缺点，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根据当前的情况，所有企业都应当适当地精简机构和人员，进行余缺调剂，充实生产第一线，加强基层领导，保证重点企业和新建企业必须补充的劳动力，同时尽可能地支援农业。在生产人员和非直接生产人员之间，主要生产工人和辅助工人之间，应当保持一定的比例，当前一般要扩大前者的比重，压缩后者的比重。一切革新活动必须同生产紧密结合。凡是经过科学鉴定可以推广的新技术、新工艺，要纳入生产计划和技术操作规程，迅速地采用和推广。各企业要随着生产的发展，及时地改善管理制度，整顿劳动组织，改进定额员，重视产品质量，注意生产安全和劳逸结合。企业的领导人员，要树立坚固的节约劳动力的观念，克服片面地以为“人多好办事”、粗打冒算、用人宁多毋少、宁早毋迟等不正确的想法和作法；树立坚固的全面观点，克服片面地强调本单位的需要和方便的本位观念。千方百计地节约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争取用尽可能少的劳动，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作出尽可能好的成绩，是现有企业重大而光荣的任务。

根据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在工业



内部，存在着人力调整问题。在工业中，采掘和冶炼、加工，修理和制造，配套产品的生产和主机的生产，厂矿运输和生产等方面，都必须互相适应，在劳动力分配上必须进行统一安排，那一方面劳动力缺乏，就应当加强那一方面的劳动力的配置。从当前情况来看，一般说来，在矿山采掘、维修配套、厂矿运输等方面，是比较薄弱的，应当加强这些方面的工作，给这些方面适当地增加人力。特别对于有些对国民经济十分重要而手工劳动还比较多的部门，如矿山采掘、森林采伐等，必须在加强技术改造的同时，保证充分的人力。但是，加强上述若干工业部门的劳动力的配置，一般应当采取从工业、基本建设等部门现有职工中调整的办法来解决。

在工业中的“小土群”、“小洋群”企业，比现代化企业占用的劳动力一般要多一些，有的多得多，劳动生产率一般要低一些，有的低得多。因此必须进行整顿和提高的工作。这些企业现在一般技术比较落后，手工劳动的比重较大，它们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潜力很大。在这些企业中积极进行技术改造，改善劳动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十分必要的。经过技术改造，现在某些先进的“小洋群”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已经接近和达到现代化企业的水平。在三年的大跃进中，“小土群”、“小洋群”在发展工业生产，促进工业的合理布局和支援农业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目前，在工业中克服薄弱环节、进行填平补齐的工作中，在工业支援农业进行技术改造中，“小土群”、“小洋群”仍然要起它的作用。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并举，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并举，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两

条腿走路”方针的重要内容，而“两条腿走路”是保证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的重要的方针。因此，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小土群”、“小洋群”企业，也应当在精简的原则下保持必要数量的劳动力。

为了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重视培养后备技术工人。有计划地培养后备技术工人，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大家知道，在旧中国时代，我国技术工人的人数是很少的。全国解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在大跃进的推动下，我国技术工人的人数迅速增加，技术水平空前提高，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但是，按照发展生产建设的需要，现在我们仍然感到技术工人不足。因此，必须加紧有计划地培养后备技术工人，为今后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培养后备技术工人应当继续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就是既采取分散的以师带徒的培养办法，又采取集中的在技工学校中培养的办法。应当提高培养后备技术工人工作的计划性，使之更好地适应今后生产建设发展的需要。加强对培训学徒工作的领导，改进技工学校的教学工作，进一步提高后备技术工人的质量。此外，根据农业机械化工作加速进行的情况，还必须有计划地培养一大批农业机械工人和农业技术工人。这项工作在今年就应当更好地进行。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农业、工业等生产部门所需要的劳动力，同商业、服务业、文教卫生等非生产部门的劳动力，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物质生产劳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一切非生产性劳动，都是为物质



生产劳动服务的。非生产性劳动永远是需要的，在劳动力安排上必须占有适当的数量。但是，如果非生产性劳动占用劳动力过多，而物质生产劳动的劳动力却不足，那末，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必然要受到不利的影响。因此，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合理安排农业、工业等生产部门和商业、服务业、文教卫生等非生产部门的劳动力，使物质生产部门经常保持足够的劳动力，非生产部门也保持一定比例的劳动力，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目前全党全民大力支援农业的情况下，商业、服务业和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必须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尽力做好支援农业的工作。

对于组织在城市人民公社中从事各项生产和服务工作的大批劳动力，也应当进一步地合理安排使用，改进劳动组织，提高技术和服务水平，使他们更好地为城市建设、国营企业和居民服务。

* * *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重视劳动力的安排和节约，是发展生产力的一个重要问题。劳动的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马克思说：“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①毛泽东同志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②我们发展生产，必须首先充分发挥人的革命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挥劳动力的作用。这就要求在安排生产建设的时候，把安排劳动力放在首要的地位，把各个时期必需的和可能运用的人力（包括干部、技术人才、一般劳动力等），根据生

产建设计划，统筹安排好。只有安排好人力，物力才能起作用。只有“人尽其才”，才能“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任何一个方面的建设，假定物力、财力等等安排得都好，但是对于人力安排得不好，计划是不可能圆满实现的。因此，那种只注意物力、财力而忽视人力的见物不见人的片面的思想，是不正确的；以为我国人口众多而疏忽大意，不重视劳动力的合理安排使用，不重视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是不正确的。

对劳动力分配使用的管理，必须采取集中领导同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原则。没有劳动力的集中统一管理，就没有劳动力的全面合理安排。具体说来，就是各方面劳动力的分配原则，全民所有制各部门职工人数的安排计划和变动这种计划的决定权，必须按照一定的范围，集中在中央、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三级。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劳动力的统一调度，合理使用，避免各自为政，浪费人力。这种劳动力的集中管理，又必须是以群众路线为基础的。劳动力安排计划的制定或修改，应当自下而上地经过基层组织 and 群众的讨论，集中群众的智慧和意见，然后确定下来执行。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集中管理的正确，才能够使各项节约劳动力的措施充分实现。劳动力安排计划一经确定之后，必须在集中管理和群众监督之下严格执行，一切按照计划办事，不允许有擅自超计划增加人员、私招乱用等现象。维护严格执行劳

① 《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7页。

② 《重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516页。



动力安排计划的纪律性，是保证这个计划以至生产建设计划完满实现的重要条件。

使用劳动力必须很好地保护劳动力。关心劳动者的生活是党的根本政策，是保护劳动力的最重要的措施。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指出：“群众的干劲越大，党越要关心群众生活。党越是关心群众生活，群众的干劲也会越大。”^① 我们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的劳动报酬政策，注意了安排好群众的生活，加强了劳动保护工作，做到了安全生产，劳逸结合，这就更加促进了广大群众政治积极性的提高，保证了国民经济的连续跃进。但是也应当指出，有少数单位在使用劳动力时，对群众

的积极性爱护得不够，劳逸安排得不好，以致使群众不能经常保有充沛的精力和旺盛的劳动热情，这种现象是必须彻底纠正的。

全面安排和节约劳动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必须根据以往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丰富经验，更加自觉地认识和掌握运用这一方面的规律，做到使全国劳动力的分配使用更好地符合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①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页。

关于《宋定伯捉鬼》故事出处的一点说明

在一九六一年第三、四期《红旗》上发表的《〈不怕鬼的故事〉序》，其中说到一篇题作《宋定伯捉鬼》的故事“选自干宝的《搜神记》”。后来一九六一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这篇序文，这几个字却改作“出自《列异传》”。对于这个改动，需要略为说明一下：

我们编《不怕鬼的故事》这本书时，《宋定伯捉鬼》的故事最初用的是今存二十卷本《搜神记》卷十六的文字。但今存二十卷本《搜神记》虽然题“晋干宝撰”，却并非干宝的原书，而是明朝人从前人书和其他书籍辑录而成。其中大部分故事有根据可查，但也有一小部分故事根据不明或并非《搜神记》文字。宋朝人编的类书《太平御览》卷八二八收有宋定伯捉鬼故事，说出自《搜神记》，但故事比较简单。另

外，唐朝人编纂的《法苑珠林》卷十（明万历刻本卷六）、宋朝人编的《太平广记》卷三二一和《太平御览》卷八八四也收有这个故事，都说出自《列异传》，而且故事都比较详细。《列异传》原书今已不存。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断定它是魏晋时人所作，成书当较《搜神记》为早。明朝人编的二十卷本《搜神记》中的宋定伯捉鬼故事，文字同《太平御览》卷八二八又很不一样，反而同《法苑珠林》、《太平广记》和《太平御览》卷八八四很相近，同《法苑珠林》尤为接近。由于这种情况，我们在《不怕鬼的故事》这本书最后定稿时，决心不用今存二十卷本的《搜神记》的文字，而改用《法苑珠林》的文字。我的序文也就相应地改为这篇故事出自《列异传》了。

何其芳 二月二十三日



阿尔巴尼亚人民胜利的斗争

· 罗 士 高 ·

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屹立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西南前哨，正在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为反对帝国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进行着坚决顽强的斗争。

阿尔巴尼亚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他们为了争取自己的解放，曾经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旧日的阿尔巴尼亚，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它受土耳其封建帝国的统治将近五百年，随后不断为希腊、意大利等外国侵略者所强占和掠夺。解放前，阿尔巴尼亚的封建主勾结外国资产阶级残暴地统治着人民。那时，除外国资本霸占的几处规模不大的矿场和油井外，几乎没有现代工业。农业和畜牧业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文盲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全国没有一所高等学校。卫生医疗设施十分缺乏，各种疾病流行。阿尔巴尼亚人民为反对土耳其奴役者，在几百年中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斗争，出现过像斯坎德培这样卓越的民族英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阿尔巴尼亚人民展开争取独立的广泛斗争，给予意大利、南斯拉夫、希腊等国的占领者以有力的打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法西斯先后侵占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人民拿起武器，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争。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一九四八年改名为阿尔巴尼

亚劳动党）成立，从此，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解放斗争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根据当时国内外的基本形势，确定了以反对外国占领者为主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路线，积极地组织和扩大人民武装，团结全国各阶层爱国力量组成民族解放阵线。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坚强领导下，阿尔巴尼亚人民同德意法西斯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阿尔巴尼亚人民在苏联红军进军巴尔干的强大支援下，终于解放了自己的祖国，取得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从而使自己的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解放后，阿尔巴尼亚人民彻底完成了民主改革，胜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开始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吸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结合本国具体情况，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工业方面，大力发展资源条件较好的石油、铬、铜、煤、沥青、铁、镍等采矿业和人民生活所迫切需要的食品、纺织等轻工业。在农业方面，通过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按照自愿原

* 斯坎德培在一四四三年曾领导人民起义，使阿尔巴尼亚的一部分领土摆脱了土耳其的统治。一四四三年到一四六七年間，他又领导阿尔巴尼亚人民胜利地击退了土耳其侵略者的进犯。



则，积极而又稳步地把农民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注意农牧兼顾，大力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开垦新地，推广农业机械化。在文化教育方面，积极扫除文盲，广泛培养工农知识分子，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校与生活相结合，学习与劳动生产相结合。

现在，阿尔巴尼亚已经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拥有现代化工业与集体化农业的农业—工业国。在城市和农村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一九六〇年，社会主义的经济部门提供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国民收入，社会主义成分占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九十九、批发商业的全部、零售商业的百分之九十和农业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六到一九六〇年）的主要任务基本上都已提前完成。一九六〇年同—九五五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一十八以上。一九六〇年不到十五天所生产的工业产品就相当于解放前一九三八年全年所生产的工业产品。农业合作化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以上，合作社和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共占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六以上。一九六〇年水利灌溉面积约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农业机械化的程度已达到平均每一百公顷作物面积有一台拖拉机（标准台）。一九六〇年和一九五五年相比，农作物面积扩大了百分之十三左右。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总产值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点五。在工农业生产迅速增长的基础上，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九，商品流

通总额增加将近一倍。文化教育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在四十岁以下的居民中已扫除了文盲；普及了四年制义务教育，现正普及七年制义务教育，并准备逐步过渡到八年制义务教育；创办了国立地拉那大学和其他高等学院；普遍设立了电影院、图书馆、文化宫、阅览室等。本民族丰富多采的文化艺术得到了发扬，阿尔巴尼亚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歌舞剧院、话剧院、电影制片厂和自己的影片、歌剧作品等等。医疗机构网已经遍及全国各地。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取得这样光辉的成就，是经过十分艰巨的斗争的。正如恩维尔·霍查同志所说的：“我国人民经历的这条光荣道路并不是满布鲜花的道路，而是一条充满障碍的十分困难的道路。人民和党不得不在各个战线上同战争带来的灾难和破坏，同饥饿和落后，同国外国内的敌人进行斗争。但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从未在无数的困难面前屈膝，从未害怕过敌人的进攻。我们战胜了困难和敌人，一直在向前进。我国曾是欧洲最贫穷的一个国家。帝国主义者、法西斯分子、豪绅、地主和商人们，吮吸了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血，把他们弄到极端贫困的境地。剩余的东西也叫战争给毁了。一切都需重新建立。若是没有牺牲和人民的英勇精神，若是没有党的正确的果敢的领导，那什么也建设不成。”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曾经对城市和乡村的剥削阶级——富农、资本家、投机商、高利贷者进行了尖锐的斗争，粉碎了他们的破坏活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贯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对劳动群众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



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各种影响，帮助劳动群众摆脱宗教偏见、迷信和有害的风俗习惯，树立新的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由于进行了深刻的社会改革，由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劳动人民的觉悟程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坚如磐石地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以高涨的热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高度警惕地保卫着祖国的独立和革命的胜利果实。

阿尔巴尼亚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他们迫切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进行建设。阿尔巴尼亚一向坚持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争取同周围邻国建立和发展友好睦邻关系。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僕从希腊保皇政府和南斯拉夫铁托集团，把阿尔巴尼亚看作是眼中钉，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它的干涉和破坏活动。早在阿尔巴尼亚解放初期，美英帝国主义者就竭力纠集阿尔巴尼亚国内的反动派阴谋进行复辟，策动希腊反动派荒谬地提出对阿尔巴尼亚南部的领土要求，并在阿希边境频繁地进行武装挑衅。英国舰队在一九四六年曾公然侵入阿尔巴尼亚领海，进行登陆威胁。美帝国主义以及意大利、希腊等国的法西斯反动派庇护和训练从阿尔巴尼亚逃亡出去的战犯和叛徒，派遣他们潜返阿尔巴尼亚进行间谍、破坏活动。南斯拉夫铁托集团是阿尔巴尼亚人民特别凶恶的敌人，他们一心妄想并吞阿尔巴尼亚，把阿尔巴尼亚变为南斯拉夫的殖民地。在阿尔巴尼亚解放初期，铁托集团在对阿进行“经济援助”的幌子下，企图使阿尔巴尼亚的经济依附于南斯拉夫的经济，不让阿有独立发展的工业，只要阿生产南斯拉夫所需的一些原料。铁托集团力图利用当时的阿南计划协作委员

会作为控制阿经济命脉的机构，并把拟定的阿南合营企业变为他们单方面操纵的企业。铁托集团的阴谋活动还伸展到阿尔巴尼亚的军队当中。他们在阿军领导机构中收买了一些代理人，打击阿军的正确领导人，反对阿党在军事方面的正确路线，甚至要求把阿军并入南斯拉夫的军队。他们借口阿军力量薄弱，还企图把南斯拉夫军队开进阿尔巴尼亚驻扎，以实现武装占领阿尔巴尼亚的阴谋。当这一切阴谋都被粉碎以后，铁托集团继续采取种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派遣间谍，造谣破坏，组织叛乱，进行频繁的边境挑衅等。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四年间，对阿边境挑衅即达四百次以上。单在一九五三年一年中，对阿派遣了一百二十个武装颠覆小组。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〇年，又曾陆续向阿派遣几百名特务匪徒。一九五六年铁托访问希腊时，甚至就南斯拉夫和希腊共同瓜分阿尔巴尼亚的问题同希腊国王进行过会谈。几个月以前，铁托集团和希腊反动派还曾勾结阿尔巴尼亚的叛徒，策划配合地中海的美国舰队进攻阿尔巴尼亚，妄图消灭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阿尔巴尼亚人民对敌人从来不抱任何幻想，在困难面前从来没有表现出恐惧和动摇。他们“对朋友用‘面包和盐’接待，而对敌人则以子弹射其脑袋”。阿尔巴尼亚人民坚决镇压了反革命叛逆，并且同伟大的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兄弟国家的人民一起，彻底揭露并粉碎了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铁托集团所策划的一切阴谋和挑衅，钢铁般地保卫着自己祖国的主权和每一寸土地，以“一手拿镐、一手拿枪”的战斗精神，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坚持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兄弟国家紧密合作、互相帮助，坚决揭露和反对美帝国主义以及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所有其他敌人的阴谋活动，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和社会进步的斗争。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这种坚定立场和英勇斗争，使阿尔巴尼亚成为社会主义阵营西南前哨的坚强守卫者，成为保卫巴尔干地区的和平和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因而赢得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热爱和尊敬。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的所有光辉成就，都是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恩维尔·霍查同志说得好：“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像座花岗岩的高岩，顶住了国外和国内的风浪。单这一件事（姑且不谈其他的事）就证明了我国人民的伟大力量，证明了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路线的正确。”

以阿尔巴尼亚人民久经考验的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诞生并锻炼出来的，是坚强的富于战斗性的党，是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党，是有高度原则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党一贯重视对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遗余力地为肃清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剥削阶级的一切思想影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纯洁和巩固自己的队伍而斗争。解放初期，阿尔巴尼亚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阿尔巴尼亚贫困落后，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同资产阶级分享政权，取消党的

领导，主张国家应当贷款帮助资产阶级和给地主保留大量土地。在对外政策方面，他们则主张乞求美英帝国主义的承认，接受它们的奴役性的贷款。一九五六年，当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特别猖獗的时候，党内的一些右倾机会主义者又从内部向党进攻。他们为那些被党和人民惩办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叛徒翻案，攻击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要求放棄阶级斗争，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来代替党的正确路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这一切离开了党的路线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和反党宗派集团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斗争，清除了那些坚持错误、不可救药的分子，从而不断地巩固和加强了自己队伍的团结一致。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各国兄弟党一起，对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有力地揭穿了铁托集团作为帝国主义代理人的丑恶面目，不断揭露了铁托集团阴谋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阻挠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破坏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等罪恶活动。最近，霍查同志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再一次表示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反对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坚定立场。霍查同志说：“我们在勇敢地保卫和平、为和平共处的胜利、为揭穿帝国主义战争挑拨者，特别是在为反对人类主要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而进行斗争的同时，今后我们将同样勇敢地、坚决地反对为美帝国主



义的企图效劳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特别是反对作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团结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死敌、我国人民和党的自由和独立的顽固敌人——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这是曾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的我们党的路线,这又是我们的代表大会所一致决定的我们今后的路线;我们全党和这次代表大会所选举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像过去一样将坚决地、毫不动摇地执行这个路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所表现的这种高度的革命原则精神和战斗精神,受到了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的敬佩和爱戴,对于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以及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社会主义阵营各兄弟国家遵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紧密地团结一致,相互援助和相互支持。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竭力维护和加强同各兄弟国家首先是同伟大的苏联的这种团结和友谊。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斗争是对各兄弟国家的有力支持,各兄弟国家首先是苏联也给了阿尔巴尼亚人民以重大的援助。正如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声明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各国发展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它们获得成就和成绩的最重要的国际条件是:相互援助和相互支持,利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一致的一切优越性。”“社会主义各国根据完全平等、互利和同志式相互援助的原则,使全面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合作日益完善,这既符合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又符合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

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阵营大家

庭中的亲密兄弟。社会主义阵营各兄弟国家所共同遵循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共同的斗争目标,把中阿两国人民紧密地牢不可破地联结在一起。中国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一向得到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全心全意的支持。中国人民也始终不渝地坚决支持阿尔巴尼亚人民的英勇斗争。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互助合作关系正在不断巩固和发展。中阿两国人民,同其他兄弟国家的人民一起,将永远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旗帜,互相支持,互相援助,为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和建设社会主义而携手前进。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发展阿尔巴尼亚国民经济和文化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的宏伟纲领。在今后五年中,阿尔巴尼亚将进一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进一步发展消费品的生产。农业生产将以更大的步伐增长,更好地供应人民生活的需要和轻工业原料,增加出口。职工的实际工资和农民的实际收入将有很大的提高。文化、教育、科学事业也将有进一步的发展。阿尔巴尼亚将在从农业—工业国变成工业—农业国的道路上更加迅速地前进。一幅更加灿烂辉煌的图景正展现在阿尔巴尼亚人民的面前。久经战斗锻炼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周围,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团结一致,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必将排除任何困难,继续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調查研究的態度

· 关 鋒 ·

調查研究的態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正確的態度是做好調查研究的根本條件，只有抱著正確態度去做調查研究，才能真正了解情況，認清客觀規律，找出解決問題的正确方法。

怎樣的態度才是進行調查研究的正確態度呢？

毛澤東同志告訴我們說，要有滿腔的熱忱、眼睛向下的決心，要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要老老實實，實事求是。這也就是說，要誠誠懇懇地十分虛心地向實際學習、向群眾學習。這是進行調查研究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態度，是共產黨員的党性表現。

毛澤東同志在說明他開調查會的方法時說道：調查會“是比較什麼大學還要高明的學校”，到會的“這些幹部、農民、秀才、獄吏、商人和錢糧師爺，就是我的可敬愛的先生，我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和採取同志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①

請看，毛澤東同志是多麼虛心，多麼尊重客觀實際，多麼尊重群眾啊！

毛澤東同志屢次告誡我們：“學習的敵人是自己的滿足，要認真學習一點東西，必須從不自滿開始。”^②毛澤東同志的虛心態度，

是一個最好的榜樣。毛澤東同志具有關於中國現狀和歷史以及國際狀況等各方面的非常淵博的知識，他一貫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正確方向，從而科學地制定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路線、策略、方針和各項基本政策。毛澤東同志之所以成為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傑出代表，成為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是和他一貫地十分虛心分不開的。他在一九四一年寫的《農村調查》序言中說：“我現在還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的必要，這是和我自己對於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依然還只是一知半解這種事實相關聯的，並非說我什麼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願。”^③

人們的知識水平和人們是否虛心的關係，常常是這樣的：越是真正具有淵博的知識的，就越感到自己懂得少；這種虛心的態

① 《〈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版，第810頁。

② 《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1版，第497頁。

③ 《〈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版，第811—812頁。



度、迫切求知的心情，正是由于他們具有淵博的知識，因而眼量廣闊的緣故。反之，那種自以為自己什么都懂，自以為了不起的人，却恰恰是只有一知半解；這種驕傲的態度、自滿的心情，正是由于他們孤陋寡聞、知識殘薄，因而眼量極其狹窄的緣故。越是領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精神實質的，就越感到向群眾學習、向實際學習的迫切，這是因為他們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踐觀點、群眾觀點指導自己行動的緣故。而只記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不懂得它的精神實質，不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踐觀點、群眾觀點的，則必然不肯向群眾學習、向實際學習。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告訴我們：我們的理論和政策都是來源於實際而又符合實際的。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又是檢驗認識正確與否的唯一標準，而最基本的實踐就是廣大群眾的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因此，要正確地認識世界，並以這種認識為指導去有效地改造世界，就必須密切聯繫實際、聯繫群眾，經常誠誠懇懇地向實際學習、向群眾學習。不肯向實際、向群眾學習，是最大的驕傲；老老實實地向實際學習、向群眾學習，對於共產黨員說來，是虛心的根本標志。從這個根本觀點出發，所以我們要高度重視調查研究，並且把調查研究的过程看作向實際學習、向群眾學習的过程。

在調查研究的过程中，切忌在深入了解某一事情以前、听取群眾的意見以前，先有一個主觀主義的“框框”。毛澤東同志說：“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觀性”^①。我們進行調查研

究工作，不要採取主觀主義的態度，不要帶着事先凭空想出的什麼“框框”下去，而要如毛澤東同志所指示的那樣，客觀地、全面地、深入地去調查了解情況、研究問題。

採取客觀的態度去做調查研究，就是用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問題，也就是說，在客觀事實面前要老老實實，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事情是怎樣的就是怎樣的，既不夸大，也不縮小。這是尊重唯物主義、尊重實際的起碼態度。

採取全面的態度去做調查研究，就是說，既要了解事情和問題的這一方面，又要了解事情和問題的另一方面。一切事物都有二重性；我們要了解事物的真相就必須全面地看清它的兩個方面。例如，要了解偉大的成績，也要了解工作中的缺點；要了解成功的經驗，也要了解犯錯誤的教訓；要了解工作的順利條件，也要了解困難條件；要听取積極分子的意見，也要听取處於中間狀態的群眾和落後群眾的意見；要了解現狀，也要了解歷史，要了解一件事情的本身，也要了解這件事情和其他事情的聯繫、和周圍環境的聯繫……。這樣，才能全面地了解情況。這裡切忌先入為主，聽到一個方面的情況就下判斷，並且把它僵化起來，而拒絕听取和考慮跟它相反的另一方面的情況。

深入地進行調查研究，就是說要深入到事物里面去了解它的各個方面及其內部聯繫。對事情的原委、來龍去脈，對問題的真相、性質及其關鍵所在，要窮根究底，調查得

^① 《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1版，第778—780頁。



一清二楚，要有“打破沙鍋紋（問）到底”的精神；而不要粗枝大叶，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仅仅看到一点表面現象就做結論、下决心、动手处理工作、解决問題。

客观地、全面地、深入地进行調查研究，才是真正地尊重实际、真正虛心地向实际学习。这样子进行調查研究，才能周密地詳細地占有材料（而不是零碎不全的材料），經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得出正确的結論。

向实际学习，最基本的就是向群众学习。不肯真正虛心地向群众学习的人，是不可能調查研究过程中客观地全面地深入地看問題的。

群众的創造、智慧和斗争經驗是一切正确理論和方法的源泉。领导者所以能够领导群众，就在于善于向群众学习，集中和提高他們的創造和斗争經驗；否則，任何聰明的人物，也不可能正确地解决問題，领导群众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毛澤东同志說：“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諸葛亮”，这就是說，群众有偉大的創造力。中国人民中間，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鎮，都有那里的‘諸葛亮’。我們應該走到群众中間去，向群众学习，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来……。”^①毛澤东同志的著作，无一不是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地总结了群众斗争經驗的結果。

大家知道，互助組这个組織形式，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都起过极重大的作用。这种組織形式是誰发明的呢？从其源头上說来，是群众自己发明的。这种組織原来是有些地方的群众，为了解决生产

上的困难而自发建立的（有的地方叫互助社，有的地方叫变工队或耕田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澤东同志在江西根据地做了实地調查，总结了江西群众劳动互助的經驗，后来又在陝北根据地做了实地調查，总结了陝北群众劳动互助的經驗，把劳动互助的办法条理化，把互助組的性质概括为“建立在个体經濟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組織”^②，加以推广。这种組織形式，在民主革命时期，对于发展生产、支援战争、培养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直接地起了重大作用，后来，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又起了个体农业經濟向集体經濟过渡的桥梁作用。起了更重要的桥梁作用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是从总结互助組的經驗发展而来的。由互助組、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这条适合我国情况、又稳妥又积极的改造小农經濟的道路，是毛澤东同志从群众的实践經驗中总结出来的。仅从这一个例子，我們可以体会到群众的偉大創造力，可以体会到领导者必須向群众学习、总结群众的經驗才能领导群众这个真理，可以体会到虛心地向群众学习、集中群众的經驗是調查研究工作的灵魂。

是否虛心地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是一个党性問題。沒有虛心地向实际、向群众学习的态度，就是沒有坚强的党性，也就不能在实际行动中真正重視調查研究，更不

① 《組織起来》。《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版，第956頁。

② 同上书，第954頁。



能做好調查研究工作。

在我党的历史上，那些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錯誤的人，都是不肯調查研究中国的实际，不肯向群众学习，他們自以为了不起，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不了解，而单凭主观向群众发号施令。毛澤东同志尖锐地指出，他們的世界观是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对于那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犯教条主义錯誤的同志，毛澤东同志曾經批評道：他們“都凭主观，忽視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則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則夸夸其談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譁众取寵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欽差大臣’滿天飞。这就是我們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导革命，則害了革命。”“是党性不純的一种表现。”^①当时为毛澤东同志所批評的那些人当中，有些人也跑过許多地方，会也开了，和干部談話也作了；但是，由于他們自以为是，不尊重客观实际，对群众驕傲，不肯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所以仍然是“欽差大臣”滿天飞。他們偶而揀到一点零星的片面的情况，就把它拿来作为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想法的“根据”，对于不符合他們的主观想法的情况就不肯看、不肯听，或者“視而不見”、“听而不聞”。他們从书本上記下的一些詞句，偶而揀到的一点零星材料，都是用来譁众取寵。毛澤东同志针对这种态度說：“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問，任何一点調皮都是不行的。”^②

我們必須时刻記住毛澤东同志批評“欽

差大臣”作风的这段話，并且經常引以为戒。如果没有坚定地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的决心，而沾染上“欽差大臣”的作风，就是跑到下边去，开了調查会，也学不到任何东西。如果你不虛心，群众就会感觉到你开調查会、和他“商量”不过是“走过場”，他就会“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就会只說那些你願意听的話，而不說另外的話。就是群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果你事前抱有脱离实际的主观成見，也是听不进去的。

做調查研究工作，要虛心地实际、向群众学习，当然这不是說，不要或者輕視指导思想；也不是說，简单地記取一条一条的个别事实或者群众說什么就是什么、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我們的指导思想，是馬克思列宁主义。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符合于客观实际的真理，是我們深入、正确認識客观事物的“显微镜”和“望远镜”。在調查研究中，虛心地实际、向群众学习，是要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为指导，去辨別、分析、綜合、概括事实材料，集中和提高群众的經驗、意見，得出合乎客观規律的結論。这就是毛澤东同志所說的“实事求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

毛澤东同志說：“‘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內部联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

①② 《改造我們的学习》。《毛澤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版，第820、821頁。



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①做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实事求是”的过程。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领导者要先当群众的学生，再当群众的先生。他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②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过程的学说和群众观点联系起来，把领导和群众的关系的原理应用于认识过程，从而阐明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的辩证法，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这里，他也从认识论的高度，阐明了领导者必须向群众学习和怎样向群众学习的问题。

群众中总是有积极的、落后的和处于中间状态的这样三部分人，因此，在群众中会有不完全正确的和错误的意见。群众，包括积极分子在内，往往受着从局部看问题的限制，往往受着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较低的限制，因此，群众的正确意见或比较正确的意见，也会是零散的、无系统的、不完整的。所以领导者向群众学习，要采取“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方法。这就是，首先要虚心听取群众的各种各样的意见，然后对这些意见进行

分析、概括、总结，加以集中和提高，整理成有条理的系统的意见。这种学习就好像蜜蜂的采花酿蜜，而不是像蚂蚁那样的只是搜罗现成的食物。这样做，就能既是群众的好学生，又是群众的好先生。越是能够做群众的好学生，也就越能够做群众的好先生；越是群众的好先生，也就越能够做群众的好学生。

调查研究就是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过程，也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根据客观材料去“求是”也要依靠群众的智慧和经验，和群众虚心地讨论，和群众一道去“求是”。要做好这件事，必须紧紧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总路线为指导，又必须始终贯彻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的决心。

充分地了解情况，并根据客观实际情况求出客观规律性的认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总路线指导之下，抱着满腔热忱、眼睛向下的决心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抱着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的虚心态度，老老实实地去做调查研究，就一定会越来越清楚地摸透在各项工作中的客观规律，从而把党中央的各项政策贯彻执行得更好，工作任务完成得更好；我们的政治水平、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本领，也一定会在进行调查研究的实践中得到更大的提高。

①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版，第821页。

②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版，第921页。



民主革命中的农民问题

林 一 舟

无产阶级要进行革命，要夺取国家政权，必须解决农民同盟军的问题，必须深入农民群众，领导他们进行斗争，从而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著名的原理。

对于我们共产党人、共产主义者来说，问题只在于，如何按照本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不同的革命任务（民主革命的任务或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来解决这个问题；是自觉地对待这个问题，还是被迫地对待这个问题。

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使农民问题成为这个革命的最中心的问题。

旧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农业和手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约占百分之九十左右（据抗日战争以前统计）。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贫农和雇农又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就土地占有情况来说，占农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雇农、中农及其他劳动人民，却总共只占有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广

大农民群众，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压迫。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同盟者及其统治的基础。因此，要埋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必须消灭封建主义这个敌人；也只有坚决领导农民进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才能组织起一支强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农民群众不仅是反对封建主义的，同时也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力军。

这样，我们的任务就是如列宁所指出的，要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即以农民为主要群众，反对的不是一般资本，而是中世纪残余的条件下，把一般的共产主义理论和这种条件下的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用独立的经验加以解决。

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时候起，就明确地提出了这个任务，并完全自觉地把解决农民问题看作是处理中国革命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还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了农民的土地革命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无产阶级在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必须把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领导起来。毛泽东同志在那个时候起，已经在思想



上、干部上和实际工作上为解决这个任务进行了巨大的准备。

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很强大的，他们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中国无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党，最初是在城市中开始了战斗，组织并锻炼了本阶级的力量，接着也在农村中做了发动和组织农民的工作，并且在一九二四年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英勇地领导了第一次大革命。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反动派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背信弃义地对中国人民进行突然的反革命袭击，把革命的人民抛入白色恐怖的血海中。中国人民被剥夺了任何的政治上的自由权利，大批的革命家受到逮捕和杀戮。中国革命的种种特殊条件，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中国革命斗争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取得胜利，而必须经过长期的和艰苦的斗争，方能逐步造成全国胜利的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也就发生了。毛泽东同志指出：“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①

这就是说，在中国革命的条件下，党的

工作不仅要一般地深入农村，而且必须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利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和反革命阵营内部不统一这样的条件，在农村建立强大的革命根据地，依靠这样的根据地，长期地积聚和锻炼革命的力量，坚持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

有人曾经怀疑，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是否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在革命历史上，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或者工人的斗争得不到农民的支持而遭受挫折或失败，没有因农民革命势力的发展而不利于革命的。在中国社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只有采取这个革命路线，才是真正代表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执行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任务，否则，党就不能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

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自然不是说可以放棄城市工作，而是以农村为主，兼顾城市，以城市工作支援农村。

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这种军队是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军队，这种战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村根据地，进行长期的革命战争，坚决为农民利益而斗争，从广大农民中间取得了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所需要的大量的人力、物资后备。这样，中国共产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29页。



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革命根据地，就成了民主革命时期我国工农联盟的主要形式；这也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全国人民争取解放的主要斗争形式。

中国人民夺取国家政权，首先是在一片一片、一块一块的地区上夺取，由一块一块的地区，到小半个中国，再到半个中国，再到大半个中国，然后夺取全国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伟大的农民战争，在农村中建立起强大的革命阵地，并且逐步地波浪式地扩大这个阵地。农村革命阵地一块一块扩大的过程，就是反动的国家政权在一块一块的地区上被打掉、革命的政权在一块一块的地区上建立起来的过程。

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并采取这样的革命发展的道路，也就最有保障地解决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问题。

无产阶级不能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孤军作战。中国革命的敌人既然是异常强大的，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按照各种不同的情况，从一切可能的革命阶级和阶层，征集广大的同盟军。农民是无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因此，农民问题是建立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同时包含着一个更为广泛的统一战线问题。这就是，中国无产阶级不仅应当领导农民，领导城市小资产阶级，也应当领导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些可能联合的非劳动人民。在中国条件下，这个统一战线能否建立以及能否巩固，也要以解决农民问题的情况为转移。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遭受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排挤和压迫，因此有参加革命或者对革命保持中立的可能，但是，他们又有软弱性，有革命和反动的两面性，经常处于动摇的中间地位。无产阶级实现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也就意味着和他们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作不断的斗争。毛泽东同志说：“对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的克服，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正确的政策，否则资产阶级将反过来克服无产阶级。”^①这里所说群众的力量，主要地就是指工农联盟的力量，指无产阶级把农民的革命力量彻底发动起来；正确的政策，就是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所采取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正因为中国无产阶级依靠着强大的农村阵地，和广大农民群众建立了最密切的战斗的联盟，因此也就有可能在这个联盟的基础之上，解决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而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正确政策，反过来又有利于农民的发动。这是中国革命所已经证明了的规律之一。

我党的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人从一开始就充分认识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事业中的地位、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有些人曾经在一个长时期内处于被迫和盲目的状态。历史上党内所犯的右倾和“左”倾错误，总是同这个问题相关联的。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者，不是主要地依靠

^①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66页。



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而是主要地依靠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对于资产阶级只进行联合，而不进行必要的斗争，一味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害怕农民斗争会吓跑了资产阶级，不但不支持、而且限制和反对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因而使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这样，一方面，他们不仅不能制止代表大地主大买办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叛变，反而为一九二七年夏季国民党的叛变和发动反人民战争，造成了可乘之机；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能把民族资产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而是相反地把民族资产阶级推到了国民党反动派一边。毛泽东同志在回顾这次历史教训时指出：“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①在那次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投降主义分子又变成了取消主义者，他们匍伏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刺刀之下，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的所谓“合法”活动，而把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诬蔑为“流寇运动”。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也完全不了解农民问题、农村根据地、武装斗争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苦性，他们急于夺取大城市，看不见中国革命由农村到城市的发展过程，拒绝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拒绝在农村中进行积蓄力量的艰苦工作。他们把当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诬蔑为“农

民特殊革命性”、“农民意识的地方主义和保守主义”等等。“左”倾机会主义者，对民族资产阶级则只进行斗争，而不进行适当的联合，否认在民主革命中有争取或中立各种中间势力的必要和可能。这样，他们也就同样地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使无产阶级陷于孤军作战，使革命遭受重大挫折。后来，由于城市工作的更大破坏，“左”倾机会主义者占据的党的领导机关（当时的临时中央），也离开了城市而迁入了农村根据地。但是这种转变，对于他们说来，是被迫的，而不是自觉的，不是从研究中国革命特点和在农民问题上达到正确结论的结果。因此，他们依然是以他们错误的城市观点，来指导红军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结果使根据地的工作受到破坏。

曾经犯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王明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又犯了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相类似的错误，他在实际上不承认党所领导的农民武装和农村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作用。

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左”倾机会主义者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不懂得农民问题对革命的极端重要性，不承认中国革命必须首先在农村中建立根据地，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而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他们不懂得农民问题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断地反对了这些右的和“左”的

^①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57页。



机会主义的錯誤。他在反右和反“左”的两条战綫的斗争中，保卫了并发展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民問題和无产階級領導权的革命学說，由此逐漸提高了全党对农民問題的自覚性。

在农民問題上，毛澤东同志还批判了另一种錯誤意見，这种錯誤意見就是认为农民无需无产階級的領導，甚至把中国革命由农村到城市的发展，解釋成农民的領導作用。事情恰恰相反，中国革命由农村到城市的发展过程，正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条件下，按照无产階級的观点，領導农民革命的过程，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农民脱离无产階級領導的任何自发过程。在近代革命中，农民不可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他們不是接受无产階級的領導，就是接受资产階級的領導。农民誠然占人口的大多数，但是，如列宁所說：“小资产階級群众的大多数本身还没有决定过任何問題，而且也不可能决定任何問題”^①。农民只有在无产階級领导下，才能成为偉大的革命力量，也才能使自己获得解放。无产階級先鋒队必須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为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和革命的农民同呼吸，共生死；同时，又必須在农民群众中进行艰苦的工作，用无产階級的思想来不断地提高农民群众的覚悟水平，而不是使自己降低到小生产者的自发性的水平上。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以无产階級的綱領和政策，无产階級思想和紀律性，来教育和引导中国广大的农民群众，使他們在思想上、組織上受到了严格的鍛炼，并避免了农民在小生产条件下形成的狹隘观点（散漫、非組織

观点、个人主义、絕對平均主义、缺乏远大眼光等等）对于党的政策的影响，从而实现了无产階級的領導，保证了革命的胜利。

二

解决农民土地問題，把社会生产力从封建关系束縛中解放出来，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內容。中国各階級各阶层对于这个革命的态度，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們对于农民土地問題的态度。

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階級的国民党反动集团，是坚决反对中国农民解决土地問題的。他們有时声言要解决土地問題，只是一种欺騙，他們是以这作为殘酷进攻农民的烟幕。

中国民族资产階級的政党沒有、也不可能有坚决的土地綱領。就市場需要來說，这个階級也贊成土地改革，但他們又多半和封建的土地关系联系着，并且害怕民众，因此，他們中的許多人又害怕土地改革，害怕农民的真正覚醒；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右翼分子，他們是反对人民民主革命的，尽管他們在口头上有时也喊着“解决土地問題”的口号，但目的只是为了欺騙农民。这种情况，“就增加了共产党批評同盟者、揭破假革命、爭取領導权的責任。”^②

在中国，只有无产階級才能够坚决領導农民彻底解决土地問題。中国革命的經驗指出这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只有制訂和执行

^① 《論立宪幻想》。《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1頁。

^② 《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澤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43頁。



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成为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土地纲领是最彻底革命的，这就是废除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没收地主的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统一平均分配，以满足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农民这个名称所包括的内容，主要地是指贫农和中农。在旧中国，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左右的贫农和雇农，无地或少地，他们过着世界上少见的贫困的生活。贫农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虽少，但半无产阶级却是极其广大的，他们并在长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具有很大的革命性。这是中国革命中（不论是民主革命中或社会主义革命中）长期起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贫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军，是中国农村革命的主力。右倾机会主义者或者“左”倾机会主义者，忽视了这种情况，他们看不到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和革命毅力，由于这样，他们也就不懂得不能把中国农民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比较保守的农民相提并论。

由于贫农雇农所处的经济地位，他们对土地斗争的态度最坚决。土地改革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必须和只能是贫雇农。土地改

革的主要的直接的任务，或者说，民主革命中解放社会生产力的主要的任务，也就是满足广大数量的贫雇农群众的土地要求。在农村中组织包括贫雇农中农在内的最广泛群众性的农会，首先组织包括贫雇农群众的贫农团，使贫农团成为一切农村斗争的领导骨干，这是坚决而彻底地进行土地改革的最重要的保证。同时，在土地斗争中及其他一切斗争中，把广大贫农的革命积极性和革命纪律性逐步提高到接近革命无产阶级的水平，使之成为党的力量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取之不竭的泉源，这又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的保证。

毛泽东同志屡次强调指出，在土地改革中必须贯彻执行团结农村中户数百分之九十二左右、人数百分之九十左右，即全体农村劳动人民，建立反对封建制度的统一战线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战略方针，必须反对错误地扩大打击面。

这里，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对待中农。中农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毛泽东同志说：“中农态度的向背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一个因素”^①。“土地改革必须团结中农，贫雇农必须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中农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不这样做，贫雇农就会陷于孤立，土地改革就会失败。”^②要团结中农，一方面必须率领中农向封建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因为中农也受地主阶级的压迫，并在政治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38页。

②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12页。



上处于无权的地位)，并取得胜利，以停止中农的动摇；另一方面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切实地保护中农利益，使之不受侵犯。土地改革中，也要满足某些中农的要求。容许一部分中农保有比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此外，还要给中农以政治教育。毛泽东同志对中农这个阶层做了杰出的分析，他特别把中农中间接近于贫农的下中农和富裕中农区别出来。对于富裕中农，规定其和富农的严格界限，不能损害富裕中农的利益，从而保证巩固地团结了全部中农；对于下中农，则分给一部分土地，并吸收他们协助贫农团工作，参加农村政权工作，借以进一步调动他们的革命积极性，扩大贫农的优势。

在土地改革中，在组织农民革命队伍中，有两条完全相反的方针，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是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组织农民群众的力量，以进行斗争，“在这些斗争中，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建立党的核心，建立群众的武装和人民的政权，把群众斗争从经济斗争迅速提高到政治斗争，参加根据地的建设。”^①这就是坚决依靠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力量、发动农民自己救自己、自己打倒地主、取得土地、保卫土地的群众路线方针。这个方针反对单纯自上而下地“和平地”分配土地。这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与此相反，按照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则是反对发动群众进行斗争，单纯地自上而下采取所谓“和平方式”，由政府把土地“恩赐”给农民。

土地改革是一场极尖锐的阶级斗争，是

我国多少世代以来呻吟于封建压迫下的农民翻身起来的严重斗争。毛泽东同志一直反复地向我们阐明这个真理：土地改革是农民群众的斗争，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对群众的领导和帮助。获得土地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这是事情成败的关键。凡不发动群众积极性而“恩赐”土地，单纯地自上而下进行所谓“和平”土改，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如果是这样做，今天把土地分给了农民，明天地主阶级就可能用各种方法进行反攻和复辟。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农村中进行巨大的工作，以启发农民的觉悟和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党和政府派遣工作组到农村去进行土地改革工作，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去代替农民群众进行斗争，而是深入农民群众中间，访贫问苦，宣传政策，发现贫苦农民中的积极分子，以他们为骨干，帮助农民组织起农会，将政策交给群众，有领导地开展斗争。划分农村阶级，是一项极复杂的需要精细地进行的工作，但农民群众在有了斗争的觉悟，掌握了土地改革的政策时，能够把这项工作做得很好。人民政府在土地改革期间则组成人民法庭以支持农民的斗争。总之，只有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用农民自己的力量从地主阶级手里夺取土地，打倒地主的势力，劳动农民才能真正成为农村的主人。

正因为土地改革斗争是依靠农民群众的觉醒和他们自己的力量而进行的，所以经过这种斗争，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也就能够进

^①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78页。



一步地提高。广大农民在土地改革中深切地认识到，本地的地主势力同整个反动势力是相关联的，自己的命运是同整个革命、整个国家的命运相关联的。这样，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通过土地改革，不但把以贫农为骨干的广大农民组织成一支积极从事生产支援前线的生产大军，而且迅速地把他们组织成一支积极参加根据地建设的政治大军。党的这个方针，一直继续贯彻执行到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的土地改革中。

我国的土地改革，不是实行土地国有化，而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归农民所私有。这是适合于我国的历史条件和农民的愿望的。

划清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者的界限，区别封建性的东西和自由资本主义性的东西，将打击面严格限制在真正封建剥削的范围内，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土地改革的对象，只是和必须是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剥削制度，不能侵犯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要侵犯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特别注意不要侵犯没有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中农、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新式富农。”^①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也曾特别指出：“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分，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有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施行，无疑义地是错误的。”^②十年内战的后期，“左”倾机会主义者曾执行反对中间阶级并打击中农的错误政策，结果只

是造成了混乱，陷革命于不利。

中国土地改革中的富农问题，是中国具体的历史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一个特殊问题。富农，在中国农村人口中约占百分之五，富农经济在全国农业经济中不占重要地位。民主革命时期，容许农村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但是，中国的旧式富农，一般具有很重的封建和半封建剥削的性质，在这一点上不同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富农。在土地改革中，也必须废除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着更多地满足贫雇农的要求，以发动广大农民支持革命战争，那时颁布的《土地法大纲》，规定在土地改革中实行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分给农民的政策；这样做，是由于富农在当时革命和反革命的残酷斗争中，还不相信人民能够胜利，他们还倾向于地主阶级和蒋介石一边，反对土地改革和人民革命战争。但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又把旧式富农和新式富农（在民主政权下生长起来的）加以区别，对于新式富农，按富裕中农待遇。到了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反革命统治被推翻以后，我们就有了可能采取使富农在土地改革中保持中立的政策。一九五〇年公布的《土地改革法》，规定对富农只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对富农的其他土地和财产则一般不动。经过土地改革，富农原来所兼有的封建剥削是消灭了，但富农经济仍允许其存在。实行这样的

①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12页。

②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93页。



政策，就彻底地孤立了在农村人口中不足百分之五的地主阶级，便于我们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同时，也解除了中农群众的某些顾虑，能够更好地团结他们进行土地改革和发展农业生产。

“左”倾机会主义者曾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这种政策也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同志说：“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即消灭封建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因此，对地主必须分给和农民同样的土地财产，并使他们学会劳动生产，参加国民经济生活的行列。”^① 实行按乡村全部人口平分土地的政策，就有助于安定社会秩序，使地主和旧富农也能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并在长期劳动中获得改造。

必须坚决、彻底、全部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不要惧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毛泽东同志同时又强调指出，必须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度。“所谓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度，就是说，必须分别地主和富农，分别地主的大中小，分别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分子和非恶霸分子，在平分土地、消灭封建制度的大原则下面，不是一律地而是有所分别地决定和实行给予这些不同情况的人们以不同的待遇。”^② 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不仅使人们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而且有利于减少革命的阻力，有利于分化和各个击败敌人。

毛泽东同志又指出：“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应当是有步骤的，即是说，有策略的。必须依据环境所许可的情况，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

和组织程度，决定发动斗争的策略，不要企图在一个早上消灭全部的封建剥削制度。”^③ 在土地改革斗争中，毛泽东同志特别着重地说明，对于各地区，各阶级、阶层的情况，要进行调查研究，要有基本的分析，然后依照实际情况决定方针，分地区、分阶段地开展工作，而不可无根据地、主观主义地决定问题，不可不顾农民觉悟程度而强制行事。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总结了过去时期土地改革的经验，指出：在一切新解放区，必须把减租减息作为工作的第一个阶段、必经的预备阶段，在这个阶段，实行中立富农和中立中小地主的策略，将打击面缩小到只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和打击豪绅恶霸分子，然后，依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提高了的情况，逐步地发展到平分土地的阶段，即消灭全部封建制度的阶段。

中国革命是长期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互相联结和互相推移，情况很复杂。在消灭封建制度的策略步骤方面，毛泽东同志一直主张适应于各个时期的斗争形势和任务，灵活地规定党的斗争策略。

从一九二七年以来，土地革命斗争经过了四个时期：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全国胜利以后的时期。各个时期的情况是不同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坚决地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斗争，复兴了并向前

①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312—1313页。

② 同上书，第1313—1314页。

③ 同上书，第1313页。



推进了革命运动，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这个时期的土地政策，就是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为着同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减少地主对于我们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并团结一切当时能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们起见，中国共产党将十年内战时期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的政策，合理负担的政策等。这就是在经济上逐步削弱封建势力而不是立即消灭封建势力。到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适应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为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发动农民群众积极支援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又及时作出了改变土地政策的决定，即由抗日时期的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这种改变获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即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这两年内，解放区农民除在物质生产方面给战争以巨大支援以外，大约有一百六十万左右分得了土地的青年农民自愿地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这样，我们终于在党的领导下，主要依靠在土地改革斗争中发动起来的农民力量，在中国的伟大的土地上，最后地埋葬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罪恶统治。

三

一切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无产阶级为了获得政权，必须取得农民的支持。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后所屡次指出的，无产阶级只要一提出国家政权问题，或者换句话说，无产阶级只要

稍为认真地提出革命的问题，就不能不提出农民问题，不能不提出与广大劳动农民结成坚固联盟、并使自己成为这个联盟的领导者的问题，否则，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国家政权，取得了，也不可能巩固地保持住自己的政权。而农民群众要获得真正的彻底的解放，只有在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的帮助之下，才有可能，才有保障。如果没有这个政权，一切已经取得的革命胜利果实，也可能会重新失掉。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农村中建立了革命政权。这个政权，在整个民主革命期间，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革命的政权。这个政权在一片一片、一块一块的地区上逐步向前发展，农民的土地问题也在一片一片、一块一块的地区上逐步获得解决或部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反过来又加强了这个政权的基础，成了这个政权能够存在、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由于在人民政权领导下农民土地问题逐步得到解决，由于农民在民主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的过程中获得了现实的利益，并且由于农民在共产党的教育下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越来越认识到政权的重要性，这样，农民群众就能够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更加自觉地坚决地为革命的基本目标——夺取国家政权而战斗。

毛泽东同志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



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①

中国无产阶级夺得了全国政权，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而后夺取城市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民主革命当作一个历史阶段来说，已经过去。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已经开始。但是，旧的历史阶段所遗留下来的民主革命任务，主要是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任务，还必须继续彻底完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立即首先在广大农村地区，用三年时间进行了土地改革。在这次全国规模的土地改革中，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并免除了每年所缴纳的相当于三千万吨以上粮食的地租，还分得了大量的农具、牲口等等。这样，我们就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巩固了我们在前一个革命中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伟大事业——工农联盟的事业。

这正说明：我们只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政权，方能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

列宁曾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相互关系：前一个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个革命；后一个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个革命的问题，巩固前一个革命的事业。

不论是在全国解放以前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或在全国解放以后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广大的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都无例外地大量地建立了各种互助合作组织。这种互助合作组织，在

民主革命条件下，只能建筑在农民个体经济基础（农民私有财产基础）之上，但它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因素，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发展农业生产，支持革命战争，对于培养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起了重大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下，这种互助合作组织更起着一种特殊重要的社会作用，它使得农村中的前一个革命易于转变为后一个革命；并且从这里开始，进一步把在土地改革基础上巩固起来的工农联盟，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逐步地为这个联盟奠定另一个新的更加巩固的基础，即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基础。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条件下，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紧紧地把握住农民问题，并以农民问题为出发点和中心来解决中国民主革命问题的全部历史经验，具有伟大意义。目前，我们已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了新的伟大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革命，党的路线和政策，在现在和过去是有原则区别的。但是，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农民为主要群众的国家，巩固和发展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发展农业生产，仍然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极端重要的问题。就这方面来说，民主革命时期我们领导农民斗争、解决农民问题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工作就仍是最切近的参考，这些经验对于我们依然有很大的意义。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85页。



红旗

HONGQI

6

一九六一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六一年第六期★

目 录

社論：坚持政治挂帅

抓紧具体措施 (1)

纪念巴黎公社 施东向 (5)

解决輕工业原料供应問題的途徑 孔祥禛 (9)

文化遗产的学习和批判问题 吳 江 (18)

做支援农业的尖兵 張維城 (24)

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农民問題 肖 述 (28)



——社論——

坚持政治挂帅 抓紧具体措施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战线上和工业生产战线上呈现出一派大好形势。在农业方面，各地人民公社在去冬今春先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整风整社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在战胜两年严重自然灾害带来的各种困难的基础上开展农业增产运动，目前，在继续彻底进行整风整社的同时，正为加强田间管理，掀起春耕生产高潮，夺取夏收胜利，争取全年丰收而进行巨大的工作。在工业方面，大力支援农业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加强。由于大抓采掘工业、木材采伐和交通运输工作，并且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初步进展，这就为各工业部门完成今年生产任务准备好有利的条件。

根据三年大跃进的经验和今年第一季度的实践，争取今年工农业生产的全面胜利，关键在于继续坚持政治挂帅，并把政治挂帅和具体措施密切结合起来。

坚决贯彻执行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坚持政治挂帅，切实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对推动人们发挥生产积极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进行生产，也同进行战争一样，包括人和物两方面的因素。在战争中，武器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这是被一切革命战争的实践所千百次证明了的。在生产中，当然必须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如厂房、土地、机器、工具、原料、材料、种子、肥料等等，但是决定生产的好坏，决定生产发展的快慢，不仅是这些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掌握和使用这些物质条件的工人和农民。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大致相同的条件下，这一个地区和那一个地区，这一个公社和那一个公社，这一个生产队和那一个生产队，这一个企业和那一个企业，由于人的觉悟程度不同，干劲大小，在生产上产生不同的结果。就是条件比较差的地区、公社、生产队或者企业，只要人们鼓足干劲，充分利用客观可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也会比条件比较好，而人们干劲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的地区、公社、生产队或者企业，取得更好的成绩。由此可见，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人的思想觉悟，人的精神状态，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生产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生产中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首先应当表现在对群众的政治思想上，就是要做人的工作，做活的思想教育工作。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要抓思想。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积累了对群众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丰富经验。做活的思想教育工作，主要就是切实掌握群众的思想动态，掌握群众思想变化的规律，结合群众的思想状况，帮助群众用正确的思想克服错误的思想，使群众真正从思想上发动起来，使群众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出来，满怀信心、干劲十足地从事生产和工作。在我们的各项生产建设中，凡是切实做好群众政治思想工作的，群众的觉悟就高，干劲就大，即使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问题，也都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河北省涿县各岗公社高辛庄生产队，去年因涝灾成灾，一千六百九十亩地，秋季只有二百九十七亩有收成，粮食减产六成多，菜、柴、饲料、资金样样不足，群众生活十分困难，情绪低落。但是这个生产队的党支部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在摸清群众思想状况以后，领导生产队的干部和党、团员，挨门串户向群众宣传党的生产救灾政策，组织群众座谈形势，启发群众回忆对比，提高了群众的思想觉悟。在鼓起群众信心以后，支部领导群众采取了各种有效的措施，克服了重重困难，安排好生活，战胜了灾害。目前，这个生产队的干部和群众，正以饱满的情绪迎接春耕生产的高潮。

辽宁省抚顺市胜利煤矿是一个老矿，旧巷多，地质情况复杂，从去年起，全矿主要依靠挖掘老采区的残煤完成生产任务，加以设备旧，故障多，生产条件很不利，从去年五月到九月，连续五个月没有完成生产计划。这个矿的一部分干部，在困难面前松了劲、泄了气；有个别干部甚至说：“我们的困难，就是诸葛亮来也克服不了。”但是这个矿的大部分干部却不甘落后，他们立志要把生产搞好，其中有许多人是越困难越要革命的闯将。矿党委针对这种情况，坚决贯彻党的总路线，向全体干部和工人大讲当前形势，大讲煤炭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让所有干部和工人都懂得煤炭是当前保证生产建设的关键。矿党委还通过许多生动活泼的方式，向干部和工人进行思想工作，组织干部和工人分别开展竞赛，并且在工人家属中进行了细致的思想工作，树立了家属关心生产的光荣感。由于思想工作做得深入细致，根本扭转了部分干部的畏难松劲情绪，激发了干部和工人的革命干劲。在这个基础上针对着实际存在的问题，有力地推行了各种措施。这个矿从去年十月份起，月月超额完成生产计划，今年一月和二月份，采煤和掘进计划也都提前完成。

高辛庄生产队和胜利煤矿，从客观条件来说，确实存在着许多困难。但是，这个队和这个矿的领导，没有向困难低头。他们坚持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坚决按照总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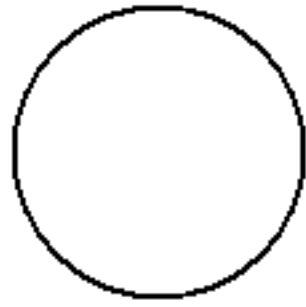


线的要求办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坚持政治挂帅，充分发动群众，抓紧具体措施，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这样，他们就能领导群众战胜了困难，取得了胜利。而且，在克服困难的斗争中，更加激发了人们的斗志，鼓舞了人们的信心，使干部和群众受到了锻炼，学到了本领，这就使原来对生产不利的条件转变为对生产有利的条件。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坚持政治挂帅，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利用一切客观可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存在着困难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如此。

坚持政治挂帅必须和切实地加强具体措施相结合。在战争中，我们必须战略上藐视敌人，而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在生产上，我们同样必须在战略上藐视困难，而在战术上重视困难。在任何工作的发展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只要我们采取积极的态度，这些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如果不采取积极态度，那末原来可以解决的问题，也会变成好像不可克服的困难。坚持政治挂帅，加强思想工作，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这是在战略上藐视困难。但是，对于确实存在的问题，又必须十分重视，采取切实有效的具体措施，一个一个地予以解决。

加强调查研究是制订具体措施的重要环节。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查清情况是下决心、订措施的先决条件。客观情况常常不是从表面上一看就清楚的。不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主观地做决定，订措施，往往不能符合客观实际，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对一个一个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才能订出切合实际的有效措施。在调查研究时，除了进行普遍的调查以外，抓典型、解剖一个麻雀的调查方法尤其重要。每一个生产单位都应该通过切实的调查研究来制订发展生产的各项具体措施；在这方面，领导机关的领导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给予切实的帮助，也是十分必要的。

在生产上，畏难松劲的情绪是必须坚决克服的。只尚空谈，不切实际，对问题不分析、不研究，不积极采取措施逐个解决的飘浮作风，是畏难松劲情绪的一种表现，也必须彻底纠正。我们当然不应该硬要做那些实际上不可能做到的事，但是对于实际可能做到、而且应该做到的事，我们一定要积极地去。政治挂帅，可以鼓足人们的冲天的革命干劲，使人们努力去解决那些骤然看去好像无法解决的困难问题，所以必须把政治挂帅摆在首位；但是，也只有领导群众切切实实地解决了各种具体问题，群众才会干劲倍增，生产的持续发展才有确切可靠的保证，这又是政治挂帅确实起了作用的具体表现。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它既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又是推动经济前进的杠杆。



前面所举的高辛庄生产队和胜利煤矿，就是把政治挂帅同具体措施密切结合的好榜样。

高辛庄生产队的党支部在领导群众生产救灾的斗争中，既加强了党的政策的宣传，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又领导群众解决了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去年粮食少收了，他们就抓紧时机抢种秋菜；燃料、饲料不足，他们就组织群众打草拾柴；资金困难，他们就组织社员开展副业生产。在解决了所有这些问题以后，群众的心情舒畅，信心大增，生产热情空前高涨。

胜利煤矿的领导，不仅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又深又透，而且具体措施也是件件落实。在困难暴露出来以后，这个矿的党委和行政领导，深入前线，深入群众，同群众一起分析问题，制订措施。在老采区残煤接近采完的情况下，他们一面集中力量加强新采区的重点工程，保证新采区按时投入生产，一面组织群众搜集残煤，找到可采残煤约三十二万吨。他们既抓生产，又抓准备；既抓重点单位，又抓生产关键和薄弱环节。在维修、运输、供应等各个部门的通力协作下，他们解决了设备维修和巷道维修、排水、通风、运输、机电各方面的具体问题，建立了各种责任制度，从而保证了采煤和掘进双跃进。

在解决生产工作中和群众生活中的一个一个具体问题时，必须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进行。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我们党从来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对于一切人民群众的事业，既不能采取命令主义，强迫群众来执行，也不能用“恩赐”的办法，不发动群众而包办代替。发展生产是群众的根本利益所在。群众是生产的实践者，他们最了解生产中所遇到的各种具体问题。只要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密切联系群众，发扬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同甘共苦的工作作风，一面加强对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一面同群众一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就能够充分地调动起来，也就能够订出切实有效的具体措施，并且在群众中贯彻执行这些措施。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革命精神，发扬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千方百计地、不失时机地采取有效的措施，争取今年农业丰收，争取在工业、运输业、商业、文教卫生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其他战线上完成新的任务。”抓紧当前有利时机，坚持政治挂帅，深入发动群众，制订切实有效的措施，克服两年严重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各种困难，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党所规定的任务。



紀念巴黎公社

· 施 东 向 ·

九十年以前，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无产阶级高举革命的红旗，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巴黎公社。巴黎公社是革命的无产阶级起来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英勇的尝试。

巴黎公社只存在了七十二天。尽管巴黎公社遭到了失败，但无产阶级在建立巴黎公社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是永垂不朽的。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是巨大的，它的经验对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来说是极为珍贵的。

一八七〇年九月，即公社成立半年以前，马克思曾在第一国际告欧美会员书中劝告法国工人不要立即举行起义，认为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的时机尚未成熟。但当后来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的时候，马克思对于群众的这种创造历史的主动精神和冲天革命精神，表示了极大的欢欣鼓舞和赞美。马克思当时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呀！”^①在公社结束战斗后的第二天，马克思在第一国际告欧美会员书中写道：“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的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被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杀害它的刽子手们已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尽管他们的牧师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其重视巴黎公社的斗争经验。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根本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一般地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变成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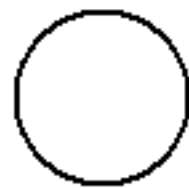
② 《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22页。



統治階級的无产階級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① 经过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的法国革命，在这个问题上，馬克思做出了更加具体的結論，在《拿破侖第三政变記》一书中，馬克思指出，工人階級应当打碎、毀坏現成的資產階級国家机器，但是馬克思还没有具体提出用什么东西去代替它。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巴黎公社，因为它在这方面第一次提供了实际的經驗。馬克思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产者階級对占有者階級进行斗争的結果，是終究发现了的可以使劳动在經濟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② 公社廢除了旧式的資產階級雇佣軍队，代之以人民的武装，廢除了反动警察和官僚制度。公社联合行政权与立法权于一体，确定一切官吏都須经过人民普选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換，他們的待遇和普通工人一样。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經驗极其仔細地进行了分析，进一步发展了他們的国家学說。

馬克思和恩格斯从巴黎公社的經驗中所得出的科学結論，已經为几十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凱歌行进的历史所光輝地証实。

偉大的十月革命在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創立了无产階級专政的国家。列宁根据俄国工人階級的革命經驗指出，苏維埃政权是无产階級专政的新的国家組織形式。列宁把苏維埃看作是巴黎公社的发展和繼續，他說，苏維埃“再造了巴黎公社型的国家”^③。“只有苏維埃国家組織才能真正一下子粉碎和彻底摧毀旧式的即資產階級的、官僚的、法官的机关，这些机关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甚至在最民主的共和国中都保存着，而且必然保存着，它們实际上是实行工人和劳动者的民主的最大障碍。巴黎公社在这条道路上走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苏維埃政权走了第二步。”^④ 列宁总结了国际无产階級斗争的新經驗，特别是俄国无产階級革命的經驗，捍卫和发展了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階級革命和无产階級专政的学說，同歪曲和背叛这个学說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作了坚决的斗争。在《国家与革命》、《无产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一系列著作中，列宁反复論証了馬克思从巴黎公社的經驗中所得出的这个結論：无产階級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摧毀資產階級的国家机器，用新的、无产階級专政的国家机器去代替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9頁。

② 《法兰西内战》。《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1頁。

③ 《无产階級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7頁。

④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資產階級民主和无产階級专政的提綱和报告》。《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3頁。



宅。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为了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战胜和铲除资本主义，实现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非常复杂，但本质是一个，不管怎样，所有这些国家总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①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被剥削者多数加于剥削者少数的镇压，这种镇压是同把民主制普及于绝大多数居民结合在一起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和亚洲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的伟大生命力。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只有摧毁了旧的军阀制度和官僚制度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新的革命的国家机器，才有可能镇压国内剥削阶级的反抗，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逐步实现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同样证明了：不论建立什么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都意味着扩大民主，意味着从资产阶级的形式上的民主过渡到真正的民主，即劳动人民的民主。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总是嚷嚷说，无产阶级专政“消灭了民主”，“消灭了自由”。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广大人民在自己的生活中深切地体会到，被消灭了的只是剥削阶级的民主和剥削阶级的自由，而从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了的一切劳动者却享受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真正的民主和真正的自由。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都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莫斯科声明在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改良主义者的根本区别的时候说：“改良主义者把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改革看成是最終目的，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声明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进行斗争，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这种或者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巴黎公社的最根本的经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思想。坚持这个思想或者歪曲这个思想，至今仍然是区分马

^①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0页。



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标志。

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如同他们的修正主义前辈——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一样，在歪曲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方面特别卖力气。半年以前出版的卡德尔所著《社会主义和战争》一书，胡说什么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了“一整套由社会来调节并指导经济发展的制度”，并且认为，这就是“已经在成熟”的新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因素。谁都知道，许多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把现代资本主义说成是“调节过的”、“改善了的”资本主义，认为通过资产阶级国家的“调节”，可以使资本主义“有计划地”发展，消灭危机。他们把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描绘成是超阶级的服务于“全民”的东西，极力掩盖它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他们的那些神话，已经在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危机反复发生和阶级矛盾不断加深的铁的事实面前宣告破产。卡德尔的这套胡说，不过是从帝国主义的辩护士那里捡来的垃圾罢了。他的目的无非是想要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自发地在向社会主义“进化”，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无须通过革命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工人阶级自己的国家机器，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了。这同宣扬“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老修正主义完全是一脉相承，一个调子。卡德尔在为资本主义作这番粉饰的同时，以一个死心塌地的叛徒所特有的对革命事业的疯狂仇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产生“官僚主义”、“政治垄断”，说什么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雇佣关系”、“国家主义变态”等等。这同帝国主义者把无产阶级的国家污蔑为“没有民主”、“极权主义”等等是完全一致的。最近，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又大肆攻击莫斯科声明，这就更加清楚地暴露了这帮叛徒的丑恶面貌。

在目前的时代，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正在不断强化他们的军事的、官僚的和警察特务的国家机器，以便对内加强反动统治，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用各种不同形式掠夺和奴役别国人民。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正在坚持和加强着斗争，反对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爱国正义斗争正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在今天，发扬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吸取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和革命的学说，反对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对于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歪曲和背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解决轻工业原料供应问题的途径

孔祥楨

轻工业，是国民经济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担负着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保证市场供应，支援工农业生产，并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的重要任务。积极发展轻工业，对于妥善安排人民生活，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鼓舞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热情，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起着重要的作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向都极其重视轻工业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六年所作的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要求全党注意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又具体规定了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正确方针的指导下，我国轻工业获得了很大发展，一九五九年比一九四九年增长了六倍，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的一九五二年也增长了两倍以上。特别是一九五八年以来，轻工业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接连两年的生产都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四左右。这个增长速度，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轻工业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二点八，快了一倍以上。一九六〇年，以工业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产量，仍然有着很大的增

长。在三十二种主要产品中，增长速度超过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有自行车、缝纫机、铝锅、日用陶瓷、铅笔等十七种，还有十二种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仅有三种比上年水平略有降低。

一九六〇年，由于农业遭受了近百年没有过的特大自然灾害，给轻工业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影响。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品，如食糖、卷烟、油脂、酒类、乳制品、纸张等，都未能完成国家的年度计划，从而影响到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指出：“由于农业歉收和轻工业原料不足而形成的市场供应的暂时困难，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全会号召：“轻工业部门应当努力克服由于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原料不足的困难，开辟新的原料来源，增加生产，尽可能地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这是轻工业战线上全体职工当前的重大而光荣的任务。

轻工业(包括手工业)主要是生产个人消费品的工业部门。根据产品目录，日用工业品包括六十多个大类，七百多个小类，一万三千多个品种。这些品种，分别由轻工、纺



織、粮食、商业、化工、机械等部门生产，其中絕大多数又是由輕工业和紡織工业这两个部門来生产的。輕工业生产同人民生活的关系十分密切。不論男女老少，不論工农商学兵，从衣、食、住、行、生、养、婚、葬，到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几乎都离不开日用輕工业品，可以說是“人人所需，日日必用”。

輕工业也为农业和重工业提供一部分生产資料。輕工业生产的手推車、各种工业技术用紙、原盐及其副产的溴素等化工产品、酒精、耐火材料、工业用革、光学玻璃、工业陶瓷、工业搪瓷等等，直接支援了冶金、机械、电机、化学、医药等工业，以及农业、交通、邮电、建筑、国防等部门。这部分产品，占全部輕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此外，輕工业产品是出口物资的重要来源之一。我国出产的許多日用輕工业品，包括手工艺品，具有独特的民族風格，受到国外的欢迎。

輕工业在国民經济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发展輕工业生产，必須努力做好輕工业原料材料的生产和供应。

輕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料材料具有品种众多、規格复杂、数量龐大、来源广泛的特点。

从生产方面来看，占輕工业原料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农副产品，范围极其广泛。各种經济作物，包括果蔬、糖料(甘蔗、甜菜)、油料、嗜好作物(烟草、咖啡、茶叶……)、芳香作物，

以及經濟林木，需要經過技术加工才能进入消費。漁猎、畜牧业的产品，也都是輕工业的加工对象。不仅是农业的正产品需要加工，就是副产品(如各种作物的蒿秆)也要經過輕工业的加工来提高其經濟价值、使用价值。仅造纸工业需要的草类纖維，包括稻草、麦草、芦苇、蔗渣、高粱秆、棉秆等等，每年就达六、七百万吨之多。

工业品原料(包括金屬、化工、矿物和人造原料)約占輕工业原料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輕工业生产的日用五金产品，包括自行車、縫紉机、手推車、钟表、打字机、计算机、鋁鍋、衡器、搪瓷制品以及数以千、万計的小五金、小百貨，都需要相当数量的各种規格的黑色、有色金屬原料材料。为維護这些耐用消費品而生产和供应市場的修配零件，以及各种产品的金屬部件(如外壳、手把、支架、底座等)，每年也需要很多的五金原料。輕工业需要的化工原料以数万吨計，包括上千个品种。有的是輕工业产品的主要原料，如做胶鞋用的橡胶，感光材料中的片基，合成洗滌剂中的酸、碱、苯，做自来水笔用的塑料等；有的是輕工业的重要輔助材料，如罐頭工业用的塗料就需要几十种化工原料来配成。輔助材料虽然不构成輕工业产品的主要实体，但却是生产中所不可缺少的。輕工业还需要各种矿物原料。陶瓷工业用的矾土，皮革工业中的矿物鞣料，鉛笔工业中的石墨，电池工业中的錳粉，造纸工业中的明矾，搪瓷工业中的硼砂、氧化鈷，工艺美术中的玉石……都是矿物原料。煤炭、石油



等燃料，更是輕工业生产中热能和动力的重要来源。

此外，足够的包装容器和包装材料，也是使輕工业生产能够順利进行的必要条件，沒有它們，就会使原料材料的进厂、成品的出厂发生故障，甚至影响生产的进行。而包装的坚固、美观，对于减少運轉过程中的損耗、保证产品质量有积极的意义。輕工业所需的包装器材，包括各种规格尺寸的紙張、紙盒、陶瓷玻璃容器、鋼瓶、板材、馬口铁，以至草席、草包等等，也都是工业和农业生产出来的。

从供应关系来看，輕工业上万种的产品所用的原料、材料和燃料，一部分是国家分配的物资，一部分是由省、市、自治区負責平衡的物资，一部分是由商业部門組織供应的物资，还有一些是进口物资。此外，輕工业企业也要自行解决一部分。

随着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輕工业的原料材料有了很大增长。三年来，国家分配給輕工业生产用的五金鋼材，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計划期間总和的一倍以上，化工原料、木材等的分配量也都是增长的。商业部門对农副产品和野生原料的收购量和供应量，除农业受灾的年份而外，总的說来也是增长的。这是輕工业生产不断增长的物质基础。但是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市場需要量很大的国家，每个人的消費需要只要增加一点，集中起来就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千方百計地开

辟原料材料的来源，增加原料材料的生产 and 供应，节约使用原料材料，不仅在目前感到特別迫切，就是今后也还是輕工业部門所要經常考虑和解决的問題。

輕工业的原料百分之八十左右来自农业，农业生产的丰歉，对于輕工业当年和次年的发展速度，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解放几年来的实践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一九五〇年农业增长百分之十七点七，当年和次年輕工业就分別增长百分之三十点八和三十二点六；一九五二年农业增长百分之十五点三，当年和次年輕工业分別增长百分之二十三点八和二十六点七；一九五八年农业增长百分之二十五，当年和次年輕工业各增长百分之三十四左右。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农业都增长不到百分之五，一九五四年輕工业就只增长百分之十四点二，一九五五年还减少百分之零点零三，一九五七年也只增长百分之五点六。一九六〇年农业遭遇特大的自然灾害，对輕工业起着更为深刻的影响。由此可见，輕工业的发展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农业的发展。农业发展了，輕工业就能更快地发展。輕工业必須坚决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針，大力支援农业。

节约劳动力支援农业生产，是輕工业支援农业的一个重要方面。黑龙江省的六大糖厂，一九六〇年采取延长榨期的办法，不仅沒有用农村临时工，还抽出七千多工人支援了农业生产。不少季节性生产的工厂，适应农时安排本厂生产，以免多占农业劳动力。



县社举办的轻工业工厂，有许多还采取亦工亦农的办法，农忙务农，农闲做工，支援农业。

组织职工上山下乡，配合夏收、秋收、小夏收、小秋收，帮助人民公社把农副产品和野生原料采好、收好、运好、藏好、加工好，是把大抓原料和支援农业结合起来的好办法。一九六〇年下半年，许多地区的轻工业部门这样做了，有很大的收获。收集和利用野生原料是一项应当重视的工作。我国地大物博，在广袤的山区半山区中，野生原料丛生。其中纤维类、淀粉类、油脂类、芳香类、药物类、栲胶类、动物类等等，都是轻工业的好原料。过去商业部门每一年收购量达到数十万吨。在野生原料的收获季节，轻工业部门组织职工上山下乡，同农业、商业部门协作，配合人民公社，进行采集、收购，采取合理的收购价格，设立一定数量的收购点，安排一部分加工设备和动力设备，就有可能收集到为数可观的野生原料。这对于增加人民公社收入，支援农副业生产，解决轻工业原料供应，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轻工业企业通过厂社挂钩等方式，在农艺技术上进行指导，也是轻工业支援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事农副产品加工的轻工业企业的职工，对农产品特别是技术经济作物的性能、成分、生长规律，以及种植、护理、收割、加工等方面，一般都有较多的知识。把他们的知识同农民的生产经验互相交流，互相结合，对于农业增产有着积极的作用。江苏省淮阴市新华烟厂，为了传授种

植烤烟技术，一九六〇年春季，先后为专区和市举办了七次短期训练班，共六百五十人次；又编印了“烟叶培植”、“烤房”等资料，发给各公社和生产队参考；七月间又组织职工经过短期培训，下公社帮助解决烤烘技术。这样就帮助社员提高了技术，促进了烟叶生产的发展。

许多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工厂，利用生产中的下脚料、废料、废液，制造出各种农肥、农药和饲料，供应农业需要。一九六〇年九月初，轻工业部召开食品工业会议时，据四川、山东等十八个省（区）的食品行业工厂不完全统计，共生产农肥、农药一千多万吨。另据湖北、辽宁、上海、河南等十八个省、市不完全统计，共生产各种饲料一百多万吨，其中利用酿酒厂的酒精、废渣，糖厂的蔗渣、蔗髓、废丝，罐头厂的水果、蔬菜下脚等作原料，生产发酵饲料、精饲料二十多万吨。会议以后，两个多月中，辽宁省又生产发酵饲料（包括畜用金霉素、土霉素、链孢霉等）三万三千多吨；河南省有六十多个酒厂，生产了发酵饲料一万二千多吨。

发酵饲料用来喂养猪、牛、羊、家禽，增膘快，产奶多，下蛋多，又可以降低发病率。这些对于发展农业和畜牧业，都有很大的帮助。

坚决贯彻以粮为纲、粮食作物与工业原料作物并举和首先支援农业的方针，建立农副产品原料生产基地，是把大抓原料和支援农业密切结合起来的一种良好的形式。几年来，造纸、制糖、卷烟以及其他食品工业，



已經在許多省市建立起了土草漿、甜菜、甘蔗、烤烟基地，和大大小小的乳蛋、酒花、蔬菜、家畜、家禽等基地。这些基地都是在当地党委的統一领导下，工、农、商、交协作，統一规划，合理安排，主要采取厂社挂鈎的形式建立起来的。这些原料生产基地，对于增加輕工业原料的生产，保证工厂的原料供应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年来，在建立輕工业原料基地的过程中，各地利用山地、沙荒地、盐碱地、低洼地种植了果树、木薯、洋姜、芦葦等；同时采取了間作套种的方法，既扩大了經濟作物的种植，又避免了同粮食爭地。河南省民权、兰考、商丘等县，利用低洼地、盐碱地、沙荒地以及地边、地沿，种植了适应性强、需要肥料和劳动力少的洋姜約四千多亩，供应商丘酒精橡胶联合厂作原料，节约了粮食。北京市郊区黄土崗人民公社，在酒花地里間作套种蔬菜，在发展酒花生产的同时，仍然保证了城市蔬菜供应，既不同蔬菜爭地，又增加了公社的收入。福建、浙江等地輕工业部門，結合有关部門建立風景区和城市綠化，进行各种香料作物的种植，充分利用土地，增加了經濟作物的生产。

发展工业品原料，积极开辟新的原料来源，使农副产品原料和工业品原料同时并举，这是解决輕工业原料来源的一个重要問題。輕工业的原料来源主要依靠农副产品原料，但是同时也应当看到，技术的进步和工业的发展，給輕工业带来了扩大使用工业品原料的可能。化学工业的发展，就为輕工业开辟

新的原料来源，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

輕工业采用更多的工业品原料，特别是矿物原料和化工原料，可以代替和节约很多的农副产品原料。例如輕工业产品中的肥皂，是人們日常生活中所必需的，也是工业生产中潤滑、洗滌不可缺少的材料。我国現在生产肥皂的原料，主要是动植物油脂（包括一部分油脚），这样每年就有几亿斤的油类耗用在洗滌、潤滑上面。而在某些工业发达的国家，却是以化工原料、矿物原料采取合成的方法，生产洗滌剂和脂肪酸，代替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皂用动植物油脂，其去污能力比一般的肥皂强，还能洗滌各种高級的毛絲織物。合成脂肪酸的原料石蜡，是石油工业的产品，在目前情况下，它的生产成本要比用植物油脂生产的肥皂高，但是随着石油工业的发展，和輕工业企业技术管理水平的提高，生产成本是可以降低的。从石油当中，除了根据不同的沸点提取汽油、煤油、潤滑油等产品外，在加工过程所生成的气体中，还可以提取多种有机合成产品所需的宝贵原料，这又給輕工业采用矿物原料和化工原料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原来利用农业原料生产的甘油、硬脂酸、酒精、皮革等等輕工业产品，也都可以利用化工原料和矿物原料来代替，大力增加生产。

在輕工业产品中进一步扩大塑料的应用范围，也是值得提倡的一个方向。塑料具有良好的机械强度、高度电絕緣性、耐化学腐蝕性、美丽的外观等优点，通过压制、压鑄、挤出、吹塑等加工过程，可以成型为各种形



状的日用工业品，如人造革、不碎玻璃、文教用品、服飾制品、牙刷、梳子、笔杆、各种箱盒、各种外壳、各种管、带、綫、杆等等。广泛地使用塑料，不仅可以代替相当一部分五金和农副产品原料，而且可以使輕工业品更加丰富多采。

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发展，扩大了輕工业使用原料的范围，有可能使用更多的矿物原料；同时对于来源有限的动植物原料，也提供了新的加工方法，使副产品的利用范围更加扩大，經濟上更加合理。在农副产品加工的过程中，应用水解的方法，就可以将无用的植物廢料轉变为人类需用的产品。把植物原料无用或用处不大的部分，如蒿秆，通过不同的水解方法处理，可以得到酵母、糠醛、甲醇、丙酮、丁醇、醋酸、乳酸、酒精、甘油、粘合剂、活性炭、香兰素等一系列的产品，这些产品又多是化工生产需要的原料。例如糠醛就是塑料、尼龙66等化工产品的原料。因此，輕工业中的农产品加工工厂，在“一业为主，多种經營”的方针指导下，大搞綜合利用，进行化工产品的生产，既可以充分利用农副产品，又可以增加化工原料，扩大輕工业生产的原料来源，有利于輕工业的发展。这是我們應該努力的一个方向。

近几年来，特别是一九六〇年，各地輕工业部門以本业为主，开展多种經營时，兴办了一些本厂生产所需要的化工、金屬和矿产原料的生产。这里包括生产燒碱、純碱、漂粉、盐酸、液氯、硫化碱、硬化油等化工

原料的工厂或車間，小型炼铁、炼鋼、炼鋅、炼焦的工厂，以及石墨、滑石、菱苦土、硼砂、岫岩玉、松石、瓷土等小型采矿事业。这对于扩大輕工业原料材料的来源，起了一定的作用。进一步巩固、充实、提高这些生产单位，就会在今年的生产中發揮出更大的作用。

在大搞綜合利用时，利用大厂的边角廢料是一项具有极大經濟意义的事情。日用小商品生产所需的原料材料，就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大厂的边角廢料。因此，輕工业企业同这些大厂固定协作关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原料供应問題。

为了适应对边角廢料和下脚料利用的需要，不少地区的輕工业部門相应地建立了金屬压延、拔絲、材料改制、廢品加工提炼等生产单位。几年来上海、青島等地先后建成的炼鋼、热轧、冷轧車間，基本上解决了分配鋼材品种規格不完全符合需要所带来的問題；同时充分利用鋼铁厂廢料、边料、次料，生产带鋼、綫材、普通合金鋼，試軋小規格的薄鋼板和馬口铁，为克服金屬原料困难开辟了道路。

回收社会上的廢物、廢品加以利用，是一部分輕工业企业的一个重要的原料来源。这一方面的潜力是很大的。把廢紙、破布等收集起来供作造紙原料，不仅每年可以收购到二、三十万吨，数量很大，而且这些都是已經加工过的东西，蒸煮时还可以节约一部分燒碱。其他如廢玻璃、廢牙膏瓶、廢电池、廢塑料、廢皮骨等等，莫不是輕工业的好原料。这些，都必须同商业部門密切协作，积



极扩大收购。

为了使社会上廢棄的消費物資能够繼續使用，各地輕工业企业結合广泛地开展修補业务，“生产什么，修理什么，回收什么”，既便利了群众，为社会节约了大量的物质財富，又扩大了回收再用的范围，这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輕工业需要的原料来源十分广泛，必須加强同有关部门的协作，特别是加强同商业部門的协作，才能有效地扩大原料的来源。社会分工愈是发达，各个部門之間的經濟联系就愈需要加强。协作就是这种經濟联系的一种形式。加强协作能够大大地节约社会劳动和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商业部門是生产部門和生产部門之間，生产、分配和消費之間的紐带，同时也是城乡物資交流的紐带。发展輕工业不能离开商业。商业部門在組織輕工业原料的供应方面已經起了很大作用，今后还将發揮更大的作用。輕工业部門应当进一步主动地加强同商业部門的协作，这是扩大原料来源的一个重要环节。

* * *

在解决輕工业原料問題时，必須开源和节流并举，使原料得到更加充分和合理的利用。每个单位产品的人力物力消耗越少，就可以在单位劳动時間內生产出更多的輕工业品，滿足市場需要。单位产品內的人力物力消耗越少，单位成本也就越低。輕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項目里，原料材料占了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节约原料材料更有其迫切和

现实的意义。

輕工业部門节约原料材料的潜力很大。同样一种产品，比較先进的企业和比較落后的企业的单位消耗定額，距离仍然不小，例如：每吨新聞紙用漿量，相差百分之十以上；每件火柴耗用氯酸钾量，相差百分之三十五以上；每万个热水瓶耗用純碱量，相差达百分之五十，等等。如果上述行业的工厂的消耗定額，都能降低到或接近于比較先进企业的水平，比較先进的企业又能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我們就可以用同样数量的原料材料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来。

輕工业生产能否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不仅表现在数量上，也表现在质量、品种、規格上。片面地只注意增加数量，不重視产品质量，就会直接損害消費者的切身利益，而且会造成很大的浪費。只注意数量，而没有根据人民生活的需要安排品种、規格的計劃，就会貨不对路，一方面产品积压，另一方面市場脫銷。这些也都必然造成原料的浪費。因此，加强技术管理，依靠和发动群众，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力爭第一流，同时加强社会需要的調查研究，使产品的品种、規格合乎消費者的需要，是使有限的原料在保证市場供应方面發揮更大作用的关键。

增产和节约，数量和质量，优质和低耗都是对立的統一，这种統一是在客观可能的基础上的。在一定条件下，增产会受到原料的限制；数量超出了一定限度，或者不适当地节约原料，质量也会下降。但是这种制約性，在生产实践中是經常变化的，經過人們的



努力,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就可以打破原来那个制约,而使之在新的基础上达到统一。

产品设计的革命,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钟表行业采取“统一机芯”的措施,缩小闹钟的机芯,既改进了结构,提高了质量,又无损于外观,还节约了铜材百分之三十,为增加生产创造了条件。天津市在技术革新中出现了许多“重中出轻(减轻重量),大中出小(缩小体积),繁中出简(简化结构)”的新品种,既节约了原料,又提高了产品质量,也更加适应了社会的需要。这些革新的产品,是在更高技术的基础上,根据社会需要而设计出来的,因而就有条件把增产、节约、质量、品种多方面的要求在新产品中统一起来。一般说来,“好产品”需要“好原料”,但是许多企业采取“粗粮细作”的办法,把“次原料”加工成为“好原料”,在这个新的条件下,也就制出了好产品。

为了更加充分地利用原料资源,应该继续逐步地合理地调整轻工业布局。

我国是天然资源十分丰饶的国家之一,但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轻工业布局很不平衡,多数工厂集中在沿海少数大城市,而原料丰富和销路广阔的内地则生产能力不足,资源不能充分利用。建国十一年来,由于我们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充分利用和合理发展沿海老基地,积极发展内地新基地的方针,原来不合理的布局得到了很大改善。解放初期,只有寥寥几个省份生产食糖,现在多数省(区)都已经建立起新的糖厂。许多产品如热水瓶、搪瓷制品、胶鞋、火柴、肥皂、手

电池、卷烟、酒精、闹钟、自来水笔、日用小五金、小百货等等,在沿海和内地生产同时增长的情况下,内地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而老基地的轻工业,则一般保持着技术领先,新行业新产品不断出现的日益兴旺的局面。虽然如此,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合理布局,还没有完全改变。总的说来,轻工业的生产能力在内地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沿海和内地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平衡的状态。这是需要今后逐步来解决的。

目前轻工业占全部工业的比重,华东、中南区较高,西南、西北区较低;东北区因为重工业比较发达,轻工业也相对地不足。这就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现有生产能力远离原料产地,原料、燃料要远距离地调进,成品要远距离地调出;另一方面,有资源的地区又缺乏工业生产能力,当地的资源要调出(或者调不出),日用工业品要调进;重工业集中的地区,轻工业相对不足,日用品也要大量调进。这就使各个地区资源不能得到更好的利用,同时引起重工业和轻工业,工农业和交通运输,工农业生产 and 地区居民购买力之间一定程度的不平衡。因此,从建成全国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出发,服从全国一盘棋的安排,根据资源(其中包括劳动力)、交通运输、煤电供应、基本建设的规模等条件,把需要和可能密切结合起来,制定规划,逐步调整轻工业布局,是充分而合理地利用各地的自然资源的一项根本性措施。

当然,轻工业的合理布局不能只考虑到原料资源条件,还必须注意到新老基地原有



基础，原有調撥和协作关系，以及产品技术的繁簡，集中生产和分散生产的利弊等等。由于輕工业生产具有資源分散，产品銷售面广，而农副产品生产又有季节性，原料材料和成品运输量大等特点，必須就地取材，就地生产，就地銷售，才能够使农副产品資源得到合理利用，才能够節約季节性生产中所需要的巨大运输劳动力，从而節約农业劳动力。所以，就原料产地建厂，仍然是合理布局的决定性因素。老基地具备技术条件好、协作关系多、交通方便、資金筹集比較容易等特点，我們一定要好好利用老基地的这些特点，发展輕工业生产；同时从老基地迁出一部分过剩的能力，支援新基地的建設。

当前，为了克服农业原料不足而形成的市場供应的暂时困难，最重要的，是要把輕工业的生产及其原料的供应、产品的銷售实行統一领导，分級管理，納入国家計劃之内。这就要根据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保证市場供应的需求的原则，經常进行排队。应当分別輕重緩急，根据原料供应的可能，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把原料用在刀刃上，使那些技术条件好、劳动生产率高、对原料材料能够充分合理節約使用的企业，首先得到充足的原料供应。应当把紧急安排和經常安排，重点安排和全面安排結合起来，保证輕工业生产的不断增长。

* * *

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要大兴調查研究之風，一切从实际出发。輕

工业部門为了增加生产，为了解决原料材料問題，为了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必須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經常了解生产中的問題，了解原料材料資源情况，了解市場需要的动向，制定出发展輕工业生产的各项具体措施，并在实际工作中努力地加以貫徹。

在中央和各級党委的领导下，繼續大搞群众运动，这是克服困难，調动企业内部的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挥企业职工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的主要途徑。毛澤东同志满怀热情地教导我們：“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綫，不是迴避問題，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問題，任何人間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①只要我們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綫、方針、政策，实事求是地去解决問題，我們就能克服任何困难，胜利前进。

当前政治形势和經濟形势很好。过去几年中，輕工业部門的广大职工在中央和各級党委的领导下，在原料生产和供应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經驗，只要我們充分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克服不利的因素，坚持鼓足干劲、力爭上游的革命气概，发揚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傳統，不失时机地采取有效措施，一定能够实现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所交付給我們的任务。

^① 《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的按語。《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6頁。



文化遗产的学习和批判问题

· 吳 江 ·

在我们的文化界和学术界中，几年来，在研究各种现实问题的同时，对于文化遗产的研究，也做了不少的工作。在哲学、历史、经济、医学、文艺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有关如何批判和继承文化遗产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工作，对于开展百家争鸣，活跃学术空气，发展文化事业，是很有益的。

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千百万人民极端活跃的生动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反映，它是最具有创造性、最先进的文化。但同时，社会主义文化又必须充分地利用以往一切时代的文化中积极的成果；在批判总结前人各种遗产的基础上，在吸收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文化才能具有超过以往一切时代的文化的丰富的内容和最高的水平。任何新的学说，都根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是新时代斗争所提供的新材料、新经验的概括，因此，不同时代的学说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但任何新的学说又都必须从过去时代中积累下来的思想资料出发。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

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①

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曾不止一次地提出必须重新系统地研究中国全部的历史遗产。毛泽东同志还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曾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②贯彻毛泽东同志在二十多年前的这个指示，仍是今天我们文化学术界的重要任务。

在遗产问题上，有些人以为，要继承就不能谈批判，照他们看来，批判和继承是不能相容的，他们主张无批判地继承，无区别

^① 《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3页。

^②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522页。



地利用。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继承只能是批判地继承，利用只能是有区别地利用，决不能无批判地无区别地兼收并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革命的批判的学说，它反对一切迷信，主张打破一切旧传统的束缚，但恰恰是这个学说，才是最科学地继承了人类全部优秀文化遗产。对于马克思，列宁曾经这样说：“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一一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① 举例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思想做了认真的批判，所以他们才能在思想界中存在着把唯物主义庸俗化的倾向的时候，特别强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力求“不使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个唯心主义体系的宝贵成果被遗忘”，而毕希纳之流和杜林之流“这一群雄鸡就是不能够从绝对唯心主义粪堆中啄出这颗珍珠。”^② 批判，如果加以正确的了解而不是片面的了解，就是进行科学的分析。批判本身就是一项严肃的科学工作，批判态度就是科学的态度。世界上没有一种东西是不可以分析的，或不需要分析的。任何一个真正具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各种问题，不论它们属于何种学术领域，没有不采取批判、分析态度的，只是不同性质的

问题，需要采取不同的批判罢了。对于现实问题是这样，对于历史上的问题也是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不承认在古代的思想和文化中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触动的，有什么高峰是不可以超越的。对于前人的成果采取批判态度，就是根据这些成果出现的历史条件，它们包含的具体历史内容，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体分析，取得以科学批判为根据的判断，区别其中的精华和糟粕，借以对当前文化活动、当前的社会实践和科学上新的探索提供有益的帮助。这也就是革命地、历史地解决古和今的关系问题。我们的目的是，经过批判，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利用旧材料旧知识而达到科学上的独创。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文化遗产主张批判地继承，而不是无批判地继承；主张区别地加以利用，而不是无区别地加以利用。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文化遗产问题的根本态度。

如果认为我们说要批判文化遗产，就是不要学习，这只是一种误解，正好像认为说要学习就是不要批判是一种误解一样。学习和批判，是对立的统一。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遗产的批判，不是抹杀一切，不是虚无主义

① 《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3—254页。

②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5页。



的，不是把历史看作錯誤的堆积。任何称得上是科学的批判，一切有观点、有材料、有論据、有分析的批判，都必须是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尽可能确实詳尽地弄清楚被批判对象的内容及其产生的历史条件，掌握各种有关的知識和資料；否則，就不可能作出真正深刻的、有科学根据的判断，也就不可能真正达到批判的目的。現在在有些問題上，对文化遗产的批判、討論，大家觉得收获不够大，也是和这种学习不够有关的。另一方面，我們的学习，也不是盲目膜拜，現成拿来，这样做，也达不到学习的目的，甚至往往会起相反的作用。正确的态度是，在学习时不要忘记批判，在批判时要注意学习。近年来的經驗也証明：必須很好地学习，才能很好地批判；也只有通过批判，才能更好地学习，得到更快的提高。因此，我們的任务是要使学习和批判正确結合，而不是使两者相分裂。学习、批判，再学习、再批判，如此循环往复，才能达到正确地继承遺產的目的。

使批判脱离学习，或者使学习脱离批判，無論对于学术研究，对于教学工作，都是不利的。如何正确对待文化遗产的問題，是学校教学中的一个重大問題。我們的学校，应当使学生们获得应有的历史知識和文化修养，必須重視有关这方面的基础課程，学生也应当閱讀必要的科学文献和中外古典作品。这样的学习是不可少的。但也正因为这

样，我們就更應該以科学的分析批判的态度对待文化遗产，来充实教学內容，提高教学质量，使学生在继承文化遗产的精华、丰富知識的过程中，提高分析批判的能力。我們不能认为，教育者和学习者可以沒有批判的头脑，不做科学分析的工作，而能够从文化遗产、古典作品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同时，在社会上，随着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接触文化遗产的人越来越多了，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这也赋予学术界一种責任，就是要以自己的科学批判成果，給一般学习者以正确的指导。

文化遗产包含十分复杂的内容。有各种各样的遺產，有属于社会科学方面的，有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虽然我們总的都須以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来进行批判和研究，但是对于自然科学方面的东西的批判，决不能等同于对社会科学方面的东西的批判，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有关社会問題的各种学說和思想，反映人們自己的社会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常常是敌对关系），它們具有阶级性，各时代的原則极不一致甚至根本相反。与此不同，自然科学主要是同社会生产力的状况相联系的，其所发现的定理和积累的知識不具阶级性。有許多科学定理，在今天來說已成为人們的常識，它們是我們活动中所不能違反的。有些科学定理要被新的发现所代替和补充，但这必須依靠大量的



科学实践和科学实验。而且，在自然科学中，同一学科中的不同学说，往往是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去研究同一对象，它们之间虽然有是非之争，但是一般说来，并不是像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那样地反映着相敌对的阶级利益。当然，在深刻批判一种学说的缺点和片面性时也会涉及科学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无论如何不能将对社会科学中错误学说的批判一般地移用于自然科学领域。在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方面，也有各种性质的遗产，情形也各不相同。我们对于不同性质和不同情形的遗产，要进行不同性质和不同情形的批判，不能千篇一律地对待。

对于不论是有阶级性的或没有阶级性的文化遗产，都要区别其中的精华和糟粕，以便恰如其分地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但在许多场合下，精华和糟粕往往混淆在一起，不是泾渭分明，使人一看就能辨别的。在这种情况下，就绝对需要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有的还需要从不同方面反复地进行分析。封建时代的文化，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除封建主义的东西以外，也还有带人民性、民主性的反封建的东西，要把这两者区别开来。对于封建主义的东西也要加以区别，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一些东西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对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也应当作这种区别。

我们对于遗产中的精华，如对旧唯物论，朴素辩证法，中外优秀古典作品，各种带人民性、民主性的思想，也要历史地对待它们，而不是无批判地全部利用，因为它们总是具有某种时代局限性。过去时代的民间文学作品，也往往多少会带有若干剥削统治阶级的影响。对于这些，我们也要经过具体分析，区别它们中间正确的成分和不正确的成分，科学地恰当地给它们以历史上一定的地位，对它们的价值，既不缩小，也不夸大。对于糟粕，也不是简单唾弃了事，因为一方面，“宣布这个哲学是错误的，还不等于制服了这一哲学”，只有经过必要的科学的批判分析，才能真正克服它，并达到消毒的目的；另一方面，对于历史上错误的东西，进行必要的分析，就能够使我们取得思想上某种经验，并吸取其中某些有用的思想资料。这也可以说是使坏事转化为好事的一例。

遗产领域中，我们常常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精华和糟粕的矛盾，民主性和封建性的矛盾，科学性与非科学性的矛盾，文学艺术作品中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矛盾，等等。有矛盾，才需要进行具体的全面的分析。例如，衡量文学艺术作品，我们主张政治标准第一，但这不等于说只要政治、思想分析，而不必要艺术分析。我们对待文学遗产，既要在思想上给以正确的分析，又要在艺术上给以正确的分析。通过这种分析，继承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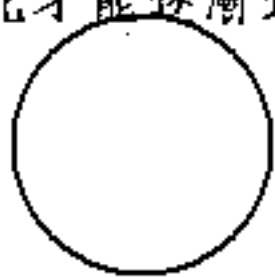


艺术遗产中一切优秀的有用的东西，其中包括艺术形式在内。毛泽东同志说：“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東西了。”^①毫无疑问，世界上一切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都应当加以吸收和利用。但是在艺术形式上，在创作方法上，不论绘画、音乐、文学等，我们应当更多地注意学习我们民族的优秀东西，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内容，通过优美的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这样做，人民群众是欢迎的，同时也将为世界文学艺术加进许多新的有价值的东西去。

从以上这些可以看出：对待文化遗产必须采取十分细致和谨慎的态度。如果不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简单从事，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纵使一时像解决了问题，也是形式上的。在这里，必须排除两种简单化的倾向，也就是两种从不同方面来的片面性：一种是无批判地简单地继承，主张分毫不加触动，全盘接受，这是右的片面性；另一种就是把批判当作简单地抹杀一切，否认或者不注意对文化遗产的必要的学习和继承，这是“左”的片面性。毛泽东同志曾这样批评过五四时代的许多启蒙人物：“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

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②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是我们所要拒绝的。我们需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精神，是对古代的思想和文化进行科学分析的能力。

中国有数千年悠久的历史，这是一件大好事，但要把这样庞大的文化遗产研究清楚，却是一个繁重的任务。要确实弄清楚古人思想所产生的各方面历史条件，弄清楚这些思想的本来的历史面目，往往是不容易的，许多问题不是短期内可以得出定论的。恩格斯说：“全部历史都应该开始重新研究。首先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生存条件，然后才可试图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③我们面前就摆着这样一个任务，需要进行长期的认真的探索。各个遗产领域，无论经济的，政治的，哲学的，艺术的，古文物的，等等，都需要互相援助，互相提供资料和研究成果，通力合作，如此才能逐渐地更多地取得可靠的成果。



-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57页。
- ② 《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33页。
- ③ 《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5年中文版，第487页。



“文化任务不能像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解决得那样迅速”（列宁）。在对文化遗产的研究中，各种观点，各种意见，可以进行自由的、充分的、切实的讨论，而且容许长期讨论，而不需要（也不应该）在问题的探索还不成熟的时候急忙地做出结论。同时，也只有切实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经过充分的讨论，才能不断地提高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分析能力，有说服力地纠正一切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立的错误观点，才能有助于实行学习、批判，再学习、再批判。对遗产经过反复咀嚼，就能恰如其分地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

在我们的文化学术领域中，需要有各种专门的工作，需要有大批的专门家；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也要从事各种专门的研究，要造就出一批专门家，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总方向指导下，进行各方面的有系统的、有目的的研究。有的可以侧重于理论性的探讨；有的可以侧重于资料的搜集，文献的整理，古书的校勘和注释，古书今译，工具书的编纂，考古工作和必要的考证，等等。凡是能够说明一点历史现象，帮助我们获得一些知识，能够为现时代一切创造性活动提供某种直接或间接的援助，就都是科学的劳动的一部分，就是必要的，应当受到注意，并在我们的文化科学事业中得到适当的安排。当然，在这个领域中从事工作的人

们，为了使自己的工作适合于整个文化事业向前发展的利益，尽可能地做出一些切实有益的成绩，就应当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并不断地克服在对待历史文化遗产方面的资产阶级学风和习惯，以力求成为好的遗产研究者或遗产整理者。

毛泽东同志号召中国共产党员研究历史，学习遗产，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地向前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事业，按照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中国的特点，运用和不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像毛泽东同志曾经批评过的，只知道抄袭外国，而不懂得中国，或者只懂得中国的今天，不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那样一种作风，显然是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是充分利用中外一切优秀遗产并达到真正的独创性的卓越榜样。这个榜样无疑地将继续激励着我们的学术界、文化界更好地前进。



做支援农业的尖兵

張維城

近三年来，南京农学院在贯彻执行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方针中，组织大批师生下放农村，传授科学技术和推广先进经验，在支援农业生产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我院师生下放农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短期的，时间一至两个月，主要是结合本省农业生产的中心任务，做一些科学技术的传授和推广工作；另一种是比较长期的，一般是半年左右，其特点是把支援农业和教学工作密切结合起来，有计划有步骤地把一定年级的学生，下放到农村，一面进行教学，一面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并做些有关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传播工作。对于后一种下放，我们采取了“组织配套，专业成龙”的做法，将下放师生组成若干个下放大队，每一个大队固定到一个公社，大队以下按专业、班级分中队、小队，小队保持原来学生的一个班，并配备几个教师。他们下到农村后，就和公社党委商定活动规划，配合公社各级组织展开工作。各下放大队都有全院各个专业的师生（包括农学、果树蔬菜、植物保护、土壤、畜牧、兽医、农业机械、农业经济等专业）。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可以协助公社解决各项

生产建设和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等各方面的问题。由于下放大队中，小队是按原来的专业和班级组成的，每个专业的师生比较集中，又有较稳固的劳动基地，这也便于进行教学工作和深入研究生产中的问题，推动生产。我院下放师生，一般都深入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同时还帮助公社各级组织做些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根据我们体会，对于下放农村的高等农业院校的师生来说，最有成效的支援农业生产的工作，是把科学技术送到农业生产第一线，以促进生产的发展。

在支援农业的工作中，我们密切结合当前农业生产实际，进行了科学研究。江苏省大部地区都种植水稻和小麦，稻麦增产是江苏省大办粮食的关键问题，我院各个有关专业就稻麦增产的一些重要方面进行了研究工作，并初步获得了一些成就。如农学系师生培育的三个小麦品种，具有迟播早熟、籽粒饱满、产量高、不易落粒等特点，已经在全省十多个地区进行试验，反映都很好。又如，我们根据陈永康“三黄三黑”水稻高产的经验，在江浦县兰花公社进行试验，适当掌握时机，比一般大田多施一次肥，多灌二、



三次水，結果就使產量增加一倍左右。植物保護專業研究的防治水稻白葉枯病的方法，在江陰縣八十多萬畝水稻田里應用之後，使這種病的發病率降低到千分之八。這種方法，去年在蘇南地區已被廣泛推行。又如下放在溧水縣漁歌公社的植物保護專業師生，為公社創立的病蟲預測預報站，僅一次由於預測出水稻三化螟即將發生的情況，公社及時組織防治，就使二萬多畝水稻大大減輕了受害程度。

隨着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和城鄉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蔬菜和豬肉等副食品的需要量急劇增加。怎樣增產蔬菜，怎樣使豬肥壯，這都是我們正在研究的重要課題。果樹蔬菜專業的師生，在一些地區和當地農民結合，進行了蔬菜常年均衡供應的研究，初步地解決了早春和伏天缺菜的問題。畜牧獸醫系師生下放到農村以後，充分利用和總結農民養豬經驗，並以先進的科學方法，具體幫助公社豬場改進飼養管理和繁殖工作，控制住了豬疫病的流行，並把所得到的先進經驗和科學成果，及時進行推廣，這對公社的養豬事業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在工業原料作物中，我院師生主要對棉花、大豆的增產，進行了一些科學研究。植物保護專業的學生，幫助一個生產大隊管理一畝一百一十畝的棉田，做到基本消滅病蟲害。這個經驗，在全公社推廣後，使公社六千畝棉田的病蟲防治工作收到很好的成效。我院下放淮陰的師生，和農民密切合作，進行了糧棉間作的試驗。在棉田里間作馬鈴

薯，每畝實收馬鈴薯一千四百斤，棉花也長得比一般棉田好，這為棉區解決糧食作物的種植找到了一條途徑。在大豆方面，我們培育了三個大豆新品種，都有早熟豐產的優點，其中有一種還適宜於機械收割。

農業機械化是我國農業技術改造的主要內容，也是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產品商品率、減輕繁重體力勞動的主要途徑。我院農業機械化專業師生積極投入了以水稻和蔬菜的機械化、半機械化為主的試驗研究工作。對於農業機械的研究，從簡單到複雜，從畜力牽引到機器發動，從單項作業到聯合作業，我們都力求做到適合實際需要，保證操作質量，並注意製造簡單，節省材料，一般要求能在農村人民公社的農具廠製造、修理。我們經過多次的試驗，並多次徵求農民的意見，結果製成了插秧質量可靠、機身輕、成本低、材料省、製造簡便的南農二號B型插秧機，並在南京地區推廣。與此同時，我們又和南京市郊區以蔬菜生產為主的人民公社合作，研究蔬菜生產的機械化和半機械化，現在已經初步製成了畜力農具的“萬能”底架。只要在那種底架上換上相應的機具，就能進行播種、移栽、中耕、施肥、噴藥或運輸等作業。在學校試驗站試用的蔬菜播種機，既可以條播，又可以點播，比手工播種提高工效幾倍。

隨着人民公社的建立和發展，農業生產迫切需要新的科學技術知識和技術幹部。幾年來，我院在完成經常的教學任務的基礎上，還舉辦一些訓練班，為人民公社培養了一批農業技術人才。訓練班有幹部班、短期訓練



班和函授学习班等形式。干部班分县級干部班和公社干部班两种，目的主要是使这些干部通过较长时期的脫产学习，提高领导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經營管理的水平。短期训练班在校內和农村都办。参加的人員較广泛，县和公社里的干部，也有一般农民，学习内容以单项技术为主。此外还有近两千人在我院各系开设的函授班学习，他們大多是在生产单位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員。函授教育的目的，主要是想通过业余学习，不断提高現有技术人員的科学理論和技术水平。

各种训练班的性质和要求虽有所不同，但我們在向干部和农民傳授技术知識时，总是根据他們的实际情况，紧密配合当时当地的农业生产的需要，来确定教学的内容和进行教学活动。短期训练班，主要是及时傳授解决生产中的关键性問題的知識和新技术的使用方法。正规的干部班和函授班的教学工作，也是密切結合当地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和当地人民公社的具体經營管理問題，适当地把专业課和基础課結合起来，把针对当地具体問題的技术学习和必要的理論学习結合起来。在教学方法上，我們根据这些學員一般具有一定的政治水平、一定的生产知識和較强的理解能力等特点，采用教学和生产实践結合，理論联系实际的方法，边学边用。这样就使學員能更好地掌握所学的内容，并把所学的知識立即运用到生产实际中去。

这种傳授科学知識、培养技术干部的工作，不仅为我省农业进一步发展准备了一定

的技术力量，同时对当前的生产也起着积极的作用。去年我院受农业部委托举办的农机管理干部训练班，学员通过一年学习之后，一般都能掌握农业机器的构造原理，并学会和提高了对农場和拖拉机站的經營管理水平。通过短期训练班，不少县和公社的技术干部初步掌握了有关細菌肥料、病虫害防治、插秧机制造和使用、猪的人工授精、藻类生产与利用、菌絲飼料培制等新的科学技术。参加函授班的学员，由于他們能够把学到的理論运用到工作中去，不少人在生产上取得了新的成績。

以科学技术支援农业生产、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过程，也是不断地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师生科学技术水平的过程。

高等农业院校最基本、最主要的任务，是搞好教学，为国家培养优秀的农业专门人才。几年来，我院师生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都是結合教学来进行的。我院把一部分师生有计划有步骤地下放到农村，将农业科学技术的知識，应用于生产，使科学研究紧密地圍繞着解决当前农业生产中的关键性問題，这就使理論和实际进一步結合起来，从而丰富了教学内容，有利于教学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是个大課堂，农田是很好的实验室，农民是有真才实学的教师，只要我們真正放下架子，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拜农民做老师，我們就能得到丰富的活的知識、活的經驗，我們的教学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也就会取得更为重大的成績。我院师生在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的过程中，学到了許多在书本上学



不到的丰富的实际的生产知識，同时也使許多书本知識得到了验证。如农学专业的学生，在劳动和科学研究中学到了很多作物栽培的实际知識和操作技术；植物保护专业的学生通过創造无病虫害区和病虫害預測預报工作，認識了数十种病虫害，学会了某些主要病虫害的防治方法。畜牧兽医系的学生在农村，学会了一套猪的飼养管理、繁殖配种的技术，还总结出一套养鵝經驗和掌握了人工孵化的方法。这些事例生动地表明，結合教学，开展各种支援农业的活动，把理論和实际、书本知識和生产实践密切結合起来，就使得学生的学习更扎实、更全面。

我們在結合农业生产的需要所作的科学研究中，有些問題在实验室内往往无法解决，只有深入生产实际，和富有生产經驗的农民結合，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办法。如我院蔬菜教研組教师过去主要在温室内进行蔬菜新品种的培养工作，研究蔬菜增产的問題。但是由于他們脱离生产实际，缺乏实际生产經驗，所以几年来一直没有取得积极的效果。这两年来，在支援农业的活动中，他們和南京郊区紫金山人民公社苜蓿园大队的农民密切合作，深入菜田，开展了“食堂蔬菜常年均衡供应”、“地方菜种对比試驗”和“蔬菜丰产栽培”的研究工作。由于他們把科学理論和农民丰富的实际生产經驗結合起来，所以研究工作很快就取得了成績。为了克服早春和伏天缺菜的現象，他們还选育出了耐热和抗寒的品种，在冬天运用“向阳斜畦”、“深沟淺栽”提高地温的方法，增产春菜；在夏天用

“遮蔭栽培”、降低地温的原理，增产夏秋蔬菜。此外，还加强栽培技术措施，使茄、瓜、豆类等蔬菜排开播种，分期采收，并种植一部分易于貯藏的蔬菜和延长某些蔬菜的收获期，使供应期和消費期接近，做到“淡季不淡、旺季丰富”。这个教研組还和当地农民在一起，根据“以高产蔬菜为主、花色品种搭配”的原则，帮助生产队改变蔬菜种植品种比較单一的情况，使全年蔬菜栽培的品种大大增加。这样不仅便于安排茬口，提高复种指数，而且还可以滿足食用者多方面的需要。通过这些工作，使我們对南京地区蔬菜均衡上市的一些关键性問題，开始摸索到了某些解决的办法。由此可见，把科学研究工作和农民群众密切結合起来，总结和提高他們在生产实践中所創造的宝贵經驗，就能促进科学研究工作的迅速发展，推动教学工作的改进。

我院广大师生不仅从劳动群众和生产实践中，学到了許多宝贵的生产知識，同时还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得到了全面的鍛炼，进一步增强了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在知識分子劳动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对于整个学校工作来说，由于經常有师生住在农村，和农民及农业生产保持密切联系，这就使学校有条件能够对农村的生产和公社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进行比較系統細致的調查研究工作，从而能够更深刻地明了农村中的各种具体情况，更有决心有目的地进行教学改革，使学校教育工作更好地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

（編者按：本文作者是南京农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农民问题

肖 述

在我国六亿多人口中，有五亿多是农民。他们不论在民主革命中，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一支最伟大的力量。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把解决农民问题，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问题，看作是国民民主革命中的极端重要的问题，也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极端重要的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已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把小农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无产阶级在取得国家政权以后，能否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把社会主义革命深入进行下去，一直达到社会主义的建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对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小生产正确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即使在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无产阶级并存着的，也还有一些这样的小生产者群众；当然，在经济愈是落后的国家中，这样的小生产者群众愈是大量地存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农民。

列宁大大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民问题的学说。列宁指出，工人阶级能够而且必须把劳动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使他们成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为争取社会主义胜利而斗争的可靠的同盟军。列宁粉碎了

那种认为农民只能是资本主义的后备军的机会主义谬论，按照这种说法，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就应当对于农民群众采取敌对态度，其结果就必然是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同时，列宁又驳斥了那种认为农民可以自发地走向社会主义的另一种机会主义谬论，按照这种说法，就不需要无产阶级进行艰巨的工作来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就是要无产阶级放弃对农民的领导，其结果也只能是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和这些在根本上脱离实际的机会主义谬论相反，列宁科学地分析了农民的阶级特性，并且制定了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对于农民和农民中的各个阶层的正确政策。列宁的学说使我们懂得，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加强工农联盟的过程，就是无产阶级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来教育农民群众和改造农民的个体经济的过程，也就是在农村中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两条道路斗争的过程，是农民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彻底摆脱资本主义道路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唯一正确的方针，就是引导千百万农民群众，经过合作化的道路，由个体私有制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



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原理，是适用于一切走上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普遍真理。这个普遍真理又一次在中国大地上显出了它的威力。

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按照我国的具体条件，創造性地运用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原理，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土地改革完成以后，领导农民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农村到一九五六年，已經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广大农民从个体經濟轉上了社会主义集体經濟的軌道。农业合作化完成以后不久，党又领导农民实现了农村的人民公社化，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現在，我国农村正在高举人民公社的旗帜，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

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由于某些条件而具有特殊的复杂性。第一，我国拥有极其广大的小农經濟和农业人口。依靠人力畜力的、分散的、落后的小农經濟，在农业中占绝对优势，和小农經濟联結在一起的农村人口占全国六亿多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第二，这种落后的农业經濟在整个国民經济中又占着最大的比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九四九年这一年，現代工业的产值約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七左右，而农业及其副业、个体手工业和工場手工业的产值約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十三左右。到

了一九五二年，前者的比重为百分之二十六点七，后者的比重为百分之七十三点三。第三，在我国农村中，土地私有制的傳統很深，农民的土地私有观念很强烈，而且在旧社会的农村中缺乏合作社的傳統。第四，在已經建立了强大的国营經濟的时候，我国还存在着大量的私营工商业。对私营的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进行的。以一九五二年的情形說，那时资本主义工业（包括已实行加工訂貨，即初步地改造为国家資本主义的部分）在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中占百分之三十九，而私营商业在商业企业商品零售总額中占百分之五十七。

国内和国际資产階級中曾經有人根据这些具体条件而断定中国共产党要在中国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是永远办不到的。在我們党内也曾經有人认为，必須在土地改革以后經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談得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他們是安于小农經濟的現狀。他們认为，如果要求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就会引起农民的反感，从而妨害工农联盟。在他們看来，应当有一个时期让农民“安安稳稳”地在他們分得的土地上过一陣“好日子”，不要去“打扰”他們；应当等工业发展起来，到能够实行农业机械化的时候再來說服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应当先去解决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問題，然后再解决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問題。

党中央摒棄了这种錯誤的观点，紧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土地改革以后“趁热打铁”，不停頓地用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



促进农业合作化运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全国土地改革接近完成的时候，党中央已经作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当时先以草案形式发给各级党委试行，到一九五三年三月，以正式决议的形式公开发表）。一九五二年底，当恢复国民经济和肃清封建残余的任务基本上完成的时候，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了在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党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合作社就在这期间从互助组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了。已组成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从一九五一年的一百三十个发展到一九五三年的一万五千多个、一九五四年的十一万多个，参加合作社的户数从一九五一年的一千六百多户发展到一九五三年的二十七万多户、一九五四年的二百三十万户。随后，在一九五五年，合作化运动继续向前发展。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全国农村中涌起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高潮，大量的农户参加了初级社，并发展了不少高级社。一九五六年，初级社进一步发展，大多数初级社又转为高级社，到年底，参加高级社的农户有一亿零七百多万户，参加初级社的农户有一千多万户，两者合计共占全国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六点三。这样，就在全国农村实现了农业的社会主义合作化，距离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只有五年。

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在土地改革以后不停顿地进行合作化运动，为什么那种认为应当停

顿一个时期的看法是错误的呢？

土地改革虽然使农民从封建所有制下解放出来，使农民得到了土地，但是并不能阻止农村中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向。如果农村中在分了土地以后，长期保持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个体经济，那就正好是为资本主义的滋长造成了有利条件。列宁早已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① 我国的实际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土地改革后的几年间，农村中就出现了新的阶级分化。虽然合作化运动立刻逐渐发展起来，但是凡是在合作化运动没有达到的地方，阶级分化就在继续发展。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五年指出：“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②

由此可见，个体农民不可能安安稳稳地在他们分得的土地上过“好日子”。社会主义不去“打扰”他们，资本主义就必然要去打扰他们。个体经济是不稳定的。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平分土地，不过是农民解放的第一步；农民为了彻底解放自己，就必须从私有

①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页。

②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1页。



制的个体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在有了无产阶级政权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帮助农民群众认清了出路，就有可能在农村两极分化还不很严重的时候，把农民引上合作化道路。这样做，完全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也便于合作化的迅速发展和顺利实现。正如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所说：“我们能使之不真正转变为无产者而把他们仍然作为农民吸收到我们这方面来的农民人数愈多，社会变革底进行也就愈加迅速和愈加容易。”如果我们土地改革以后把革命停顿下来，听任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发展，听任农民向两极分化，那末在以后要实行合作化，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就会困难得多。

以为在还没有较高的工业化水平，没有农业机械化的时候，就不能实行农业合作化的看法也是错误的。

这种观点的根本错误，在于以为工业化可以离开农业合作化孤立地进行。我国工业的基础原来是很薄弱的，因此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只有迅速地发展社会主义工业，才能造成农业机械化的物质基础。但是，工业的迅速发展是离不开农业的迅速发展的。私有的、落后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限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满足工业对原料、粮食等农产品的不断增长的需要，不能为工业提供广阔的市场，这是对工业的发展不利的。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在还没有条件用机械化装备农业的时候，先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使农业由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

为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充分发挥农民集体的协作的力量，就能使农业生产力得到发展，从而促进工业的发展。同时，也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农业机械化。因此，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我国的条件，首先是实现农业合作化，然后才是实现农业机械化。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工业化而忽视农业合作化，决不可以为了等待机械化而延缓农业合作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不能长期地建立在社会主义大工业和小农经济两种基础之上。这就是因为，小农经济限制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小商品生产的分散性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不相适应，而且从小农经济中会生长出同社会主义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经济来。我国小农经济比重很大、农民众多的情况固然表明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艰巨性，但同时也表明了这种改造的迫切重要性。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四九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强调地指出：“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来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①

事实证明，迅速地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34页。



造,不仅不会破坏工农联盟,而正是在新的条件下加强了工农联盟。以为这样做就会破坏工农联盟的人,是不懂得在两个不同时期有两个不同性质的工农联盟。前一时期的工农联盟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基础上,建立在反封建的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的。到了土地改革已经结束以后,如果不去解决农民中实际存在着的新的问题,让农民中的两极分化一天天发展,让社会主义大工业和小农经济的矛盾一天天发展,那么工农联盟就有遭到破坏的危险。所以在新的条件下必须把工农联盟建立在新的基础上面。这个新的基础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①

至于那种认为先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然后再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观点,当然也是不对的。在我国条件下,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可以而且应当用和平的方法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方面的改造的逐步进行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造成了有利条件;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更能起很大的推动作用。在一个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国家,对农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中消灭了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资本主义工商业就处于孤立的地位。在一九五六年,随着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进入了高潮,正是证明了这一点。

所有这些都表明,在土地改革以后,党采取积极的步骤,不停顿地、迅速地促进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完全必要的。

必须看到,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具备着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国的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在无产阶级领导的长期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就已经进行,它是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全部彻底完成的。经过革命战争、土地改革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在广大农民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在民主革命中已经建立了巩固的工农联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们党已经有了在土地改革之后,领导根据地的农民实行互助合作的丰富经验。

我国无产阶级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由于立刻没收官僚资本而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这样,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就能够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运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力量来帮助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

农民虽然是私有者,但又是劳动者。从他们是劳动者这一方面来说,是能够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同工人阶级在一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走上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道路的。大多数贫苦农民,更是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我国的农民群众由

^①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2页。



于长期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具有较高的觉悟，他们根据切身的经验，完全相信共产党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

当然，从农民是私有者这一方面来说，要领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又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在旧社会，农民长年累月在小块土地上劳动生产，虽然饱受封建剥削压迫而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但他们的小生产习惯，他们对于土地和生产资料的私有观念是很牢固的，特别是富裕农民的私有观念更加浓厚。土地改革推翻封建土地制度，把土地分给农民，是符合农民的这种小生产习惯和私有观念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改变农民的私有制，这是同由于农民所处的经济地位而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小生产习惯和私有观念相抵触的。工人阶级为了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充分估计到农民的这种两重性，发挥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克服他们中间的落后倾向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

因此，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是十分必要的和完全可能的，是一个迫切的任务，但是决不能认为，可以依靠简单的行政命令来实现这个任务。

列宁说过：“我国有千百万个体农户，分散在偏僻的农村。要想一下子下个命令从外面、从旁边去强迫它改造，是完全荒谬的。”^①

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基本结束的时候强调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要实现农业社会化，只能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而决不能用强迫命令的方法。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

指出：“发展农业合作化，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根据农民自愿这一个根本的原则。在小农经济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是绝对不可以用简单的一声号召的办法来实现的。更绝对不能够用强迫命令的手段去把贫农和中农合并到合作社里，也绝对不能够用剥夺的手段去把农民的生产资料公有化。如果用强迫命令和剥夺农民的手段，那只能是破坏工农联盟和破坏贫农中农联盟的犯罪行为，因而也即是破坏农业合作化的犯罪行为，而绝对不能给农业合作化带来任何一点好处。”

绝对不能用剥夺农民财产的办法来迫使农民接受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农民问题上的一个根本原则。无产阶级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必须用强力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在我国，是剥夺了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而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则用赎买的方法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但是对于作为劳动者的农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用剥夺的手段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

正是从这点出发，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把个体的农民经济改造为集体所有制的经济，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因为这是唯一能够为农民所接受的形式。恩格斯早就指出：“当我们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能设想我们会像我们不得不对大土地所有者采取的办法那样，去用强力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

^① 《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9页。



我們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要把他們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协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使用强力手段，而是依靠示范和为这个目的提供社会帮助的办法。”（《法德农民問題》）

因此，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經濟必然具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全民所有制，一种是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是剝夺剝削者的生产資料以后开始建立起来的。集体所有制是个体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在党和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领导和帮助下自觉自願地建立起来的。这种集体所有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內，是适合于生产力状况，能够促进生产发展的，并且是符合于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的。

在土地改革以后，为了迅速地促进农业从个体經濟到集体經濟的轉变，我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在坚持自願的原则下，实行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采取了适当的政策、步骤和办法，并且深入地 and 細心地 在农民群众中做了工作。

二

农业合作化是一次深刻的革命运动。党在领导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正确地解决依靠誰、团结誰、打击誰的問題，对于动员广大农民群众和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胜利地完成农业合作化具有决定的意义。毛澤东同志在解决这一問題的时候，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从实际出发，对我国土改后的农村各阶级、各阶层进行了科学的分析。

在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初期，曾經有

一些同志以为，不能提出建立貧农优势的問題。他們认为，建立貧农优势，在土地改革时期是必要的，因为那时貧农是农村中的大多数，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十、六十到七十，而中农在农村中只占少数；但是現在的情况变了，过去的貧农大部分已經上升为中农，所以在合作化运动中，再要建立貧农的优势就是不对的了。这些同志忽視了貧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并且沒有对中农进行具体分析，以为合作化运动要依靠中农。这种观点是完全錯誤的。

农民群众中包含貧农、下中农、上中农（即富裕中农）这三个部分，他們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是不完全相同的。根据毛澤东同志的指示，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須注意在中农中間有下中农和上中农的不同，而且还要区别新中农（即在土改以后由貧农上升到中农地位的农民）和老中农（即从土改前以来一直处于中农地位的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对于中农进行这样的分析，具有重大的理論意义和实际意义。

土改以前的貧农群众中有一部分，由于缺乏牲畜和农具，缺乏劳力，以及其他原因，虽然分得了土地，但仍然沒有能改变自己的貧困生活，仍然处于貧农的經濟地位，他們最深切地体会到个体經濟的痛苦，所以他們一般地具有很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新中农中間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間的下中农，他們的經濟地位虽然比較解放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不富裕，他們虽然会产生一种爬到富裕中农地位上去的願望，但是在农村两极分



化中他們經常受到直接的威脅，所以他們對於合作化的態度接近於貧農而和富裕中農不同。他們一般地也具有社會主義積極性。特別是新下中農，他們是經過共產黨領導下的土地改革而才改善了自己的經濟地位，他們比較容易接受黨的號召。貧農和新、老下中農這三部分人占農村人口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他們是比較地不固執小農私有生產資料的制度，比較地容易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人們。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要用社會主義精神和社會主義制度去徹底地改造整個農村的小私有生產資料的制度，必須依靠過去是半無產階級的廣大的貧農羣眾（包括貧農和原來是貧農的新下中農）。

富裕中農有較好的農具和耕畜，原來的土地經營比較細緻，產量較高，或者有較多的副業收入，生活比較富裕。富裕中農的這種經濟地位，使他們（特別是入社前有部分剝削收入的老上中農）成為農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代表。他們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是具有動搖性的一個階層。他們占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合作化運動中，對待富裕中農的正確政策是團結、教育和改造的政策；應當團結他們，同時和他們的資本主義傾向作鬥爭，這種鬥爭主要採取說服、教育、批評的方法，要通過鬥爭達到團結的目的。

在我國土地改革以前，富農的經濟本來很弱，在土地改革中富農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剝削已被廢除，他們的經濟地位進一步削弱了。新富農由於土改後黨的各項政策的限制

和迅速進行農業合作化，發展不大，雖然已開始在農村中到處出現。富農經濟是農業合作化中被消滅的對象。隨着合作化運動高潮的掀起，黨的限制富農的政策就轉而為消滅富農作為一個階級的政策。富農和已經被打倒的地主階級，是堅決反對和破壞農業合作化的敵人。他們有時公開地有時秘密地支持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因此，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絕不能放鬆對地主富農的警惕，對他們的破壞活動，必須進行堅決的打擊。

合作化運動是在農村中用社會主義道路戰勝資本主義道路的一場嚴重鬥爭。在中國，由於富農經濟很弱，而富裕中農的力量却相當大，所以在合作化運動中兩條道路的鬥爭常常表現為同富裕中農的鬥爭。當然，富裕中農是和富農不同的，富裕中農屬於勞動者的範疇。如果看不到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傾向，是不對的；但如果不是採取適當的方法同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傾向作鬥爭，而用對待富農的方法來對待他們，也是錯誤的。在富裕中農還沒有參加合作社的時候，他們往往依靠他們的比較優越的生產條件，企圖在生產上壓倒已經組織起來的貧農、下中農，在這些富裕中農後面，實際上還站着地主和富農。這時，新生的合作社組織就應當充分發揮集體經濟的優越性爭取更多的增產，這樣才能不斷擴大合作社的影響。這種和平競賽是兩條道路的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

上述分析說明，對農民各階層必須做具體分析，既要看到較小量的富裕農民對合作



化的动摇和抵触，又要看到最大量的贫农和下中农对合作化的积极性。对农民的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两重性也要做具体的分析。贫农和下中农的私有观念较少，富裕中农的私有观念就浓厚得多。如果看不到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去发挥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就会使贫农孤立，削弱合作化的社会基础。如果抛弃贫农而说什么依靠中农，那就是在实际上抬高了富裕中农在农村中的地位，就会使下中农，甚至一部分贫农不能脱离富裕中农的影响，这样，就只会助长农村中资本主义倾向而葬送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党内合作化问题上曾经出现过的右倾观点，往往表现为对农民的各阶层不加分析，这些右倾观点实质上就是反映了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要求。毛泽东同志对于我国土改后农村各阶级、各阶层的分析，特别是对于中农中各个阶层的分析，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明确的阶级路线。

农民中各个阶层的觉悟水平是不同的，而且同一阶层的农民的觉悟程度也不完全一样。我们党在领导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采取了分步骤进行的办法，使合作化的过程成为逐步地提高农民觉悟的过程；易于为大多数农民所接受。这样做，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像是突然地到来的。”^①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是分为三步完成的。

第一步，组织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第二步，在互助组的基础上，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步，在小型的半社会主义合作社的基础上，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农业生产互助组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成立互助组，并不触动农民的私有制，但可以经过集体劳动而提高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可以依靠劳动协作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形式最容易为农民所接受，因而它成为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种最初步的过渡形式。但是，互助组中存在着集体劳动和分散经营的矛盾。在土地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劳动力的合理安排和集体劳动作用的充分发挥是受到限制的，土地的合理利用和生产的统一计划也有很大的困难。随着互助组内部矛盾的日益发展，在农民逐渐地习惯于集体劳动并从实际生活中认识到集体劳动的好处的情况下，互助组就被更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所代替。

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初级合作社）实行了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实行了一定的按劳分配制度，并有了一定的公共积累。在初级合作社中，能够因地制宜地种植，进行较合理的有计划的分工分业劳动；能够有更大的劳动力量和经済力量，进行技术改

^①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7-28页。



革、基本建设和发展副业生产。在初级合作社的发展中，按劳分配的比例逐渐增多，土地分红的比例逐步减少，这是有助于改变农民的私有观念，能够大大地鼓励农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它是引导农民过渡到更高级的、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适当的形式。我们党发现和普遍采用了这种农民比较容易接受的过渡形式，就大大加速了合作化运动的进程。初级合作社还存在着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私有之间的矛盾，到一定时候，对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会起阻碍的作用，因此随着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的进一步提高，随着生产的增长，在能够做到废除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而保证绝大多数社员增加收入的条件下，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必然发展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高级合作社，土地和耕畜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已不再归社员私有，而归全体社员集体所有。高级合作社中取消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报酬，完全实行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制度。这样，农业生产就从农民个体经济的束缚下彻底解放出来，我国农民的个体经济就变成了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

在我们党内有些同志有过这样一种观点，他们认为迅速实现农业合作化，势必降低农业生产，因而主张放慢合作化的速度。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和合作化以后，农业生产节节上升的事实，驳倒了这种右倾观点。经验证明，只要迅速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步骤是建

立在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的基础上，并坚持了自愿互利的原则，不仅不会减产，而且一定可以使农业增产。合作化过程分成了上述的几个步骤，逐步进行，正是农业生产能够不断增长的一个保证。我们党一向认为，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产量，增加社员收入，使农民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济繁荣看成是不断增进自己物质与文化的幸福的主要源泉，这是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根本标志。

农业合作化的三个步骤之间是相互区别而又相互衔接的。前一步为后一步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后一步是前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曾经有些同志看不起互助组和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不认为这是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必要过程。我们党批评了这种观点。同时，我们党也不断地批评了那种认为有了互助组已经够了，不必再前进到合作社，有了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已经够了，不必再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观点。

农业合作化的每一个步骤，要经过一定的发展和巩固的过程，不仅在每一步骤之间需要总结经验、整顿巩固，而且在实现每一步骤的过程中，也需要分期分批地进行。毛泽东同志说：“各省各县，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那种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①

我们党根据农民中各阶层对合作化的不同态度和大多数农民的觉悟水平，在合作化

^①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9页。



过程的每一步驟中，都是先后分批分期地把农民組織起来。

例如，在組織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时，首先是把貧农和新老下中农中間的积极分子組織起来。这几部分人中間暂时还不积极的分子，則不勉强把他們拉入合作社；等到他們的觉悟程度提高了，他們对于合作社感到兴趣了，然后才把他們吸收进合作社。

对于新中农中間的上中农和老中农中間的上中农，在开始組織合作社的时候，除开吸收一些有社会主义觉悟、真正自願加入合作社的以外，其余暂时都不吸收，更不勉强地把他們拉进来。对于这些人，一方面加强教育，一方面用合作社的优越性去影响他們，让他們多看一些时候，等到他們的觉悟程度提高了以后，才吸收他們入社。

这种分期分批地組織起来的做法，既貫徹了自願的原則，又有利于建立貧农和下中农的領導优势，有利于爭取和团結中农，这对于合作社初期的发展和巩固是有利的。

至于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只有在合作社已經巩固的时候，在他們早已放棄剝削、从事劳动、并且遵守政府法令的条件下，才能分批分期地允許他們入社，在集体劳动中繼續改造他們。

合作化的每一步驟中，不仅要坚持农民自願的原則，而且要坚持互利的原則。只有在互利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自願。所謂互利，主要的是貧农和中农之間的互利。在合作化的每一个步驟中，都要坚决維護貧农和下中农的利益，这是毫無疑問的；同时，我們要使

貧农懂得，不要去損害中农的利益，不要占中农的便宜。在不損害貧农和下中农的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照顾富裕中农的合理利益，也是完全必要的。例如，合作社对于富裕中农入社的大农具和牲畜采取逐年偿还代价的政策。这样做，既使富裕中农不感到吃亏，而且也是有利于发展合作社的生产，因而也是有利于貧农和下中农的。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決議》着重說明了貧农和中农的团結問題：“中农是工人階級和貧农的永久同盟者，不論在社內社外，都必須善于同中农共处，决不能侵犯中农的利益，决不應該去剝夺中农的财产。对于中农的落后思想，特别是对于富裕中农的資本主义傾向，應該采取說服的方法給他們以适当的批評，决不應該用行政的强制手段。同时，这种批評是为了达到团結他們的目的，决不應該利用这种批評作为反对中农的借口。”

我們党坚决执行团結中农的政策，认为只有依靠貧农，树立了貧农的优势，貧农向中农做了工作，才能把中农团結到自己方面来，使革命一天一天地扩大，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在向地主作斗争、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是这样，在向富农和其他的資本主义势力作斗争、逐步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也是这样。

合作社的領導权必須掌握在貧农手里，这是有关农业合作化成敗的根本原則問題。在合作化运动中，我們党特別強調，合作社的主要領導干部，应当由貧农（包括貧农和



原来是貧农的新下中农)来充当;合作社的社务管理委员会,必須吸收老下中农和一部分觉悟較高的、有代表性的新老上中农参加,人数占三分之一左右,貧农委员的人数占三分之二左右。毛澤东同志說:“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必須建立現有貧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机关中的优势,而以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作为輔助力量,才能按照党的政策实现貧农和中农的团结,巩固合作社,发展生产,正确地完成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沒有这个条件,中农和貧农就不能团结,合作社就不能巩固,生产就不能发展,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实现。”^①

我們党所采取的这些政策、步骤和办法,是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为依据,也是符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其中贯穿着一个总的精神,这就是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的统一。我們党既充分地估計到絕大多数农民願意实行农业合作化的积极性,又充分地認識到要把农民的私有經濟改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經濟的艰巨性。我們党始終从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同时又注意不断地提高农民的觉悟,以便依靠农民自己的行动和力量,一步一步地完成农业合作化这一个偉大的事业。

三

在党的正确领导和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大力援助下,五亿多农民的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获得迅速的发展和胜利,使得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发挥了无限的力量。事实完全证明了,工农联盟在經過了以反封建

的民主革命为基础的阶段以后,必須进一步发展以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为基础的阶段,才能不断地巩固和加强起来。

党的领导和国家的援助对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起着决定的作用。合作化符合于农民群众的利益,要依靠农民群众自己的觉悟来进行,但是如果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国家的援助,是不可能实现的。列宁曾說:“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不待說,‘自由’資本主义的誕生曾花了許多万万卢布。目前我們应该特別加以支持的社会制度就是合作制度,这一点我們現在应该認識到并使它实现。”^②

在土地改革以后,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通过发展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使个体农民的小商品經濟和国家經濟結合起来。国家在农村中組織信貨合作,对耕畜农具等生产資料缺乏的农民,主要是貧农,給以国家的貸款,并且实行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的統购統銷。这些步骤都是对于貧农和下中农的援助,使得富农、高利貸者、投机商人不能为所欲为。采取这些步骤,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村中的两极分化起了限制的作用,对互助合作运动起了促进作用。国家对于互助組和合作社給了大量的财政援助。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六年的七年当中,国

^① 《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轉变为貧农占优势的》一文的原語。《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57頁。

^② 《論合作制》。《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24頁。



家除了用水利、救災、救济等方面的財政支出来帮助农民发展生产以外，用于推广优良品种、新式农具、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及防治病虫害的經費达十二亿八千多万元，国家在七年中还貸給了农民八十多亿元的低利貸款。这部分經費和貸款主要是对于互助組和合作社的支持，有很多貧农的入社股金就是用国家的貸款交納的。如果没有国家的大力援助，沒有供銷社、信用社的优待和帮助，以及农业技术推广站等的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迅速发展是不可能的。

党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的正确政策，不断地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派了大批干部下乡领导和帮助农业合作化运动，并从运动中培养了大量的农民干部。政治思想工作在合作化运动中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不但在合作社建立的过程中，而且在社会主义的集体經濟已經建立以后，都必须不断加强政治工作。有一部分富裕农民的資本主义傾向是很严重的，他們在合作社的内部仍然企图用資本主义的方針来影响合作社的发展方向。所以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要反复进行的。如果放松了合作社内部的政治工作，資本主义傾向就会泛濫起来。毛澤东同志說：“反对自私自利的資本主义的自发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結合的原則为一切言論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經濟逐步地过渡到大規模合作化經濟的思想和政治的保证。”^① 正因此，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合作化运动就会迷失方向。我們党深入农民群众中，根据农民的生活經驗，具体地細致地进行了政治思想工作，并且是和

經濟工作結合着一道去做政治思想工作，这样就保证了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

农业合作化完成以后，正确地处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間的关系，对于繼續发展和巩固工农联盟是十分必要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关系，实际上是工农之間的关系。

集体所有制經濟和全民所有制經濟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一切重要的經濟活动、它的巩固和发展，都离不开国家和全民所有制經濟的领导 and 援助。但是，集体所有制的經濟，同全民所有制的經濟是有差别的。在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中，生产資料和产品是全民的财产。在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生产資料和产品归农民集体所有。国家所能直接支配的只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品，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产品，只有合作社才能作为自己的财产来支配。合作社除了向国家履行納稅等义务以外，只有通过商品交換才把自己的产品轉入到国家手中。这种商品交換关系是农民所願意接受的，是符合农民的利益和整个国家的利益的。我們党和国家規定了工农业产品的合理价格和其他有关发展商品生产的政策，使全民所有制的經濟和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經濟，通过商品交換密切地联系起来，以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坚持等价交換的原則，是正确处理国家和集体、集体和集体、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正确处理工人和农民以及整个劳动人民内部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們党始終认

^① 《严重的教訓》一文的按語。《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23—124 頁。



为，对于农民的劳动成果是不能剥夺的，在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时候对于农民的私有财产是这样，在实现合作化以后对于农民的集体财产也是这样。贯彻执行等价交换的原则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充分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巩固工农联盟，对于集体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必要的。

社会主义的经济，包括集体所有制的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的。国家对集体所有制农业经济有计划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各项政治工作和规定主要农产品的计划指标实现的，此外还通过对农产品的统购、派购和按合同进行的预购等联系来实现。国家和合作社之间，广泛地实行合同制度，又是有计划地实现商品交换的保证。这样，既给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经济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的机动余地和权力，又保证了集体农业经济的生产发展循着国家计划的轨道进行。

我们党用上述原则和办法正确地处理了两种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同时对农民不断地进行了爱护公共财产、认清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的教育，这样就使工人和农民、个人和集体、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得到适当安排，使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都得到了迅速的、不断的发展，使工农联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目前，社会主义工业和整个全民所有制经济，正在大力支援农业，以求逐步地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实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的要求。逐步地使农业实现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地发展农业生产，农业就能够为工业提供充分的粮食、

原料和广阔的市场，促进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城乡人民的生活不断地得到改善。这说明我国的工农联盟已经开始向新的阶段发展，即向建立在农业机械化的基础上的新的阶段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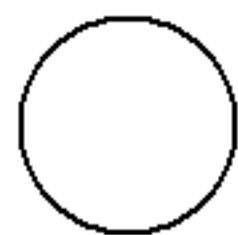
集体所有制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觉悟水平的提高，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已不能充分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照耀下，于一九五八年，在农村中又实现了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在五亿多人口的广大农村中，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我国农村的人民公社是在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的，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属于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人民公社在分配制度上仍然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同时实行了部分的供给制，使农民群众得到了可靠的社会保险。人民公社比原有的高级社的规模大得多，并且实现了政社合一，实现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结合。在三年来的实践中，人民公社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巨大优越性，有力地促进了并且继续促进着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人民公社将逐步地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现行的三级所有制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后，也将跟着实际的需要而进一步发展发展为以公社所有制为基础的集体经济，然后再发展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公社所具有无限生命力使我们充满信心地看到了社会主义农村的光辉的远景。



红旗

HONGQI



7

一九六一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六一年第七期★

目 录

加强国营农场的建设 王 震 (1)

在农村人民公社中

一个人民公社大办粮食的经验 中共醴县委员会调查组 (8)

整风推动了生产 顾建鹏 李兰桂 (12)

心目中时时刻刻要有群众 凌南标 (16)

为农业服务是气象工作的首要任务 饒 兴 (19)

笑里藏刀的“亲善” 郭济洲 (24)

論形式邏輯的对象和作用 王忍之 (28)



红星公司制作 请尊重作者版权



加强国营农场的建设

王 震

国营农场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农业战线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它拥有先进的技术装备，现代化机器的大生产基本上代替了手工生产；它具有较高的生产水平，有可能向国家提供高额的农畜产品。在党的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下，必须进一步加强国营农场的建设，提高国营农场的管理水平，把国营农场办得更好。

毛泽东同志早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指出，为了解决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年年增长的需要同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必须“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①。他还预言：“国营农业在第二第三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将有大规模的发展”^②。

建国十一年来，我国的国营农场从无到有，不断地顺利地发展着。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到一九五二年，已经建立了五十二个规模较大的机耕农场，拥有三百三十多万亩土地；一般农事试验性质的地方农场，每县至少有一个至二个。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

间，即到一九五七年，已有七百一十个规模较大的农场（不包括专区和县的农场）；这些农场的耕地面积共达一千五百多万亩，职工五十万人，拖拉机约一万标准台，粮食产量达十一亿九千万斤。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导下，国营农场更有了飞跃的发展。到一九六〇年底，农垦系统的国营农场已经有二千四百九十多处，有职工二百八十八万人，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四点六倍；耕地面积达七千八百多万亩，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四倍；有拖拉机二万八千标准台，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一点七倍以上；粮食总产量达五十余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三点七倍以上。三年来，单位面积的开荒造田的基本建设投资有了很大降低。在各地区的农场中，由于正确地实行了“八字宪法”和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出现了一些大面积的或者小面积的各种农作物的高产田。

国营农场在发展的过程中，日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

党中央早在一九五一年发给各级党委试

①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2页。

② 同上书，第6页。



行、一九五三年正式公布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中，就曾经指出，“国营农场应该推广”；国营农场要“一方面用改进农业技术和使用新式农具这种现代化农场的优越性的范例，教育全体农民；另一方面，按照可能的条件，给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技术上的援助和指导”。在《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又指出，“要求所有的国营农场，团结和帮助周围的农业合作社，在生产技术方面发挥应有的示范作用。”国营农场的这种示范作用，在它的初办阶段就已经在许多方面初步显示出来。例如，一九五二年，国营机耕农场的小麦平均亩产量为全国平均产量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一点七，棉花为全国平均亩产量的百分之一百四十八点七，大豆为全国平均亩产量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一。又如，一九五六年，全国国营农场粮食作物的平均亩产量，比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平均亩产量超过百分之四，棉花产量超过百分之六十六。国营农场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农民优良的傳統耕作法，采用了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成就，因此许多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劳动生产率都出现了新纪录。在改良农畜品种、改革耕作制度等方面，国营农场也起了示范作用。当时，很多国营农场还用机器给附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代耕、开荒，帮助训练技术干部。

国营农场拥有现代化技术装备，能够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耕地为例，如一天分两班工作二十小时，大型拖拉机可耕地一百五十亩以上，中型拖拉机可耕地一百亩左右。由

于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高，国营农场的农畜产品的商品率都比较高。把国营农场建设成为提供大量农畜产品的商品基地，是当前的迫切任务。

国营农场在开垦大片荒地和建设祖国边疆方面，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开荒是发展农牧业生产的基本措施之一。我国有大量可以开垦的荒地；这些荒地，大部分分布在边疆、沿海和湖泊附近等地区。开垦这些荒地，可以使亿万年沉睡的荒原变为良田。在人烟稀少的地区大量开荒，必须由国家组织大规模的移民并采用现代化的机器。过去十一年来，国营农场在开荒和建设边疆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新疆地区，已经在天山南北建设起机械化农场一百八十多处。到一九五九年，耕地面积已发展到八百零三万亩。一九六〇年又开荒三百五十七万亩，播种面积比一九五九年扩大将近一倍。在黑龙江、内蒙古、海南岛、云南等地的国营农场，也开垦了大量的荒地。这些农场，已经能够生产大量的农畜产品，成为国家的重要的商品基地。国营农场的发展，促进了这些地区的工业、交通运输、建筑工程和文教、卫生等事业的发展，迅速地改变着边疆地区的落后面貌。

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国营农场的建设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军队参加生产，是我军光荣的历史传统。远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人民的军队（当时的八路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自己动手、生产自给、克服困难”的号召下，曾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



动，建立了公营经济。在解放战争中，东北解放军后方部队就创办了国营农场。建国以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人民解放军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军队参加生产的指示，有一部分军队在边疆实行军垦屯田，为促进国营农场发展和加速边疆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国国营农场事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我们逐渐认识农场建设的规律性、逐渐掌握多快好省的建设方法的过程。十一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国营农场在建设方面必须贯彻边开荒、边生产、边建设、边积累、边扩大的方针。在大面积生荒地上建立国营农场，必须有一个开荒造田和相应地进行房屋建筑、水利、道路等各项基本建设的过程；而进入垦区的大批人员所需粮食、副食品的供应，国家对工业原料和出口商品的需要，又要求国营农场尽可能缩短这种建设过程，早日投入生产。因此，在建设开始，如何解决开荒与生产、生产与建设之间的矛盾，就成为能否多快好省地发展国营农场的决定性环节。在国营农场创办初期，由于缺乏经验，曾经机械地采取先勘测、规划，再开荒造田、进行各种基本建设，然后再正式投入生产的程序。这样做，在建设阶段得不到生产成果，建场年限长，生产发展慢，耗用国家投资多，达不到党所提出的“投资少，收效快，收益大”的要求。一些地区的经验，特别是有些地区军垦的经验证明，应该改变这种做法，而实行建场安家、开荒生产和

基本建设同时并进，也就是“边开荒、边生产、边建设、边积累、边扩大”的建场方针（简称为“五边”方针），并在资金管理方面实行“投资包干”的制度。执行这个方针，是符合多快好省的要求的。

实践证明，正确贯彻执行“五边”方针，能够使国营农场很快地投入生产，在建场的当年或第二年就能生产出大量的粮食，为继续开垦荒地、扩大基本建设打下必要的物质基础。而通过生产，又可以较快地掌握当地的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的特点，有助于因地制宜地全面规划农场的生产和建设。实行“投资包干”的制度，能够充分发挥农场广大干部和职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国营农场本身的生产积累来不断扩大建设规模。这样，就能够充分发挥国家投资的效益，达到“投资少，收效快，收益大”的要求。如江西、湖北、湖南、甘肃等省一九五八年以后建立的一批国营农场，由于积极执行了“五边”方针，绝大部分都做到了在建场的当年就有收益，其中不少农场还做到了在建场的当年就获得赢利。从投资效果来看，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三年，平均每年国家投资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国家投资增长约一倍，而开荒面积却增加了五倍多。

贯彻“五边”方针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体现了勤俭办场的原则。“五边”方针要求在建场当中因陋就简，用少量的资金办更多的事，把资金用在生产最需要的地方。这几年来，许多农场贯彻了这个方针，坚持了勤俭办场的原则，促进了生产建设的迅速发展。但也有少



数农场，在生产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对勤俭办场的原则有些忽视，在基本建设方面追求高标准，非生产性建设占的比重过大。应该指出，勤俭办场的原则，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忽视的。离开这个原则，我们就不能达到“投资少，收效快，收益大”的要求。

国营农场在生产经营上必须正确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粮食为纲，农牧业并举，全面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

国营农场的任务，是向国家提供商品粮食、棉花、肉类以及其他多种农畜产品。为了提供国家建设和出口贸易所需要的产品，国营农场在生产经营方面必须正确地处理农业和牧业的关系、农牧业和其他多种经济的关系。农业和牧业是相互依存、互为发展条件的。以农业为主的农场，只有发展了畜牧业，才能为农业生产提供丰富的肥源，促进农业的发展；以畜牧业为主的农场，只有发展了农业，才能保证发展畜牧业所需要的饲料和职工的口粮，为大量发展畜牧业创造前提。无论是以农业为主还是以牧业为主的农场，在发展农牧业以外，还应当根据需求和可能发展其他多种经营。农牧业是发展多种经营的基础，而多种经营的发展，可以合理地利用农副产品，充分发挥机械利用率，经济地使用劳动力，增加收入和资金积累，促进农牧业的扩大再生产。在那些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农场，同样也需要适当发展粮食生产和畜牧业，以解决粮食自给和肥源问题。实践证明，只有正确处理这几方面的关系，才能使国营农场的经济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得到顺利的发展。

在国营农场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少数

农场忽视发展多种经营，只种植几种粮食作物，而不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畜牧业、林业、工副业和渔业，结果农场每年生产的大量农副产品，得不到很好的利用，农田所需要的粪肥极端缺乏，农闲期间劳动力的潜力无从发挥，生产收入不能稳定地增长，甚至有亏损的现象。大跃进以来，国营农场的多种经营有了很大的发展，基本上克服了过去有些农场单一经营的偏向。在全国国营农场经济中，畜牧业和工副业所占的比重，已经由一九五七年分别为百分之十和百分之十二左右，提高到一九五九年的分别为百分之二十五和百分之三十二左右。多种经营的发展，进一步巩固和稳定了国营农场的经济，使农场经常有收入，加速了农场的资金周转，增加了自筹资金，为扩大生产规模、加速农场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发展多种经营方面，也有少数国营农场存在重工副业、轻农牧业的偏向，使工业占用的劳动力、资金、物资过多，以致影响了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这对于国营农场的建设也是很不利。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以农业为基础，以粮食为纲，农牧业并举，在保证农牧业正常发展的条件下，相应地发展那些为农牧业生产服务的工副业和其他生产。在发展的步骤上，根据近年来的经验，在建场初期，因为开荒造田和各项基本建设任务都很繁重，不宜大量兴办工业和其他多种经济，而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农牧业生产。在农牧业生产和各项基本建设有了—定基础以后，再因地制宜地有步骤地发展为农牧业生产服务的工副业等多种经营，这样对生产比较有利。

在国营农场中，必须注意提高机械利用



率，采取有效的技术措施，正确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提高劳动生产率。

国营农场拥有大量的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在技术装备上得到国家优先的大力的支持。现在，国营农场除了已有拖拉机二万八千标准台以外，还有联合收割机三千三百多台，排灌机械十七万五千多匹马力，各种畜牧机械三千八百余台。国营农场已有了一支在政治上久经锻炼的具有企业管理和技术知识的干部队伍，和一支能够操作机械的技术工人队伍。因此，有充分的可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高速度地发展生产。

这几年来，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对机器使用的日臻合理，每标准台拖拉机按标准亩计算的工作量逐年增加。如一九五五年是二千一百五十亩，到一九五七年达到四万亩，到一九五九年达到六千二百多亩。但是，应该看到，目前国营农场在机械设备的利用方面还是不平衡的，还存在着设备不配套，利用的期限较短、停闲的时间较长，维修和保养工作跟不上，折旧费用大，生产成本高等问题，机械设备的潜力还很大。很好地总结过去在这些方面已有的经验，充分挖掘现有机械设备的潜力，以进一步提高田间作业和非田间作业的机械化程度，是提高国营农场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关键。

提高机械利用率的重要一环，是加强机械的管理和维修。现代化的农业机械，要求有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和维修设备。这几年来，许多大的垦区和农场，初步建立了农业机械的修配网和技术人员的培训网，国营农场的机械管理水平和维修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有的农场，由于在机械使用方面

实行了科学管理，相应地建立了机具的修配网点，保证了机车的较高的出勤率。有的生产队，一九六〇年机车出勤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时间利用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但是整个说来，国营农场的机械管理水平和维修能力还不能完全适应机械化生产的要求。有些农场还没有建立对机械的管理和保养制度，有的已经建立了，但未能坚持执行，因而在机车调度使用上存在不少窝工、浪费和损坏现象；有些垦区和农场，修理设备不足，维修所需的配件缺乏；有些农场技术人员不足，技术水平较低，操作不够熟练；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机车的充分利用。有的农场拖拉机的出勤率，只达百分之五十左右。根据这种情况，需要加强对机械的管理，建立和健全必要的使用、管理和保养制度，建立和健全机械的修配网和技术力量的培训网。只要这些工作很快地跟上去，就可以使国营农场的机械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有很大的提高。

提高机械利用率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加强机械的综合利用。农业生产是有季节性的，生产的项目又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大量的田间作业，又有大量的非田间作业，既要经营好农(牧)业，又要发展多种经营。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各项作业的机械化程度，降低生产成本，必须使机械能够综合利用，发挥一机多能的作用。许多农场依靠职工群众，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在这方面已经创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不仅拖拉机、播种机、中耕机等机器都能够综合利用，就是过去一直被认为利用率最低的联



合收割机，经过各种技术改装，也扩大了使用范围，收到了综合利用的效果。有的农场综合利用机械的结果，使设备利用率提高一倍到十倍，改变了以前许多机械半年使用半年闲的状况，提高了非田间作业的机械化程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成本。农业机械的综合利用现在还是一个新的问题，我们的经验还很不足，对这一工作应该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态度，从当地条件和农业技术要求出发，在不损坏原机器的原则下，认真地进行。

各地农场在正确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方面是有成绩的，许多农场实现了大面积的或小面积的丰产。如一九六〇年新疆有的农场十万亩小麦平均亩产三百多斤；有的农场六百亩玉米平均亩产九百六十斤。但是整个来说，国营农场的平均单位面积产量还不够高。因此，必须在大面积开荒的同时，大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推广试验田、丰产田、丰产队、丰产场等典型经验，由点到面地开展大面积丰产运动。可以根据土壤、气候、水利等条件，将耕地分为基本田、一般田和改良田。对于基本田，要采取有力措施，力争高额丰产；对于一般田，要力争高于常年产量；对于改良田，要积极加以改造。总之，要更合理地经济地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力争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单位面积产量指标。

近一两年来，各地在实现高产和改良耕作方法方面创造了丰富的经验。拿改良耕作方法来说，例如实行轮作换茬、间作套种、分期播种、马铃薯芽栽等，既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土壤肥力，增加了产量，又有利于充分地

有节奏地利用劳动力和机器设备。两年来，由于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我们增加了一些暂时的困难；但是各地农场在同自然灾害的斗争中，也取得了一些新的经验，例如在作物安排上注意节约用种量，适当地多样化，适当地多种杂粮、耐旱耐涝作物、早熟作物，以及使蔬菜提早成熟提早供应，以满足城市工矿区居民的需要等等。这些经验，不仅有助于战胜自然灾害，而且有利于实现农业增产，我们应当进一步加以总结和推广。

为了正确地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达到增产的目的，必须加强调查研究，提高干部和职工的农业科学技术水平。

农业生产具有强烈的季节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很大，不同地区存在着自然条件的差异。因此，采取任何增产措施，都必须切实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制宜。这就要求国营农场的各级领导干部和科学技术人员，经常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进行调查研究。

近两年来，国营农场开展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广大职工的思想觉悟和科学技术知识都有了很大进步。有些单位的职工，由于学习了现代的气象学和现代农业科学，已经初步掌握了有关本地区的气温变化、土壤性质、各种作物的播种日期和生理特性等方面的知识，并且能够把现代科学技术和我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的优良栽培方法结合起来。这些都对于生产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许多农业科学技术人员在传播农业科学技术知识方面，也作出了许多贡献。在各垦区农业技术学校中，正在培养着又红又专的有实际经验和专门知识的农业技术干部和专家。一支既有政治觉悟又



有科学知識的建設队伍正在成长起来。但是，有些国营农場的领导干部，还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識和生产知識，也不尊重农业生产的客观規律，因而在工作中出了一些錯主意，給生产造成了損失。經驗证明，凡是采取了符合作物生长和发育規律的正确的技术措施，就能够丰产；反之，凡是采取了違背作物生长和发育規律的錯誤的技术措施，就一定减产。在科学面前必須老老实实，一点調皮也是不行的。因此，必須認真开展学习农业科学技术的运动，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执行“八字宪法”，正确采用农业技术措施。

在国营农場中，还必須不断地注意健全企业管理制度，充分調动广大基层干部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优越性。

国营农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农业企业，它同国营工厂企业一样，直接按照国家計划进行生产，实行严格的經濟核算制，在生产上要求有高度的組織性和紀律性。但是，由于它所进行的是农业生产，在管理上應該适应农业生产的特点，不能机械地搬用工厂企业的一套管理制度。参照农村人民公社的經驗，根据国营农場自己的一些經驗，国营农場在管理体制上一般实行总場、分場（或作业区）、生产队三級管理，三級核算，統負盈亏。一般是总場进行全面核算，分場进行基本核算，生产队作为基层生产单位，只进行业务核算，不进行經濟核算。国营农場也在生产队实行“三包”、“四定”的生产責任制度。这样既便于总場实行統一集中的領導，又能够使分場、生产队在組織生产、进行基本建設、财务管理、生活福利事业管理等方面有必要的权力，

充分发挥他們的积极性。許多农場还实行了“两参一改三結合”的民主管理制度。所有这些，都对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几年来国营农場各方面工作有了很大发展，新建了很多农場，这就在經營管理上带来了一些問題。有些农場的领导干部对业务还不熟悉，管理制度还没有来得及健全起来。有些农場管理机构过于龐大，非生产人員过多，不利于降低成本和进行經濟核算。另外，在一部分干部中，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不深入实际、不調查研究、不实事求是、不走群众路綫的不良作風。所有这些問題，都必須根据党的政策，根据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的精神，通过整風运动切实加以解决。

現在，党和国家要求国营农場提供更多的商品粮食和畜产品，提供更多的工业原料。为了使国营农場能够担負这个任务，我們必須貫徹执行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精神，用全力爭取今年农业丰收，大力办好已經初步建立起来的农畜产品商品生产基地，認真执行調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針，把整个国营农場的生产和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一步。我們必須将現有的土地經營好，积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同时积极开垦荒地。目前的形势大好，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思想已經深入人心，农場的設備和技术力量也增强了，通过正在进行的整風、整場运动，农場职工的政治思想觉悟将不断提高，干部作風将有很大改进。我們相信，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巩固、充实和提高，国营农場的生产潜力必将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它在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运动中，会作出更大的貢獻。



一个人民公社大办粮食的经验

中共隴县委员会调查组

陕西省隴县河北人民公社，連續两年获得丰收，成为全县大办粮食的一面红旗。

这个社是在山区。一九五八年，全社十六个生产大队，有八个大队粮食不能自給自足，由国家供应了十八万六千多斤粮食。经过全社干部和群众的两年努力，情况完全改变了。一九五九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一千五百三十六万斤，每人平均約一千五百斤。一九六〇年，夏秋作物虽然遭受严重旱灾，粮食生产仍然取得了丰收，全社总产量达到一千一百五十万斤，每人平均一千一百多斤，除了超额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和留足种子、饲料、口粮外，还储备了余粮。家畜家禽也都有很大增长。社员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一九六〇年每人平均达到一百七十多元。

他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主要是在大办农业、大办粮食中，切实地贯彻了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的原则，按照党的政策办事。

对于从根本上改变缺粮的状况，起先有些人有畏难情绪，认为“山大沟深，地多劳动力少，粮食不能大增产”。为了解决这个思想问题，公社党委书记李仲义同志深入到白石、业家山等生产大队，总结了連年增产、由穷

队变富队的经验。通过现场会，大家从这活生生的事实中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认识。公社党委还进一步改进了领导方法。一是坚决实行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公社党委书记以身作则，带头参加生产。这样就带动了生产大队支部书记、队长和生产队长都参加生产。干部参加生产，大大地鼓舞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还能切实地掌握生产情况，加强对生产的领导。二是多和群众商量。例如，一九六〇年天旱，早秋作物减产，为了弥补损失，公社党委书记向白石生产大队的群众请教，根据群众意见，决定大种蕎麦，全社共种了四万五千亩。三是加强调查研究，建立基点。公社党委将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作为一种经常的工作制度。他们在全公社建立了具有各种不同特点的工作基点，把这些基点当作公社指导生产的参谋部。公社研究生产问题时，经常吸收基点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参加，这样就能根据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不同情况，做到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例如，他们经过多点试验，摸出了一套适合山区特点的密植经验，克服了有些同志不顾具体条件强求“一律化”和认为“越密越好”的主观片面观点。



河北人民公社土地辽阔，有阴山、有阳山，有高山、有低凹，适宜种植的作物差别很大。根据这种情况，公社党委决定在发展粮食生产上实行三个并举：扩大耕地面积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举，夏收作物与秋收作物并举，主粮与杂粮并举。这样就便于因地制宜地种植，有利于克服自然灾害，能够更合理地安排农活。实行三个并举的结果，粮食总产量增加了，同时还满足了群众在生活上多种多样的需要。

全社有可耕地二十多万亩，但在一九五八年实际种植面积只有十一万一千多亩。公社党委决定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同时，扩大耕地面积，将可耕地尽可能地利用起来。种植面积能不能扩大？开始也有人怀疑，认为“地多劳动力少，种多了管不好”。公社几个党委委员就分头到各生产大队进行调查，发现各生产大队每个劳动力平均负担的耕地面积很不平衡，耕地最多的白石和兰家堡生产大队，每个劳动力平均负担耕地达五十亩左右，而且经营得好，产量逐年增加。苏家原生产大队，每个劳动力平均负担耕地二十亩，粮食产量很低，全年需要国家供应一万六千多斤粮食。公社总结了白石和兰家堡生产大队的增产经验，号召各生产大队扩大种植面积，并以业家山、侯家寺生产大队为重点，做出了榜样。全社两年来共扩大种植面积五万多亩，扩大的方法是开荒和复种并举。为了充分利用地力，在秋田中套种豆类作物五万多亩，林粮间作二百一十亩。多种就能多收。一九六〇年因为遭灾，粮食的平均亩产量虽比一九五八年减少百分之二十六，但是由

于多种，总产量却增长了百分之十三点九。

玉米、高粱、糜子是当地的高产作物。一九五八年全社玉米的种植面积只占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百分之十点七，而玉米的产量却占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一一点五。一九六〇年公社大抓玉米等高产作物，玉米种植面积由一九五六年的一万零七百九十亩，扩大到二万一千四百八十九亩，面积增加了一倍，产量比一九五六年增加一百零四万斤。公社在大抓高产作物的同时，还注意了扩大秋田作物的种植面积和小麦的种植面积，一九六〇年小麦种植面积达到七万六千九百多亩，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九千九百多亩。所有这些，对迅速提高粮食总产量都起了很大作用。

河北人民公社过去水土流失很严重，耕作粗放，自然灾害频繁，还经常遭受鸟兽危害。公社党委针对这种情况，采取以下三条带关键性的措施：

一、以水土保持为主，进行土地基本建设。这是发展山区农业生产的一项综合性的根本措施。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公社领导干部在程家原和大队干部、技术人员一道，率领群众突击三天，集中治理了尖山四百多亩，取得了治山的经验。全社在这一冬就修地边地埂和梯田二万多亩。在一九六〇年农闲季节又修起了十一万九千多亩土地的地边地埂；全社百分之六十五的种植面积进行了水土保持；修建了小型水库四个，涝池、水泉、水井、旱井等共一百八十五个，坝堰四千六百一十七条，还修了一些小渠道，扩大了灌溉面积。这些水利建设工程在抗旱中起了重



要的作用。

二、认真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特别注意耕作和施肥两个增产关键。在耕作方面，根据当地的情况，改浅耕为深耕，改迟耕为早耕，改粗耕为细耕，改少耕为多耕。并根据当地轮歇地多的特点，狠抓了早耕和多耕。下年的麦田在夏收前细耕两次，下年的早秋田在秋冬细耕一次。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是经过曝晒、霜冻，促使土壤分化；二是蓄水保墒；三是促进土壤团粒结构，增强地力；四是有利于消灭虫害、杂草。此外，还有利于错开活路。在肥料方面，大力发展畜牧业，特别是养猪。全社以积蓄肥为中心，开展了搜、造、漚、烙肥料和种植绿肥的活动。一九六〇年施肥面积占种植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同时，推行了合理的轮作倒茬。主要是苜蓿和粮食的轮作，每年种一万亩新苜蓿地，开一万亩老苜蓿地，新开的苜蓿地，可以长三至五茬小麦。这样不仅提高了地力，多打了粮食，而且有利于发展畜牧业，做到畜多、肥多、粮多。

三、根据当地自然灾害比较频繁、鸟兽危害比较严重的情况，对作物作了因地制宜的安排。如在易遭春霜的低凹湿地种植玉米，在易遭大风的沟渠种植豆类等低秆和不易落粒的作物。在防雹、防霜冻、防兽害、防病虫害等方面也规定了具体办法和具体制度，逐级都有专人负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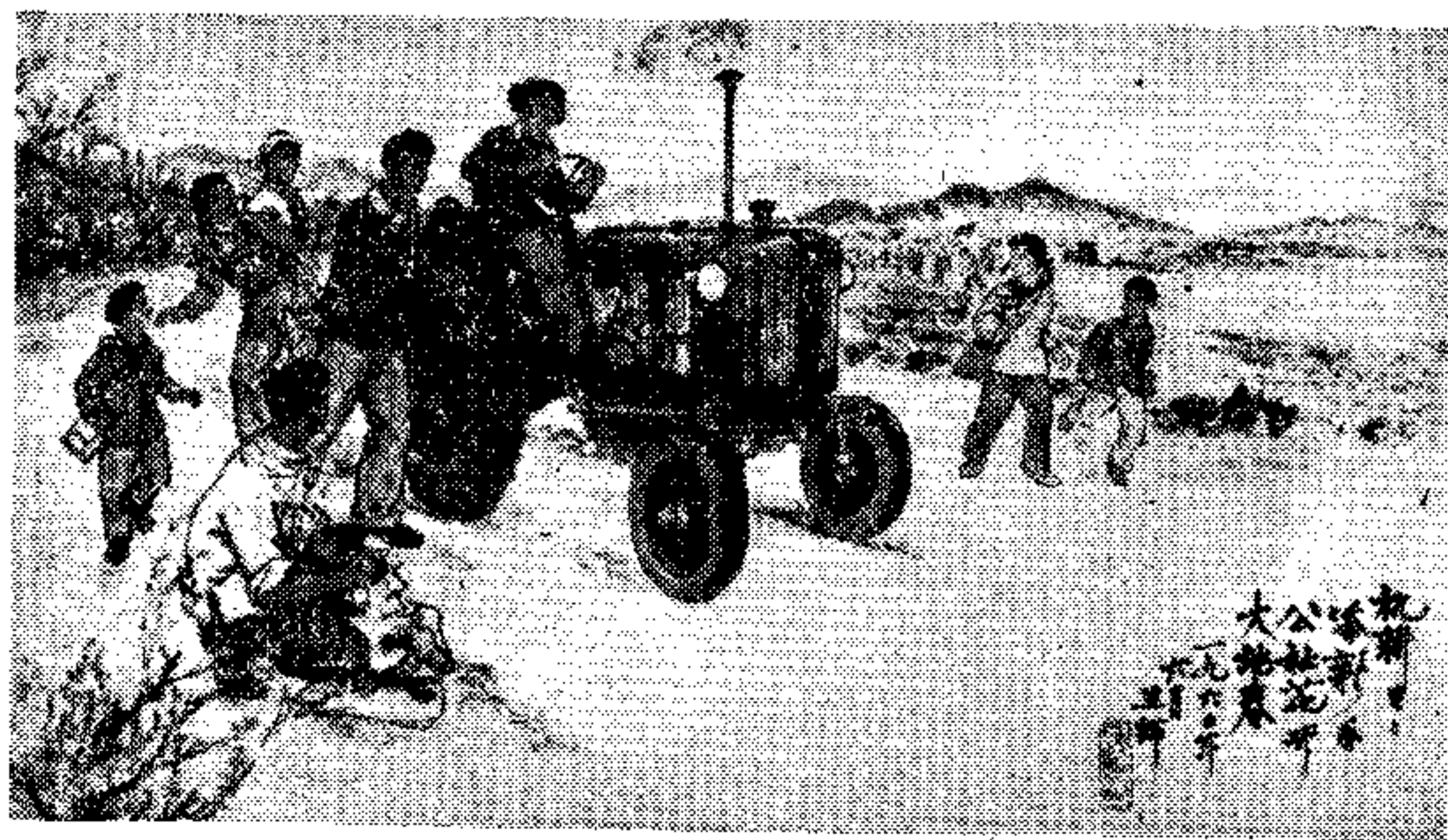
开荒、种地、水土保持等，一切都需要劳动力。劳动力不足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怎么办呢？开始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主张减少任务，有人主张依靠川原地区的支援。公社

党委就派人深入到耕地多、劳动力少、种植面积逐年扩大、农业生产连年丰收的业家山生产大队进行调查，发现这个大队过去大部分农活是在秋收秋播和夏收期间做的，忙闲极为不均。后来，他们调整了作物种植面积，合理安排了活路和劳动力，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业家山生产大队几年来并没有增加几个劳动力，但是种植面积却一年比一年扩大，而且亩产量在稳定地增长，总产量迅速地提高。根据业家山生产大队的经验，公社在劳动力的安排上，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和以粮为纲的方针，从各方面作了调整，使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达到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点七，其中直接参加田间生产的达到百分之八十五，大大地加强了农业生产第一线。在活路的安排上，他们根据一年四季各个节气的特点，将农活做了合理的安排：什么时候做什么，何时做完；主要做什么，结合什么；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哪些活路必须在一定的时节做，那些活路可以抽空去做等等。如种小麦，就要求在白露前把山上的地种完，白露后再种平川的地，最迟到寒露要全部种完。在做这些活路时，必须集中力量，其他活路都要让路，保证不违农时。又如搞副业、砍柴、积肥、搞水土保持等，则抽空闲时间进行，必要时搞突击。夏收和早秋作物锄草往往挤在一起，就采取活路提前做的办法，在夏收开始前就把早秋作物锄完，这样就将活路错开了。此外还推广“送货上门”、“修造农具上门”等办法，大大便利了社员，使社员能够集中精力从事生产劳动。



河北人民公社党委在领导生产中，深深地体会到党的政策是党和群众利益的集中表现，是调动群众积极性的钥匙。几年来，河北人民公社贯彻执行了党的各项政策，鼓舞了群众的干劲，克服了各种困难，获得了丰收。保证党的政策深入地贯彻执行的关键，在于有一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河北人民公社认真地进行了党的组织建设和选拔、培养干部的工作。无论在发展党员或选拔干部方面，公社党委都坚持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全社生产队以上的干部中，贫农、下中农占百分之九十。这些从劳动人民中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具有鲜明的阶级立场，有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与群众有密切联系。为了提高党员和干部的政策思想水平，公社党委经常组织干部学习政策，统一认识，提高觉悟，并且定期检查干部的工作和思想作风。

几年来，公社党委坚持贯彻执行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重视发展队有经济，生产大队的积累大部分留给生产大队自己使用，国家每年帮助穷队发展生产的贷款全部发给穷队。公社还派了十一名脱产干部加强对穷队的领导。全社原有十二个穷队，现在已经有十一个赶上了富队。公社党委坚持实行“四固定”、“三包一奖”、定额管理和评工记分等经营管理制度，同时还正确地处理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一九五九年粮食大丰收，生产大队在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之后，对超产多的生产队奖励了一些粮食。这样既照顾到国家，又照顾到集体和个人。在一切工作中，公社党委都坚持政治挂帅，注意使政治教育和物质奖励结合起来，以充分发挥生产大队、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这样就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持续跃进。



春 (新华社稿)

王 师



整風推动了生产

顾建鹏 李兰桂

清溪生产大队是湖南省湘潭县韶山人民公社的一个基本核算单位。这个生产大队在上級党委的领导下，于去冬今春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了整風整社运动。在整風整社运动中，进一步贯彻执行了党的政策，使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和锻炼。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提高了，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改进了；社員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也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愈加高涨了。走进这个生产大队，可以看到一片预示着今年农业生产丰收的欣欣向荣的景象。

清溪大队共有二百一十六户，九百零八人，男女全半劳动力三百四十七人，一千四百四十九亩水田和八十九亩旱田。这个大队的耕地虽然不多，但是大部分土质较好。一九五八年获得了农业丰收，一九五九年也完成了增产计划。一九六〇年，由于春天遭到了六、七次寒潮的袭击，秋季又遇到了干旱，影响了禾苗的生长，产量比往年减少约三分之一。这自然给人们带来了暂时的困难，但是干部和社員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在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团结一致，采取有效措施，克服各种困难，决心在今年争取丰收。整風整社运动为争取丰收创造了更为有

利的条件。

清溪生产大队在整風整社运动中，进一步地贯彻执行了党的各项政策，广泛深入地向干部和群众进行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和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的教育，严肃认真地整顿了组织，巩固了贫农、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坚决地贯彻了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和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并改进了经营管理制度。今年年初，这个大队就实行了“四固定”的制度。现在全队的劳动力、土地、耕畜、农具等都已经固定给各生产队使用。实行“四固定”以后，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員的积极性很高，生产队的干部领着社員四处查看了一次，他们对固定在本队的土地、耕畜、农具，人人心中都有了底。并且还讨论了如何经营使用，做到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这个大队还采取放手发动群众的办法，总结过去实行“三包一奖”制度的经验，按照实际情况，制定了“三包”方案。“三包”落实以后，各生产队的社員都扎扎实实地挑起了担子。在制定“三包”方案的同时，还健全了定额管理和评工记分制度，根据当前新的情况，全面地修订了劳动定额。在过去制定的各项农活定额中，有六十四项仍可采用，



有三十一項比較煩瑣的定額被取消，有一百五十五項定額因情況變化進行了修訂。此外還增訂了三十三項農活的定額。在健全定額管理的基礎上，他們認真實行評工記分。現在，這個大隊的十三個生產隊都基本上做到人人有勞動手冊、隊隊有記工簿。大隊還找補了一九六〇年決算分配的款項，全隊共找補四千二百元。一九六〇年的“三包”超產獎勵也兌了現，十個隊受獎兩千斤谷，二百六十五元。這些實物和現金都及時按勞動工分分配給了社員。

通過整風整社運動，清溪大隊各級幹部的工作作風和領導水平有了新的改進和提高。全大隊共有生產隊以上的幹部二十七人，一般都做到了與社員同勞動、同食堂、同商量。黨支部書記龐碧祥，在檢查各耕工作時，發現小沖灣生產隊因飼草不足，有的牛長得不够好。為了幫助這個生產隊解決飼草問題，他便找儲備了不少牛草、但缺乏燒柴的老屋灣生產隊的幹部商議，按照等價交換、自願兩利的原則，使雙方達成交換柴草和飼草的協議，解決了雙方的困難。

在領導生產中，許多幹部注意調查研究，從實際出發，尊重老農的意見。如老屋灣生產隊副隊長周國良很感慨地說：“要事情辦得准，只有找群眾商量。”三月上旬，隊上安排秧田。秧田選擇哪里好？開始時，他打算放在屋門前，認為這樣便于施肥和管理。什麼時候平整？他認為，“百般宜早不宜遲”，主張立即動手。但是，他沒有根據自己的想法作出硬性規定，而是召開社員會，提出自己的

主張，讓大家討論。會上有的青年社員同意，有的社員特別是老農不完全同意。他們提出的理由是：一、屋門前做秧田好處是有，但迎北風，容易爛秧，尤其是对早稻秧威脅大；二、秧田平得太早不大好，去年有的秧田平早了，結果到禾種下泥時，秧田里已長出許多草來。周國良接受了社員的意見，按照大家的決議，除了將部分中稻秧田選在屋門前外（因為中稻下種遲一點，那時寒潮少），早稻秧田則選在背北風的地方，平秧田則等到禾種上水的時候。

清溪大隊的幹部經過整風，更加關心群眾的生活。去年冬天，有十多個社員患病，大隊黨支部為此開了多次會議研究，將病情較重的社員安置到大隊療養組診治，大隊幹部經常前去看望。在春節前後，大隊還給他們送去了一些豬肉、鮮魚、蚕豆、黃豆、糖食等營養品。對生活上特別困難的社員，拿出了部分公益金，進行了補助。劉家灣生產隊隊長劉少周對年老力弱的社員和女社員，在排工中特別注意照顧，盡量給他（她）們安排一些輕活，自己總是撿重活、難活干。由於幹部切實關心群眾生活，更得到社員的擁護和愛戴。幹部和群眾之間的關係更加密切了。幹部和群眾之間，有說有笑有商量，親如一家。社員們對幹部也很關心，經常囑咐幹部注意休息，別把身體累壞了。

經過整風整社運動，社員的勞動積極性有了新的高漲。社員的出勤率高，工效高，質量好。今年一月份以來，很多社員超過了勞動定額。貧農李揚生家里四口人，自己和



爱人都参加劳动。自今年一月到三月中旬，他一个人就已经做了六百二十多分工，超过了定额。六十六岁的下中农李惠连，是队上的看水员，每天一边看水，一边为队里扯猪草，还经常督促儿子、媳妇好好劳动。不仅贫农、下中农进一步发挥了劳动积极性，就是部分比较富裕的、过去劳动不够主动的上中农，现在也表现出相当高的劳动积极性。许多社员为了提高劳动工效，在劳动中发挥了创造性。贫农周梅生是老屋湾生产队的肥料员。他已经六十多岁，但身体还很健壮。自从实行家肥按质论价、现金收买的政策以后，社员们经常请他上门去收家肥，他比往日更加忙碌了。为了更多更快地收好家肥，他改进了收肥办法，提高了收肥效率，自今年二月份以来，已经收集了一百九十多担人粪尿。

社员对于发展生产的要求十分迫切。在春耕大忙时节即将到来之前，大家都忙着添置农具和栽种树木。全队有二百多户社员共添置了各种小农具约六百三十多件。社员李文吉一下就添置了七件，锄头、耙头、筲箕都是双套。各生产队和社员纷纷提出在山里栽竹子、杂木、棕树、果树，在塘里养鱼，在坝里栽藕，把田埂加宽种豆子。目前，全大队已种植各种树苗四万多株，栽桃、梨、桔、枇杷、桂花等果木一千五百多株。老屋湾生产队对归本队使用的山林进行了全面规划。他们原来计划种植十七种树，共二千六百多株。经过社员努力，已超额完成任务，共植树二十一种，三千四百多株。在集体造

林任务完成以后，社员又买了些桃树、枇杷等果树苗，栽植在屋前屋后的空坪隙地或自留地里。各个生产队积极挖掘生产潜力，寻找生产门路。神山塘生产队社员充分利用土地增产粮食作物，把地边、洲地种上高粱、饭豆和绿豆。他们又利用生产空隙，在公路旁和山上开了三、四亩荒地，种上了红薯和花生。花园里生产队的社员们还冒雨下田，加宽田埂，准备种豆子。

社员的积极性，不仅表现在劳动和发展生产上，还表现在进一步增强了集体观念和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的责任感。例如老屋湾生产队的社员在讨论生产计划时，先后反复讨论了七次。干部根据群众的意见，研究、修改，再研究、再修改，终于制定出一个积极可靠、大家满意的生产计划。社员们在讨论生产计划时，对于种植多少双季稻曾展开了一场争论。有人主张多种，有人主张少种。最后通过对本队的水利、土质、劳力等条件的详细研究，才确定了双季稻的种植面积。社员对技术措施，也讨论得非常仔细。例如关于每亩田施多少肥，哪些田施什么肥，采用什么品种，怎样做到不违农时，以及保证耕作质量等等问题，都曾反复地进行讨论。

清溪生产大队社员们生产热情的高涨，是和他们对今年农业增产具有充分信心分不开的。这里社员们普遍反映：照这样干下去，今年生产有五条保证：一是保证完成种植计划，二是保证不误季节，三是保证耕作质量，四是保证积极出工，五是保证队队超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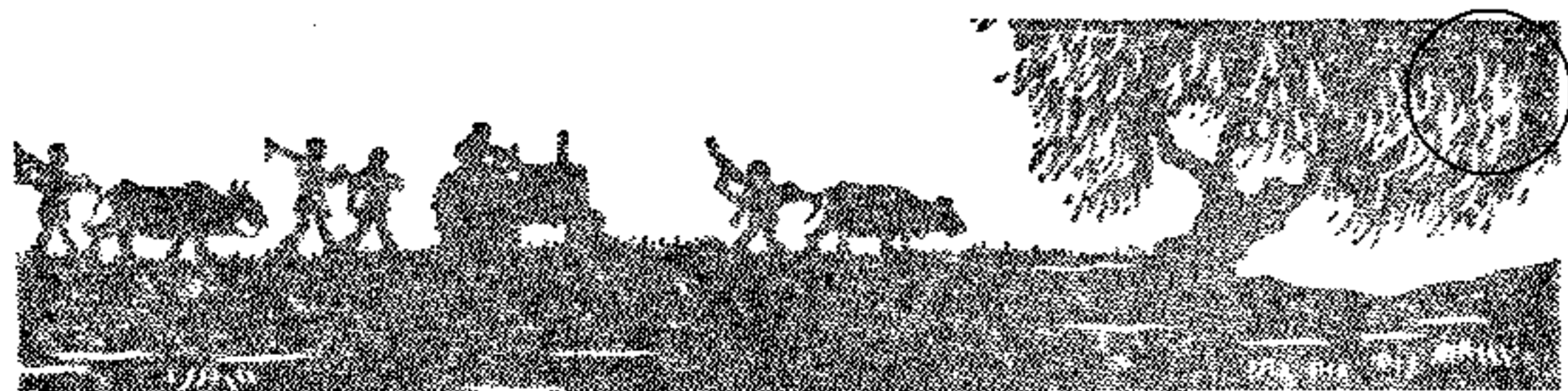
从清溪生产大队当前的生产情况看，来势很好。走进这个大队，只见满壠金黄色的油菜花和青蓝色的蚕豆花，蚕豆大部分正在结荚，小麦已开始含苞。春雨过后的田野里，流水潺潺作响。圆形的肥田分布在田间。白水田大都犁了两次，耙了两次。有的生产队已经开始浸谷种，人们在忙着播种的准备工作。

为了把握住整风整社后的大好形势，搞好今年的生产，力争获得好收成，大队党支部正在更深入细致地做好以下几件工作：

一、积极采取措施，保证生产计划的实现。全队在二月份通过上下结合的办法，充分发扬民主，制定了生产计划。这一生产计划贯彻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精神，对粮食生产、林业、牧业、副业、渔业都做了全盘的安排。为了保证这个计划逐步实现，入春以来，大队在全面做好备耕工作的同时，开展了突击积肥运动，一手抓收集家肥，一手抓大积土肥。今年的肥料比往年积得多，质量也好。同时，还抓紧春收作物的田间管理工作。他们还规定要定期检查计划完成情况，根据计划作出短期排工。

二、搞好生活，积极办好公共食堂。清溪大队的干部认识到搞好社员生活是保证搞好生产的重要关键，因而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办好食堂的工作上。经过干部和社员的努力，现在全生产大队的十八个食堂都日益巩固，越办越好，社员吃得饱、吃得好。为了使食堂办得更好，大队结合整风整社运动对食堂又进行了一次整顿，派了一批党团员骨干加强食堂的领导力量，每个食堂都建立了以贫农和下中农积极分子为骨干的领导核心。大队还切实帮助各个食堂建立好家务，种蔬菜和养猪。

三、抓好政治思想工作。清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在工作中很注意对社员进行思想教育。党支部五个委员，分工领导各生产队，实行了“三包”（包政治思想工作、包生产、包生活）。去冬今春以来，大队党支部反复地向社员进行了思想教育，讲形势，讲政策，帮助干部和社员认清生产的有利条件，鼓舞大家战胜困难的信心。在各生产队之间，还组织了评比竞赛，进一步鼓舞了社员的劳动热情，推动了当前的生产。



心目中时时刻刻要有群众

凌南标

我是上海市南汇县惠南人民公社惠东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在很长一段时期中，我脑子里总转着一个问题：工作做不好，常常同我们的工作作风有密切关系，可是，改进工作作风的关键到底是什么呢？通过总结一九六〇年的工作，我想通了这个问题。说来也是老生常谈了，这就是：心目中时时刻刻要有群众。

我们办的是什么事？办的是群众的事。这些事要依靠谁去干？要依靠群众去干。办群众的事，当然要懂得群众想办什么事，不想办什么事；要靠群众去干，当然要群众乐意去干；才干得好。要做到这两点，就不能不放下架子同群众打成一片，同他们商谈，积极领导他们

去办。党教育每个干部要跟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是做到这两点的一把钥匙。

人民公社化以来，一个生产队，既要管群众的生产，又要管群众的生活。在生产中，有农林牧副渔等各个方面；在生活中，也有办食堂、办托儿所、办业余教育以及办卫生事业等等工作。要管好生产和生活，离不开做

人的工作，因此，又要抓对群众的思想教育。真是千头万绪。如何领导好一个生产队，看来可不容易。可是，仔细想一想，这也不难。第一，我们办的这些事，都是对群众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事，群众是会愿意办的；第二，群众人多力量大，一齐动员起来，大家来办，这些事情也是一定能办得好的。

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生产队的第一小队，有一片九十多亩的土地，地势低洼，里面小沟多，茅柴多，地块零散，高低不平。这片田因为年年歉收，群众给它取名叫“死田”，还编了一首歌谣道：“小芦荡，一片荒，茅柴塞胸膛，刺碎裤子裆。”群众早就有着把这“死田”变成“活田”的愿望。一九五九年冬天，社员们提出了“要千年死田翻身”的口号。党支部根据群众要求，积极领导他们大战了十五天，终于铲平了泥丘，填平了水沟，并耕翻了十多亩长满茅柴的荒地，把原来分成七十八块高低不平的田，联成一大片，种上了油菜。经过社员的精耕细作，这些油菜长得十分好，平均单产比全队大面积平均产量还高出百分之三。油菜收获以后，为了防止旱涝灾害，社员们又在这片地里修了渠道，接着种上了单季老来青晚稻。秋收时，这片晚稻单产比全队大面积土地的单产又高出百分之七。于是，这块“死田”便被群众称为“黄金盆”了。把“死田”变“活田”，把“小芦荡”变成“黄金盆”，这当然不是一件小事，也不是件简单的事。要花多少人力、物力，要做多少复杂的工作，这件事才能办成。但是，这件事对群众大大有利，他们乐意去办；他们乐意办，劲头就足了，主意也多了；大家一动手，请看，不就办成了吗？



說是不難，可也不容易。這不容易處，就在於要真正懂得群眾的心思，真正相信群眾，真正做到同群眾心連心。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認真地實行“四同”。也舉幾件事來說一說：

一個生產隊的主要任務是搞好生產，只有生產搞好了，社會主義建設才能順利發展，人民的生活才能不斷改善。這當然是對群眾有利的大好事情，群眾當然是樂意搞好生產的。但是，在沒有認真實行“四同”以前，幹部遠遠一看，群眾在田頭干，以為就沒有問題了。後來生產隊幹部認真實行了“四同”，在一個小隊里同群眾一面勞動一面談心，才了解到情況並不是這樣。原來這個小隊六個多月沒有很好地抓評工記分工作，工分雖然上了賬，但工分定額定得不合理，記分也沒有經過群眾評議，有不够公平的地方，群眾有很多意見，雖在田頭干，勁頭却使不足。經過生產隊黨支部反復討論，把黨的按勞分配政策直接交給群眾，依靠群眾自己來做好評工記分的工作，群眾的主意可多啦！他們創造了一整套的評工記分的辦法，如：生產隊在布置一段生產任務時，事先要經過試工並和有代表性的人一起研究，制定工分定額，由小隊結合具體情況參照執行；根據農活特點，分別推行大包小評和按件記工等辦法；由記工員每天把工分二聯單送交會計，登入社員勞動手冊，一句一公布，一月一小結；幹部和社員一起評工記分，不能有絲毫特殊。這一套辦法，都是群眾提出來經過生產隊黨支部討論後才訂下來的。實行了這套辦法，工效就立即大大提高了。可見，不同群眾一起勞動、一起談心，就不能懂得群眾的心思，發覺不到在貫徹執行按勞分配政策上有什么問

題，也就不能認真地去抓評工記分的工作；不相信群眾，不把政策交給群眾討論，就提不出這一整套切實具體的評工記分的辦法；不堅決貫徹黨的按勞分配政策，不把評工記分工作做好，群眾的生產勁頭就鼓不足。

一個生產隊，除了領導好生產而外，還必須安排好群眾的生活。我們愈關心群眾的生活，群眾的干劲就愈大。這話說來容易，可是，怎麼才能安排好群眾的生活呢？拿吃飯問題來說，不同群眾一起在食堂吃飯，吃一樣的菜、吃一樣的飯，就不曉得群眾覺得哪些好吃、哪些不好吃，就不懂得食堂那點辦得好，那點辦得不好。我們同群眾在一起吃飯，群眾對食堂的意見，我們隨時都能聽到；該怎樣办好食堂，也可隨時同群眾商量，办好食堂的辦法就找出來了。去年三秋以前，有些食堂由於蔬菜沒有種好，加上某些炊事員和管理員有嚴重的自私行為，辦得不好，引起群眾的不滿，這些情況，是我們在同群眾一起吃飯以後才發覺到的。幸而發現得早，我們在縣委的領導下發動群眾進行大鳴大放、大整大改，調整了食堂工作人員，加強了食堂管理委員會的工作，還建立了各種制度。食堂面貌為之一新，社員普遍滿意。群眾說：“食堂辦得好，我們心定了，大家可以一心一意搞生產。”像吃飯這樣的大問題，我們為什麼也會一時疏忽了呢？一句話，是群眾觀點薄弱的表現。毛主席教導我們說：“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假如我們對這些問題注意了，解決了，滿足了群眾的需要，我們就真正成了群眾生活的組織者，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① 通過這一件事情，我們進



一步懂得了，要“四同”，就要和群众同心同德，把整个身心交给群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成为群众的知心人，才能够为群众办好事情。

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灵魂，领导一个生产队，如果脱离了政治思想工作，什么工作也做不好。政治思想工作到底应如何做法，这也是我们过去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向群众进行教育，最大的困难就是摸不到群众的心。群众在想些什么，要求些什么，我们不了解。不管什么事，都依靠开会解决，开起会来，又是干部谈的多，群众谈的少，听进去的也少，结果浪费了时间反而弄得群众疲劳，影响生产。干部实行“四同”后，这种情况根本改变了。在“同”的过程中，干部不论在田间，在食堂，在路上，在社员家里，都可以听到很多群众的议论。议论内容十分丰富，从思想问题到实际问题，从生产问题到生活细节问题，包罗万象，应有尽有。我们绝不能看轻群众的这些议论，它是我们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资本”。用去年三秋中的例子来说，我们在跟群众同劳动时，听到二小队个别社员反映，他们对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三秋任务缺乏信心。再一了解，发现小队干部本身也普遍存在着畏难情绪。这就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极大的思想问题。支部找到了问题的症结，首先从解决思想问题着手，发动群众总结了夏收夏种工作的经验，分析了虽然当时任务重，时间紧，人力少，但是还有不少有利条件。于是干部和群众心里开了窍，树立了雄心壮志，三秋工作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政治思想工作并不能到此为止，还必须步步深入地去，特别要到实际斗争中去做。实行“四同”，为我们更深入地做思想工作创造了条件。当三秋工作热烈地开展起来时，生产队副队长朱水全在五小队和社员一起种麦，听到了社员对工人家属王银英不参加劳动有意见。他第二天就去访问这个工人家属，从谈心中了解到这个妇女虽然有依赖丈夫、轻视农业劳动的思想，但她也有一些具体困难。家中有四个小孩，小的还得喂奶，出去参加劳动，家中孩子没有人照管。朱水全同志一方面对她进行了劳动光荣的教育，另一方面又十分同情她切身的困难，帮助她把小孩送到托儿所里去。这个女社员由于思想认识有了提高，又为干部体贴入微的关怀所感动，积极地参加了劳动，后来还被推选为生产小组长。群众看到干部这样关心群众，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正由于我们实行了“四同”，深入地去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结果是，不必要的会议减少了，群众思想问题及时解决了，干部和群众的心齐了，生产也就搞得更有起色了。

话又说回来了，实行“四同”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心目中不是时时刻刻都有群众，那末身子虽然和群众“同”在一起，心却不和群众“同”在一起，“四同”就会变成形式。所以，我想来想去，归根到底一句话，还是心目中时时刻刻要有群众。

（原载《解放》杂志1961年第2期，
本刊转载时文字上略有修改）

①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131—132页。



为农业服务是气象工作的首要任务

· 饒 兴 ·

气象工作是农业生产的尖兵，是我们向自然作斗争的重要武器之一。现在，全党全民正在积极响应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的号召，千方百计地争取今年农业丰收。全体气象工作者应当竭尽全力，踏踏实实地做好气象服务工作，使农业生产能够充分利用有利的气象条件，防御和克服不利的气象条件的影响，争取获得好收成。

建国十多年来，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的实践证明，气象工作把为农业服务做为重点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农业生产和气象条件的关系特别密切。农业生产的对象是有生命的有机体。光、热、水分和养分是农作物生长发育的必要条件，而其中光、热和水分都是气象因子。没有充分的阳光和热量，农作物就难以进行光合作用，很难生长发育；而没有水分，农作物就根本不能成活。农民说得好：“土是根、热是劲、水是命”。农作物生长在田野里，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不仅怕大风、暴雨、霜冻、干旱等自然灾害，而且在生长发育各个不同的时期，对气象条件又有不同的要求。以水稻为例，在播种、移栽、分蘖、拔节、抽穗、扬花、成熟等各个生长发育期，对气象条件的要求是各不相同的。

在播种和秧苗期间，一般要求日平均气温十至十二度（摄氏）、水温稳定在十二度以上，播种后有三到五个以上的晴天，这样就出苗快、长得壮。如果在此期间日平均气温在十度以下，或短时间内气温急剧下降，最低气温降至五度以下，并连续阴雨四天以上，就可能发生烂秧现象。在抽穗扬花期间，要求天气晴朗，有微风，日平均气温在二十度以上，相对湿度在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左右。如果在此期间遇到日平均气温低于二十度和连日阴雨，就对扬花授粉不利，容易形成空壳秕粒和感染稻瘟病。早稻播种时正处于天气多变的早春，这时温度很不稳定，特别是在南方，伴随着低温而来的常有连绵的阴雨。如果播种过早，就会遇到低温阴雨的袭击，造成烂秧；如果播种过晚，不但延迟早稻的成熟期，还会影响晚稻的移栽和生长，往往造成空壳秕粒，减低产量。农作物种类繁多，特性各异，对光、热、水分和养分的要求不同，这种要求又随着气候、地形、土壤、品种以及各种农业技术措施和耕作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而且由于各地自然地理情况（如纬度、地形、高度等）不同，气候状况又有各自的特点。各地的不同气候条件，有时



对某种作物生长有利，而对某种作物生长不利。同一种气候条件，在这一阶段对这种作物或农事活动有利，在另一阶段却对它不利。

要使农业生产得到丰收，必须切实地研究和掌握各种农作物在整个生长发育过程中“要什么天气、怕什么天气”的规律，真正做到从不同地区、不同气候、不同作物、不同品种以及耕作措施等实际情况出发，瞻前顾后，全面安排农事活动，以便不违农时，充分发挥天时地利的作用。而要准确地掌握和利用农时，还必须考虑到天气的突然变化，如大风、暴雨、干旱、霜冻和冰雹等灾害的袭击，并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农业技术措施。“看天、看地、看庄稼”，灵活地掌握具体情况，摸清天气变化的规律和农作物生长发育的特点，是向自然作斗争，争取农业生产丰收的重要一着。

气象工作在贯彻执行把为农业服务做为重点的方针的过程中，获得了全面的发展。一九五八年以来，全国已经基本建成了一个星罗棋布的气象服务网，配备了大量的仪器，培养了大批的气象技术干部。在气象科学技术方面，天气预报方法有了新的发展，预报准确率和预报时效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农业气象预报、海洋水文气象预报等专业气象预报也已开始建立。以人工降雨为中心的人工控制局部天气的试验研究工作已经开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所有这些，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为我国气象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同連續两年特大自然灾害的斗争中，气象事业起到了参谋和助手的作用。例如一九六〇年山西省翼城县遇到了二百余天的大旱，以及大风、霜冻等自然灾害，该县在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充分运用了气象工作这个武器。早在三月间，县委就根据县气象站的天气干旱预报和各公社气象哨查墒的结果，摸清了“敌情”，反复教育广大群众树立长期抗旱的思想，掀起了群众性的抗旱高潮。全县扩大浇地面积六万五千多亩，保证了玉米、棉花等春播作物的适时播种。四月间，根据天气预报，得知将有一场严重的终霜冻，领导上便动员群众进行防霜护苗工作。仅该县大交公社，就有三万余亩麦田安全渡过终霜冻。县委还根据四月上旬将有小雨的天气预报，发动群众在雨前为八万九千多亩麦田追了肥，充分发挥了肥料的效益。这样，全县经过顽强斗争，终于战胜了特大的自然灾害，夺得了丰收。

在贯彻执行把为农业服务做为重点的方针的过程中，我们进一步地体会到，天气预报是气象工作的中心，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重要手段。

天气虽然变化多端，非常复杂，但仍有一定的规律可循。这些规律是可以逐步被认识和掌握的。而天气预报就是力求准确地反映天气演变的客观规律。天气演变受着许多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影响，即使在同一天气系统控制下，由于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植被等差别，天气变化也会有所差异。要准确地反映天气演变的客观规律，必须运用唯物辩



证法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天气演变的过程,把大范围天气变化的一般规律和局部天气变化的特点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观察全局情况,又注意地区的特殊变化。这样才能不断地认识和揭示天气演变的各种规律,作出比较准确的天气预报。

关于天气预报的技术方法,在一九五八年以前,我国是采用天气图预报方法,即由气象台的预报员根据分布在一定范围内的地面和高空气象站的定时观测记录,分析绘制地面和高空各层的天气图,然后再根据按照观测记录的时间先后而绘制成的天气图和有关的理论与经验,分析天气系统的发生、发展和移动以及因之而产生的天气现象,作出大范围的天气预报。这种预报方法只能粗略地揭示大型和中型偏大的天气系统的变化、地形地理影响和大范围内一般的天气变化趋势,很难预报出各个地方特有的小范围天气表现。这样就使它在为生产、特别是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面,有了一定的局限性。

大跃进以来,我们对天气预报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不少的经验,初步找到了一套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天气预报方法。这一套技术原则和方法概括起来就是:“天气预报大中小结合,以小为主”。所谓“大”,就是指中央和各省气象台利用天气图和各类气候图表,划分天气模式,制订天气卡片,探求大型大气运动的客观规律和天气演变过程,从而作出大范围的天气预报。“中”就是指专区气象台根据省以上气象台的天气分析,并利用专区小天气图、历史资料和群众

经验,预测出大型大气运动在本地区的地形影响下所发生的部分改变,作出专区范围内的比较具体的分片天气预报。“小”就是指补充预报。它是县气象站和人民公社气象哨,从当地地形、气候条件 and 生产需要等具体情况出发,在收听专区台或县站天气预报的基础上,仔细观察本地区各种气象要素的演变,以及天象和物象对天气的反映,并征求老农的意见,进行补充订正,作出本地区的天气预报。经过这样大中小相结合作出来的天气预报,就准确得多了。特别是县气象站和人民公社气象哨比较了解当地的农业生产和地形地理特点,不仅预报准确率较高,同时还能密切结合生产的需要,所以在使用天气预报时应以小为主。

在编制天气预报时,各级台站既要密切配合,彼此尊重,上下会商,又要根据实际情况,独立思考。这样才能更好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充分发挥专业气象工作者和广大群众的智慧,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率和气象科学技术水平。

提高天气预报准确率的关键,在于不断地探索和寻求反映天气演变客观规律的征兆。这种征兆大量地反映在天气图、历史资料和群众经验之中。经过仔细的调查、整理、统计、分析和验证,就可以逐步摸清天气演变的客观规律。反映天气演变规律的资料,我们通称为天气预报指标。从无数次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中,使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在天气预报的技术方面,指标愈细致、愈精确,客观依据就愈充分,预报准确率也



就愈高。

为适应生产需要，天气预报在时间上必须长、中、短期相结合。长期是半月以上，中期是三至十五天，短期是二十四至四十八小时。天气预报长、中、短期相结合，就便于农业生产部门长计划，短安排，争取主动。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还不能完全准确无误地掌握住天气变化的规律。因此，天气预报必须以中期补充订正长期，以短期补充订正中期。长期供战略参考，中期供战役部署，短期供战斗使用。三道防线，而以中期为重点。长、中、短期的天气预报要有机联系，相互策应，协同作战。使用天气预报时必须结合具体情况，认真进行分析判断。要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着想，做好充分准备，宁可备而不用，力戒侥幸心理。这样，我们就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完全处于主动地位。

为了使气象工作更好地为农业生产和其他部门服务，必须使气象工作逐步走向专业化。国民经济各部门对气象工作的要求各有不同，仅凭一般的天气预报是不能满足各部门生产需要的。天气预报只是预告未来可能出现的天气变化，并未说明这种天气变化对生产特别是对主要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将带来什么影响。因此，必须在以为农业服务为重点的前提下，根据不同行业对气象条件的具体要求，有的放矢，进行专业气象预报（如农业、民航、渔业捕捞等），使气象工作紧密结合生产需要。

由于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和农业技术的

不断改进，农业对气象条件的要求愈来愈严格。各种农作物品种和特性不同，对气象条件的要求也各有不同。因此，必须把天气预报和当地农作物生长发育中“要什么天气和怕什么天气”的特点结合起来，精确地编制好农业气象预报，以便为农业生产部门提供资料，充分利用有利的天气和气候条件，防御不利的天气和气候条件的影响，使农业生产获得丰收。

编制农业气象预报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它必须从当地的生产需要、耕作方法和经验，以及当地天气和气候特点等具体情况出发，才能适应各种农作物错综复杂的要求，做到因时、因地、因作物制宜。因此，以县气象站为单位来编制农业气象预报，并经过人民公社气象哨，生产大队气象组补充订正，才能基本上接近于实际。

编制农业气象预报，首先要知道农作物对气象条件的要求（气象部门通称为农作物气象指标）。这种气象指标，一般是根据对长年农业气象观测积累的大量资料的分析得出来的。而我国这种资料年限短、残缺不全。如果等待长期观测，得出指标，再作农业气象预报，就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我国农民有数千年从事农业生产和同天灾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如能广泛收集，进行总结，并和气象历史资料对照，结合实况观测进行验证，就可得出农作物气象指标。有了指标，再根据中长期天气预报，进行综合分析，便可作出农业气象预报。为使农业气象预报更加切合实际，作出农业气象预报后，还要发



到气象哨、组，根据各公社、生产大队的生产和气候的具体特点，进行补充订正，并在使用过程中通过实地观测，再具体运用。利用这种方法编制的农业气象预报，在气象部门通常简称为“四结合、过两关”（四结合是天气预报、气候资料、群众经验、实况观测相结合，两关是哨组补充订正和实地观测使用）。实践证明，在我国当前的具体情况下，这是一种编制农业气象预报的多快好省的方法。

近几年来，全国建立了“专区有台、县县有站、社社有哨、队队有组”的气象服务网。这个服务网是气象事业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主要标志，是广泛开展气象服务工作，迅速发展气象科学的很好的组织形式。气象台站和气象哨组在业务上是紧密联系的，在性质上是各不相同的。气象台站是骨干力量，其仪器设备和观测方法必须力求正规统一；气象哨组则是社队按“自愿、自建、自管、自用”的原则建立的，是气象工作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第一线，人员以兼职为宜，其仪器设备，则根据生产需要和当前可能的条件办事，因陋就简，不要求统一。有了这样一个台站和哨组紧密结合的气象服务网，就有可能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密切结合生产需要，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力量，进一步做好气象服务工作。

由于建立了台站和哨组紧密结合的气象服务网，使广大劳动群众参加到气象事业中来，大大地提高了天气预报的质量，使天气预报和生产更加紧密的结合，改变了我国气

象事业的面貌。群众是生产的实践者，有着十分丰富的生产经验。远在三千年前的殷代的甲骨文中，就有这样的记载：“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现在分析起来，东南方来的雨多为绵雨，西北方来的雨多为阵雨，它对庄稼的影响是不同的。在秦汉时代，我们的祖先又总结了黄河中游一带的一年内季节变动的规律，创造性地订出了二十四个节气，以后这二十四个节气逐渐成为各地进行农事活动的日程表。流传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看天经验和天气谚语，世代相传，经过反复的验证，绝大部分是反映着当地天气变化的客观规律的。不难看出，如果没有大量的气象哨组和广大群众参加，仅依靠国家台站的专业气象人员，气象工作是不可能做好的。这进一步说明了科学来源于实践，人民群众具有伟大创造力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总结气象工作已经获得的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一九六一年的气象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兵力，进一步做好为农业服务的工作。在这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重点必须放在提高天气预报和农业气象预报的质量上，并且围绕这个中心，提高气象观测资料质量，加强农业气象的试验研究，推广新的预报方法。同时，还要结合生产需要，积极进行以人工降雨为中心的人工控制局部天气的试验研究工作。



笑里藏刀的“亲善”

· 郭济洲 ·

美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非洲。新上台的肯尼迪政府，为了推行对非洲的侵略政策，采取各种狡猾手段，做出种种“亲善”姿态，如派遣“和平队”去非洲从事搜集情报和文化侵略活动，扩大非洲留美学生的名额，“殷勤招待”非洲的访问者，建议每一个美国城市同一个非洲城市建立“密切关系”等等。不久以前，美国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斯对非洲十多个国家的访问，就是肯尼迪政府在这方面活动的一个重要步骤。威廉斯在访问中，一方面搞情报，为美国侵略非洲筹策，一方面进行欺骗和拉拢，装作是非洲人民的“朋友”，虚伪地宣称肯尼迪政府“特别关心和同情非洲人民的愿望”，将“帮助”非洲人民“实现自决”，“支持‘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的政策”，等等。

非洲拥有极其富饶的矿藏和农业资源，尤其是钻石、石油、黄金和钴、铀、锂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稀有金属。美国的垄断资本家向非洲输出资本，通过剥削廉价劳动力和采取半奴隶式的强迫劳动，比在国内投资可以获得加倍的以至好几倍的利润。不仅如此，用肯尼迪的谋士们的话来说，美国在非

洲还有着“地理政治上的利益”，“非洲对西方的防务是重要的，因为它守卫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南翼。”加紧侵略非洲，是美帝国主义实现它的所谓“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非洲原来是被欧洲殖民主义者瓜分了的地区。老殖民主义者长期以来的残酷统治，激起了非洲人民的不断反抗。近几年来，非洲人民日益觉醒，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支援不断加强。在这种条件下，美帝国主义要加紧侵略非洲，就不得不采取比较迂回的策略，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把自己伪装起来。

刚果局势的发展，充分说明了美帝国主义侵略手法的阴险狡诈，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剥开了这个假仁假义的新殖民主义者的画皮。

盗用联合国的旗帜来进行侵略，是美帝国主义在非洲活动的一个重要手法。肯尼迪在上台前就说过：“美国必须使联合国成为美国在非洲进行努力的中心工具”。美帝国主义对刚果实行武装干涉，就是通过所谓



“联合国军”来进行的。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军”所到之处，原来由刚果政府军所守卫的阵地、机场和港口被占领，刚果爱国军民遭到攻击和屠杀，刚果各个叛乱集团的分裂活动得到支持，刚果合法政府的领导人受到种种迫害。在“联合国军”的庇护下，被刚果人民赶走的大批比利时殖民者又重新回到刚果，据《华尔街日报》供认：这些人“再次控制了大企业、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刚果很多服务部门”；“比利时顾问正重新担任政府职务”，“回来接管现在由联合国人员担任的工作”。美帝国主义勾结比利时殖民主义者扶植和收买了刚果民族败类卡萨武布、蒙博托、冲伯、卡隆吉之流，策动他们进行叛乱，千方百计地要颠覆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的卢蒙巴—基赞加合法政府，并且终于杀害了卢蒙巴和这个政府的另外一些领导人。在卢蒙巴等被杀害后，美帝国主义不顾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愤怒抗议，公然表示要继续通过联合国镇压刚果人民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卡萨武布等叛乱集团反对刚果合法政府。肯尼迪悍然声明：“美国一向支持并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在刚果的活动”，“美国认为唯一有权代表整个刚果讲话的合法的当局”是卡萨武布“领导下建立的政府”。据美联社报道，这次威廉斯到刚果进行阴谋活动时，曾同卡萨武布进行了“非常友好”的会谈，威廉斯代表美国政府“保证继续支持”卡萨武布叛乱集团反对刚果合法政府。在同卡萨武布叛乱集团的“副总理”博利康果会谈

时，威廉斯再次强调美国承认这个叛乱集团为“刚果的政府”，要同这个叛乱集团“维持十分亲密的合作”。最近，在美、比等帝国主义的策划下，刚果各个叛乱集团举行了所谓“圆桌会议”，“决定”把刚果变成一个由若干所谓“独立国家”组成的“邦联”，以代替统一的刚果共和国，“邦联总统”则指定由叛乱分子卡萨武布担任。

美帝国主义所谓“支持”民族独立运动，所谓“支持‘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的政策”，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还不清楚么？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卡萨武布、冲伯等叛乱集团所盘踞的地区，早就已经挂上了“独立国家”的招牌，卡萨武布、冲伯等这一小撮非洲败类，早就已经自封为“总统”、“总理”等等，然而在那里，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不但丝毫没有触动，而且还在继续加强，而真正维护国家主权的合法政府的权力却被剥夺，政府领导人遭到监禁和杀害。美帝国主义所要“支持”的，正是这样的“独立”。在美帝国主义者的心目中，“非洲人的非洲”一词中的“非洲人”，就是卡萨武布、冲伯这样的非洲败类。美国现任副国务卿鲍尔斯在几年前就说过：“为了渗入非洲，必须利用黑人。”按照美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通过扶植傀儡政权，充当自己的代理人，不但可以达到向非洲扩张的目的，而且还可以使自己避免成为那里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直接打击目标。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的声明，深刻地揭露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这种推



行新殖民主义的阴谋。声明指出：“美国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拼命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形式，保持对原殖民地人民的殖民主义剥削。”“帝国主义者力图割裂和破坏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的主权，歪曲民族自决的含义，在所谓‘互相依赖’的旗帜下，强制推行殖民主义统治的新形式，在这些国家中扶植自己的傀儡执政，收买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利用民族纠纷这个恶毒的武器来削弱这些年轻的尚未巩固的国家的力量。”

肯尼迪政府标榜所谓“支持‘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的政策”，还意味着要排挤老殖民主义者的势力，使非洲最终变成美帝国主义的非洲。还在一九五九年十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的关于美国对非洲外交政策的研究报告就认为，美国要像过去那样，“依靠欧洲友好国家的继续控制非洲，来作非洲的稳定性以及和我们（美国）进行可靠合作的保证”，已经不行了。报告要求美国政府对非洲的侵略活动能“跟得上当代非洲的变化速度”。据外国通讯社不久以前报道，肯尼迪任命的非洲问题特别小组所提出的报告，也认为美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主要通过以前一直在统治着非洲大陆主要部分的西方国家来处理非洲问题”，而应当“直接同非洲各国接近”；报道说，肯尼迪采纳了这个建议，“为了这样做，即使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部分国家发生摩擦，也是迫不得已的。”威廉斯在非洲的活动，就是执行

肯尼迪政府排挤老殖民主义势力、“直接同非洲各国接近”的政策。这就难怪乎威廉斯一說出“支持‘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的政策”，就立即引起老牌殖民主义者的强烈反感。尽管威廉斯一再表白他所說的“非洲人”包括在非洲的殖民者，但仍免不了遭到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攻击。英国保守党报纸《约克郡邮报》罵威廉斯“不仅是一个相当愚蠢、不懂得外交的外交家，而且还是那些爱嚷嚷的许多美国人的非正式代表，这些人一方面赞扬美国牌的金圆殖民主义，同时却对我们的殖民主义一直加以攻击。”法尼亚首府内罗毕的商会主席则讽刺威廉斯說：“如果我们的美国朋友会知趣地呆在家里解决自己有关黑人的问题，而让我们用多少是愚蠢的英国方式解决我们在这里的问题，他们就好比跑到这里胡说八道要好得多”。随着美国加紧向非洲扩张，新老殖民主义强盗们的这种“摩擦”和吵架，将不可避免地会更加频繁起来。

非洲在美帝国主义者的心目中，是一个势在必夺的殖民主义的重要障地。但这绝不意味着美国在向非洲扩张时，可以完全不顾它的西欧盟国而行事。西欧老殖民主义者在非洲有着巨大的殖民利益，他们决不肯轻易放弃他们的利益。美帝国主义虽然有独霸非洲的野心，但为了镇压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仍然不得不借助于它的盟国。例如，美国原想完全挤掉比利时在刚果的势力，独吞刚果，但是，刚果人民的英勇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刚果的尖锐矛盾，却使美帝国主义不



得不放慢独吞刚果的步骤，暂时缓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便共同镇压刚果人民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美、比等帝国主义通过刚果各叛乱集团所举行的“圆桌会议”，“决定”共同瓜分刚果，就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

非洲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上，不但要遇到老殖民主义者的垂死挣扎，而且还面临着美国新殖民主义者这样凶恶和狡猾的敌人。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是十分艰巨、曲折的。帝国主义虽然在刚果和非洲其他某些国家中可以找到为它们效劳的傀儡，如同在亚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中那样，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在日益觉醒的广大非洲人民面前，是无法用假仁假义掩盖起来的。美帝国主义充当国际宪兵的角色，到处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不断从反面教育着各国人民，也教育着非洲人民。美帝国主义对刚果的侵略，特别深刻地教育了非洲人民。在卢蒙巴等被杀害以后，从非洲东部的内罗毕、桑给巴尔到非洲西海岸的科纳克里、阿克拉，从非洲北端的拉巴特、开罗到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到处都掀起了抗议美、比帝国主义血腥罪行的群众示威怒潮。马里首都巴马科群众大会的决议写道：“担任着国际帝国主义宪兵角色的美帝国主义，继反对古巴，反对老挝以及支持法国反对战斗的阿尔及利亚等行动之后，又一次在非洲各国人民眼前暴露了它的不守信义和罪恶的惯

技，证明了它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这次使整个非洲沉入哀痛的祸首。”几内亚新闻社在评论肯尼迪政府对刚果问题的立场时指出：肯尼迪政府的“假面具已经断然撕下来了”，这个政府的“立场是清楚的：这就是积极支持刚果人民的侵略者和它们的可耻代理人哈马舍尔德。”“非洲不会对殖民主义重新占领刚果一事袖手旁观。任何威胁都阻挡不了坚决进行反帝斗争的非洲各国人民摆脱来自任何方面的统治和维护他们来之不易的独立。”担负着贩卖“友谊”的使命到非洲去的威廉斯，在桑给巴尔就遇到了要他滚蛋的示威群众。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领袖阿里·莫辛在群众大会上表示：“威廉斯说美国支持非洲独立斗争，但我们很清楚他对‘非洲独立’的理解。我们将使他了解，我们反对间接的新殖民主义就像一贯反对直接的殖民主义那样强烈。”最近在开罗举行的全非人民大会，谴责了以美国为首的新老殖民主义者对非洲的侵略。大会还特别通过了关于新殖民主义的决议，决议指出，“新殖民主义是威胁新近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或者接近这种地位的国家最大危险”，决议号召非洲人民加强动员，“遏止新殖民主义和清除帝国主义最后的老根”。

不管是老殖民主义也罢，新殖民主义也罢，都镇压不住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挽救不了殖民主义在非洲必然灭亡的命运。美帝国主义玩弄种种阴谋手法，到头来只能是枉费心机。



論形式邏輯的對象和作用*

王 忍 之

形式邏輯這門科學研究什麼，它的作用範圍是什麼，在目前我國邏輯學界、哲學界中存在着不同的意見。

形式邏輯所研究的問題，相對於思維內容來說，乃是形式方面的問題，它研究概念、判斷、推理的形式，揭示思維形式結構的規律。形式邏輯要求人們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時，所使用的概念前後含義一貫，進行推理時，前提和結論不自相矛盾，等等。學習並掌握了形式邏輯這門科學，我們就能判定思維的形式結構是否正確，就能保證我們的思維具有正確的形式結構，就能夠把思維內容確定地、不矛盾地、有條有理地組織起來和表達出來。

有些同志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們在實際上否認形式邏輯的研究對象是思維的形式結構，認為形式邏輯應當研究具體的思維內容，應當能判明具體的思維內容是否和客觀實際相符合。他們以為，形式邏輯教給我們的知識，應當足以用來駁倒一切具有錯誤內容的思想觀點。持有這種意見的同志認為，形式邏輯如果不研究具體的思維內容，起不了他們所說的那種作用，那它就不成其為科學了，就沒有必要去研究它了。他們把形式邏

輯看成是一門具有階級性的科學。由於現在的形式邏輯沒有能滿足他們所提出的種種要求，他們就主張按照他們的意見來“修正”或“改造”形式邏輯。這些同志以為，他們的意見反對了唯心主義和形式主義的邏輯理論。這些同志還以為，他們的意見是以辯證唯物主義的形式和內容不能分割、形式和內容相統一的原理作根據的。

這篇文章想來分析一下這種意見，看一看它對形式邏輯這門科學的看法是不是正確；看一看它所主張的對形式邏輯的“修正”或“改造”會引導出什麼樣的結果；看一看它所根據的原理究竟是什麼，是不是辯證唯物主義關於內容和形式之間關係的觀點；看一看它所反對的究竟是不是唯心主義、形式主義的邏輯理論，而唯心主義、形式主義的邏輯理論在形式邏輯的對象和作用問題上的錯誤究竟在哪裡。

目前，我國邏輯學界、哲學界對於形式邏輯的對象和作用的不同意見，在推理這個

* 關於形式邏輯的對象和作用，在我國學術界有各種不同意見。本刊發表這篇文章是為了提供大家討論——編輯部



範圍里，表現得特別集中和明顯。所以，本文對上述問題的討論也着重於這一方面。

任何事物，它的內容和形式總是結合在一起的。沒有無內容的形式，也沒有無形式的內容。思維也是如此。人們的思維總是有了一定的具體內容，總是以一定的形式構造起來。思維形式並不是同思維內容無關的獨立自存的東西。但是，這種情形並不妨礙一種以思維形式為研究對象的科學的存在，形式邏輯就是這樣的科學。

形式邏輯能夠這樣做的原因何在呢？任何統一物的各個方面、各個屬性總是互相聯繫的，它們不可分離地結合在一起。但是，統一物中的各個方面、各個屬性又是互相區別、各有特點、相對地獨立的。思維的兩個對立的方面——思維內容和思維形式的關係也是如此。這種客觀情況，就使我們有可能在一定條件下，在認識事物的一定階段上，撇開統一物（在這里，就是思維）中的某些方面或屬性，只把另一些方面或屬性抽取出來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恩格斯寫道：“思維不僅在於把相互聯繫的原素綜合成為統一體，而且也以同樣程度來把認識的對象分解成為各個原素。沒有分析就沒有綜合。”^①對統一物進行分解，抽取其中的某一部分、方面、特性、環節來進行研究，不僅是可能的，而且常常是必要的。各種具體科學都是以統一物中的某方面、某屬性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的。形式邏輯把思維的一個方面——思維形式抽

取出來進行研究，並不出乎常情，並不值得驚奇。

在這點上，形式邏輯同數學是相類似的。事物的質和量總是結合在一起，正如同思維的內容和思維的形式總是結合在一起一樣。人們把事物的量的關係抽取出來進行研究就有了數學，把思維形式抽取出來進行研究就有了形式邏輯。恩格斯在談到對數學的研究時寫道：“為要能夠在其純粹狀態中去研究這些形式和關係，那麼就必須完全使它們脫離其內容，把內容放置一邊作為不相干的東西；這樣我們就得到沒有面積的點，沒有厚度和寬度的綫， a 和 b ， x 和 y ，常數和變數”^②。恩格斯的這段話也適用於形式邏輯：為要在純粹狀態中研究思維形式及其關係，那就要暫時使它們脫離其具體內容，把內容放置在一邊作為不相干的東西，這樣我們才能認識思維形式的種種類型，認識它們的本質、規律。

對於大量的思維材料（它們既有內容，也有形式），形式邏輯不去研究它的具體內容怎樣，是正確還是錯誤，是反映了哪一個階級的思想，等等，而是把思維形式抽取出來進行研究。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形式邏輯是暫時撇開了具體的思維內容來研究思維形式的。經過這樣的 research，從具體思維材料中總結出了關於思維形式的規律之後，就可以用這種知識來為一定的思維內容服務。由此可見，形式邏輯雖然不研究具體的思維內容，

① 《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頁。

② 同上書，第38頁。



只研究思維形式，但是研究形式的目的，却不是為了形式。探究思維形式結構的規律，對於我們說來，其所以是有意義的，就因為這種研究有助於我們有條理地、循序漸進地思考，有助於我們的思維活動達到正確的（符合於客觀實際的）結果；就因為這種研究使我們能夠以恰當的形式來表述和論證正確的（符合於客觀實際的）思維內容。

一般說來，形式是由內容決定的，而形式對於內容又起一定的反作用；一定的內容要求一定的形式，但有時內容又會表現在同它不相適合的形式中。內容在什麼程度上決定形式，形式和內容發生怎樣的不一致和矛盾，這是要根據具體事物作具體分析的，不能一概而論。如果只抱著內容決定形式，有什麼內容就一定有什麼形式的公式，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正確的思維在內容上是正確的，在形式上也是正確的*。思維形式結構的規律是以大量的正確的思維為依據而得到的。思維的形式結構是否正確，歸根結底，決定於它是否適合於正確的思維內容的要求。但是，事實上，大體上是正確的內容被表達得缺乏條理、曖昧不清的情形是存在的。在這種情形下，正確的內容就由於形式結構上的缺點而遭到了損害。另一方面，錯誤的思維內容被表達得條理有條、前後一貫的情形也是存在的。當然，在這種情形下，錯誤的思維內容不會由於形式上的“完滿”而成為正確；相反，它愈是前後一貫，就愈會暴露出它的錯誤，所以它為了掩飾錯誤，又往往發生邏輯

混亂。這些情況，一方面表明思維內容對於思維形式起着決定作用，思維內容和思維形式之間具有統一性；另一方面也表明思維形式對於思維內容有一種相對獨立性，思維形式和思維內容之間存在着矛盾。我們之所以能夠把思維形式抽取出來研究，其根據就在於此。

思維內容和思維形式的矛盾的最突出的表現就是，錯誤的思維內容具有正確的思維形式。現在有些同志竭力否認這種矛盾。金岳霖同志在《論真實性與正確性的統一》一文中說：內容（指推理的前提、結論的內容）錯了，推理形式也就錯了。李世繁同志在自己的文章中認為，一個推理，只要其前提的內容錯誤，那它的形式結構就必然是不正確的。李世繁同志說：一個推理形式是否正確，是隨推理的前提、結論的內容而改變的，如果不這樣看，那就是用形式脫離內容的觀點來觀察問題。總之，照這些同志看來，思維內容和思維形式之間的矛盾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思維形式對於思維內容的相對獨立性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根據這種觀點，這些同志進而認為，撇開了具體思維內容來研究思維形式，來論說思維形式，是不正確的。他們所說的不能撇開思維內容來研究思維形式的意思是這樣的：以推理形式為例，他們以為，要判定一個推理形式是不是正確，乃至於它算不算推

* 許多討論邏輯問題的文章，把“真實”和“正確”當做兩個不同的概念，分別用在思維內容和思維形式方面。本文不採取這種說法。



理形式,单对推理形式进行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看这个推理形式和怎样的内容相结合。根据这个原则,金岳霖同志认为:同样的一个推理形式,当它和无产阶级的思想内容相结合的时候,它才是推理形式,当它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内容相结合的时候,它就不再是推理形式了。李世繁同志则认为,同样的一个推理形式,当它和正确的内容相结合的时候它是正确的,当它和错误的内容相结合的时候它就变为不正确了。这样一来,思维内容就势必被拖入到形式逻辑的研究范围之内,势必要以对思维内容的研究来代替对思维形式的研究,而具有不同内容的思想在形式结构上的共同点,却因此就被抹杀了。同样的一个思维形式既然一会儿是思维形式,一会儿又不是,一会儿正确,一会儿又不正确,那末,思维形式本身就没有什么规律性可言了,对思维形式的研究就无法进行了。

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古代有人进行这样的推理:所有的英雄人物都是上应天象的,岳飞是个英雄人物,所以岳飞是上界星宿下凡。当然,这种想法是十分荒谬的,但我们应当说,其错误是在对英雄人物、对自然现象等等的看法上,而不是在思维的形式结构上。从那样荒谬的大前提中,自然引导出荒谬的结论来。在这里,推理形式倒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按照金岳霖同志的看法,就不是这样了。他在《论“所以”》这篇文章中说:“所以”即推理形式“相对于科学”,“基本上有阶级性。”所谓推理形式“相对于科学”的意思是:某一推理形式的发生或作出

以及它之是否正确取决于科学水平。所谓推理形式“基本上有阶级性”的意思是:推理形式“基本上”是为某一特定阶级服务的。金岳霖同志的立论根据是:“形式如何,主要地是由内容决定的。内容有某些一般的或基本的特点,形式也有该一般的或基本的特点。”^①固然,人们提出某种内容的推理是同一个时代的科学水平有关的,往往是为某一特定阶级服务的,但是,难道据此就可以断定推理形式“相对于科学”、“基本上有阶级性”了吗?

就拿对英雄人物的看法来说吧。我们现在说,凡是英雄人物都是适应于一个时代的社会要求而产生的,岳飞是个英雄人物,所以岳飞是适应于他所处的时代的社会要求而产生的。我们的这个推理,和上面举的那个推理当然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科学水平,具有不同的阶级性。但是两个推理所用的形式是同样的。取决于当时科学水平的,具有阶级性的,是具体的思维内容,而不是那个“所以”(即推理形式)。这是很明显的事情。

由此可见,有些同志的文章虽然也承认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是思维形式,但是按照他们否认思维形式和思维内容的矛盾的观点,人们就不可能去研究思维形式的特点、本质和规律。按照他们的观点,人们只要去分析思维内容的特点,去研究具体的思维内容是否正确就行了;人们只要把这种分析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原封不动地搬过来,用来论

^① 《论“所以”》,《哲学研究》1960年第1期,第36页。



說思維形式，就叫研究了思維形式了，就算是正确地說明了思維形式了。其實，對思維形式的研究如果被對思維內容的研究所代替，思維形式就得不到正確的說明，形式邏輯這門科學也就不能成立了。

金岳霖同志說，形式邏輯的研究對象不能和不当是撇開了具體思維內容的思維形式，但同時他又承認，在研究形式邏輯過程中，要“讓思維形式暫時脫離它的具體內容”。他以判斷為例寫道：“研究的目的是要正確地反映判斷這一思維形式，是要得到科學的抽象，是要得到關於判斷這一思維形式的正確概念”。而在這個概念中，金岳霖同志說，思維形式是暫時地和它的具體內容脫離的^①。當金岳霖同志這樣說的時候，他是說出了形式邏輯這門科學的特點。但是很明顯的，既然要使形式暫時地和內容相脫離，然後才能得到關於思維形式的概念，那就應該承認，作為形式邏輯的研究對象的正是暫時撇開具體思維內容的思維形式。

二

形式邏輯這門科學能起怎樣的用，在哪个方面起作用，取決於它的研究對象是什麼。這是很明白的。一門科學所研究的對象是在什麼範圍內，這門科學就能有助於人們解決在這個範圍內的問題。對於形式邏輯的研究對象採取了不正確的看法，那末，對於形式邏輯這門科學的作用的看法也就勢必錯誤。

對於形式邏輯這門科學的作用，有些同

志的看法是：形式邏輯不僅能夠管推理在形式上是否正確，並且還“管得到”推理在內容上是否正確（指推理的前提、結論的內容是否和客觀實際相符合）。宰木同志寫道：“說形式邏輯只管推理在形式上是否正確，不管它在內容上是否真實，就是要使邏輯研究離開了實際去做‘純’形式的研究，不能不說它是一種迷信觀點，是屬於資產階級的學術觀點。任何形式都是一定內容的形式，離開了內容就沒有什麼形式可言，因而離開了真實，也就沒有什麼正確可言。如果形式邏輯真的管不到推理的是否真實，那我們還有什麼必要再去研究它呢？”^②有的同志說：主張形式邏輯只管思維的形式結構是否正確，而“管不到”思維內容是否正確，最終要把形式邏輯導向唯心主義與形式主義。

有些同志，如周谷城同志認為，在一個具體推理中，前提內容是否正確，這是要靠實踐來檢查的，形式邏輯不研究、也解決不了這樣的問題。這本來是一個很平易的看法。但宰木同志因為主張形式邏輯要管並且“管得到”思維內容（推理內容）是否正確，所以反對上述這種看法。宰木同志是這樣批駁的：“試問哪一種科學研究可以把實踐剔除在外？……誰曾說過形式邏輯的推論可以不注意實踐工夫呢？那末，有沒有人不注意實踐工夫而在‘純理論’地研究形式邏輯呢？有。那就是資產

① 《論“所以”》，《哲學研究》1960年第1期，第34頁。

② 《邏輯研究同樣要聯繫實際》。見《邏輯問題討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77頁。



階級的各式各樣的邏輯實證主義者。”^① 宰木同志的這個反駁，把許多同志所主張的形式邏輯“管得到”推理內容是否正確的含義顯示出來了，這就是：形式邏輯負有依據實踐來判明推理前提是否正確的使命，似乎只有形式邏輯中包括了依據實踐來檢證前提是否正確這樣的內容，才叫做不把“實踐剔除在形式邏輯研究之外”；只有對形式邏輯持有這樣的觀點，才叫做不是“純理論”地研究形式邏輯。在宰木同志發表這種觀點的同時，馬特同志也在自己的文章中說：邏輯理論中的唯心主義者主張推理前提真實不真實不是形式邏輯所要探究的問題^②。

的確，研究形式邏輯是離不開實踐的。列寧說過：“人的實踐活動必須億萬次地使人的意識去重復各種不同的邏輯的格，以便這些格能夠獲得公理的意义。”^③ 而人們認識邏輯的格、認識思維形式及其規律又是離不開在實踐基礎上產生的思維材料的，只有對這些材料進行抽象概括，才能得到關於思維形式及其規律的知識。並且，人們對思維形式及其規律的認識是否正確，歸根到底是要靠實踐來檢驗的。可是，研究形式邏輯離不開實踐是一回事；形式邏輯這門科學本身的內容包括不包括依據實踐來一一檢證推理的各個前提是否正確，這又是一回事。宰木同志把這兩回事混同起來了，他用研究形式邏輯離不開實踐作理由來批駁周谷城同志的意見，這怎么能令人信服呢？

只要認真地、實事求是地研究一下形式邏輯這門科學的實際，我們就會看到，形式

邏輯這門科學中並沒有依據實踐來驗證前提是否正確這樣的內容。從形式邏輯中，我們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關於某個具體的推理所依據的前提的內容是否正確的回答。這是明擺的事實，是否認不了的。那末，是不是可以把這種狀況看作是形式邏輯的局限，應當加以“克服”呢？是不是可以把這種形式邏輯看作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邏輯理論指導下的形式邏輯，從而採取“積極的態度”，對它進行“改造”呢？有些同志就是這樣主張的。但正如周谷城等同志所指出的那樣，這是辦不到的。人類的思維具有無限複雜的內容，在一個個具體推理中所依據的前提的內容千差萬別，形式邏輯根本沒有能力一一研究它們，判定其正確和錯誤。而且這也是不必要的。因為它們已經或正在被各門科學研究着，各門科學依據實踐來回答它們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這樣的工作，毋須形式邏輯去管。如果說，形式邏輯不具體研究各個推理前提的內容，不能解決它們是正確還是錯誤這樣的問題，是一種局限，那末，類似這樣的局限，各門科學都是存在的。化學不研究也解決不了歷史學所研究和解決的問題，歷史學不研究也解決不了數學所研究和解決的問題，如此等等，而其他各門科學也都不研究、都解

① 《邏輯研究同樣要聯繫實際》。見《邏輯問題討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0頁。

② 《馬克思主義的邏輯理論，還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邏輯理論》。見《邏輯問題討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75頁。

③ 《哲學筆記》。《列寧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03頁。



决不了形式邏輯所研究和解決的問題。各門科學都有的這種局限，來源於各科學部門之間的合理分工，是不能夠和不應當加以“改造”的。硬要“改造”形式邏輯，使它不再具有這樣的局限，那就勢必把各門科學一一包括到形式邏輯里面來，使之成爲一種萬能的、駕手一切科學之上的科學的科學。這當然是不正確的。

更多的同志對於形式邏輯“管得到”思維內容是否正確的說法，採取了另一種解釋，即形式邏輯“要求”推理前提的內容必須是正確的。馬特同志後來也採取了這樣的解釋。顯然，僅僅要求前提內容正確，還很難說得上“管得到”推理內容是否正確。自古以來，人們在進行推理時，總是自以爲是要求前提“正確”，而且自以爲是從“正確”前提出發的，但是事實上，人們對正確的標準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而且許多推理所依據的前提其實是錯誤的。

形式邏輯是“管”推理在形式上是否正確的。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第一，形式邏輯研究各種推理形式，指出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不正確的；第二，形式邏輯指明何以某些推理形式是正確的，某些推理形式是不正確的，即它告訴我們判明推理形式正確與否的規律規則。現在，有些同志說，形式邏輯“管得到”推理在內容上是否正確。這句話實際上不外乎下面兩種意思：第一，以爲形式邏輯應當研究各種推理的具體內容，也就是研究各個前提和結論的內容，指明其正確或不正確。但這是辦不到的，前面已經說過了。第

二，以爲形式邏輯能夠指明何以某些內容應當被認爲是正確的，而某些內容應當被認爲是不正確的，也就是形式邏輯能夠指出知識的真理性的標準是什麼，為什麼應當是這個標準而不是別的標準。可是，這是哲學認識論所研究和解決的問題，不是形式邏輯所要研究和解決的問題。硬要形式邏輯解決這樣的問題，那就勢必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包括到形式邏輯中去，這當然也是不正確的。

從形式邏輯不具體研究思維內容是否正確，單靠形式邏輯的知識還不能判明思維內容是否正確這個意義上來說，形式邏輯是“管不到”思維內容是否正確的。既然如此，形式邏輯是不是就與尋求知識和驗證知識的真理性的無關了，就不值得再去研究它了？決不是這樣。前面已經說過，研究形式的目的還是爲了內容，這裡不妨再進一步說明一下。

形式邏輯研究了思維形式，依靠了它的幫助，我們能夠檢查思維形式正確與否，這樣，形式邏輯也就能夠幫助我們去探求知識、去驗證知識的真理性的。具體說來，在判明前提正確的條件下，遵循了形式邏輯的規律規則進行推理，那我們就能夠獲得包含某種新知識的結論（周谷城同志認爲，通過演繹推理不能獲得任何新知識，這個看法是很難令人同意的。宰木同志在文章中批評了這個觀點，這是正確的）。在前提內容業已判明爲正確的條件下，依據形式邏輯的知識，檢查了推理的形式結構，判明了它是正確的，那我們就能確定推理的結論是正確的。反過來，推理的結論業已判明是錯誤的，而依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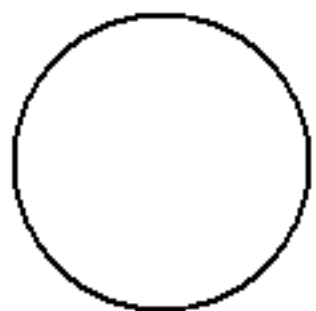


形式邏輯的知識，檢查了推理的形式結構，判明了它是正確的，我們就能夠確定推理前提中至少有一個前提是錯誤的，等等。在所有這些場合，我們看到，形式邏輯雖然不能單獨判定思維內容是否正確，但它對於人們尋求知識、驗證知識的真理性來說，却有着自己的作用，這種作用是其他科學所不能代替的。在所有這些場合，我們也看到，形式邏輯所以能起這種作用，並不是因為它研究了具體的思維內容，而恰巧是因為它只研究思維的形式結構，是因為它提供了判明思維形式結構正確與否的知識。從這些地方可以看出，形式邏輯能夠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在一定限度內，在判明思維內容是否正確方面起作用，不承認這種作用是不對的。但我們必須具體分析形式邏輯在什麼條件下、在何種程度上、通過什麼途徑來起這種作用，而不能向它要求它所做不到的事情。

當然，在全面地評價一個個思想的時候，不只要看它的形式結構是否正確，尤其要看它的內容是否正確。仍以推理為例，我們要評斷推理所達到的結論是否正確，就既要看看推理的形式結構是否正確，還必須看推理的前提在內容上是否正確。我們不能說，一個推理的形式結構正確了，這個結論就是正確的；我們也不能說，這個推理的前提在內容上是正確的，這個推理就是正確的。必須二者兼備，才能說這個推理是正確的推理，它所達到的結論是正確的結論。我們所要求的是，推理的前提、結論的內容正確和推理的形式結構正確的統一。

一方面，在評價一個個推理的時候，應當採取形式和內容相統一的觀點；另一方面，形式邏輯又沒有能力單獨判定推理的前提、結論的內容是否正確，只能用來判定推理的形式結構是否正確，而且承認，一個推理雖然其前提、結論的內容錯誤，但是只要其形式結構正確，這個推理就是合乎形式邏輯的。有些同志不這樣看。他們認為，既然我們要求的是內容正確和形式正確的統一，那末，一個推理，其前提、結論的內容錯了，就沒有什麼形式正確可言，這個推理就應當被看作是不合形式邏輯的，如果還認為它合乎形式邏輯，那末這種形式邏輯就沒有用了，就不再是科學了，就是“形式主義的”邏輯了，就應當被“改造”。這個看法是不對的。

所謂內容錯誤就沒有什麼形式正確可言的說法，是與事實不相符合的。拿推理來說，為了達到錯誤的結論，牽強附會地進行推論，破壞了形式邏輯的基本規則的情形固然是很多的，但確也有這樣的情形：前提、結論的內容錯誤了，其形式結構卻是正確的，也就是說，這種推理是從內容錯誤的前提合乎邏輯地引伸出了一個內容錯誤的結論。還可以拿文章來作一個比喻，固然有很多內容很壞、文理也不通順的文章，但確也有內容貧乏、錯誤而文理通順的文章。既然有這樣的事實，辯證唯物主義就不能加以否認。在辯證唯物主義看來，形式和內容的統一是有條件的、相對的，其中包含着矛盾，同樣的內容可以具有不同的乃至相反的形式，而同樣的形式也可以附着於不同的乃至相反的內容上。辯證唯物主義



承认形式和内容之间的这种矛盾，并且正因为看到了这种矛盾，才认为我们在看待事物，例如看待文章、推理的时候，必须采取形式和内容相统一的观点，不能只看内容，不看形式，或者只看形式，不看内容。如果凡是内容贫乏、错误的文章就一定文理不通，凡是前提、结论内容错误的推理其形式结构就一定不正确，等等，那末，在评价文章、推理等等的时候，就只要看它们的内容、或者只要看它们的形式就行了。这样一来，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要求对我们也就没有意义了。

指出形式和内容的区别和矛盾是有实际意义的。这种实际意义就在于使我们可以如实地评价那些内容和形式有矛盾的事物，就在于提醒我们，对于错误的东西，要具体地分析其错误是在内容方面，还是在形式方面，从而根据不同的情况，用相应的武器来批判它。对于文理通顺但内容贫乏、错误的文章，用语法这门科学所教给我们的知识去批判，那是白费力气。对于内容错误、形式结构正确的思想，要想用形式逻辑去批判倒它，那也是徒然的。要批判这样的思想，必须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依据有关科学的研究成果，依据事实。内容错误的思想，常常会犯逻辑错误，这时形式逻辑就能够而且应当在批判这种错误思想时起作用。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单靠形式逻辑，或主要靠形式逻辑，也是驳不倒错误思想的。列宁说：“单靠论据和三段论法是不足以驳倒唯心主义的。”^① 现在有些同志以为内容错误的思想，形式也就一定错误，以为单靠形式逻辑，或主

要依靠形式逻辑，就能批判一切错误思想，并将其驳倒。他们的这种观点，其实是不利于和错误思想作斗争的。

指出形式和内容的区别和矛盾的另一个重要的实际意义在于，它提醒我们，为好的内容取得一个同它相适合的形式，是要经过一番努力的。如果内容正确的文章，天然就是文理通顺的，那末，文章家就不必用气力去学习如何遣字造句行文，而语法学、修辞学也都可以废除了。如果一幅画的思想内容好，天然就会具有很好的形式，那末，画家就不必用气力去学习用笔、构图、透视等等了，而素描学、透视学都可以废除了。但是，事实上，文章家和画家总是要为熟练地掌握这些属于技巧和形式方面的本领而花很大的气力，虽然他们永远不可能仅仅依靠这方面的本领而成为大文章家和画家。只是卖弄技巧和形式，那是形式主义者。但是如果为了怕成为形式主义者而不在技巧和形式方面下功夫，不能熟练地掌握这方面的本领，那也永远达不到形式和内容的统一。

很明显的，我们不能因为语法这门科学只能用来检查文章的遣字造句合不合式，无力判明文章内容的好坏，就说语法没有用，不是科学，就说这种语法是“形式主义的”语法。我们更不能因为，我们要求于一篇文章的不仅是文理通顺，尤其要内容充实正确，就认为必须把现在的语法科学加以“改造”，让它来研究什么叫文章的内容好，什么

^①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页。



叫文章的内容坏，让它来教导人們判明文章内容的好坏。同样的道理，全面评价一个思想的时候，既要看它的内容是否正确，也要看它的形式是否正确，但决不能据此就说，用来检查思维形式是否正确的方式逻辑就没有用，就不是科学，就应当加以“改造”，要它来研究思维的具体内容，使它单独地判明思维内容是否正确。现在有些同志，对于形式逻辑原来能够起的作用——检查思维形式结构是否正确——极端轻视，说形式逻辑如果只能起这种作用，形式逻辑就等于没有用；他们要求形式逻辑起更大的作用——研究思维的具体内容，判明它是否正确，这却又是形式逻辑所无力胜任的。这样一来，形式逻辑岂不是就进退两难，无路可走了吗！

三

可以看出，有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是混淆了。一个问题是：有没有只有内容没有形式的思维，或者只有形式没有内容的思维。对于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是：没有。一个问题是：是不是可以从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的统一体中，把思维形式抽取出来作为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用这种研究的成果来检查思维形式是否正确，并通过这个途径来对探求、表述、论证正确的思维内容起作用。对于这个问题的正确回答是：可以的。显然，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用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来代替、偷换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上面提到的那些同志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虽然有某些差异，但是在实际上却都是以下述的方式

来立论的：“形式和内容是不能分割的，有内容就有形式，有形式就有内容”，“任何形式都是一定内容的形式，离开了内容就没有什么形式可言”，等等；据此，他们就讲，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不应当只是思维形式，不应当不探讨推理前提的内容是否正确，不应当管不了思维内容是否正确。这就是说，他们都错误地以为，既然对第一个问题应该作否定的回答，对第二个问题不用多说也应该作否定的回答了。

所以有这种混淆，是因为他们对思维是思维形式和思维内容两者的统一的了解是形而上学的。他们在统一的东西中，看不见它的不同方面、不同属性所具有的差别。在统一的地方，他们只看见统一，看不见统一中所包含的矛盾；在互相联结的地方，他们看不见在联结成一个整体时各个不同方面、属性所仍然存在的相对的独立。他们只是在口头上承认思维形式和思维内容是有分别的，但是，在实际上却否认思维形式和思维内容之间的区别和矛盾。

这种形而上学的了解使他们以为，只要主张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的科学，是用来检查思维形式结构是否正确的，那就是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事情难道真是这样吗？

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逻辑理论在形式逻辑研究对象问题上的错误，并不在于它们认为形式逻辑只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而在于它们对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观点，对于如何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观点，是唯心主义和形式主义的。



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邏輯理論或者认为思維形式及其規律是先驗的，或者认为它們是人們为了自己的需要和方便而臆造出来的。

康德所持的观点是先驗論。他說：“邏輯应当包含的仅仅是先驗的規律”^①。他又說：邏輯“仅論究先天的原理”^②。和康德一样，牟宗三說：邏輯就是“理性自身的形式方面的发展或推演”^③；又說：“理性自身就是不关論外界的那普遍的形式的人类理性。……邏輯的推演完全是先天的，不依靠經驗的。”^④

另一些唯心主义者，采取另一种观点。例如邏輯实证主义者卡尔納普认为，說邏輯規律是对于“真正的邏輯”（即客观邏輯）的忠实表达，乃是一种虛妄的、无意义的、形而上学的見解。他以为邏輯規律就像玩紙牌的規則一样是人們随心所欲地規定的。照卡尔納普的說法，“邏輯就是語法。”他写道：“对于語言底形式，我們在每一方面都有完全的自由；不論构造句子的規則和变形規則（后者通常被称为‘基准’和‘推論規則’），都可以十分任意地选择。”^⑤和这种观点相类似，張东蓀认为：“同一律是思想上的律而不是事实上的律。于此所謂思想却是指‘說話’而言。倘使采取唯物的見地，以为思想是事实的映印，那就不相謀了。在此所謂思想完全是說人类用符号（即言語）所表示的东西。这些符号是人造的，不是事实的映印。符号与符号之間具有內在的規則。这种內在的規則就是所謂邏輯。于是我們便可卑之无甚高論，而知道这种思想律只是說話的規則罢了，不必有

客观的对应，亦不是宇宙的理性。”^⑥

各种唯心主义的邏輯理論，虽然有那样那样的不同，但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它們都否认思維形式及其規律的客观性。这种理論之所以被称作是形式主义，是因为它們都把思維形式看作是和思維內容完全无关的东西。它們以为，先驗的、或人所臆造出来的思維形式，是人們外加于思維內容之上，以使用来整理思想的內容，整理經驗，整理事物的。

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邏輯理論既然把思維形式及其規律看作是和思維內容、和客观世界完全无关的东西，于是这种理論就认为，对于思維形式及其規律的研究，无須从实际存在的并受實踐檢驗的思維材料出发。既然认为思維形式及其規律是先驗的，康德就說：“邏輯既不能从任何科学中获得原則，也不能从任何經驗中获得原則。”^⑦而牟宗三就說：研究形式邏輯“首先在認識邏輯本性而指定那理性自身”；就說：“几个前提一确定，就可以推出全部的邏輯世界。”^⑧既然认为思

① 轉引自《邏輯問題》，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3頁。

② 《純粹理性批判》，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1頁。

③ 《邏輯与辯證邏輯》。見《唯物辯證法論战》（这是由張东蓀主編的一本反对唯物辯證法的論文集），民友书局1934年版，第77頁。

④ 同上书，第93頁。

⑤ 轉引自康福斯著：《科学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159、161頁。

⑥ 《唯物辯證法之总檢討》。見《唯物辯證法論战》，民友书局1934年版，第187頁。

⑦ 轉引自《邏輯問題》，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3頁。

⑧ 《邏輯与辯證邏輯》。見《唯物辯證法論战》，民友书局1934年版，第92—93頁。



維形式及其規律是人們臆造出來的，卡爾納普就認為，研究形式邏輯就是去給“基本的邏輯符號”指定某種意義，就是“自由地”去創造某種公式或符號的系統。

在唯心主義、形式主義的邏輯理論看來，思維形式正確與否，是指它和先天的原理是否相符，或者能否在自己創造的系統內說得過去，不相矛盾，根本和反映客觀實際的思維內容無關，根本用不着去找它們的客觀的對應（即根據），因為這種東西是不可知的，或者根本就是不存在。這種割裂思維形式和思維內容、割裂思維形式和客觀存在之間關係的觀點，當然是錯誤的。用這種觀點來研究思維形式及其規律，完全對形式邏輯的曲解。

和唯心主義、形式主義的邏輯理論相反，在辯證唯物主義看來，思維形式及其規律雖然和物質世界不同，它們只存在於人們的思維過程中，但是，人們的思維所以有這樣的形態，而不是別樣的形態，所以必須遵守這樣的規律，而不是別樣的規律，却不是先驗地確定了的，也不是人們可以隨意選擇的，它們具有客觀性。也就是說，思維形式歸根到底是客觀事物的反映，思維形式的規律也是有自己的客觀根據的。列寧曾經指出：“邏輯形式和邏輯規律不是空洞的外殼，而是客觀世界的反映。”^①他又說：“最普通的邏輯的‘格’……是事物的被描繪得很幼稚的——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最普通的關係。”^②在辯證唯物主義看來，思維形式對於思維內容不是“外在的”東西，不是人們為了某種目

的將其附加到思維內容上去的東西，而是思維內容本身的形態，是思維內容的各個組成部分的連結構造的方式。

從上述觀點出發，對於如何研究思維形式及其規律，就得出和唯心主義、形式主義的邏輯理論完全相反的結論。第一，思維形式既然是思維內容本身的形態，因此就應當研究大量的豐富的思維材料，主要是研究其內容已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思維材料，考察其中的思維內容是以怎樣的方式構造起來的（注意：仍舊不是研究這個或那個思維內容是否正確、是否符合客觀實際之類的問題）。只有進行了這樣的 research，在大量的思維材料的基礎上進行抽象概括，我們才能獲得思維的形式結構的種種類型及其相互關係的知識。當思維形式隨着思維內容的發展、豐富而發展、豐富起來的時候，這樣的 research 就能夠擴大和加深我們對於思維形式的知識，把形式邏輯科學推向前進。第二，思維形式既然是思維內容本身的形態，所以思維形式結構正確與否，就是看它對思維內容起着何種作用而定（注意：不是隨着具體的思維內容是否正確而定）。某種思維形式結構是正確的，這是說它能夠把思維內容確定地、不矛盾地、有條有理地組織起來和表達出來。就推理而言，運用正確的推理形式，在前提內容正確的條件下，就能保證我們得到正確的結論。某種思維形式結構是不正確的，

① 《哲學筆記》。《列寧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92頁。

② 同上書，第189頁。



这就是說它对于思維內容不能起上述的作用。在實踐中，經過了长期的、反復了亿万次的檢驗，人們看到了某些思維形式結構起着上述的好的作用，某些思維形式結構則不然。在这样的基础上，人們才能制訂出关于各种思維形式結構是正确或不正确的理論来。离开了思維形式对思維內容起着怎样的作用的問題，思維形式就談不上正确或錯誤。第三，某种思維形式結構所以能起这种作用，而另一种思維形式却起另一种作用，归根到底取决于它們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及其关系。因此，要正确地說明某种思維形式結構何以正确或何以錯誤，要說明其中的規律，就不能不研究思維形式結構及其規律的客观根据。

在形式邏輯研究对象問題上，辯證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觀點就是这样地对立的。这两种观点之間的对立不在于一个主張形式邏輯既要研究思維形式，又要研究思維內容，一个主張形式邏輯只研究思維形式。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邏輯理論必須批判。可是，如果不切实地具体地去分析唯心主义者在这个問題上的观点何以是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那末，我們就不可能把矛头指向真正的唯心主义、形式主义，我們的剖击就会不中腠理。有些同志在看到康德、邏輯实证主义者們主張形式邏輯只研究思維形式，就說誰主張形式邏輯只研究思維形式，那他的观点就是从康德、从邏輯实证主义者那里继承下来的。这些同志为了反对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邏輯理論，就起来反

对形式邏輯是研究思維形式及其規律的科学，这就正像我們所常說的，在倒洗澡水的时候，把澡盆里的孩子也潑了出去。

在形式邏輯的作用問題上，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邏輯理論的錯誤，也并不在于它們认为形式邏輯的作用是檢查思維的形式結構是否正确，而在于它們或者把这种作用看得一文不值，或者竭力夸大这种作用的意义。康德既然把形式邏輯所研究的思維形式及其規律看作是和思維內容、和客观世界无关的东西，因此他就认为，形式邏輯虽然能够提供判断思維形式結構是否正确的标准，但是它对于人們寻求知識、验证知識的眞理性來說是毫无意义的。邏輯实证主义者則认为，眞理的标准无非是命題和命題、思想和思想間的一致，不相矛盾。邏輯实证主义者紐拉特写道：“句子要和句子來比較，不是和‘經驗’，不是和一个‘世界’，也不是和任何別的东西。……每一个新的句子都要碰到一种由許多現成的并且已被弄成一致的句子所构成的总体。所以一个句子如果能被放在这个系統里面，它才被称为正确的。凡我們不能使之入于系統的，就須作为不正确而予以擯棄。”^①这就是說，一个思想只要其形式結構正确，其內部沒有自相矛盾之处，它就是眞理。这样一来，原来是在檢查思維形式結構方面起作用的形式邏輯，就被看作是眞理的最高、唯一的評判者。

我們只要肯定了思維形式及其規律的客

^① 轉引自康福斯著：《科学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三联书店 1954 年版，第 189 頁。



观性，肯定了思维形式乃是思维内容本身的形式，我们就和康德完全相反，认为形式逻辑所提供的检查思维形式是否正确的标准，对于人们寻求知识、验证知识的真理性来说是有用的。我们只要肯定了一个思想之是否正确不仅要看其形式是否正确，而且主要地是要看其内容是否和客观实际相符合，我们就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完全相反，认为用来检查思维形式结构是否正确等形式逻辑，并不是什么万能的科学的科学。现在有些同志认为，形式逻辑如果只对检查思维形式结构起作用，那它就不配当科学研究的工具，形式逻辑就没有用，这时他们的观点恰巧和康德是一致的。当他们在反对这种“无用的”形式逻辑时，他们企图改造它，使它成为知识的真理性的全能的评判者，这却是某种唯心主义、形式主义，例如逻辑实证主义所能够赞同的。这些同志没有能正确地反对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逻辑理论，就因为他们的观点不符合形式逻辑这门科学的实际，就因为他们所根据的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而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长期以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理论支配着形式逻辑这门科学，它们歪曲了形式逻辑的本来面目。在旧的形式逻辑的著作和教科书中，不但对这门科学的理论解释还存在着很多错误，就是在介绍形式逻辑这门科学本身的内容方面，也存在着烦琐、脱离实际等毛病。这些都是必须批判和纠正的。但是我们应当做的，是要批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加在形式逻辑科学身上的种种歪曲，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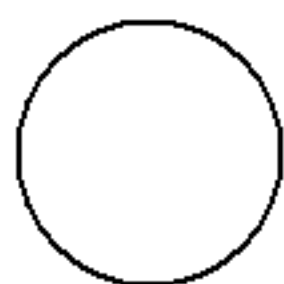
不是要从研究对象和作用范围等方面去“修正”或“改造”形式逻辑这门科学。可是，现在有些同志却要改变形式逻辑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要扩大这门科学的作用，要改变这门科学的性质。正如上面所分析的，这样做结果，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逻辑理论对于形式逻辑科学的本来面目所作的歪曲，并不能得到纠正，反而会又一次地歪曲形式逻辑的本来面目；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逻辑理论并不能被驳倒，反而会取消了形式逻辑这门科学。

辩证唯物主义为形式逻辑科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形式逻辑科学的发展开拓了道路。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我们就能批判和清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逻辑理论，就能对形式逻辑科学及其规律规则作正确的理论说明，还它一个本来面目。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形式逻辑这门科学的实际状况出发，掌握丰富的材料，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就必定能取得新的有价值的成果，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相反，如果不从形式逻辑科学的实际情况出发，任意摘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语句，使之简单化、片面化，以这作根据，对形式逻辑提出种种要求，并企图把辩证唯物主义的某些内容搬到形式逻辑科学中去，把它们作为形式逻辑科学的内容，那是不正确的，也是没有益处的。



红旗

HONGQI



8

一九六一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六一年第八期★

目 录

粮猪并举,互相促进本刊评论员 (1)

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肖 述 (4)

有事同群众商量林一舟 (10)

东日生产大队公养私养并举,发展养猪业
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农村调查组
 中共新会县委员会 (14)

一个实行粮食生产和畜牧业并举的生产大队
赵 明 曾 源 (17)

人民公社工业的创建、巩固和发展
李成瑞 左春台 (20)

努力提高轻工业产品质量,满足人民需要.....陈克奇 (29)

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南斯拉夫农业廖 原 (35)



.



粮猪并举，互相促进

本刊評論員

本刊这一期发表了广东省崖西公社东日生产大队和河北省建明公社西铺生产大队的两篇调查材料。这两篇材料所叙述的，都是养猪业和其他饲养业同发展粮食生产互相促进的关系。两个大队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都注意相应地发展饲养业，特别是养猪业，因而就反过来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西铺大队，每头猪一年可出肥料一万几千斤，几年来养猪增多，精肥也逐年增多。肥多粮就多。东日大队一九六〇年晚造亩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三十，养猪积肥是一个重要原因。粮食增产了，饲料增加了，就又促进了养猪业。这两个材料，同时也说明发展养猪业可以增加集体收入和社员的副业收入。

东日大队和西铺大队的材料使我们再一次看到：粮猪并举，互相促进，综合发展农村经济，确是大办农业的一种比较完善的方法。这比那种单纯地抓粮食生产而忽视饲养业，更能促进粮食生产的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中，无论从当前看，从长远看，粮食又是基础。所以办农业必须以粮为纲，也就是说，大办农业，首先是大办粮食。这是我们的一个最根本的方针。但是农业的内部构成是很复杂的，农业从来都不是一种单纯发展粮食生产的经济，而是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等在内的综合经济。当然，农业内部是有

分工的，各生产单位在不同条件下，经营的重点是不同的。但是，绝不能因此否定农业内部的各个部门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研究和了解这种在长期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关系，实事求是地研究和掌握农业内部的发展规律。领导农业生产，应当以粮食生产为纲，因地制宜地综合发展其他经济，实行粮食与多种经济并举，粮食与畜牧业并举的方针。这样，才能迅速地发展农业，迅速地发展粮食生产，否则，粮食生产本身的发展也要受到限制。

就粮食和畜牧业的关系来说，不发展粮食生产，不解决饲料问题，畜牧业就不可能发展；同样，不发展畜牧业，尤其是养猪业，不大力从这方面解决肥料问题，也势必延缓粮食生产的发展速度。“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我国的这个谚语也正确地说明了粮食生产和畜牧业的密切关系：五谷丰登为六畜兴旺提供条件，六畜兴旺又为五谷丰登提供条件，彼此互相依存，互相促进。近来我们常说，猪为六畜之首。这是因为发展养猪能够最大量、最经常地提供质量最好的肥料，对发展粮食生产关系最为密切。目前我国无机化学肥料还很少，肥料来源第一还是厩肥。猪粪肥是有机肥料，它含有农作物所最需要的多量的氮、磷、钾三要素，并含有比较丰富的有机物，可以增强土壤中对植物营养有



益的微生物的活动,能培养地力和改良土壤。实践经验和科学理论证明:不能完全用无机化学肥料来代替有机肥料。即使将来化学肥料多了,也还应当尽可能地增加厩肥。厩肥和无机化学肥料混合使用,才更有利于土壤的改良和农作物的增产。我们切实地认真地执行粮猪并举的方针,一方面可以使粮食生产有可靠的肥料基地,另一方面可以使养猪业的发展有巩固的饲料基地,这样就能够促进粮猪两项都大大地发展。而且,养猪还可以提供肉食,提供轻工业生产的原料,无论对国家、对集体、对个人都有很多好处。

一般说来,各个农村人民公社、各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具有实行粮猪并举的不同的潜在可能性。要把可能性变为现实,需要有正确的领导和其他适当的措施。就领导来说,发展养猪业的关键,在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公养私养并举、而以私养为主的方针。目前,在大多数农村,在大多数情况下,应当采取各种有效办法,发动社员养猪的积极性,普遍地组织社员养猪,同时,在有条件的地方,当然也应当积极地逐步地发展集体养猪。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五五年在批发浙江省一个合作社的材料时,就指示:“除了合作社公养以外,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分作几年达到这个目的。”(少数禁止养猪的民族地区当然不在此内)首先做到每户养一头猪,然后争取每户养二头猪,这是我们几年内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我们应当努力完成这个任务,并且应当有信心完成这个任务。

社员家庭副业是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和助手,一切可能的地方,社员家庭养猪应当

成为其副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员家庭养猪有许多方便条件。农民原有的养猪经验和设备可以发挥利用,而且分散饲养比较容易管理好,管理简便,能减少疫病传染,可以充分发挥辅助劳力和零星资源的作用,成本比较低。只要发动社员积极性,并提供适当的条件,就能使养猪业在短期内大量发展,这样能较迅速地满足国家日益增长的需要。同时,还应当看到,在集体经济条件下的私养和个体经济条件下的私养,是有所不同的。社员的收入主要来自集体经济,包括养猪在内的家庭副业只是社员收入的一小部分。而且,在集体经济条件下,私人养猪,受益的不仅是社员个人生活,在生产上受益的,主要是集体经济。社员积极积肥并把肥料卖给集体(生产队应尽可能把社员家庭积肥,纳入自己的总的积肥计划之内),就是对于集体生产的贡献。社员家庭养猪和集体经济这两者的关系,有一致的方面,也有矛盾的方面。只看到一致的方面不看到矛盾的方面是不对的,只看到矛盾的方面不看到一致的方面也是不对的。我们领导的任务,是要采取适当的办法,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使两者的关系更好地一致起来。公私并举是我们发展养猪业的长期方针,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即使将来公养部分在整个养猪业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在积极办好集体经济、不妨碍集体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全国社员养猪的数量也还应当尽可能地增加。因此,在领导上来说,不能只顾公养而不顾私养,也不能只顾私养而不顾公养。在目前则必须用大力提倡和领导社员家庭养猪,发掘私养的潜力,并且切实解决在发展社员家庭养猪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在集体经济条件下全面地发展养猪业，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新事业，不是泛泛地只做一般号召或空发议论所能够解决问题的。东日大队和西铺大队同志们的可贵处，是他们不仅较早地懂得必须正确地执行这一方针，并且在鼓励社员家庭养猪方面，及时地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主要的是：（一）搞杂粮生产，种可作饲料的高产作物（如番薯），以保证猪的饲料。这是发展养猪业的根本问题。两个大队的经验都是，杂粮增多了，饲料多了，猪也可以养得多。为了帮助社员养猪，生产队还给社员配售饲料，并提供其他各种方便。（二）为了解决饲料问题，使社员在不妨碍集体劳动的条件下，有可能种好自留地。并且很好地安排集体劳动的时间，执行放假制度，使社员有时间从事家庭副业。（三）帮助社员解决猪仔问题。东日大队一九六〇年为私养和食堂养猪提供了七百八十多只猪仔，满足了社员的需要。（四）按照规定向社员收购肥料，合理作价，按质论价，按期付款。（五）社员出售肥猪，适当留肉，多养猪多吃肉。（六）实行免费防疫制度。采取这些措施，对于发动社员家庭养猪起了很好的作用。一般说来，各个公社、各个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可以根据本地情况适当采用这些措施。为着鼓励农民养猪，国家自然也要考虑进一步合理地解决收购价格和饲料供应等问题。

在鼓励社员家庭养猪的同时，有条件的地方，必须积极地逐步地发展集体养猪事业。集体养猪代表着养猪业的伟大前途。但是，各地经验和这两个大队的材料都证明，集体养猪事业只能而且必须根据实际可能条件，逐步地发展。目前不少地方还缺乏大量集体

养猪的经验和必要的物质条件，因此，必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养好一批发展一批。在目前一般情况下，集体养猪应该以生产队（原来的生产小队）和食堂为主，集体养猪的规模应该以小型为主，决不能不顾条件是否具备，主观地盲目地想多就多，想大就大。必须根据设备的逐步改善，饲料的逐渐增多，科学管理经验的积累，饲养责任制度的健全，卫生防疫力量的增强等等条件，使集体养猪的数量从少到多，使集体猪场的规模从小到大。东日大队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可供那些有条件发展集体养猪的地方作参考。

从党中央提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以来，各级领导机关在调整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技术改造，进行整风整社，坚持和巩固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提高社员生产积极性等等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所有这些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发展农业，发展粮食生产，使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能够更好地适应城乡人民生活的需要，适应整个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东日大队和西铺大队两篇材料所提供的粮猪并举，互相促进的经验，也证明发展养猪是增产粮食、发展农业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只要我们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抓紧发展养猪业，发展饲养业，就能够更好地持续地促进粮食生产的发展。粮食是宝中之宝，大办粮食是全党全民共同的光荣任务。我们相信，贯彻执行中央既定的方针政策，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我们一定能够争取今年粮食生产的好收成，并且逐步地使粮食生产和整个农业生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

肖 述

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一个根本原则。在我們办任何事情的时候，能不能办，如何办，都須看实际条件而定，要經過調查研究，按照具体的時間、地点、条件解决問題。

要不要注意研究客观条件？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答复从来是肯定的。人們能够自觉地为自己的行动規定某种任务和目的，并为实现这种任务和目的而进行斗争，这就是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我們革命工作者当然必須十分重視人的主观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任务本身，只有当它所能借以得到解决的那些物质条件已經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的。”^①我們在实际行动中为自己規定某項任务、某种目的并为此而奋斗，无非是为着促使某种事物的轉化，使某种可能性轉变为现实，例如，使某項計劃轉变为实际，使农作物由低产变为高产，使落后变为先进，使我們的工作由这一步进到那一步，等等。要实现这种轉变，不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一定的物质基础，是不行的。

毛澤东同志說：“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

互相斗争的結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轉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沒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轉化。”^②客观地分析现实中包含的各种可能性，掌握为实现好的可能性所必需的一切条件，这是科学的任务，也是领导的任务。

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我們一方面要具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的雄心壮志，一方面又必須脚踏实地，把自己当前的一切行动計劃、任务，建筑在实际可能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筑在抽象可能或虛假可能的基础之上。办一切事情，要考虑需要和可能两方面，不能只顾需要而不顾可能，不能以主观願望代替对于实际条件的估量。虽然一切合乎規律的可能性或迟或早要轉变为现实，但它們的轉变总須依賴于各种必要条件的成熟。正确的任务就是符合于群众的需要，并有必要的客观根据的任务。人們的行动总要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因此，必須

^① 《政治經济学批判》序言。《政治經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頁。

^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頁。



願到客观条件的許可，不能超越客观条件所許可的限度去期求事情的成功。以征服自然为例。人們征服自然的能力，从总的发展趋势來說，从人类世世代代的长过程來說，是无限的，发展生产的可能性，增产的潛力是无穷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定的阶段，人們征服自然的能力，增产的可能性和潛力，又是有限的。在任何条件下，生产的增长都不能不受任何限制。当我们的生产达到某种程度时，为要突破限制，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就需要改变原有的条件，創造新的条件。只有新的条件被不断創造出来，增产的可能性才能随之不断增大。又如，我們领导任何一項运动，干部的力量和群众的觉悟程度，都是重要的条件。毛澤东同志屢次向我們指出，我們在一切工作中，既不可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違反群众自願的原則，也不可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違反领导群众前进的原則。

每个地区都是全局的一部分，都有基本相同的东西，有共同的一般的規律性，或者叫做共性，因此就能提出和規定一般的原則、总的方針、共同的任务。但各个地区又有不同的个性，它們之間存在着具体条件上的許多差別，因此在把一般原則、总的方針应用到不同的具体条件下的时候，步驟、方法、形式等就应有所不同。这就是，要使原則性和灵活性相統一，因时因地制宜。我国地域辽阔，各地条件差別很大，不論在革命中或建設中，每个地区在貫徹执行党的路綫和政策的时候，必須注意当地的具体条件，按不同地区的

不同条件，决定当地当时的工作任务和方法。党的路綫和政策是以全面的形势为依据而制定出来的，如果背离了党的路綫和政策，工作就会犯錯誤；但要真正地，而不是形式上执行党的路綫和政策，又必須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否則也要犯錯誤。

一九四二年，毛澤东同志在《經濟問題与財政問題》一文中，曾以陝北地区农业工作为例來說明一切工作要实事求是地深入調查研究，按照具体的時間、地点、条件解决問題的道理。他說：“要因地因时制宜。农业的地区与時間不同，发展的方法也不同。例如警备区沒有荒地(除清澗有少数)，耕地不能扩大；羊子为牧地限制，发展有限；运盐又缺乏驮牲；减租政策又未彻底；因此，那里的粮食沒有增产，副业除紡織外亦未发展。但是多鋤草、多施肥、多犁地的深耕(改良作法)办法，虽在那里早已实行，也还應該根据现状作进一步的研究，以期尽可能的增产。但是这种办法，若拿在土地多、人口少、作法粗的区域去用，便少实效。因为这些办法都要增加劳动力。在后一种地区的农民看来，深耕不如多种地，多施肥不如多开荒；尤其在雨水少的区域，多种地是較強的。所以改良农作法的口号，現時在后一种区域一般是少实效的。在这些区域，目前真正增加产量，最主要的还是靠开荒。”由此，毛澤东同志指出：“我們指导农业，要依各种不同地区而采取不同方法，……不但在大的区域之間要有分別，就是在一县、一区、有时甚至在一



乡之内，也要有这种分别。”^①

各个地区应当互相学习经验，应当按照自己的条件推广先进经验。由于各地的条件千差万别，有些事情在甲地能够办或者能够这样办，在乙地未必能办或者未必能完全照这样办。在介绍一项先进经验的时候，必须弄清楚当时当地的条件，说明这些条件对于它的成就起了什么作用，说明主观努力是在什么条件的基础上发挥作用的，而不能只是笼统地讲述成果，不分析该项经验产生的具体条件。在学习和利用别人经验的时候，必须注意本地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如果简单地抄袭，就容易弄出错误。

曾有人以为，如果我们讲客观条件，就会妨碍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他们把重视条件和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什么是主观能动性？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同志说：“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②由此可见，我们要发扬这样的自觉的能动性，就必须正确地认识和估量客观条件，从实际出发采取行动。

人们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创造历史，这就是说，人们能够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们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并在

这个基础上，依托现存条件，为实现一定的目的和任务而努力。在一种任务还没有完全实现以前，由于事物的矛盾规律，事物的发展往往有诸种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可能性，有好的可能性，也有坏的可能性，它们是由许多互相矛盾的条件支持着的。这些条件对于实现我们的目标、对于实现我们所要争取的可能性来说，有的发生有利作用，有的发生不利作用。对于这些条件，我们必须客观地而且全面地认识它们，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它们的变化发展的趋向，这也就是所谓观察形势。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尽一切努力，运用并创造有利条件，克服或限制不利条件，或使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条件。这就是排除实现坏的可能性，争取实现好的可能性，使形势变得对我们完全有利。不仅如此，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不限于眼前的任务，而且还展望到将来。我们是“在现今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将来”^③的人，所以在实现当前的任务中，还应当积极地为下一步任务准备条件。我们对于客观条件和形势认识得愈好，估计得愈正确，我们也就愈能驾驭这些客观条件，愈能获得主动权，从而能够最有效地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也就是毛泽东同

①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解放社1944年订正再版，第18—19页。

②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67页。

③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版，第40页。



志所說的，人們必須把自己活動的舞台建築在認識客觀條件和客觀條件允許的基礎之上，建築在既定的物質基礎之上，凭借這個舞台，充分發揮主觀能动性，就可以演出很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戲劇來。

我們對於主觀能动性的作用的了解，如果超過上述的意義，例如把它了解為我們的活動可以脫離既成的條件，人們可以在不具備必要條件和一定的物質基礎的情形下，任意地規定和實現某種任務，或者把僅在將來有可能實現的任務，勉強地放到現時來做，那是不正確的。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脫離客觀條件，忘記我們活動的舞台必須以一定的客觀物質條件作基礎，我們只能變為亂撞亂碰的魯莽家，就談不到正確地發揮主觀能动性。

所以，採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重視客觀條件，不僅不會妨礙人們主觀能动性的發揮，恰恰相反，重視客觀條件正是為着正確地和真正有效地發揮人們的主觀能动性，前者是後者所不可少的一個前提。

但是，事實上，確實也有人在重視客觀條件的借口下因循敷衍，對實踐採取消極態度。應該指出，在這種情形下，主觀能动性之所以不能發揚，並不是因為他們重視了客觀條件的緣故，而是因為他們以一種不正確的態度、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對待客觀條件的緣故。客觀條件中有對我們的工作有利的條件，又有對我們工作不利的條件；他們却往往只看到不利的條件，而看不到有利

的條件。在我們的工作中，許多客觀條件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動的、可變的、暫時的；但他們只是在某種條件已經完全出現的時候，才能看到它，而當它正在生長、興起的時候，却視而不見。他們名義上重視客觀條件，其實並沒有對於客觀條件進行科學的全面分析。

如果不承認客觀條件，以為提出一種任務，進行一種工作，不需要估計客觀條件，那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如果以為人的行動只能消極地適應客觀條件，以為只有在具備了一切有利條件而沒有任何不利條件的時候，才能提出某種任務，進行某種工作，這種觀點只是使人放棄了主觀努力，當然也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

如果放棄了主觀努力，那就不但不能夠改造實際，而且也不能夠認識實際。要科學地、全面地認識各種客觀條件，了解其作用和相互關係，是要經過一番努力的，為此就要進行調查研究，就要在實踐中取得經驗。沒有這種努力，是得不到正確認識的。我們根據已經存在或者正在形成過程中的某些客觀條件，提出一項任務，並不是說，為最後實現這一任務所必要的一切條件都已完全具備了。有沒有客觀根據提出某項任務，這是一回事；在某項任務提出以後，爭取任務的實現，使可能變為現實，這又是一回事。爭取任務的實現，就是依據現存條件，加上主觀努力，逐步創造出為實現這一任務所必要的一切條件，使可能趨勢變為事實。所以實現任務的過程，



同时又是依靠主观努力进一步认识条件和创造新的条件的过程。

以军事为例。在军事上，我们提出战略反攻的任务，是因为就全局说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已经存在，战胜敌人的实际可能已经存在，但反攻任务的提出，并不等于我们已经胜利，敌人已经失败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反攻的条件和形势，具备着决定胜败的可能性，但还不是胜败的现实性，还没有实现两军的胜负。要战胜敌人，就必须发展和继续创造新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例如，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我军是在力量已大为增强，并已争取到粉碎敌之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迫使敌人转入防御的条件下，提出反攻任务的。我们的最后胜利，是依托了上述的条件，积极发挥主观努力，采取“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①的正确方针，实行决战，不断创造新的条件，克服种种困难，而争取得来的。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②。“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③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极高地、同时也是最恰当地评价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种主观作用，也正表

现在它能为获取胜利继续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

革命工作一般总是要求我们在比较差的条件下，积极创造条件，克服一切困难，做出成绩，夺取胜利。革命不是坐享现成的有利条件。我们革命的胜利，大家知道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可能轻而易举。毛泽东同志曾经着重指出：“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④。我们有使我国变成富强的实际可能，但要达到这一目标，仍需要我们发挥极大的主观努力，采取多快好省的正确方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利用已有的条件，不断地探索和创造新的条件。例如工业战线上的持续跃进，在目前需要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去继续创造条件。其他战线上也是这样。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起码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办成事情的。但也应当承认，人们如果能够高度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那末即使在比较差的物质条件下，也能够做

① 《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229页。

②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467—468页。

③ 同上书，第476页。

④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页。



出比较好的成绩来。我们有許多工作单位和生产单位，在主观努力方面做出了好的榜样。如有些农村人民公社或生产队的土地贫瘠，又受了几年大灾荒的影响，客观条件对他们并不利，但他们能够根据情况，想尽一切办法，多种杂粮、蔬菜，大力发展副业和畜牧业，做到了扩大生产，提高了群众生活水平。这是因为他们尽可能排除了对他们不利的客观条件，而发掘了对他们有利的客观条件。有些工厂面临着原料材料数量不足、质量差的困难，他们正视这些困难，但不被这些困难所吓倒，而是承认困难，如实地分析困难，认清这是总的大好形势下的暂时性的困难，充分发挥主观作用，发动群众多出主意，多想办法，向困难作斗争，结果还是达到了可能达到的优质高产低消耗的目的，克服了实际上可以克服的困难。

事实证明：实际存在着的客观可能和有利条件，往往不是人们一看就能认识，也不是不经努力就能利用的。有些粗看起来似乎难以做到的事情，只要我们鼓足干劲，努力发掘和利用有利条件，尽力去做，就能够做到；反之，有些实际可能的事情，如果畏难松劲，不努力发掘和利用有利条件，不尽力去做，则本来可能办到的事情也会办不到。在一些条件大体相同或相差不多的生产单位，其生产结果不同，有的比较好，有的比较差。凡是能够切实地适当地估量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按照实际条件办事，并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就能够把工作做好。

反之，不按实际情况办事，或者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或多或少具有畏难松劲情绪的，工作就做不好。

过高地估量事情的可能性，规定一些缺乏实际可能条件的任务和指标，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勉强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这是不从实际出发、不顾实际条件的表现；但过低地估量事情的可能性，看不到或者不努力去发掘和利用那些实际存在着的有利条件，对于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也认为做不到，领导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这也是一种不从实际出发、不顾实际条件的表现。犯后一种毛病的人，往往在口头上说他们是重视条件的，但实际上他们正像前面所说的，只是片面地看到某些不利的条件，忽视实际存在着的有利条件，以及不懂得现成条件是能够由人们的主观努力而变动和发展的。

事物是不断发展的，条件是不不断变化的。一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新的现实就又提供给事物以新的发展的可能性，使事物具备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新的现实条件，这些条件，我们就又须去认识它们、掌握它们，以便据此提出新的任务，为达到新的目标而进行新的主观努力。这样的过程是不断的。因此，经常调查研究现实中包含的各种可能性，掌握变化着的各种现实条件，在这个基础上，为着夺取一个一个的胜利，正确地充分地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我们在工作中所需要经常注意的十分重要的事情。



有事同群众商量

·林一舟·

最近一个时期，各地许多农村人民公社通过整风整社运动，对过去几年来的工作经验进行了认真的总结。这对于提高干部的领导水平，争取今年农业生产的丰收，有重大的意义。各地的经验毫无例外地证明，要把农村工作领导好，干部在工作中必须充分发扬民主，有事同群众商量。

有事同群众商量，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主要精神。毛泽东同志说：“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①群众的经验和智慧，是我们党的一切正确的政策、办法、措施产生的源泉；我们工作中的任何正确的领导意见和解决问题的办法，都不是领导人单凭自己脑子想出来的，而是在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不断集中群众的各种具体意见和经验逐步形成的。我们的工作能不能做好，决定的关键并不是个人的聪明才智，而是能不能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只要肯事事同群众商量，重视和学习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任何问题都可以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有的同志在工作中碰到困难，只是关在房子里叹自己能力小，办法少，而不去同群众商量。其实，只要走出房子，深入群众，虚心向群众求教，头脑就会聪明，思路就会灵活，眼睛就会明亮。事

情常常是这样：当我们出去时脑子是空的，回来时却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意见和材料；有些困难问题，自己脑子里想不通，一旦同群众商量，便迎刃而解，豁然贯通了。

一切革命和建设的事业，都是靠群众的双手来进行的。干部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经验，遇事同群众商量，群众的主人翁的责任感才会不断增强；干部提出的主张和办法必须得到群众的同意，才会变成群众的积极行动。有的社员说：“工作布置得合我们的心意，越干越有劲。”有的基层干部说：“非得让群众真正思想通了，从肺腑里说出同意的话来，事情才真正好办。”“光是我们干部拿出一套办法来号召群众去干，就算这些办法都很好，总还有社员一时了解不到，干起来总不像了解得透的人那么带劲。大家讨论以后，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都牢牢挂在心上，干起来都是自觉自愿的，就一定能干好。”所有这些都说明，同群众商量是启发群众的自觉和自愿，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一把钥匙。

我们党从来认为，依靠简单的行政命令，是不能领导群众前进的。要领导群众前进，就要密切联系群众，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就要把工作任务和党

^①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02页。



的政策向群众交代得清清楚楚，对群众作耐心的宣传动员和说服教育工作；就要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我们的多数干部，由于树立了群众观点，摆正了自己与群众的关系，能够在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倾听群众意见。许多同志已经养成了同群众商量问题的习惯，凡是应该同群众商量、经过群众讨论的事情，如果不同群众商量、不经过群众讨论，心里就感到不安，感到对党对群众没有尽到责任。他们愈是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愈是尊重领导，主动帮助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因此领导工作也就愈好做，愈容易保持正确。也有少数同志并非在主观上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是由于他们的群众观点不强，自以为比群众懂得多，不向群众学习，不同群众商量，因而在领导工作中出的主意就常常不能符合实际需要，在群众中行不通。有的同志甚至把一些行不通的办法硬叫群众实行，把一些群众不愿办的事情勉强群众去办。这样他们就不但不能做好工作，而且往往把事情办坏了。

我们进行任何工作，都必须从实际出发。遇事同群众商量，我们的工作就能符合于实际情况。拿农业生产来说，从当地的实际生产条件出发，贯彻因地、因时、因作物制宜的原则，是很重要的。要做到因地制宜，就要掌握当地的土质、地力、水利等条件。要做到因时制宜，就要掌握当地的气候条件，掌握节令和天气演变的规律。要做到因作物制宜，就要认识和掌握各种作物及其各个品种的生长规律。谁最熟悉当地的“天时”“地

利”等自然条件和劳力、畜力、农具等生产条件？谁最了解当地各项农作物的具体的生长规律？无疑地是常年累月从事生产活动的农民群众。他们在本乡本土长期的生产斗争中，摸熟了各种自然条件，积累了丰富的实际经验。群众的经验，是干部领导生产的主要依据。例如，作物种植的合理安排，是关系生产的全局、对增产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要使各种作物安排得当，决不只是依靠少数干部能够办得到的，必须同群众反复商量。作物种植面积的安排，主要是决定于当地的土质、气候、茬口等自然条件和水利、肥料、劳力、畜力等生产条件，决定于当地的耕作经验、生产习惯和各方面的实际需要。有些地方土质有几种以至十几种类型，安排作物和采用技术措施，就必须适应不同土质的要求。有些作物种在这里、接这种茬口产量高，种在那里、接那种茬口产量就可能低；有些作物粮食产量不一定很高，但它的秸秆产量高，是牲口的好饲料，做饭的好烧柴，副业生产的好原料。农业生产既要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满足国家对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又要满足当地人民生活（包括粗细粮搭配、品种调剂、烧柴等等）的需要，既要满足牲畜饲料的需要，又要满足经营副业生产的某些原料的需要。要使各种作物的种植安排得当，干部必须同最熟悉当地生产情况和实际需要的群众反复商量，共同作出决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而避免顾此失彼的主观片面性。事实证明，凡是在种植上做



到因地因时制宜、增产多的地方，从领导上来说，大都是那里的干部同群众商量得好；凡是种植不合理、增产少的地方，大都是那里的干部和群众商量较少或者没有和群众商量。

有些同志对一般的工作能够做到同群众商量，但是在推行新技术、新经验的时候，往往不大愿意同群众商量，认为同群众商量会不利于这些工作的迅速开展。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如果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取得群众的拥护和同意，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才能迅速地开展，收到良好的效果，那末，推行新技术、新经验的工作，就尤其是如此。为了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积极推行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增产经验是必要的。广大群众对于确实有助于增产的技术措施和先进经验，也都是愿意接受的。但是，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不完全相同，而农业生产又有强烈的季节性，“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在重要的环节上措施失当，往往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群众对于新的技术措施和增产经验的推行采取慎重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采用任何一项新的技术措施，都必须同群众商量，弄清楚是否适合当地需要，是否具备推行这种技术措施的各种条件。有些技术措施，虽然在别的地方已经试验成功，但是在本地推行还没有把握，那就要同群众一起进行适当的试验。有些技术措施在本地推行，虽然还缺乏某些条件，但只要群众愿意采取，他们就会积极地创造条件，来加以实现。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

的个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又说：“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①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完全适用于农业生产中推广新的技术措施和先进经验的工作。

有些同志在工作中也懂得同别人商量，但往往只限于周围的少数积极分子。同积极分子商量是完全必要的，积极分子的意见能够反映群众的要求，但是也难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在许多事情上要得出全面的、合乎实际的主张，不只要同积极分子商量，还要同广大群众商量。一个正确的主张，如果只是少数积极分子理解和接受，还是不能贯彻执行，必须为群众的大多数所理解和接受，才能真正贯彻执行。我们在工作中，要启发群众的自觉，主要地就是要注意启发那些处于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的自觉。

有些同志不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在同群众商量工作、讨论问题的时候，常常会碰到不同的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如果完全

^①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10页。



没有不同意见出现，倒是使人奇怪的。群众不是清一色的。由于知识和经验的水平不同，觉悟程度不同，家庭经济状况不同，对同一件事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不同意见的出现，对于领导者来说，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应当使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人畅所欲言，言无不尽。有了不同的意见，群众和领导就可以把各种不同意见加以比较，比来比去，就会肯定出一种为大家所共同承认的、或多数人所承认的意见；这种意见往往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不同意见的出现，批评意见的出现，对于我们全面地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对于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是应当热情欢迎的。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①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应该养成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与自己相反的意见和批评意见的习惯。如果不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很难做到全面地观察问题，很难及时发现自己的缺点加以改正。当然，群众的有些意见可能是错误的，应该经过分析，对于确实是错误的意见，进行说服教育，帮助他们改正，不能跟着错误的意见走。有事同群众商量，这是干部自我教育的方法，也是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

这几年来，各地农村工作干部已经创造了許多同群众商量的有效形式。有些同志为了解决工作中的某些重要问题，经常召开有

经验的老农或其他有关人员的座谈会，征求意见，进行讨论。有些同志聘请一些有生产经验的老农和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作指导生产的参谋和顾问，经常向他们请教，并通过他们了解群众各方面的要求和意见。很多同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贫农、下中农中交了許多知心朋友，工作中、生产中的问题随时同他们商量，他们也主动地帮助干部出主意，想办法。这些做法，对工作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应该认真坚持下去。

健全人民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是干部贯彻有事同群众商量这一原则的最重要的保证。民主集中制是人民公社的组织原则。公社社员代表大会，生产大队社员代表大会或者社员大会，生产队社员大会，是公社各级讨论和决定重大事情的权力机关。定期开好这些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可以听到各方面的意见，集中广大群众的智慧，同群众一起正确地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曾经强调地指出：“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人民公社的生命”；“为了把工作作好，一定要实行高度的民主，一定要有事同群众商量，忠实地代表群众的利益，反映群众的意志。”这一指示，是做好人民公社工作的指南。认真执行这一指示，就能够经常保持正确的领导，把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地调动起来，促进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① 《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03页。



东日生产大队公养私养并举，发展养猪业

中共广东省委农村调查组

广东省新会县崖西人民公社东日生产大队，近两年来由于认真地贯彻执行了党的公养私养并举的养猪方针，无论大队、生产队集体养猪和社员家庭养猪，都取得显著成绩，对于促进粮食生产，增加社员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东日生产大队共有五百九十七户，两千二百五十八人，耕地五千七百一十六亩。这个生产大队的社员历来就有养猪的习惯，对养猪很重视。他们说：“秀才望考试，农民望养猪。”“有猪就有肥，有肥就有粮。”“家里养头猪，利用朝头晚尾，不用花费好多工夫，一年就能收入几十元。”但是过去曾有一个短时期，没有认真执行公养私养并举的方针，在尚未创造必要条件和缺乏集体养猪经验的情况下，盲目搞“千头猪场”，对社员家庭养猪不加鼓励和帮助，结果影响了养猪业的发展。后来，他们及时吸取了教训，全面地执行了公养私养同时并举的方针，一

面继续巩固和发展大队和生产队集体养猪，一面大力鼓励和帮助社员家庭养猪，不到两年，就使全大队养猪事业的面貌一新，不但完全恢复了原来的水平，而且有了更大的发展。

为了鼓励和帮助社员家庭养猪，大队按

规定保证社员每月有几天的假日，收购肥猪时给养猪户留下一定数量的肉吃，强调干部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带头养猪。除了这些以外，大队还集中力量帮助社员解决两大问题：

一是帮助社员解决猪仔问题。大队规定，凡大队猪场百斤以下的猪，社员可以随意挑选赶回家去喂养，一律不收现款，等把猪养肥卖出后再还猪仔本。猪场卖给食堂和社员的猪仔，一九五九年有三百三十四头，一九六〇年有七百八十二头。最近，大队还准备再卖给食堂和社员四百五十头。这样，就基本上满足了生产队食堂和社员家庭养猪的需要。

二是帮助社员解决猪饲料问题。经过调整，现在社员有自留地共二百三十多亩，加上私人少量开荒，平均每户有六分地。这些地百分之八十以上用于种植猪饲料。各食堂除有大队拨给的饲料地六十四亩以外，还开荒一百六十八亩，主要也是种植猪饲料。公社和大队对社员家庭养猪还分配给一定数量的番薯和米糠等饲料。为了彻底解决猪的饲料，大队在大办粮食中，狠狠地抓杂粮主要是番薯的生产。一九五九年全大队杂粮种植面积二千零九十亩，产量达三万一千三百五十担，一九六〇年扩大到二千八百四十三亩，产量达四万二千六百多担。这样既补充了人的口粮，又从根本上保证了猪饲料和大牲畜饲料。去年每头猪平均有番薯四、五百斤，薯苗二十担。

由于大队采取了上述一系列的办法，社员对养猪的积极性很高，信心很足。他们说：“这里养猪有三个有利条件：一是大队有猪仔，二是喂猪有饲料，三是喂猪有时间。”

东日生产大队在鼓励和帮助社员家庭养猪的同时，还积极地发展集体养猪事业，办



好集体养猪场。他们认真地吸取了过去不顾条件盲目办大猪场的教训，经过整顿和建设，逐步由小到大，使猪场得到巩固和提高。两年来，大队集体养猪场不仅为国家提供了大批商品猪，而且给食堂和社员养猪提供了大量猪仔和其他许多方便，为实行公养私养并举的方针创造了条件。两年期间，猪的死亡现象大大减少，一九六〇年一百八十头母猪无一死亡，猪仔成活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一，养猪的纯收入共达一万六千三百元。

东日大队举办集体猪场的主要经验是：

首先，集体养猪一定要有条件，从小到大，逐步扩充。最好先养少量的母猪，以便取得经验，掌握技术，再一步一步地扩展。同时，要明确大队集体养猪场的任务，除了逐步饲养部分肉猪，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商品猪以外，还要注意饲养母猪和种公猪，繁殖猪仔，为生产队食堂和社员养猪提供猪仔。

其次，集体养猪一定要加强领导，建立专业队伍。大队派出副总支书记李胃厚专职领导猪场工作，并选派了三名共产党员、四名共青团员到猪场工作，饲养员也都是经过挑选的贫农、下中农社员。猪场有三个场长，他们分管饲料、饲养、肥料三方面的工作。下面又组成若干个专业小组。此外，还选出两个青年和一个老农当技术员，他们自学技术，买书看，到外地学习，现已初步掌握了一套防治猪病的技术，去年一年用针灸治好了七十四头母猪的气喘病，又给社员治好了一百多头病猪，有效地防止和减少了猪的死亡。猪场用药也多是自己上山采集的，去年为大队节约药费二百多元，现在尚存土药十多担。

第三，集体养猪必须建立责任制。他们针对过去猪场管理制度不健全的情况，制订

了分栏、分群、分工管理的责任制，带仔母猪要分栏，大小肉猪要分群，分别编排猪舍，固定专人饲养。同时，实行“三包、四固定”制度，即包工、包产、包成本和定人员、定饲料、定产量、定工分。关于定人员，全场人员中，分担饲养的八人，种饲料和割青饲料的二十人，煮饲料的四人，割柴草的六人，种菜的三人，积肥的二人，管伙食的二人，技术员三人。关于定饲料，目前规定一头母猪每天喂青饲料五斤、番薯四斤半、米糠一斤、稻谷三两，另外每产一胎猪仔加营养费一元。一头猪仔每天喂番薯一斤、米糠四两、稻谷四两，一直喂到六十天。一头公猪或一头肉猪每天的饲料也作了类似规定。关于定产量，根据上述分工和固定的饲料，饲养员要保证将每头猪只喂饱、养大、养肥。新老母猪每年包产一胎半，猪仔九十天后出售，每只重十二斤。后备母猪每年包产一胎，猪仔九十天后出售，每只重八斤。肉猪从十五斤起包养一年重达一百三十五斤。关于定工分，管好一头母猪每天工分四厘，后备母猪和肉猪工分二厘，公猪工分六厘，猪仔工分一厘。此外，还规定了定期搞清洁卫生和每天汇报猪只生长情况的制度。猪场建立了一套经营管理制度，成立了场委会，每十天召开一次场员大会，中心议题是：第一检查猪只生长情况，第二检查饲料供应，第三解决各种实际问题。两年来一直坚持了这一制度。为了巩固上述“三包、四固定”制度，他们还实行月月评和“三全奖”。“三全”是全产、全活、全壮。每个月由领导干部和场员共同进行民主评比。小猪全活奖（成活）一般一月一次，大猪全产奖、全壮奖（母猪安全生产、猪只生长达到规定重量）和超产奖一般一年一次。一九六〇年发



奖金五百多元，最多的得到二十六元，最少的也得到六元。实行这一制度对于激发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完成养猪任务，尤其是提高猪仔成活率，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四，集体养猪要准备足够的饲料。除了大队每年供应三万斤饲料谷以外，猪场还建立了自己的饲料基地，开荒一百七十五亩，生产了大批番薯，再加上割青饲料，便保证了全场五百多头猪只常年不缺饲料，并为大队节约了饲料款六千多元。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东日生产大队集体养猪采取稳步发展的方针，已经初步摸索了一套集体养猪的经验，为今后进一步发展集体养猪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东日大队由于执行了公养私养并举的方针，一九六〇年养猪头数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一点三倍，存栏数增长二点一五倍。大队猪场养猪五百二十七头，食堂养猪二百九十五头，社员养猪七百一十六头。三项合计共一千五百三十八头。平均每人有猪零头六八头。同时鸡鸭鹅也有较大发展。历年生猪和鸡鸭鹅的发展情况如下：

生猪发展情况

	饲养数 (头)	平均每户 (头)	存栏数 (头)	平均每户 (头)
1957年	658	1.1	370	0.6
1958年	714	1.2	365	0.6
1959年	1,124	1.9	690	1.2
1960年	1,538	2.6	1,169	2.0

鸡鸭鹅发展情况

	饲养数 (只)	平均每户 (只)	存栏数 (只)	平均每户 (只)
1957年	9,819	16	4,831	8
1958年	12,341	21	5,101	9
1959年	13,734	23	3,785	7
1960年	24,183	41	8,170	14

东日大队一九六〇年为国家提供了三百六十三头商品猪(扣除留肉部分)，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七，出售鸡鸭鹅九千三百多只，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一百零三。

养猪多，积肥多，便大大地促进了粮食生产。一九六〇年积猪屎尿肥一万九千八百多担，全大队平均每亩稻田施精肥十担(今年每亩可达十五担)，其中猪肥占百分之五十。该年晚造亩产平均三百四十四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三十，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十一。养猪积肥推动了冬种作物的生产，去年播种面积达二千九百三十六亩，比往年增加一倍多。这些冬种作物都是用猪肥作基肥和追肥的。由于肥源充足，社员对争取今年粮食丰收更加充满了信心。

随着养猪事业的发展，社员的收入显著增加了。一九六〇年卖给国家生猪得到五万多元，平均每户八十多元。社员卖给大队肥料得到九千多元，平均每户十五元多。社员家庭副业，主要是养猪、养鸡鸭鹅，平均每户收入九十七元，占社员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九，比一九五九年增加百分之八十三。社员养猪解决了不少问题，第二生产队长李业付说：“我去年养猪收入七十多元，交了三个孩子的学费、买棉胎一张、棉衣一件，还有几十元零花钱，又领了不少的肉票。”今年过春节，大队准备了大量的猪肉、腊鸭和现款分配给社员。

现在，东日大队计划今年养猪达到三千头，其中，集体养一千二百头(主要是繁殖猪仔)，食堂养六百头，社员家庭养一千二百头。为了更快地繁殖猪仔，大队还准备从猪场拨出四十五头母猪分给社员公私合养。东日大队的养猪事业将会得到更快的发展。



一个实行粮食生产和畜牧业并举的生产大队

赵明 曾源

西鋪生产大队，是河北省遵化县建明人民公社的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也就是原来王国藩领导二十三户贫农办“穷棒子社”的那个西鋪村。全大队有一百七十四户，八百一十二人，参加本大队劳动的劳动力二百六十八人，耕地一千四百四十五亩。这个大队由合作化时期到现在，粮食产量一直稳步上升，同时，畜牧业特别是养猪业也相应地发展起来。粮食生产与畜牧业相互推动，相互促进。

西鋪生产大队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近几年来都是逐年上升的。用于粮食生产的耕地面积和劳动力虽然由于种植经济作物和从事其他生产而逐年有些减少，但是粮食总产量仍然在稳定地增长。下面是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的逐年增长情况：

年份	单位面积产量(斤)	总产量(斤)
1956年	380	491,938
1957年	409	573,242
1958年	476	566,977
1959年	557	573,664
1960年	605	622,944

西鋪村原来是个缺粮村，每年要由国家供应几万斤粮食。由于粮食产量逐年增多了，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变为余粮村，此后年年超额完成国家征购粮食的任务。

粮食多了，社员的生活改善了，人口也很兴旺。该村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每年每人有口粮四百斤左右，每户还都有三、四百斤的储备粮。去年由于遭灾，口粮标准降低些，但是仍然比一般生产大队高，队里还有五万四千多斤储备粮，蔬菜也比较多。这里年年添人进口，一九五三年全村只有六百三十四人，一九六〇年增加到八百一十二人。

西鋪生产大队粮食产量逐年稳步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畜牧业有较快的发展。畜牧业特别是养猪业随着粮食生产的发展相应地发展了起来，反过来，又推动了农业生产更快地发展。下面是畜牧业逐年发展的情况：

年份	猪饲养数*	羊存栏数	牛 驴存栏数	骡 马存栏数
1953年	217	45	25	1
1954年	275	96	38	3
1955年	339	98	49	3
1956年	370	100	52	4
1957年	395	120	55	5
1958年	420	119(外调6)	57	5
1959年	445	135	70	4
1960年	470	156	66	4
1961年**	315	177	65	5

* 包括存栏数、卖出数和食用数

** 根据1961年2月统计的数字

由于畜牧业发展了，特别是猪多了，肥料增加得很快。全村耕地每亩平均施肥量，



在个体生产时期約有一千五百斤，农业生产合作化以后增加到三、四千斤，人民公社化以后，一九五九年增至五、六千斤，一九六〇年增至七千斤左右，一九六一年春耕前已送到地里的肥料每亩約有五千斤，預計全年可达八千斤左右。西鋪生产大队的干部和社員对积肥工作都十分重視，他們有一套成功的积肥經驗。生产队定期帮助各戶猪圈垫土、起粪，每头猪每年平均出肥一万五千斤。生产队还在山脚盖起了六个大牛圈，夏天不用牛的几个月，把牛放养在这里，并且組織劳动力抽空上山割回大量荆条(很好的綠肥)放在牛圈里，經過牛踩踏后出的肥料又黑又臭。这样造肥多，又节省运输力。据干部們計算，一头牛每年可以积肥五万斤左右。

肥料多了怎么运呢？他們在积肥时尽量注意縮短运肥路程，他們还注意繁殖大牲畜和添車买馬。全大队現有的大牲口已經比个体經濟时期增加一点六倍多，今年又买了一匹馬。近几年車輛也增加了，一九五九年能运粪的有三辆胶皮車和五、六辆铁車，現在有六辆胶皮車、四辆小胶車和二辆铁車，能够保证把大量肥料运到地里。

这里是个山区，百分之八十是梯田，原来土质瘠薄，大部分田地的土层只有三、五寸厚，下面是石子。数年来，由于施肥多，改良土壤，进行水土保持，土质变肥了，土色变黑了，土层变厚了。这个大队有一块山坡地，个体生产时期每亩只收七十斤苞米，后来由于施粪多，一九六〇年每亩收五百多斤。地里使用的廐肥多了，粮食产量高，生产成本随着降低了，一九六〇年农业生产費用仅占农业收入百分之十九点七，比上一年减少百分之五点四。这主要是因为用土肥多，用化肥少，

土肥便宜，所以生产費用减少了。王国藩对粮食生产和畜牧业的关系，对土肥和化肥的关系体会很深，他說，“在我們这里，要想增产粮食，不发展畜牧业不行；別說現在国家还不能大量供应化肥，需要自己积肥；就是有了化肥，沒有廐肥結合使用，化肥也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所以我們一直坚持以土肥为主。”

西鋪生产大队养猪业逐年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他們一直坚持了党的公养和私养同时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針。这个大队养猪业发展很快。近两年虽然由于自然災害的影响，猪飼料有些减少，但是他們积极想办法解决猪飼料問題，猪的飼养数仍然沒有减少。下面是这个大队历年猪只发展的情况：

年份	存栏数			母猪(适龄母猪)			公猪 公养
	合計	公养	私养	合計	公养	私养	
1953年	127	2	125	7	1	6	
1955年	249	16	233	21	7	14	
1957年	280	40	240	29	14	15	1
1958年	300	60	240	31	12	19	2
1959年	304	62	242	33	19	14	3
1960年	350	135	215	39	26	13	4
1961年*	285	70	215	28	17	11	3

* 根据 1961 年 2 月統計的数字

西鋪生产大队在貫徹执行党关于养猪的公养和私养并举的方針的过程中，曾經和各种錯誤傾向进行了斗争。一九五八年、一九六〇年，曾經有人打算将社員私人养的猪轉为公养。王国藩同干部、社員反复商量，一致认为，将社員养的猪轉为公养是違反党的公养和私养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針的。而且这样作問題还很多：一是大队沒有那么多飼料；二是大队沒有那么多猪圈；三是集体养猪的經驗还不足，发生疫病时，可能造成大量死亡；四是戶戶不能大量造肥；五是社



員也不願意。他們认为，大队一方面應該依靠現有的力量积极发展集体养猪；另一方面應該积极鼓励和帮助社員家庭养猪。社員家庭养猪的好处很多：社員家里有人弄飼料，有現成的圈，有飼养經驗，有积极性，戶戶能造肥，还能解决各戶零用錢的問題。同时，实行社員必須完成基本劳动日的制度，也不会影响集体生产。于是他們决定在发展集体养猪的同时，仍旧鼓励社員私养，社員私养的猪一律不动。由于坚持了公养和私养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針，便保证了养猪数量的繼續增长，全大队年年超額完成了国家的购猪任务(其中絕大部分是社員出售的)。一九五三年卖给国家生猪四十头，一九五五年五十头，一九五七年七十六头(公养六头)，一九五八年九十头(公养十四头)，一九五九年一百一十五头(公养十六头)，一九六〇年一百零二头(公养十二头)。

为了鼓励和帮助社員家庭养猪，西鋪生产大队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一) 尽力設法解决飼料問題。他們认为每养一头猪沒有百余斤粮食是不行的。为了解决飼料問題，队里按上級規定的标准撥給社員自留地(包括飼料地)，国家在收购生猪时，每头猪也供应了一定数量的飼料。

(二) 保证养猪的社員吃到較多的猪肉，按照上級規定，留給卖猪戶一定数量的肉票。

(三) 社員积的肥一般都按质論价，按月付款；生产队还負責給各戶的猪圈送土、起粪。

(四) 对一些想养猪但在經濟上有困难的社員，将大队猪場的小猪无利贈給他們，等他們卖肥猪后再还款。

(五) 实行了免費防疫制度。給各戶养的猪打防疫針；这项办法很受群众欢迎。

(六) 按人口留給社員的自留地始終坚持不变，同时督促社員按基本劳动日完成出勤天数，加强社員的思想教育，因而社員沒有发生只顾个人生产、不管集体生产的傾向。

此外，西鋪生产大队在发展畜牧业的过程中还貫徹了自养自繁的方針。他們认为不能伸手向国家要小猪和牲口，因为国家沒有那么多，即使有那么多，拿来也不一定适合当地的“水土”。因此生产大队的猪場主要是繁殖小猪，同时允許社員养母猪。自农业生产合作化以来，这里的猪和牛驴騾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是自繁自养的。

与西鋪生产大队仅隔一条路、自然条件相同的东鋪生产大队，近几年来粮食生产和畜牧业有些下降。一九六〇年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四百三十九斤，比一九五九年降低百分之十以上。总产量比一九五九年减少百分之五。这个大队粮食减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沒有认真貫徹执行党关于养猪的公养和私养并举的方針，致使畜牧业沒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因而也影响了粮食产量的增长。

现在，西鋪生产大队在进一步貫徹党的关于农村工作的各項政策以后，大队集体养猪的积极性很高，社員家庭养猪的积极性也很高。有的社員正在忙着买小猪，不少社員在經過大队领导批准后，頂着月亮开“十边地”。生产大队准备根据社員要求分給社員一部分粗飼料，帮助沒圈的社員修圈，还准备抽一个較弱的劳动力，替社員放猪。看来这个大队的畜牧业还将更快地增长起来，粮食产量也将繼續稳步上升，粮畜相互促进的作用将更加显著。



人民公社工业的创建、巩固和发展

李成瑞 左春台

一九五八年，在我国广大农村中，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组成了政社合一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农村人民公社。农村人民公社不同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兴办了大量的公社工业。一九六〇年，随着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在我国许多城市中，也办起了许多城市人民公社工业。截至一九六〇年下半年，根据大略的统计，全国城乡公社工业共有二十多万个单位（不包括生产大队的经营单位），其产值大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

我国人民公社工业在短期内获得这样广泛而迅速的发展，绝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国社会经历了彻底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产物，是由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由农业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的必然产物。在总路线的鼓舞下，一九五八年，出现了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实现了全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化。农业生产的跃进，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要求进一步加强农业的技术改造，要求大量制造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要求提供更多的土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要求建立排灌机械、拖拉机的修配行业。农村人民公社为举办工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在农村人民公社建立以后，在原来已经开展的群众办工业运动的基

础上，公社工业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全国农村中迅速地广泛地发展起来。城市人民公社工业出现较晚，是在一九六〇年上半年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创建发展起来的。在此以前，城市街道工业的发展，托儿所、幼儿园、公共食堂、邻里服务站的建立，国营企业开展综合利用和多种经营，兴办“卫星厂”，特别是城市广大妇女群众要求直接参加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热情的空前高涨，所有这些，使城市人民公社工业的广泛发展成为不可避免。

人民公社工业，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规模还很小，生产水平还很低。生产条件，大部分是手工劳动，部分是半机械化，小部分是机械化。人们常常把公社工业叫做“小小工厂”。但是这类“小小工厂”，却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分布广泛的、为数众多的城乡公社工业企业，加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家庭手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起着显著的作用。

公社工业在支援农业方面已经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同县级国营工业一起，已经开始担当了农业机械和排灌机械修配的主要任务。部分地区初步形成了农业机械的修配网，大体上做到了小修、中修不出社，大修不出县。农村人民公社工业仿制、改制和创制了很多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大量制造了镰刀锄头



农具。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約有一半是公社工业生产的，小农具大部分是公社工业生产的。許多地区在“向机械化要劳动力”的口号下，通过农机农具的制造和改革，收到了节省农业劳动力的效果。公社工业具有点多面广，直接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的特点，能够适应当地需要，灵活多样，随試随制随改，及时生产，及时供应，深受群众欢迎。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业的人員和产值中，直接为农业服务的行业約占百分之四十、五十或者更多；城市人民公社工业为农业服务的行业，在不同地区，分別占百分之五、十、二十、三十不等。

公社工业已經成为国营大工业的有力助手。它为大工业生产原料，加工零件、配件、半成品、包装用品，为基本建設单位采制磚瓦、砂石等建筑材料，利用大工业的廢料、廢渣、廢水、廢汽，加工为成品、半成品。許多公社工业已經成为大工业的“卫星厂”，成为大工业生产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城市人民公社工业的人員和产值中，为大工业服务的行业約占一半左右；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业中，約占百分之十到二十。

公社工业在增加市場貨源供应人民生活日用品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担負了小商品生产任务的百分之五十到七十，担負了大部分修理服务业务，并且开展了农副产品的初步加工和綜合利用，从各方面增加市場貨源，供应人民需要，供应一部分出口物资。在城市和乡村公社工业的人員和产值中，为人民生活和市場服务的行业各占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公社工业的发展，增加了公社积累和社員收入，壮大了社有經濟。公社工业的积累

在公社一級全部积累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許多公社反映：办了工业，有錢买生产資料了，社員手头也活动了。在現阶段的农村人民公社中，公社所有制虽然在整個公社經濟中还不占主要地位，但是正是这部分公社所有制代表着农村人民公社的偉大希望和偉大前途。

农村人民公社工业的发展，使机器生产开始进入了农民的生活領域，打开了农民的眼界，它正在改变着农民的精神面貌，增强了农民建設社会主义的决心和信念。列宁曾經把每一个小型电站看作是教育农民的基地，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那些开始使用机器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业，也正在起着这种作用。城市人民公社工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家庭妇女，直接参加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設事业。“家家无閑人，人人有事做”、劳动光荣、互助友爱的良好風尚在城市中进一步树立起来。

人民公社工业广泛的迅速的发展，是党的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胜利，是党的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針，特别是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的方針的胜利，归根到底，是毛澤东思想的胜利。

我国的人民公社工业經過两年多以来的大发展，目前已經进入一个以巩固为主的时期。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的在发展的基础上“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針，不仅适用于国营工业，而且适用于公社工业。人民公社应当认真做好公社工业的巩固、充实和提高工作，并且努力促进手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現在，我們来回顾一下两年来公社工业已經走过的道路，研究一下兴办公社工业已有的經驗。

什么是我国发展公社工业的主要經驗呢？根据我們的体会，大致有以下四条：第



一，要有明确的经营方针，即首先和主要地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同时适当地为大工业和出口服务。这就是说，公社工业不能离开这些任务而片面地追求利润、追求产值，不能没有重点地百业俱兴，甚至轻重倒置，不能不顾实际需要和具体条件来制订生产计划，安排生产。第二，要把公社工业在公社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摆得恰当。农村人民公社工业的发展要适应公社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适应当前农业生产水平的需要和可能。这就是说，不能采用削弱生产大队基本所有制和不适当地挤占农业劳动力的办法去发展农村人民公社工业。第三，要用适当的方法把公社工业同国家计划结合起来，把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同公社因地制宜的主动性、灵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这就是说，各级计划机关对公社工业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统得过死。第四，要按照公社工业的特点，搞好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继续有效地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坚持勤俭办企业，土洋并举，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是说，既不能放松加强管理，又不能完全照搬国营企业的一套办法。

以上四条中，经营方针是最根本的一条。公社工业为谁服务，应当干什么，不应当干什么，这是举办公社工业的时候必须首先正确解决的一个问题。第二、第三、第四三条，也是发展公社工业必须正确处理三个问题，即三个方面的关系：一个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同公社内部各级（主要是生产大队一级）和各业（主要是农业）之间的关系；一个是公社工业同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关系；一个是公社工业企业内部的各种关系。只有坚决贯彻公社工业的经营方针，正确处理公

社工业上下、左右、外部、内部的关系，公社工业才能充分显示出它的优越性，才能巩固地、健康地向前发展。

公社工业的经营方针

人民公社工业，应当为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为大工业服务，为出口服务。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和县城、集镇的公社工业，主要任务是为农业生产服务；城市人民公社工业，主要任务是为人民生活和市場服务。两年多的实践证明：中央规定的这个被人们通常简称作“四为”的方针，是发展公社工业的正确方针。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人类的生存之本，衣食之源。只有农业发展了，工业的发展才有可靠的基础，整个国民经济才能更快地发展。搞好农业是我们发展工业、进行经济建设的立足点。按照农业发展的需要，大力做好工业支援农业的工作，是整个工业战线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农村人民公社工业是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在农民群众大力支持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它同农业有着更加密切的关系。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只有把为农业生产服务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全心全意做好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作，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才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各种日用小商品的制造和修理服务业，同广大群众的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锅盆碗筷，针线钮扣，发卡子，奶嘴子，鞋钉子，这些东西虽小，但不可缺少。各种日用小商品，除了一部分生产技术条件较高的产品要由国营企业生产以外，大部分生产任务落在公社工业特别是城市人民公社工业的肩上。城市人民公社工业，在为大工业服务的同



时，必须以主要力量把这个任务承担起来。有一个时期某些城市人民公社工业中，为人民生活服务的行业只占百分之三十或者四十，这个比例显然是低了，目前已在设法增加。

公社工业是否正确执行党和国家规定的经营方针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它是否以主要力量为农业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

“四为”的方针是统一的，但是四者之间又存在着矛盾。以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为这方面服务得多了，为那方面服务得就少了。如何做到既保证重点又兼顾其他呢？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需要规定一些具体的政策界限，也就是要恰当地规定四个方面在公社工业从业人员和产值中所应占的比例。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业中，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行业一般应当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在有些情况下，应当占到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城市人民公社工业中，为市场和人民生活服务的行业应当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这两个比例就是公社工业经营上最重要的政策界限。目前有些地方的公社工业达不到这个比例，正在设法提高，这是十分必要的。其他三个方面应当在总比重不超过百分之五十的条件下，各占一个适当的比例。究竟各占多少，则要由各地按照当地具体情况来确定。若干地区提出，农村人民公社工业中，除了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应占到百分之五、六十以外，为人民生活服务的应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为大工业和基本建设服务的应占百分之十到二十；为出口服务的应占百分之一到五，传统出口商品重点地区比例还可以适当提高。公社工业既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根据具体条件开展各项经营，又要适当缩短战线，保证重点。

在公社工业同国营大工业之间，在农副产品原料的分配上也存在着矛盾。一定数量的农副产品的工业原料，农村人民公社工业用得多了；供给城市国营工业的就少了。怎样分配才算合理呢？这也是在执行“四为”方针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目前的原则应当是：凡是国营大工业加工能力有余力，原料便于长途运输，产品供应较大地区需要的，应当尽先供给国营大工业；凡是国营大工业加工能力不足的，原料不适于长途运输的，产品供给公社内部和当地人民需要的，应当留给公社工业就地加工。例如，棉花、麻类、皮革等原料属于前一类，应当供给国营工业，公社不要举办土纺、土织、制革等工业。农作物秸秆的综合利用（如多种高粱制糖、制饲料），农村消费的粮食、油料等的加工，若干野生植物的初步加工（如野生纤维脱胶、野葡萄制酒）等等属于后一类，应当尽可能由公社工业来办，一般不宜由国营工业来办。还有些农副产品原料，可以先由公社工业粗制，然后运往城市由国营工业再加精制（如草类和木材，先由当地公社加以采集，制成粗纸浆，然后由国营工业制成细纸浆），可以大大减少原料材料的重量和减小体积，节省大量运输力。公社工业同国营工业这样合理分工，公社工业就可以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就地取材，向着自己的广阔的领域里去发展，不仅不会同国营工业争原料，闹矛盾，而且可以同国营工业更好地互相支援，互相促进。

贯彻执行“四为”的经营方针，要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过去一个时期，有一部分公社工业人员有所谓“三千三不干”的思想：愿干产值大、利润多的，不愿干产值小、利润



少的；願干成批生产的，不願干零星的；願干制造，不願干修理。社員群众对这种不正确的經營思想和作法已經表示了他們正当的責难。公社办工业要求有一定的利潤和积累是应当的，但是决不能脱离当地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片面追求利潤。产值是反映生产成果的一个重要指标，增加产值是一件好事，但是，檢查公社工业生产，应当同时以品种、产量、质量等指标为标准，不能只看产值，不顾其他。当前公社工业的主要任务，是制造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所大量需要的产品（如鋤头、鑿刀、改良农具和鍋碗盆勺之类）和开展修理、服务工作，这也是一般公社工业所能胜任的。不顾公社工业当前的具体条件，看不见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中的迫切需要，是缺乏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的具体表现。总之，必須經常地反复地加强对公社工业职工的政治思想教育，加强国民經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教育，加强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加强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教育，才能正确执行公社工业的經營方針。

农村公社工业在公社 经济中的地位

摆好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在公社經济中的地位，正确处理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同公社各級（主要是生产大队一級）的关系，正确处理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同各业（主要是农业）之間的关系，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业贯彻执行为农业生产服务的關鍵問題，也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健康发展的關鍵問題。

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三級所有制，是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生产大队是

独立經營单位，是基本核算单位。农村人民公社中的任何工作，都必須严格遵守这个根本制度，才有利于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和各項生产事业的发展。农村人民公社举办的工业，如果需要使用生产大队的資金和材料，必須按照自願两利、等价交換的原則办事，决不能像国营企业内部那样实行无偿調撥，以至損害生产大队的基本所有制。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原則。我国农村創办公社工业，資金、設備和劳动力，大体有这样几个来源：（1）原有企业的底子，包括乡办工业的底子，一部分基层手工业合作社的底子，县里下放企业的底子，这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开始建立的基础。（2）国家的支援，包括財政的投資，国家供应的某些設備，通过厂社挂鈎由国营企业单位支援的設備，这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建立和发展中設備和資金的一个重要来源。（3）农村人民公社自己的积累，包括社办企业本身的积累和按照規定从生产大队提取的一定比例的积累。公社工业本身的积累，是发展农村人民公社工业經常的、根本的資金来源。农村人民公社工业的发展，只有建立在本身积累的基础上，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才会成为开不败的花朵。

在一个农村人民公社之内，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級的工业和副业，应当根据集中和分散相結合、骨干和一般相結合的原則，通盘规划，合理分工，互相配合。公社一級应当集中力量办好那些为全社服务的、所需設備和資金較多的、骨干性的企业。凡是适于生产大队分散經營的企业，都应当由各个生产大队自己去經營，而不应当过多地集中到公社来办。生产队則要利用农閑进行一些小型的副业經營。以农具制造和修配为



例，农业机械的修配和新式农具的制造一般应当由公社一级来办；一般农具的修配和小农具的制造可以由生产大队来办；而生产队则应当有一盘铁匠炉，能够进行简单的农具制造和修配。这样，三级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农机农具修造网，就能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服务，更加便利群众。

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可以由公社单独投资举办，可以由公社和生产大队共同投资举办，也可以由几个公社联合投资举办。凡是公社和生产大队共同举办的企业和公社联合举办的企业，都应当签订合同，保障各方享受合同规定的权益，分取应得的利润。

农村人民公社工业的发展，必须适应当前农业生产的水平，既不能落后于当前农业发展的要求，又不能超越当前农业生产水平的客观可能，这是举办公社工业的另一条重要原则。马克思说过：“能够投于工商业上面而无须从事农业的劳动者人数……是取决于农业劳动者在他们自身的消费额以外，能够生产多少农作物。”^①这就是说，从农业人口中抽调多少劳动力从事工业，主要地不是决定于发展工业对农业劳动力的需要，而是主要决定于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的水平，虽然比旧中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总的说来还是很低的，耕作主要还靠手工劳动和畜力，粮食生产的商品率还不高。因此，第一，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占用的劳动力在农村劳动力总数中的比例，目前还只能是较低的。第二，必须实行中央提出的亦工亦农的政策，除了少数必须常年经营的工业以外，一般应当是农闲多办，农忙少办，大忙不办，农忙务农，农闲做工。

那么，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劳动力占农村全部劳动力的比例究竟以多少为合适呢？根据许多地区两年来实践的經驗，在目前情况下，社办企业和其他事业，除了尽先使用城镇的非农业劳动力以外，占用生产大队的劳动力，一般地不要超过生产大队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二；生产大队兴办的企业和事业，从生产队占用的劳动力，一般地不要超过生产队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三。把公社和生产大队举办的企业和事业所占用的劳动力控制在这样的比例以内，再加上林业、牧业、渔业和副业等方面所占用的劳动力，总共不超过农村全部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二十，才能保证使用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这样的比例是适当的。过去我国农村没有或很少工业企业，没有或很少工人，这是经济落后的标志之一。这种情况，显然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要求。一九五八年以来农村兴办公社工业，农村中工人迅速增加，是必要的。但是，一九六〇年上半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业的从业人员，曾经发展到占农村全部劳动力的百分之三点五左右，而且大部分是常年固定工人，这就有些过多了。从一九六〇年下半年起，各地方已经开始加以适当紧缩，特别是把许多常年固定工人转为季节性工人，把农村劳动力更多地使用到农业生产第一线。今后相当时期内农村人民公社工业的发展，要靠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从长远看，农村人民公社中从事工业的人员肯定还要增加，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要做到这一步，还有待于农业现代化的逐步实现。农村人民公社工业集

^① 《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页。



中力量把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行业办好，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然后使农业有可能腾出劳动力来进一步加强工业，这是发展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壮大公社工业职工队伍的正当途径。

正确处理公社同各级和各业之间的关系，归结到一点，就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必须适当。消极保守，能办不办，使农村人民公社工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落后于当前农业生产发展的客观可能，是不对的；不顾条件，贪大图快，使农村人民公社工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超越当前农业生产水平的客观可能，也是不对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掌握得适当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业在公社经济中的地位就容易摆得适当了。

把公社工业和国家计划 适当结合起来

为着保证公社工业“四为”方针的圆满实现，必须把公社工业和国家计划适当地结合起来。公社工业是集体所有制的（虽然许多城市人民公社工业具有较多的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它不同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公社工业一般又是小型、分散、灵活、多样、季节性强的，它不同于大中型的、比较集中和全部常年生产的企业。这就决定公社工业经济活动和计划工作的方法要具有不同的特点。我们在经济计划中，不论对于国营企业和公社工业，都要实行统一的计划性和因地制宜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都要实行集中领导和分级管理相结合、条条（各部门）和块块（各地区）相结合的原则。但是，由于公社工业存在着上述特点，对于公社工业的计划

领导要更多地注意因地制宜的灵活性，更多地依靠分级管理，实行块块为主的办法。公社工业和国家计划结合的形式要多种多样，并且要通过供应原料材料、统购和包销产品、合理确定价格政策和税收政策以及国家有计划地进行援助等方法，实现国家对公社工业的计划领导。

公社工业不能像国营企业那样直接地纳入国家计划。公社工业和国家计划的结合可以有这样几种形式：由商业部门加工订货或者统购包销的部分，可以通过商业部门的供、产、销计划同国家计划结合；为大工业承制加工的部分，可以通过大工业的生产计划同国家计划结合；有些重要产品如煤、铁、纸、糖等，可以由国家主管部门适当地纳入本部门的计划。而所有这些计划，都应当由各级计划机关加以汇总，进行全面的综合平衡。

公社工业的供、产、销都要同国家计划适当结合。对于那些必须由国家供应某些原料材料才能进行生产的公社工业来说，供是关键，供的问题不解决，产销计划就会落空。公社工业的原料材料绝大部分依靠就地取材，在不影响国家统购物资的收购，不和国营企业争原料的前提下，公社工业依靠自己，逐步建立和发展原料材料基地，这是公社工业解决原料材料问题的基本途径，离开这个基本途径，过多地伸手向国家要东西是不对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许多公社工业也需要一小部分国家统一分配的物资，主要是钢材、有色金属和某些化工原料，要靠国家有计划地供应。例如，修理农业机械和制造各种农具，需要一定规格的钢材和机器零件，制造各种日用品，水壶要有黑白铁皮，发卡子要



有鋼絲，奶嘴子要有橡膠，小五金電鍍要有鹽酸，等等。這些原料材料雖然需要的數量不多，但是缺少這些原料材料，生產就不能進行，因此國家按照計劃適時地給予供應是必要的。利用大工業的邊角廢料，也是公社工業的一個重要原料材料來源，今後，在這方面應當保持和恢復傳統的協作關係，凡是宜於由公社工業利用的邊角廢料，應當盡先供給公社工業。

合理的价格政策和稅收政策，是國家對集體經濟實現計劃領導的一個重要工具。公社工業的產品收購价格和稅收政策，應當有利於生產的發展和保持市場物價的穩定，有利於使公社工業的發展同整個國民經濟計劃的要求相適應。目前有些地方的問題是：為大工業服務的行業，產品收購價和加工費偏高，利潤偏大，而目前急需發展的行業，如農機農具的修配製造，小商品生產和修理服務業，利潤反而偏低，有的甚至沒有利潤，這種情況是不利於公社工業貫徹執行“四為”方針的，應當加以改變。最近許多地方已經着手根據國家計劃的要求和公社工業“四為”的方針，從原料材料價格、產品收購价格和國家稅收等方面加以調整，把偏高的適當調低，把偏低的適當提高，使各個行業都能得到應得的利潤，這是完全必要的。

國家對公社的支援和幫助，要有計劃地進行。財政投資和銀行貸款的重點應當放在為農業生產服務和為人民生活的行業，並且要同國家物資供應計劃相銜接。廠社掛鉤，應當以技術支援（傳授技術，幫助修理等）為主，支援動力設備和機械設備要列入國家計劃，並且由公社照價付款。

加強公社工業的企業管理

為着保證公社工業“四為”方針的圓滿實現，還要按照公社工業的特點，正確處理公社工業企業內部的各種關係，搞好企業內部管理，堅持勤儉辦企業的方針，努力提高勞動生產率。

公社工業企業同國營工業企業都是社會主義企業，都應當實行黨委領導下的職工代表大會制和廠長負責制、“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管理制度、合理的工資待遇制度，都要有效地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有領導地開展群眾性的增產節約運動，都要實行嚴格的經濟核算，努力降低生產成本，不斷提高產品質量，防止人力和物力的浪費等等。但是，公社工業企業的經營管理在具體做法上又必須適合自己的特點。

農村人民公社工業經營管理必須根據農村環境的要求，一般地實行季節性生產，農閑做工，農忙務農（少數常年生產的企業除外）。這不僅是目前節約勞動力的潛力所在，而且對於今後長時期內逐步縮小工農差別也有重要的意義。農村公社工業企業在勞動力的使用上大體是這樣的：有的基本上常年做工，特忙時抽個把月務農；有的三分之二以上時間做工，在大忙時抽兩三個月務農；有的半年做工，半年務農。實行亦工亦農要有適當的形式和制度。從現有經驗看，有幾種形式：一種是廠隊掛鉤，固定支援對象，農忙時有組織地下去，農閑時有組織地回來；一種是按照農活需要，臨時確定支援對象，也是有組織地來去；一種是工業單位自己兼辦農副業，設立蔬菜場、养猪場、家禽場、飼料場。具體形式可以因地制宜，多種多樣，但是，不



論采取什么形式，都要注意这样一条原則，即是既要最大限度地發揮支援农业的作用，又要有利于工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工业技术的稳定和提高。由工入农，由农到工，都要有組織有秩序地进行，有技术的职工不要輕易更換，防止不必要的波动。同时还要合理地解决工人参加农业劳动的粮食供应、工資福利、收益分配等問題，既要使工厂乐于支援农业，又要使生产队乐于吸收工人参加劳动，力求做到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工厂、工人五个方面都滿意。

城市人民公社工业要适应这些企业以家庭妇女为主要成員的特点，注意保证妇女出勤所必需的各项福利設施（托儿所、公共食堂等），注意工作時間不要过长，使她們有适当的时间进行学习和从事必要的家务劳动。有些地方实行“六、二”制、“七、一”制，即每天六小时或者七小时工作，二小时或者一小时学习，效果很好，深受男女职工的欢迎。

目前公社工业的生产水平还是比较低的，因此，公社职工的工資也应当适当从低。在城市，应当适当低于当地地方国营工厂同行业同工种的职工的工資水平。在小城镇和农村，技术熟练工人的工資，应当适当地高于农民。公社工业的干部应当比国营企业的干部更多地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做到是干部，也是工人，力求减少脱离生产的管理人員，力求降低成本，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不論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业或者是城市人民公社工业，都应当从实际出发，开展技术革新运动，提高技术，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修理服务质量。

勤儉办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經營管

理的一条根本方針。我国城乡公社工业，就是在这个方針的指导下創建和发展起来的。应当教育公社工业的全体职工，坚持和发揚克勤克儉、艰苦奋斗的作風，公社工业才能得到不断地巩固和提高。值得注意的是，近来有些公社工业，在生产有所发展、积累有所增加以后，有一部分干部又开始滋长了讲排場、鬧闊气的鋪張浪費的風气。这种現象虽然是很少数的，但是必須及时加以糾正。

公社工业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管理水平的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領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公社工业建立不久，干部不足，絕大多数干部缺乏領導企业的經驗，同时在公社工业迅速发展过程中，有一些单位中出現了領導成份不純的現象。因此，必須加强党对公社工业的領導，加强党在公社工业中的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政治觉悟，克服各种資产階級思想，进一步树立全局观点和計劃观念，进一步树立深入調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作風，进一步树立有事同群众商量，同群众同甘共苦的群众路綫的作風。对于那些領導成份不純的企业，必須結合整風整社，通过群众运动及时处理，使那些觉悟高、成份好、作風好、工作踏实的积极分子掌握企业的領導权，保证党在公社工业中的絕对領導。改善經營管理，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工作，而是一个端正經營作風、提高管理水平的細致复杂的組織工作。为此，必須坚持政治挂帅，发动和依靠群众，大搞群众运动。

为了加强对公社工业的具体領導，最近許多地区正根据国务院的决定，积极建立和加强人民公社工业的管理机构。这是保证公社工业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



努力提高輕工业产品质量， 满足人民需要

· 陈 克 奇 ·

上海市是我国輕工业的老基地之一，生产的輕工业品有三千多个品种，二万多种花色，产品行銷全国許多地方，一部分还供应出口的需要。大跃进以来，上海市輕工业在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积累了一些經驗。一九六〇年，随着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广泛而深入的发展，上海市輕工业企业，积极采用和推广了許多新工艺、新技术，加强了技术管理，深入开展了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的群众运动，使輕工业品的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一九六〇年底对一百一十五种主要产品的調查統計，产品质量稳定和高的占百分之八十七，其中八十一一种产品的质量，已經接近或者赶上国内外的先进水平。这一年来，有七千八百多种新产品、新花色投入生产，其中高級、精密的产品就有三百六十六种，比一九五七年增长将近五倍。可以說，上海市輕工业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是矛盾統一的两个方面。增加产品数量，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消耗，是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基本要求。日用輕工业品的原料材料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来自农业，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原料材料消耗，也是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农业原料的一个重要

措施。中共上海市委一再指出，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从各方面挖掘工业的潜在力量，使一份材料抵几份材料用，一件产品抵几件产品用，一个人抵几个人，一个厂抵几个厂。在市委的领导下，上海市的輕工业企业，不断地向广大职工群众进行提高产品质量的思想教育，以求全面地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針，同时又不断地对輕工业产品进行分析排队，調查研究产品质量上存在的問題，通过群众运动进行檢查对比，交流經驗。

在上海市的輕工业企业中，有些同志曾經满足于已經取得的成績，他們只看到本企业产品的产量、质量的提高，而沒有看到其他先进企业比本企业进步得更快，更沒有看到国家建設和人民生活对輕工业的要求不断提高，因而产生驕傲自滿思想；另外有些同志，看到本企业的設備比較陈旧，原料材料的供应还不能滿足需要，因而对提高产品质量缺乏信心，在困难面前产生畏难情緒。这两种思想对不断提高产品质量都起着不利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上海市輕工业的各个企业，在各級党委领导下，紧密結合生产运动，大讲形势，大讲任务，深入进行总路綫的思想教育；同时充分发动群众，大鳴大放，大辯論，揭发产品质量上存在的問題，分析原因，提出改进的措施。通过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通



过开展提高质量的群众运动，上海市轻工业企业的广大职工，觉悟大为提高。他们鼓足干劲，树立起力争产品质量第一流的雄心壮志，加强了多快好省的全面观点，克服了在部分同志中存在的骄傲自满思想和畏难松劲情绪，研究出解决质量关键问题的具体措施。“雄心加措施，力争第一流”，已经成为广大职工群众的行动口号。

在进行思想教育工作中，各厂普遍发动群众，采取“听听、比比、议议”的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使每个职工不仅了解产量指标，而且了解每一产品的质量要求和规格标准，从而使人人关心产品质量；力争做到高产优质。为此，许多轻工业行业和企业搜集了大量的国内外产品的样品和资料，举办产品质量展览会，进行广泛的访问活动，把本单位的产品的质量情况同国家标准和各方面先进水平进行对比。在扩大眼界、明确方向的基础上，组织职工进行“想人家，比自己，找问题，查原因”的议论，树立大志，制订提高产品质量的规划，提出切实的措施。这种议论，既是检查和研究改进产品质量的过程，也是反复进行提高产品质量的思想教育的过程，又是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一起深入调查研究的过程。这样，在不断解决了思想认识问题的同时，也找到了提高质量的途径和有效方法。

一年来，上海市不少轻工业工厂，组织了领导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队伍，到用户、商业部门、兄弟地区和兄弟厂，以召开用户座谈会、产销联席会议等方式，进行了二千多次访问活动。在这期间，还举办了各种规模的产品质量展览会、质量评比会

和鉴定乐器、运动器具等产品质量的演奏会和表演会等达五百多次。日用轻工业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实际使用的需要，用户是产品质量的最后检验者和鉴定者。生产单位同使用单位等各方面经常保持联系，把日用轻工业品的质量置于广大消费者监督之下，就能够经常了解用户对产品质量的要求，激发生产者提高产品质量的劳动热忱。

上海市搪瓷工业通过质量对比展览会，进行自我教育，从而提高产品质量的事例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上海市搪瓷工业中有些厂，原来把产品质量赶不上兄弟地区的原因，完全归之于煤质差，硼砂、粘土等原料材料的规格、数量不能满足生产要求等客观条件。在一九六〇年十月开展的“力争产品第一流”运动中，在有关单位的协助下，这些厂搜集了全国质量第一流的西安人民搪瓷厂的产品，同上海市搪瓷产品一起举办了质量对比展览会。通过参观，组织讨论，看到上海市搪瓷产品的光泽、白度、细腻等方面都赶不上西安的搪瓷产品；同时也看到某些厂的试制小样已经赶上西安的搪瓷产品的水平，因而改变了原来不正确的想法。搪瓷工业广大职工提出“大战一月，决心赶上西安”的口号，一方面由领导人员和工人、技术人员组成三结合的队伍到西安“取经”；一方面，各厂开展“比志气、比操作、比质量”的大竞赛，各工段、小组都在详细检查自己操作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制订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的具体措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各个搪瓷工厂中贯彻执行了一百多条重要措施，使产品达到全国先进的水平。



要提高产品质量，除了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以外，还必须进行巨大的组织工作和复杂的技术工作。轻工业生产的产品数量大、品种多、工艺复杂、协作面广。从原料投产，经过每一道工序的加工，再到装配，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有产品质量的问题，每一个环节的处理是否得当，都会影响产品质量的好坏。要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不仅需要对产品进行严格检验，更重要的是要不断改进每一个生产环节、每一道生产工序的加工质量；不仅需要发动主要工种工人革新技术，而且要求全体职工，包括运输、储存以及其他各种辅助工种工人，全面地改进工作；不仅要发动工人群众提高技术操作水平，而且还需要相应地提高整个生产过程的管理工作水平。因此，提高产品质量的思想教育和调查研究工作，一定要结合不同企业、不同产品、不同工种的实际条件来进行，造成一个广泛而深入的群众运动，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人人关心产品质量，道道工序把关，针对产品质量上存在的问题，献计出谋，从各个方面来保证产品质量的提高。从上海市的实践经验来看，主要抓以下三个环节。

第一，必须从原料材料的处理抓起，只有原料材料的质量提高了，加工产品的质量才会有保证。投料是任何生产过程的第一步，也是保证产品质量的第一道关。原料材料的品种、规格、性能符合产品制造的要求，才能为整个加工过程提供有利的物质前提。上海市轻工业在持续跃进中，原料材料的供应，在品种、规格上，有时不能满足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的要求，对产品质量的

稳定和提高，带来了一些困难。我们根据产品质量的要求和原料材料的变化，积极采取措施，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和提高。上海市轻工业在一九六〇年中，积极发动群众，开展了“劣煤烧高温”、“次料生产好产品”等提高产品质量运动，使土草浆、废次钢材、土铁、次煤等次级原料和燃料，生产出质量较高的白纸、包装纸、日用金属制品等产品。在具体做法上，我们一方面加强原料材料的管理和合理利用，另一方面根据可能条件，大力增产各种专用原料材料。

加强原料材料的管理工作和合理利用原料材料，是提高产品质量的一个重要问题。轻工业品的原料材料，规格性能多变，要正确了解它的性能和特点，就必须认真加强原料材料进厂和投产前的检验、化验工作。对一些应该分等使用的原料材料，采取分档分级、量材加工的办法使用，坚持优材优用、大材大用、专料专用的原则。对规格品种不合格的原料材料，经过加工处理后，可以符合产品物理性能或化学性能要求的，坚持先处理，后投产。原料材料经过处理，改变了它的原有规格和性能，不仅限制了它对产品质量发生不利的影响，而且从中摸到经验，进而有利于改进产品质量。上海市钟表工业把延展性很差的硬性铁皮，经过多次冲压、回火等措施和多次拉伸试验，改变了原来的性能，不仅保持了闹钟的质量，而且逐步掌握了硬性铁皮的加工工艺，进一步提高了闹钟的质量。在原料材料的发展不能适应生产发展需要的情况下，通过改进工艺、改善操作来提高原料材料的性能，这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的一个有效方法。工人们



說得好：“三分原料，七分操作。”

对輕工业产品质量有关的专用材料，应当根据可能条件，大力进行增产，大搞多种經營，补充原料材料的缺門。几年来，上海市輕工业共有六十六个单位組織了原料材料生产，为二百多种輕工业产品提供了部分必要的原料材料。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国家分配物資的不足，滿足了对原料材料数量的要求。其中有許多还是生产所必需的关键性原料，如钟表工业的发条，造纸工业的燒碱和液氨，制笔工业的鐵粒，鞣革工业的紅矾，日用刀剪工业的合金鋼，日用化妆品工业的硬化油等。此外，在一九六〇年中，上海市輕工业还利用廢料、廢水、廢气，生产和提取了鉻酸等一百零一种日用輕工业品的原料，也大大有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

第二，不断革新技术，是充分发掘生产潜力，把产品质量推向更高水平的犀利武器。产品质量是生产技术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产品的质量总是根据每一时期社会生产的发展要求和生产水平来制訂的。要提高老产品的质量，对老产品进行改型，使它的效能增加；要試制和生产新产品；要对規格不符合要求的原料材料进行加工、改制，以及創造和采用产品质量的檢驗仪器和工具，提高檢驗和鉴定水平等，都要求从各方面革新技术，改革旧工艺、旧技术、旧設計，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設計，不断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一九六〇年以来，上海市輕工业企业不仅努力提高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的程度，同时也把提高原有产品的质量，增加新花色、新品种，作为技术革新、技术

革命的主要内容。一九六〇年，上海市輕工业企业实现的革新技术的项目中，有一万多项是直接有关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产品品种的。这些项目的实现，使企业增加了对低次材料的处理能力，提高了設備和工夹模具的精密度，推行了强化化学反应等新工艺、新技术，改善了操作水平，大大提高了产品质量。如香精香料的凝固点和温度，金笔笔尖的圓滑度和漏水温差，紙張的光洁度和拉力，钟表、照相机等日用金屬制品的精密度，都有显著的提高。我們在具体做法上，首先对产品作全面排队分析，针对质量上的薄弱环节，发动群众，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分期分批地加以解决。排一批项目、攻一批项目，檢查一批、再排一批、再攻一批，做到方向明确，目标集中。上海市金笔制造工业，几年来組織各厂排出了十个重大质量关键問題，集中全行业的老工人和革新技术的积极分子，組成专业的技术队伍，协同各厂的有关人員，分头研究。經過一段时間的反复試驗，实现清洗水箱的新工艺和开深环槽等革新措施，彻底解决了上海市制笔工业三十年来长期存在的漏水温差問題，做到了温度相差摄氏四十度以上而不漏水，达到了先进水平。在这个基础上，又进一步試制成功在三千公尺高空不漏水的高级金笔。为了解决笔尖圓滑度的关键問題，又經過几百次試驗，采取許多措施，跳出了手工操作的旧框框，实现了磨笔尖的新工艺，使笔尖圓滑度由三面好写提高到四面光滑，五面好写。

在革新技术的过程中，我們对每一项新工艺、新技术、新配方、新設備和新产品，



都坚持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任何一项新技术，从创制到使用，都有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在普遍推广时，也要结合具体条件（设备、技术等）逐步进行，方能取得实效。通过革新、总结鉴定、改进提高，再革新、再总结鉴定、再改进提高这样一个实践的过程，我们才能逐步摸索到技术发展本身的规律，使每一项技术的革新，都能真正在生产上开花结果。以上海自行车二厂为例。这个厂生产摩托车，从试制成功到投入生产，经过了以下的步骤：先将试制成功的摩托车，装配五辆，作出初步总结鉴定，并加以改进；又试装二十五辆，再进一步鉴定，并经过实地行驶，然后再总结提高，成批投入生产。由于经过反复试验，不断改进，摩托车的质量不断提高，性能愈来愈好。

经过革新所实现的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新原料、新产品，都是能够提高生产、提高产品质量的。但是如果工人没有掌握与之相适应的操作技术，这些革新的技术还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操作，都包含着丰富复杂的技术内容，对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不断改进操作技术和提高操作水平，才能够保证提高产品质量。一九六〇年，上海市轻工业企业各级党组织，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提出了“人人掌握新技术，个个跨上千里马”的口号，并且以业余学校为基地，进行系统的操作技术知识的教育，广树标兵，组织先进生产者进行技术表演赛，互相交流经验，订立师徒合同，包教包学，先后组织了十万余次大小规模的技术

操作的“练兵”活动，对提高产品质量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广大群众很欢迎这些形式多样的“练兵”活动，他们说：“大家总结大家谈，大家表演大家看，互为师徒互相学，既取经来又传宝”。

第三，实行产品质量分级管理、层层负责、人人把关，加强设备维修，贯彻质量管理“以防为主”的方针，是巩固和扩大提高产品质量群众运动成果的重要环节。我们的具体做法是：在管理制度上，分级管理，层层负责，既要充分发动群众，又要加强集中管理；既要小组管理为基础，又要加强专业科室的指导作用。我们将产品按名牌、主要、重点、一般等进行分类，在改变配方、变更工艺方面，确定分别由局、公司和生产厂审批的权限和产品质量检验的职责，加强了对产品质量的集中管理。由于不少轻工业的原料和成品具有较强的时间性，加上工艺复杂，划分较细，不合格的零件和在制品，在加工过程中被及时发现，往往可以重行处理等，因此在加强集中管理的同时，发动群众人人把关，“以防为主”，就显得特别重要。

小组管理是群众管理的基本形式。上海市的许多轻工业工厂，在提高产品质量的运动中，加强了小组对产品质量的管理。不论是原料材料、在制品、半成品或者成品，在小组中都要进行质量检验工作。在小组中，还建立了产品质量分析制度、质量统计制度等。这就使小组成为加强产品质量管理的基点。每个小组的成员都参加质量管理，使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管，小组每个成员既是生产工人，又是质量管理员，边生产，边检验。不少轻工业工厂还推行了群众性的



提高质量的生产鼓动制度，经常提醒工人注意产品质量，从而大大降低了产品废品率、退修率。工人們的体会是：“过去干活闷着干，合格不合格心中无数，等到檢驗員发觉了，已經做出了一大批不合格品，有的送走了再退回来，搞不清是誰做坏的，也不知道是怎样做坏的。現在自己負責檢驗，有了問題立即想法解决，廢次品就少得多了。”广大群众加强了对提高产品质量的責任心，反过来又有利于小組根据具体情况，修訂和健全提高产品质量的制度。这些来自群众实践的管理制度，也就更能为群众自觉执行和不断发展。

小組管理和专职管理必須互相結合。加强了小組对产品质量的管理工作，使质量檢驗工作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就能够使专职檢驗員在工作中爭取主动，更好地提高檢驗工作的质量，并且帮助工人解决生产中的质量問題。上海市許多輕工业工厂的专职质量檢驗員，在群众性的质量檢驗工作开展以后，也采取了“变堵为防，变堵为帮”的方法，开展了抓标准、抓措施、抓分析、抓宣傳、抓評比的“五抓”运动。在自行车、钟表、照相机等金屬制品行业中，专职檢驗員对关键性冲压等工艺，实行首件檢驗，对組合完工的部件，則进行逐件檢驗。在日用化学制品行业，专职檢驗員着重抓抽样化驗，并主动到小組进行巡迴檢驗，結合生产工人的自檢、互檢制度，发现先进，及时組織交流經驗，发现质量問題，随时帮助工人解决，工人遇到有质量問題时，也主动找他們商量。这样，质量檢驗員既是檢驗員，又是宣傳鼓动員，既担任檢驗工作，又組織技术交流，把

质量檢驗工作做活了。

产品质量的提高，要求大力加强技术后方。在上海市輕工业中，有不少行业設備比較复杂，产品变化快，要求工夹模具数量大，精密度高，因此，加强技术后方，健全設備維修制度，也是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花色品种的一項重要措施。我們在加强专业的維修能力的同时，也扩大了群众的維修队伍。这两者的結合，保证了設備正常运轉和工夹模具应有的精度。几年来，上海市輕工业已經拥有三十个設備修造厂，二十多个模具厂，有专业修配人員五千三百人，形成了一支强大的維修队伍。大部分工厂也設有專門的修理車間或維修小組。随着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在广大生产工人中形成了一个“操作什么，会修什么”的学做多面手的运动，大兴群众保养設備之風，并使之形成定期大修、中修、小修等維修保养的制度。很多工厂不但注意了設備的保养和維修，建立了制度，而且还貫徹了“小修不出車間，中修不出厂”的自力更生的精神，保证了設備維護工作的及时性和經常化，有力地促进了产品质量的提高。

爭取工业产品的质量 and 品种方面的跃进，是工业战綫上今后两三年內的一項主要任务。我們上海市輕工业职工將坚决貫徹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的精神，进一步总结和推广已有的成功的經驗，大大提高輕工业品的质量。我們有这样的志气和决心，不但在产品的数量上，而且在质量、品种上，为滿足人民生活 and 国民經济建設的需要，做出更大的成績来。

（編者按：本文作者是上海市輕工业局局长）



走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南斯拉夫农业

廖原

铁托集团一贯说他们正通过什么“独特道路”在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在农业方面，他们自称选择了一条“建立现代化大型农业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好道路”，吹嘘说他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农业组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事实真相如何呢？

一九五一年，南斯拉夫原有六千八百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拥有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六点六和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一。从一九五三年起，铁托集团大批解散合作社。一九五三年三月，铁托集团颁布“关于合作社财产关系和改组农业生产合作社法”，任意解散合作社，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自由租赁和雇佣劳动等。卡德尔在《论我国农村政策中的某些问题》一文中，露骨地提倡在农业中实行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说什么南斯拉夫农业政策的第一个原则是：“使农业摆脱行政领导因素，并把农业发展建立在各种经济力量自由竞赛的基础上。”一九五四年四月，铁托在一次讲话中说，南斯拉夫政府“从上到下的政策必须是支持个体农民”。铁托集团否定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提倡发展资本主义的合作社和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农场。铁托在同一篇讲话中说：“在农业发达的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里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合作

形式。这些形式对我国社会也是有益的。”一九五五年七月，他在对美国“埃迪·薛伍德”研究班人员的谈话中说：“我们在思想上不放棄有一天在南斯拉夫以某种方式把小农庄合并起来，并且在这方面寻求一个‘对立双方共同的生活方式’。在美国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由于铁托集团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和措施，使南斯拉夫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几乎完全垮台。目前，在南斯拉夫农村中，个体经济拥有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资本主义正在蔓延滋长，农民已经在向两极分化。

在南斯拉夫，由于土地是自由买卖的，富裕农民可以合法地兼并贫苦农民的土地，并且可以把比较贫瘠的土地卖掉，买进比较肥沃的土地。许多贫苦农民无力经营自己的土地，不得不把土地卖掉。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三日的南斯拉夫《战斗报》写道：“近几年中，在个体农业者之间的土地流通相当活跃”，“在某些地区”，农民“越来越多地要出卖土地”。

农村阶级分化的状况，从土地分配的數字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八年，个体农户从一百九十六万多户增加到二百三十三万多户，增加了三十七万多户，其中，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富裕农户只增加了



三万七千多户，而占地五公顷以下的农户*却增加了二十六万八千多户，为前者的七倍多。一九五八年，占地五公顷以下的农户共占个体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但他们占有的土地，仅占个体农户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八，而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富裕农户只占个体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三点六，却占有个体农户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九。这些数字表明：在南斯拉夫农村中，大多数人正在贫困化，他们只占有很少的土地，而能够上升为富裕农户、占有较多土地的，只是一小部分人。这是个体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是铁托集团把南斯拉夫农村引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有力证明。

富裕农民还可以通过租赁土地，扩大自己的耕种面积。根据《南斯拉夫一瞥》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号的材料，一九五六年个体农户共出租土地三十七万公顷。出租土地的原因，大多数是由于力量薄弱，劳动力、耕畜、农具不足。这些出租的土地，大部分为富裕农户所租去。《战斗报》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三日说：“某些农业生产者耕种着几乎超过土地最高限度**一倍的面积”，他们“实际上把自己占有的土地增加了一倍”。

南斯拉夫很大一部分农户缺少耕畜和农具，如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百分之四十三的农户没有耕畜，百分之五十三的农户没有犁耙。拥有较多的耕畜和农具的富裕农民，不仅可以租种那些自己无力耕种的农户的土地，而且可以把耕畜、农具出租给缺少这些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户，进行剥削。

南斯拉夫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个明显标志是雇佣劳动的普遍发展。据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的《共产主义者》周报报道：一九

五六年，在塞尔维亚，占地八公顷以上的农户有百分之五十二都雇佣劳动力。他们剥削的对象，是那些缺少生产资料的农业劳动者。

在南斯拉夫，依靠放高利贷发财的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的《解放报》说：在“某些地区，仍然出现了一些旧高利贷者”。这家报纸举例说：托博依县泽列尼卡村的奴伊奇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两年中，放出的高利贷有六百万第纳尔现金、五千八百多公斤粮食和一千五百多公升白酒，利率最少是百分之十，多的超过百分之百，榨取利息达五百多万第纳尔，有七百八十户农民欠他的债。报纸还说，“如果不及时报还债，他就在家门口出卖负债农民的最后—头乳牛”。

铁托集团一方面大批解散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另一方面又吹嘘他们的所谓“综合农业劳动合作社”对于发展农业生产的作用。其实，这种合作社完全是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以赢利为目的的农业组织。

经营商业，在“综合农业劳动合作社”的业务中占有最大比重。合作社利用农产品自由贸易和价格自由涨落的条件，大做投机生意，一方面剥削农业生产者，另一方面剥削城市消费者。如一九五八年南斯拉夫农业减产，合作社和其他商业机构就抬高农产品销售价格。一九五九年农产品收成比一九五八年增加，合作社就破坏同农民签订的收购合同，减少收购数量，不惜让农产品烂在地里。

同个体农民进行生产上的所谓“合作”，

* 据《南斯拉夫一瞥》1959年1月号材料，占地五公顷以下的农户一般是缺粮户。

** 铁托集团规定私人每户占有土地最多不得超过十公顷（土地贫瘠地区为十五公顷）。



也是“綜合农业劳动合作社”的一项业务。合作社同个体农民签订合同，代个体农民耕地、播种、收割、运输等等，或者是租种、包种个体农民的土地。个体农民则根据合同给合作社以报酬。这种“合作”的情况是很不妙的。许多农民在同合作社的“合作”中欠了债。据一九六〇年十月六日的《共产主义者》周报报道：和合作社合作的农民总共只有五十多万户，他们欠合作社的债务达一百三十六亿五千多万第纳尔，其中到期未还的债务超过了七十亿第纳尔。由于种种原因，合作社发生亏损的情况也不少，这当然是违反铁托集团的愿望的。在这种情况下，铁托集团的宣传机关公然鼓吹合作社不要同贫苦农民合作，而应当只同富裕农民合作。一九六〇年九月十日《战斗报》以南斯拉夫产粮地区奥西耶克县的情况为例写道：“在奥西耶克县，百分之五十的农户只占有三公顷以下的土地。”“事实已经证明，在合作农民中间，大部分农民的全部产量，仅够家庭食用，他们没有剩余来出售，也没有剩余偿还债务”。这家报纸以富农阶级代言人的语调说：“和这些不生产商品的生产者进行合作，会有什么结果？是否要在他们本来不可能正常维持生活的土地上免费保证他们的生活呢？这样对谁有利？”这家报纸的结论是：“同比较稳定的农民（按指富裕的农民）建立合作是更赢利和更合算的”。

合作社还经营自己的农场，从事部分的农业生产。这种农场，也完全以赢利为目的。它们雇用工人为他们生产利润，并普遍向个体农民购买或租种土地，扩大耕地面积。一九五九年，合作社雇用固定工人六万八千多名（农忙季节还雇用许多临时工人）。农场之间有着剧烈的竞争。那些经济力量较弱、

生产成本较高的农场在竞争中敌不过那些经济力量强大的农场，往往弄得亏本、倒闭或被后者所吞并。农业工人的生活状况很坏。一九六〇年九月三十日的《经济评论报》说，由于农场情况恶化，“占百分比很大的农业工人仅领到最低限度的个人收入”。许多工人难以维持生活，只好流亡到城市谋生。

南斯拉夫这种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合作社，给富农造成了极其有利的活动场所。富农逐渐把持合作社的经营大权。据《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经济政策》一书记载：一九五六年在合作社管理委员会中，占有两公顷以下土地的农民所占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十五点三，而占有八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民却占百分之二十五。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新闻周报》报道了一个“亏损的合作社”的情况，这个社的管理委员会委员和会计、出纳、收购员等重要职务大都由富农把持，他们在半年内就使这个合作社损失了将近六千万第纳尔。

这种“綜合农业劳动合作社”由于得不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已经处在危机之中。合作社的数目和社员人数不断减少。据《南斯拉夫一瞥》一九五九年六月号所载，一九五〇年这种合作社有八千零四个，社员三百五十四万人，一九五八年社数减少到五千一百九十七个，社员减少到一百三十七万人；又据南斯拉夫通讯社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七日报道，社数在一九六〇年只剩下不到四千八百个了。

上述情况清楚地表明，近十年来，铁托集团在南斯拉夫农村中实行的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已经把南斯拉夫的农业引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人们从这里可以看出，铁托集团的所谓“独特道路”，其实只不过是同社会主义完全相反的资本主义道路罢了。

